

文革回憶錄叢書

# 我親歷的 國務科委文革

輝仁祥 著

文革回憶錄叢書

K8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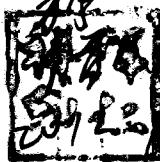
37

# 我親歷的

# 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國防科委  
東南大學  
校友  
惲仁祥



SEU 06683103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文革回憶錄叢書  
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惲仁祥 著

責任編輯：林 涛

封面設計：胡 冬

ISBN 978-988-16347-2-6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12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2012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 33 號豐盈工貿中心 5 字樓 G 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 00852-3921 6033

Fax : 00852-2528 5333

網址：<http://www.cccpress.com>

Email : [info@cccpress.com](mailto:info@cccpress.com)

: [sales@cccpress.com](mailto:sales@cccpress.com)

發行：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地下

G/F,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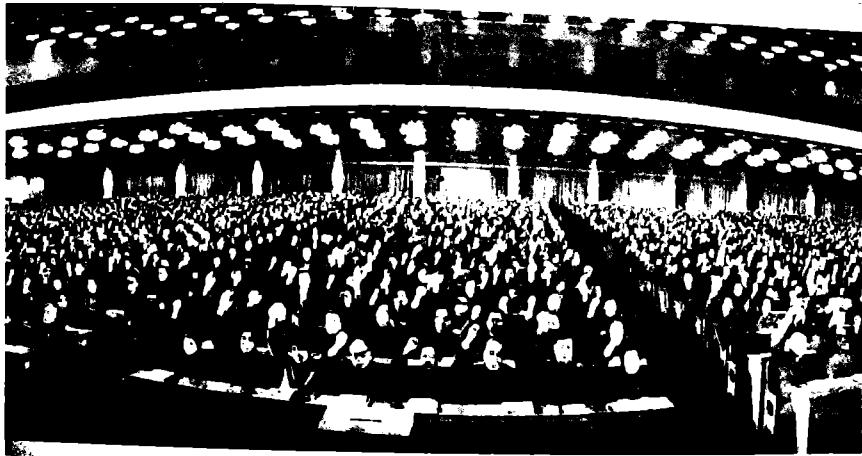
Tel : 00852-23818251

Fax : 00852-23971519

定價：HK\$ 110 元



■毛主席像：惲仁祥於  
1968年8月繡



■作者在全國四屆人大會上(1975年)。箭頭所指為惲仁祥(第三排)；  
作者右邊為總後政委郭林祥；前第一排(左一)為張愛萍



■ 2007年和原國防科委司、政、後戰友探望陶魯筭同志。左起：尹香金、尹同太、陶魯筭、惲仁祥、康華清



■ 2011年5月25日原國防科委司、政、後戰友在八寶山向陶魯筭同志遺體告別時留影。左起：湯月英、惲仁祥、李敏、康華清、劉宗仁、尹香金

## 序言：為文革正名的一篇佳作

林伯野

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可以和法國巴黎公社、俄國十月革命相媲美的衝天創舉，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防止蛻化變質，與舊制度、舊觀念徹底決裂，向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前進的必由之路。

可是，自從毛澤東逝世，文化大革命被扼殺、被否定、被歪曲、被妖魔化以來，三十多年過去了，謬論橫流，莫衷一是。文革真相，極需澄清。惲仁祥同志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就是一篇為文革正名的佳作。

他不但親自經歷了文革，而且以一個真正的造反派的身份參加了文革。他不但是造反派，而且是一個相當大的部門——國防科委的知名造反派頭目，因此，他不但寫了很有份量的大字報，他反映的情況，得到了毛主席親自批示支援。他向中央文革反映重要情況，還得到過江青同志寫信回應和支持。他參加了革命的三結合，並曾擔任該單位黨組副組長。陶魯笳、錢學森等領導親自蹲點並支持過他。當造反派挨整時，他也被打擊、被關入私設的“監牢”，被無理中止工作。我們可以從他的經歷中，從一個側面瞭解到文革的全過程。

若干年來，寫文革回憶錄的人已很多了，有的人立場不對，方法不對，自然寫不出高品質的作品。惲仁祥同志既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又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他生長在一個被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搞得家破人亡的革命家庭，是共產黨、新中國解救了他。他的哥哥在他少年時已是共產黨員。解放不久，他加入共青團，成了基層幹部。是共產黨培養他從中學到大學，參軍，搞國防科研工作。由於他有這樣的經歷，他能有堅定的正確立場。

本書引用了大量資料，這說明作者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唯物論原則。文章中運用了文革時期和現實生活加以比較的方法。他說：“毛主席關於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於歷史的週期律；直至他晚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系列講話，如果 30 年前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則近 30 年共產黨資本主義化的現實教育，就完全能理解了。”

作者的語言明快而深刻，如：“抹不黑的毛澤東，塗不紅的走資派”；現在是“吃了前人的，用了後代的，剩下是給美國的”等，使人讀起來不感枯燥。

文章揭露了軍隊高層某些上將甚至元帥的重大錯誤，由於這些情況鮮為人知，所以對瞭解歷史真相更加珍貴。

2011 年 5 月 25 日

林伯野：原南京軍事學院政治教員，曾經受過毛主席接見；後調國防大學政治教研室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長等職。現離休、副軍級。

## 抹不黑的毛澤東 塗不紅的鄧小平

——讀《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肖衍慶

今年7月下旬的幾天，我到京郊延慶一家養生家園去避暑。為我們服務的青年同志知道我愛看書，就私下對我說：“肖老師，你就在家看書吧。”這樣，我一連看了4天書，一口氣讀完惲仁祥同志寫的《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一書（以下簡稱《親歷》），深感這本書是目前反映文革的一本好書，值得我們大家認真討論一番。

好在什麼地方呢？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談一下我的感受。

### （一）它全方位描繪和捍衛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作者是寫親歷，所以他能把他親歷的單位文革過程同整個文革過程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反映出文革的全貌，又能看出文革在一個單位的展現。這就使人對文革的認識有了一個立體感。

有人說，這本書攻擊了聶榮臻元帥、張愛萍這樣的將軍。我不這麼看，聶榮臻這樣的元帥，張愛萍這樣的

將軍，他們在文革中的表現，說明他們是文革的反對派。他們的這種態度，連毛主席、周總理都看出來了，批示要徹查他們的問題。如果聯繫到他們在鄧小平翻案復辟中的表現，那他們都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誠然，他們各自都曾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也和鄧小平有過一些矛盾。但是，走資派這個總定性決定了他們和人民的根本對立。

在文革期間，毛主席反覆教導我們，要從路線上看人看事。他在病重時曾對華國鋒說：“葉劍英也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極端不滿的分子，再不要讓他插手軍隊的工作了。這兩年軍隊的情緒不穩定是和他有關係呢。許多政治謠言，和他有很大關係呢。”我從這本書第一次看到這段話，立馬感到華國鋒是地道的叛徒。毛主席把這話都向你交了底，你竟然和葉劍英勾結起來抓捕“四人幫”，這絕非一般私心所致，是明顯的背叛行為。

從路線上看人，就是要看他對文革的態度。對葉劍英，毛主席是這麼看的，對周總理，毛主席也是這麼看的。他說：“總理組織上是緊跟我的，思想上是跟劉鄧的，他並不真正理解文革。”我想，總理對文革理解的局限性，恐怕就是對鄧小平的認識上。在生命的最後的日子裏，他把黨和國家的危險性放在“四人幫”身上，而把希望寄託在鄧小平復出上。當然，當毛主席部署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以後，他就停止了一切保鄧的活動。即使葉劍英派了兩個人，拿著兩張紙，日夜守候在總理身邊，想記錄下總理說出對他們有用的話。結果，一個字也沒有等出來。總理沒有違背“組織上緊跟毛主席”

的原則。

毛主席這樣看人看錯了嗎？沒有。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主席這樣看人是極富遠見的。我常想，連總理都不能真正理解文革，我們自己呢？難道沒有重新認識的必要嗎？所以，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認識毛澤東。我認為這是當今首要問題。而重新認識毛澤東的要害，就是重新認識文革。

作者正是根據這一點，向我們描繪了聶榮臻這樣的元帥、張愛萍這樣的將軍，在文革中的真實表現，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去相信，反而認為這是“攻擊”呢？這說明至今我們有些人就是不願從路線上看人，特別是不願從對文革的態度上看人。如果是這樣，那他們的“革命”，又從何談起？

毛主席為什麼把對文革的態度作為識別人的標準呢？這是他老人家對自己辦的第二件大事意義的深信不疑。全世界一百多個共產黨不信馬列，社會主義陣營諸多國家變修。面對這樣一個嚴峻的形勢，毛主席以開天劈地的氣概，把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原則運用到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掀起人民群衆參加國家管理的偉大實踐。從此以後，凡是站在這個實踐的紅線上，就是革命派；凡是不邁這個門檻的，就是不革命派，甚或反革命派。這個標準將持續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實現。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本書對聶榮臻、張愛萍的揭露，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它讓沒有參加過文革的人，可以看透這些昔日的功臣是怎樣變成革命罪人，從而看

到文革的必要性。正是耀眼的“元帥”、“將軍”這些頭銜，增加了人們識別他們的困難。他們從政治上的反動，到生活上的腐化，就使他們必然選擇資本主義道路，而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

《親歷》在捍衛文革方面幾乎是全方位的。凡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給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編造的謠言和事件，它都給以撥亂反正。這反映出作者巨大的政治勇氣。

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是幾億人民參與的偉大革命運動，又是長達十年的革命運動。反革命修正主義者要翻案復辟，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為了這一點，他們利用他們在黨內那點騙人的威望，不顧一切廉恥地編造謠言和事件，企圖欺騙人民跟著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文革，全面否定文革自然就成為他們起家的基石。他們急急忙忙給天安門事件平反，急急忙忙給劉少奇平反，急急忙忙做“決議”，徹底否定文革，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

但是，謠言和詭辯，不但逐漸被他們的翻案復辟活動所打破，而且使文革的光芒重現在人們心頭，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成為人民在黑夜中的燈塔。劉少奇、鄧小平成為人民最痛恨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頭子。

就說劉少奇。他們原本以為給平了反，文革就站不住了。誰知鄧小平的翻案復辟，把劉少奇那條對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修正主義路線“克隆”得惟妙惟肖，淋漓盡致。劉鄧原是一條藤上的瓜，這在老百姓心裏是明鏡似的清楚。

《親歷》抓住六十一個叛徒集團案中的《反共啟示》

的反動實質，就把劉少奇這個叛徒的嘴臉揭露無遺。1935年11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們以“全國救亡工作緊張，北方局幹部缺乏”為由，策劃了一個要關押在北京軍人反省院一批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的計畫；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張聞天背著毛主席，以中央名義批准了北方局的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傳到監獄，反省院的黨員不相信，沒有執行。後來組織催促，他們才發表《反共啟示》出獄。文革中，紅衛兵把當年發表在報上的《反共啟示》寄給中央文革小組，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視。

1967年2月3日，毛主席會見阿爾巴尼亞外賓時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反共的啟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這些方面，紅衛兵小將是有功勞的。”

從毛主席這段話裏可以看出，這個《反共啟示》要害的兩句話，就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在這樣的書上簽字，不是叛徒是什麼！所以獄中的共產黨員憑著起碼的覺悟也會拒絕簽字。但是，一作為“組織決定”，很多人就糊塗了。那麼現在看來，這個“組織決定”是背著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毛澤東同志做出的，是地地道道的盜用組織名義組織的一次集體背叛活動。從解放後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看，他策劃的這次活動不僅是他叛徒哲學的使然，也是他這條組織路線的早期反映。像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這些叛徒自然就成

為劉鄧司令部的骨幹。鼓動獄中黨員叛賣黨，然後再混入黨內，那些不堅定分子，能為黨好好工作嗎？具有叛賣思想的分子，不是內奸是什麼？因此，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是誰也摘不掉的。毛澤東把《反共啟示》事件看做劉少奇問題的性質變化的分水嶺，是十分有道理的。

有沒有對“組部決定”也不服從的共產黨員？有，這就是唯一位劉格平。對這樣一位敢於保持共產黨人氣節到底的人，劉少奇竟然恬不知恥地用叛徒哲學說服人家。解放後，劉少奇給他解釋說：“你不瞭解形勢，當時需要像你們這樣的人投入抗日戰線，發揮很大的作用，你不出來對黨的事業有影響，你自己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做不了多少工作。”劉格平說：“我不是不瞭解形勢，我瞭解形勢，也相信中央對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可是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看了《反共啟示》，於心不忍，我不能在上面簽字。既然是中央指示，別人出去我並沒有反對，只是我不能簽字。”這段對話，把革命者和叛徒的人格、心境對比得多鮮明。

在這叛賣成風的時代，我們耳邊不禁響起魏巍同志生命最後的遺言：繼續革命，不當叛徒！我們同樣喊出：捍衛文革，不當叛徒！

## （二）它全方位揭露和批判了“改革開放”

作者像是給“改革開放”安放了全方位的攝像頭，在《親歷》裏，幾乎可以看到“改革開放”30多年間全

部的罪惡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這種揭露，往往是同捍衛文革相聯繫的。有時是為了捍衛文革而揭露“改開”，有時為了揭露“改開”而對比毛澤東時代。這種巧妙的對比方式，使人讀起來很有感染力和說服力。作者能做到這一點，那是要有很強的鳥瞰式的觀察力。

比如關於文革中武鬥和死人問題。這是我國走資派抹黑毛澤東的一個慣用手法。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三千萬人，右派製造的這個謠言，竟然成了中央政治局多次討論通過的黨史二卷的官方數位。最近有文章揭露，最早的一700萬數字的研究者也聲明這個數字沒有經過核實。這個數字在80年代能作為國家研究課題提出來，就是一種挑釁性的問題。據說1985年6月，我國有關官員參加一次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會，便產生了“研究中國大饑荒期間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願望”，這個願望很快就變成了“國家研究課題”。很顯然，這是有意配合當時抹黑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潮流。最早的研究專家竟然在“因我手頭沒有詳細資料，許多計算結果都在手稿等資料堆中，要待我有機會再來整理”的不準確的境況中，就公佈出1700萬非正常死亡人數。對於這樣一個演繹過程，知情人應該徹底揭露。

《親歷》根據右派們這樣不顧事實的捏造，在揭露他們誣衊文革武鬥和死人問題時，巧妙地提出“看看究竟是誰在屠殺人民？”這個對比太重要了。人們清楚地看出，文革是保護絕大多數人民的。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質。從黨中央、毛主席那兒早就明令要文鬥、不要武鬥。凡是發生武鬥的地方，都有走資派和階級敵人挑撥的身

影；甚至武鬥的槍支就是他們發的。相反，走資派搞資產階級專政、法西斯專政，直接鎮壓人民，槍殺無辜愛國學生和市民，暗殺知情的公安幹部，逼死敢與反抗他們的仁人志士。所謂三次嚴打，更是不知錯殺了多少冤魂。至於黑監獄、黑磚窯、黑煤窯、黑礦難，連同鐵路、公路不該發生的事故，死難的同胞更是不計其數。還有因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或生命所迫而走上絕路的人，更是遍佈全國各地。

在這一條裏，我建議再加一個內容。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把鬼變成人，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把人變成鬼。你看“改開”以來，有多少人倒在金錢和石榴裙下。前幾年，有網文說，倒下的超過了淮海戰役的傷亡人數；現在，這個數字要翻幾番哩！（本書作者註：現在每年非正常死亡 800 萬，30 多年是多少？誰敢計算；另外 1 億多人“被精神病”、5000 多萬人喪失生育能力）。

文革期間，毛主席有段話說：“對廣大人民群衆是保護還是鎮壓，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根本區別，是無產階級專政同資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區別。”三個“根本區別”把兩條路線對待人民群衆的態度問題區分得清清楚楚。看看 7·23 動車追尾事故發生後，那些官員的表現，從總理到部長，從處理事故的官員到現場指揮的人員，對死傷群衆冷漠、欺騙、威逼到難以置信的程度。這和當年《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是多麼天壤之別。

《親歷》的揭露是準確而辛辣的，批判也是擊其要害的。作者抓住“決議”反覆批判，指出它是“鄧小平的

自供狀”。“決議”的出籠，就充分暴露了鄧小平的兩面派嘴臉。他曾一再講：“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還是要肯定。”“不能輕率地否定”，“不想匆匆忙忙地總結”，甚至說：“要對這樣一個歷史階段做出科學的評價，需要做認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經過更長一點時間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評價，那時再來說明這一段歷史，可能會比我們今天說得更好。”（《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9頁）。

可是，他這話說了一年多點時間，就組織人起草“決議”。他研究了嗎，他理解了嗎，統統沒有，完全是按照他預謀的全盤否定文革的結論，強加給全黨。連一個普通的中國人看了這個“決議”，都說鄧小平要食言了。毛主席說“‘永不翻案’靠不住”，果真如此；毛主席沒有看錯人。“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內亂。這個結論現在連修正主義集團的骨幹分子都難相信了。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七·一”講話就說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雖然他也是否定文革的。

“決議”不僅把中國引上資本主義復辟的絕路，也給修正主義集團手裏塞進了一個定時炸彈。“七·一”前夕，所謂中共第五代智囊張木生（《中國稅務》雜誌社長或總編）接受共識網主管的採訪時說：“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了。”危險到了什麼程度呢？他說：“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中國走在錯誤道路上，要拉回一點。”雖然張木生的話隱含了主語，但不難猜測他所指的便是中共現任領導。而他的這番話，外界認為是第

五代接班人對胡錦濤不滿公開了。這個定時炸彈不論傳到誰的手裏，都有爆炸的那一天。

現在，海內外都在議論中國天天發生的奇聞奇事，說：“中國怎麼啦？”一位網友形象地回答說：“據說棋盤讓二奶吃醋打翻了，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滿地找棋子呢！”

### (三) 要正確認識文革，首先要正確認識自己

毛主席在文革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這段話是毛主席關於文革最精彩的論述。

我花了兩天時間，讀了項觀奇同志《重新認識毛澤東，重新認識鄧小平》，又花了四天時間，讀完了惲仁祥同志《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就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他們都能深刻地闡述文化大革命，闡述毛主席的繼續革命理論？因為他們都是以毛澤東的戰士身份投身文化大革命的，並且把這種身份堅持到現在。這啟發我們，只有以共產主義者的世界觀，才能觀察文革的真正意義。其他的思想，只能在文革門檻外徘徊。

最近，一家紅色雜誌刊登一位老幹部對文革的反思。作者說他也是從文革開始“很不理解”，到文革結束時“徹底否定”，直至後來在事實面前的變化過程。他說：“文

革之初，我不相信在領導幹部與知識份子當中會有一批蓄意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存心反對毛主席更不可能，看他們的講話、文章和著作，無反對之意，言談之中也都是信誓旦旦的。於是有人‘造反有理’，我則‘保守有理。’加上我的作品最早上省報批判，在單位裏最早靠邊，不服衝擊外逃時，造反派發出的《通緝令》貼遍了全國的車站、碼頭……。粉碎‘四人幫’，我也‘人心大快’，頭幾年無異議地接受‘全部否定’的結論，還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而自負，偶爾別人談及‘文革’的別樣觀點，便認為此公的思想太離譜了！”現在的教育，終於使作者“深切地懂得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良苦用心”。

作者在總結了正確認識以後，卻在“對於文革言錯，還不如言敗”的題目下，講了六條既是錯、也是敗的反思。而且條條都算到毛主席的頭上。他毫無道理地說：文革“毛實質上處於孤軍作戰的狀態”。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干擾破壞，“是造就文革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顯然，這是極其荒謬的。誰能想像幾億人民參加的、長達十年的一場世界罕見的大革命，竟是一個“孤軍作戰”的領導人發動和領導的。明明是走資派相對力量過大，利用毛主席逝世和投降派的配合，使文革陷於失敗的境地，把這樣一個主因歸罪於“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干擾和破壞”，那是顛倒了敵我。他指責毛主席發動文革“一哄而起”，“犯了戰略性的錯誤”、“急性病錯誤”。說什麼“毛澤東如果事前像以往一樣做深做細調查研究”，“上上下下的準備工作（包括統一思想）做充分，運動的範圍由點到面，由淺入深，逐步總結經驗，步子慢一點”，就不會犯這樣的

錯誤。這真是庸人之見！試想，在當時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躍躍欲試想篡權的緊迫形勢下，像你這樣搞，不僅不會有一場群衆運動，革命派連束手待斃喘息的時間都沒有。作者對批判《海瑞罷官》、批判文藝黑線、批判“二月逆流”、“踢開黨委鬧革命”等等文革事件，都進行了反批判。指責毛澤東“犯了組織路線錯誤”，“出於過分自信的自負，處在這種情況的毛澤東憑藉了全國享有的崇高威望，個人的領導逐步代替了集體領導。”這種指責，和走資派有何區別？難怪作者借用主流出版的《毛澤東傳》，攻擊毛澤東晚年不瞭解情況，靠虛假不實的材料決策。“因此，他提出的不少意見往往同客觀現實有很大距離”。（《毛澤東傳》1949-1976 第 1499 頁）作者竟然認為當時的中國“好比一個人生了良性腫瘤，雖有癌變危險，但良性階段畢竟不能當惡性來治”；指責毛澤東“把‘防修’作為‘已修’，把‘防病’作為‘已病’甚至作為‘重症病人’來對待了！”請問：這樣的判斷，還要文革幹什麼？作者完全滑到“徹底否定”文革的立場了。

作者為什麼犯這樣的錯誤？一個是作為老幹部，民主派的立場很頑固。用民主派的立場怎麼能看清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是至今一些老幹部對文革說三道四的根本原因。文革中從民主派到走資派的揭露教育，在鄧小平翻案復辟下，早就化為烏有。再一個是從作者自述中可以看出，文革初期“保”的立場並沒有徹底轉變。實踐只是接受教育他接受了文革總體上值得肯定，一到具體問題，又難免回到錯誤的立場。我們可以說，這份老幹部的反思，真實地暴露了目前一些老幹部不能擺脫

修正主義的影響，過不了文革這一關的尷尬局面。

我晚年有幸和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偉大戰士魏巍同志相處，從他身上我看到了老幹部過文革這一關的重大意義。毫無疑問，魏巍在文革中，也是作為一個“反動權威”吃了不少的苦頭。但是，他從延安整風建立起的對毛澤東同志的信賴和尊重始終不變，對毛主席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規律的探索正確性堅信不疑。有了這兩條，導致他在“改開”時代，始終站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最前線。他對鄧小平自始至終保持警惕。1996年，他親口告訴我：“鄧是一個‘理論矮小，陰謀的能手’”。在認清了鄧的真面目以後，他就認真地研究文革，閱讀了大量的有關的資料和書籍，還和河南的造反派同志書信來往討論文革問題。他在《話說毛澤東》一書有關文革的論述的初稿裏，也說過毛主席“用人不當”的錯誤。但是，經過幾年思考，他很快糾正說：“他不用那幾個人用誰呢？”一篇《論毛澤東晚年》，成為他過文革這一關的代表作。此後，他反修批修的勇氣和智謀更上一層樓。他終於成為毛主席繼續革命的偉大戰士和英雄旗手！

種種事實說明，毛主席留下的這個未竟事業是極其偉大的，它召喚著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為它在全世界的勝利而奮鬥。而要從事這個事業，毛主席也給我們提供了途徑，這就是“鬥私批修”四個大字。從《親歷》裏可以看出，作者始終是在走著這條路。他和某某相比較，就要走得更好一點。某某的唯物論不徹底，把修正主義者鄧小平看做是犯路線錯誤的同志看待，並且對這個集團的某些人還抱著幻想。《親歷》的作者則不然。鄧小平儘

管把他從聶、張的迫害下解救出來，但他還是把鄧作為修正主義頭子，痛加揭露和批判。

文革中群衆有一句流行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毛主席那段“四個觸動”的論述，就是對這個流行語的精彩描繪。敢於把自己靈魂深處的髒東西晾到陽光下，人們的自覺性達到這種境界，共產主義何愁（不能）實現！“救黨保國”論者，一不鬥私，二不批修，把私和修都精心地偽裝起來，怎麼能獲得文革的真諦。他們用資產階級觀點淡化、消解繼續革命的理論，離文革十萬八千里。對這些在路線問題上言而無信的人，我們要警惕啊！

2011年8月7日

肖衍慶：原北京日報同心出版社社長兼總編。退休後，任“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

## 讀《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有感

——贊文化大革命

徐 飛

兩個十年都不空，修正主義確實有。  
和平演變無煙戰，最大危險黨變修。  
由今及古大反思，文革發動非無由。  
內因外因都具備，階級矛盾真正有。  
路線鬥爭不調和，黨內確有走資派。  
翻案復辟沒有冤，自做帽子自己戴。  
親歷文革受迫害，製造冤獄走資派。  
團結兩個九十五，打倒一切胡亂來。  
全面內戰主席反，武鬥頭子被除掉。  
團結勝利鬥批改，林彪爆炸未料到。  
總結教訓學馬列，鬥私批修總綱領。  
限制法權為工農，亡黨亡國靠精英。  
革命經驗應總結，原則永存大民主。  
共產主義是目標，文化革命多次搞。  
批判從嚴處理寬，立場站錯改就好。  
一個不殺給出路，關愛幹部重改造。  
吐故納新重建黨，堅持三要三不要。

文革總評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孬。  
小平拒絕作此評，一次翻案識破了。  
二次鬧事天安門，留黨察看觀後效。  
導師臨終兩移交，預言復辟實現了。  
預言革命必然到，低潮過去是高潮。  
重新學習馬列毛，反修反帝掀高潮。  
腐敗根源私有化，盜劫資產向外逃。  
徹底清查大官僚，買辦漢奸大清掃。  
工農重新掌政權，重整河山紅旗飄。  
世界人民大團結，帝國主義要打倒。  
建立人民聯合國，和平世界才能到。

2011年6月19至21日

徐飛：傳媒大學政治副教授。現離休。

## 前　言

從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去世，華國鋒、葉劍英等人于當年 10 月 6 日抓捕“四人幫”以後，走資派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復辟資本主義，大肆妖魔化中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文革”這段歷史，醜化得不成樣子。不僅把毛主席、周總理健在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頑固推行修正主路線，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造成的破壞都歸罪於“文革”和毛主席，而且把他們篡權後的 30 多年“改革開放”中必然發生的腐敗、污泥濁水等，也栽贓給“文革”和毛主席，利用他們操縱的報、刊、電視、廣播、小說、教課書、戲劇（包括電視劇）等對“文革”進行肆無忌憚的歪曲、醜化、栽贓。前些時候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等發表《“政績”文學催生四不像》稱：“很多現實批判題材的報告文學創作者面臨高風險，很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過人身威脅。”這段話生動地描繪了當今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現狀：官辦報、刊、圖書等所有宣傳媒體，對改革開放只能歌頌，不能批評，即使改革開放已使黨和政府腐敗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也得把它歌頌成“和諧社會”、“科學發展”、“太平盛世”……；相反，對“文革”、江青同志等只能

貶低、妖魔化、人身攻擊，而不能講真話；否則就要查封、打擊、迫害。這完全是赤裸裸地推行指鹿為馬、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集封、資、修於一身的法西斯獨裁專制。2010年暴露的黨和政府同地痞、惡棍、流氓、黑社會聯合經營的截訪“黑監獄”——北京安元鼎（公司），就是這類法西斯專制的活標本。今年的《新京報》和《新華網》又相繼報導：“《北京再曝黑監獄：五六十人到部門辦事後被關》令國人震驚。這是繼‘安元鼎’之後的第二次對‘黑監獄’的曝光。一年前，北京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和非法經營罪拘捕了‘安元鼎’的高管。這家名為北京安元鼎安全防範技術服務有限公司的‘黑監獄’，擁有3000多名打手，按照軍隊編制，配備政委、大隊長、中隊長、班長等領導的相應機構，衣著類似于武警的統一制服，且頭戴特警帽，胸前掛有黑底白字的‘特勤’標誌，配備有電警棍、狼狗、專用囚車等。而最令社會不安的是，‘安元鼎’所有的非法業務，均是來自於地方政府，他們在各地方政府和其他權力機關手上承接拘禁和押送上訪人員‘業務’，地方政府和其他權力機關給與他們豐厚的報酬”。人人皆知，即便是十分腐敗的封建社會，也還允許老百姓“擊鼓申冤”。但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和賣國集團打著“共產黨”旗號、“社會主義”招牌的“人民”政府，為了標榜“人權”、“零上訪”等偉大“政績”，而同地痞、流氓、惡棍、黑社會聯合經營“截訪公司”、私設監獄，把蒙冤上訪人員非法綁架進黑監獄。這個問題暴露後，有報導稱：“遠在無錫的謝其明看到了一縷曙光，他和其他17名訪民決定給付政華寫一封公開信，告訴這

位首都公安局長最高行政長官，在其治下，‘安元鼎公司’涉嫌綁架、非法拘禁、暴力傷害、猥褻婦女、敲詐勒索等有組織犯罪行為”。最近互聯網報導了武漢和陝西等地都有類似黑監獄，呈推廣普及之勢。這在古今中外都是聞所未聞的觸目驚心的最殘暴的法西斯專政的鐵證。然而一些官辦媒體，還在大力宣傳“改革開放”的“創new理論”所創造的“零上訪”、“和諧世界”、“科學發展”……帶來的“太平盛世”。如此“太平盛世”弄虛作假，遠超過了走資派的祖師爺劉少奇、鄧小平在1958年破壞大躍進的造假水準，這是當今世界無法最右的極右派反動階級本性的大暴露。怎麼能想像靠這些人還能對文革作出公正評價呢。

“文革”等時期的一些材料、檔案被某些人不知出於何目的而銷毀。例如，有的同志作了細緻統計：《劉少奇選集》（下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有七篇，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飈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現了整整三年的文獻空白；《鄧小平文選》（第一卷）中選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間的文章共八篇，其中在“大躍進”期間，沒有一篇涉及到反對“大飈五風的大躍進”的文章，而且從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現了一年又十一個月多的文獻空白，從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出現了一年另七個月的空白，前後相加，文獻空白期五年間達三年六個月。走資派、文痞們就是用如此編造陰謀史，大樹劉、鄧“反浮誇風

等‘五風’，而誣陷毛主席‘頭腦發熱，‘颳五風’而‘害死幾千萬人’”。但是，劉、鄧在當年大颳“五風”的講話、指示發表在當時報紙上或親自受命的人記錄在筆記本上的，在近些年才被吳冷西、張宏志等同志挖掘並揭露出來，還了劉、鄧破壞大躍進而大颳“五風”的本來面目。還有一些是跟了鄧小平幹了不少壞事，但由於鄧小平過河拆橋反目成仇後才揭露出來的，例如胡耀邦向楊尚昆當面揭露關於鄧小平一些見不得人的“內幕”，隨著楊尚昆日記的公開才揭露出來……。可見，當今要如實反映“文革”這段世界無產階級值得大書特書和繼承的革命史經驗之難度。

我們這些從1949年，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的那天起，親歷、親見、親聞了從解放至今的歷次政治運動（包括近3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人，理當擔起還人民一個真實的“文革”史的使命。但由於各人掌握情況的局限、世界觀改造得不夠或很不夠、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學習和理解得不深不透，尤其是各人階級立場的差異等諸多原因，任何個人很難把幾億人民投入的“文革”史說清楚，這就得靠群策群力才能完成這個任務。但我認為應抓住重點，從中總結出“文革”的主要經驗和教訓，對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有所啟發。

近30來年，因退休賦閑，我這個熟背“活到老、學到老”的老朽，除讀了一些馬、列、毛著作外，還看了一些有關“文革”方面的文章和境內外出版的圖書、資料，以及互聯網發表的涉及“文革”方面的文章。我曾經試寫了幾十篇涉及“文革”的文章，發表在互聯網上，其

中少數被一些黨報和知名報紙轉載，但也有不少文章因觸及到事物的本質而被“監管”部門無理強行刪除。經過這段學習和寫作的嘗試，我感到要如實寫出自己親見、親聞、親歷的“文革”，必須真正徹底解放思想，以“五不怕”精神，排除種種主、客觀阻力和干擾。

要敢於如實把自己擺進去，不管是對、是錯，把它亮出來，任憑旁人和後來人評說，才能把一場生動的“文革”，有血有肉地呈現出來。各人經歷的“文革”過程，是整個“文革”的一粒“細胞”，按現在的科學技術，一些高手能從這些“細胞”，“克隆”出“文革”的主要特性。

要破除迷信，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造反精神，向“權威”挑戰。提倡凡事動腦子想一想，看是否真有道理。共產黨從來不提倡奴隸主義和盲從。近 30 來年，搞什麼“不爭論”，把整個黨的生活搞成了“萬馬齊喑、一修獨放”的極不正常的狀態。我認為，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要還真實的“文革”史，必須重新審視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以下稱“決議”）等問題。單就這個“決議”而論，它是全盤否定“文革”的動員令。從近 30 年許多公開報導的材料，證明“決議”否定“文革”的主要論點都出自鄧小平一人之口。在此只得欠恭責問一些“老革命”，鄧否定的幾乎全是原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關於劉少奇和鄧本人所犯錯誤的決定。即便忽略鄧本人曾對自己所犯錯誤作過“認真”檢查，並表示“永不翻案”，但鄧小平不僅沒有按一貫的黨紀原則，回避涉

及到討論他本人重大問題的會議，反而親自壓陣，實際操縱了會議，而通過否決對劉少奇和他本人問題的原中央決定，明知故犯地無視黨的組織原則。難道那些“老革命”不懂這些嗎？還是另有打算？因此，我認為那個“決議”中有關“文革”的內容，只能看作是鄧小平出爾反爾的翻案書。從後果看，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秘密報告。把它看作是“黨中央‘決定’”，是對黨紀的蔑視和玷污。把它強加給全黨，更十分荒謬。而且按“決議”精神，實踐了這30多年的史實，反更證明“決議”所否定的，恰恰是最正確的。把幾億人民響應黨中央（包括劉、鄧等“老革命”一致通過的開展“文革”的決定）號召而參加的“文革”，竟被誣衊為“一場浩劫”，幾億人民成了“一場浩劫”的“暴徒”，說得通嗎？你們承認這些“暴徒”是你們動員教唆的嗎？我看了不少人寫“文革”，之所以寫成陰謀史，同沒有能跳出“決議”這個怪圈，密切相關。

研究文革，必須同華、葉叛徒集團篡黨奪權復辟了資本主義的近30多年“改革開放”腐敗的現實進行比較，才能顯示文革的偉大意義。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各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真理之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參見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2頁）。毛主席還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參見毛澤東：《關於正

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90頁）。所以，研究文革不同走資派叛徒集團複製了古今中外一切最腐朽的假、醜、惡之大成在“改革開放”30多年造成的後果作比較，就研究不出一個真實的文革史。這“改革開放”的30多年，是走資派叛徒集團反文革之道的30多年，是高速復辟資本主義和惡性腐敗的30多年。坦率講，鄧小平等上臺後，關於如何評價“文革”，曾一段時間，我腦子裏一片糊塗。包括對“大躍進”的認識，也是如此。因為有許多問題，認為似乎是“敗筆”（即可能是錯誤的），但感到認識上沒有把握，因而觀望、研究一段時間，而不匆忙檢討自己“跟黨跟錯了”，“造反造錯了”。我曾同好些知己朋友講：如果鄧小平是繼承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對不足或錯誤之處，予以補臺或糾正，而不是貨真價實復辟了資本主義，我會絕對重新審視我在“文革”中這段“造反史”。但從他的路線搞了這30多年的現狀來看，他們不僅為我解脫了檢討“文革”那段“造反史”，反而讓我感到很自豪，“造反”造對了。因此，研究和回顧“文革”，不能脫離這近30年否定“文革”而鑄成的現實，孤立而書生味十足地看“文革”。現在社會上研究文革的文章、書、刊，雖琳琅滿目，其中包括國內（佔比例極小）和國外、境外的，除相當數量是在做那個“決議”的填充題，而走上陰謀史學的邪路外，即使一些學者“公正”的介紹“文革”，大多又屬於把“文革”懸空著去評說，即沒有參照比較的物件。而用“理想主義”、“主觀唯心”、“形而上學”、階級鬥爭熄滅論等觀點去研究“文革”，結果表面上是講得頭頭是道，但實際是無的

放矢。但這些好好先生，請看看“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和諧”了30多年的今天是什麼樣子？請看看毛主席點名永不翻案靠不住、還在走的走資派鄧小平，大搞不爭論，把今天的中國搞成了集世界上一切最腐朽、沒落的封、資、修之大成，搞成了古今中外最腐敗的“中美國”、帝國主義的“組裝廠”、半殖民地。不把這些作為研究“文革”的反面樣本，即參照物件，能研究出真實的“文革”嗎？絕對不能。因為這30年走資派瘋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現實，更襯托出毛主席和黨中央于1966年所作文化大革命決定即5·16通知和文化大革命規定即十六條都無可挑剔的正確。所以，我一再表示，要感謝走資派先生們這30來年的表演。他們真是令我大開眼界，讓我基本上弄清了“文革”中的一些是非非，真正認識了“文革”對於反修、防復辟，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

同理，研究“文革”，也不能套毛主席曾說過的，文革三、七開，三分缺點、七分成績，（一些人）懷疑一切，全面內戰等說法。毛主席畢竟沒有親自見到他去世後，華、葉叛徒集團“腥風血雨”篡黨奪權和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現實。所以我們也應當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實事求是地把文革中存在的問題寫出來，不把毛主席的估計，當填充題去找答案。是什麼問題就是什麼問題，是誰幹的，就說是誰幹的，力爭問題清楚、責任明確。避免像有些人那樣，只要是發生在“文革”期間的問題，不管是誰幹的，統統歸罪於一人，這是違背實事求是和歷史唯物論的，利於一些人逃避責任、混水摸魚。現在有一種怪論：“文革”已過去了幾十年，“改革開放”造成了官員惡性

腐敗，社會發生一連串極度荒唐事，一些“天才理論家”也能把它化作“文革”的“流毒”。對這類陰謀史學，必須徹底消毒，才能如實寫出真實的文革史。

毛主席說，“文革”支持的人少，而反對的人多。我理解這是指上層“高官”，而不是指人民群衆和“小官”。人民群衆和“小官”絕大多數，不管以什麼觀點、立場、動機，都是積極參加“文革”的，而且大多極力搶著自稱“造反派”，這是“文革”時期最時髦、最“光榮”的稱號。“文革”時期許多群衆組織都聲稱是什麼“革命造反”兵團之類，我還真沒有見過打著某某“保守派”兵團之類旗號的群衆組織。只是在華國鋒、葉劍英叛徒集團政變、復辟資本主義後，不少人爭著說是“文革”時期的“保守派”。可能這類人其實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而是個“風派”、“投機派”。近 30 年的實踐證明，“大官”多數是反“文革”的，實踐證明毛主席的估計是準確的。這表明文革始終遭到劉、鄧資產階階司令部走資派們的對抗和破壞。因此，“文革”中的問題，情況十分複雜，必須實事求是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人具體分析。

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立場、方法研究“文革”，核心是用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觀點研究“文革”，抓住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為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來研究“文革”。有這樣一個明確的目標，作為研究“文革”的綱，才能綱舉目張。“文革”的物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文革”是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同時，對每個人來說，又是一場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造的大革命，“興無滅資”的意識形

態的革命，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时，改造我們的主觀世界。站在這個基點看待“文革”、投入“文革”，才能做到不管遇到什麼風浪，都能“勝似閒庭散步”，而無悔、無恨。有些人自稱“造反派”，背離了這些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立場、觀點、方法，以個人私利為準研究“文革”，還認為旁人也同他一樣，都是向“文革”伸手要“油水”的，這樣就必然陷入一些枝節問題，而鑽進了個人主義牛角尖，不能自拔。有的人寫了一本洋洋灑灑30萬字的“大作”，文中怨天憂人，怨自己的家庭出身、或社會關係問題，對共產黨的“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重在個人表現”的正確政策持抵觸態度，完全以唯成份論論述“造反派”、“保守派”，結果把自稱的“造反派”，蛻變為一個猖狂的反“文革”、反毛派。這些典型事例說明，任何自封的“造反派”、“左派”，不一定都經得起實踐檢驗。不管是“造反派”、“左派”什麼派，都應有明確的政治和階級屬性的特徵。實踐證明，人是容易變的，造反派、保守派並非一成不變，更非鐵板一塊。黨外有黨（註：現今的實際情況已是黨內也有黨，即一小撮走資派、官僚資產階級、賣國集團的反馬列毛的反黨叛徒集團的修正主義“共產黨”、和廣大黨員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產階級共產黨），黨內有派，何況群衆組織。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以，我認為不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其中都有左、中、右。一個幾十、幾百、幾千、以至上萬人的群衆組織，我不相信能純而又純，要麼都是造反派、或都是保守派，這既不現實，也不客觀。“文革”中，所謂的“紅五類”、“黑五類”，是極少數人搞的，不是主

流。另外，“紅五類”中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黑五類”中也是如此，這都是客觀現實。唯物主義承認外因是條件，起決定作用的是內因。造反派、保守派，主要由個人的世界觀決定。把握住這些原則，才能避免把“文革”歪曲為一些人與人之間恩怨糾葛，把幾億人都扭曲成為個人私利拼搏的一場混戰。一些關於文革的圖書、文章，所以寫成如此糟粕之作，同作者的世界觀、階級立場等密切相關。有些作者寫的東西，明白無誤表明其參加“文革”是投機，甚至是為了對無產階級、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搞階級報復、反攻倒算。這樣的文章根本就談不上在研究“文革”。所以，離開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的階級觀點，不可能正確地反映“文革”，而只能是把文革醜化為一些不同人群間爭權奪利的“大混戰”。就像現在，“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大氾濫，導致了多少傷天害理天下第一、可獲腐敗諾貝爾國際獎的大悲劇。這也說明，參加“文革”隊伍的，什麼人都有，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不僅造成“文革”出現種種複雜局面，而且直接造成研究“文革”時，出現各類奇談怪論。所以，研究“文革”，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如果脫離了“文革”的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去議“文革”，就沒有研究文革的共同語言。

毛主席在“文革”時期對學生們說：“我那個父親也不大高明，要是在現在也得坐噴氣式。”而有些人，因為父母或親屬在“文革”期受了點衝擊，就同“文革”結上仇。如果能學學毛主席這種胸懷，就不會出這類問題。毛主

席的女婿孔令華同志在“文革”初，被北航造反派批鬥、戴高帽、遊街。回到毛主席那裏，江青同志開玩笑說：“保皇派回來了。”毛主席問：戴高帽沒有？是多麼應對自如，不僅無絲毫怨言，更是為女婿受了教育，而表示祝賀似的。有些人在“文革”中受了點衝擊，就對“文革”記恨在心，這種胸懷，還能正確對待“文革”嗎？我的家庭也非世外桃源，我哥哥1937年入黨，從未被捕過。但在“文革”時期被當作“叛徒”批鬥、隔離審查；我愛人的小叔父惲玉棠烈士，1927年入黨，1941年同日寇作戰犧牲，“文革”期也被當作“叛徒”審查；還有其他親友被隔離審查等等，而且無一例外都是冤案，在1970年左右才相繼平反。我不是表白我自己的出身。我從沒把這些當回事，審查就審查，無所謂。本人就被整得更慘了，這在後面詳細介紹。平時我們誰都能背，“我們要相信群衆、相信黨”，但遇到實際問題，卻不一定能處理好。當然，這裏指的黨是無產階級黨，而不是修正主義黨。研究文革不能以個人恩怨或好惡為標準。

以上是本人研究“文革”力爭應持的觀點、方法和立場。像“看戲”一樣，站在“觀眾”的立場，評論旁人的表演，相對而言，比親自去當“演員”要容易得多。我自己筆下反映的“文革”，是否能完全如實反映歷史？只待旁人和後來人評說。

# 目 彙

序言：為文革正名的一篇佳作.....	1
抹不黑的毛澤東 塗不紅的鄧小平 .....	3
讀《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有感.....	17
前 言.....	19

第一章 我親歷的文化大革命.....	1
一、我為什麼成為“造反派” .....	1
1、解放後受的教育鑄就了“造反”性格 .....	1
2、本人的成長史培育了我“造反”的性格 ..	2
3、階級鬥爭的深入進一步推動我“造反”	14
二、接待紅衛兵 .....	18
三、情報所第一張大字報 .....	21
1、我們貼大字報前和後國防科委運動 開展情況 .....	22
2、劉毅民組織反撲 .....	26
3、大字報擊中了所“文革”的主要鬥爭目標	28
四、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	29
1、關於群衆組織問題 .....	32
2、嚴格掌握無產階級政策 .....	34
五、“5·13”北京展覽館的演出.....	38

1、聶榮臻操控的“科委三軍無革派 總勤務站”的起家 .....	39
2、聶榮臻的御用工具“總勤務站” .....	40
3、聶榮臻把情報所 90%以上的幹部、 群衆打成“反革命”即“小三軍” .....	43
4、堅決斬斷伸向情報所的黑手“總勤務站”	45
5、制止武鬥 .....	46
6、同聶常委談判 .....	47
六、聶榮臻砸爛政治部、劉毅民立“大功” .....	48
1、砸爛科委政治部 .....	49
2、揪鬥羅瑞卿同志 .....	50
3、陷害彭德懷等老同志 .....	52
七、聶榮臻拉山頭樹自己的“學代會” .....	59
八、清理階級階伍 .....	65
九、“聶核心”上了林彪“賊船” .....	66
1、為林彪武裝政變提供國家絕密文件和 科技資料 .....	67
2、聶榮臻把造反派“一鍋端”離科委機關 大抓“5·16” .....	68
3、中央逮捕了林彪死黨王秉璋、梁軍 .....	84
十、批林批孔 .....	88
1、我親歷的批林批孔運動 .....	89
2、關於“批林批孔中‘四人幫’ 反對周總理‘組閣’” .....	115
3、走資派和文痞說“四人幫”批林批孔 反周總理 .....	116

4、毛主席談批孔	119
十一、張愛萍 “整頓機關和七機部”	127
1、張愛萍整頓科委機關	127
2、張愛萍 “整頓七機部”	129
3、關於長征運載火箭	133
十二、反擊右傾翻案風	136
十三、右派武裝政變	138
1、揭批 “四人幫” 運動	138
2、聶核心打擊報復迫害幹部的罪行	149
第二章 走資派大飈翻案風，對造反派反攻倒算	179
一、利用職權為自己翻案，樹碑立傳	179
1、“文革” 中張愛萍無罪嗎？	180
2、張愛萍大搞右傾翻案	186
3、聶榮臻 “王國” 對科研等造成的 慘重破壞	197
二、劉少奇的案該平反嗎	202
三、鄧小平的案該平反嗎	210
四、走資派對造反派瘋狂反攻倒算	229
第三章 與 “文革” 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和 事件的思考	231
一、毛主席、黨中央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231
1、文化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 “專利”	231
2、1966 年中央發動 “文革”的時代背景	235
3、“文革” 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分割的 組成部分	247
二、文革的成績不容抹煞	258

1、請看走資派的後臺美國怎麼說 .....	259
2、再看一組重要資料 .....	260
3、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	263
三、向紅衛兵致敬 .....	275
1、革命群衆運動好得很 .....	275
2、向紅衛兵致敬 .....	281
四、如何正確對待“文革”中的周總理 .....	290
1、正確評價周總理 .....	291
2、周總理嚴于律己 .....	312
3、周總理同江青同志 .....	313
五、武鬥和死人問題 .....	320
1、文痞們頻繁地在死人問題上大做文章 ..	320
2、看看究竟是誰迫害和屠殺人民 .....	326
3、幾起性質特別嚴重的案件 .....	328
六、黨內有沒有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 .....	356
七、關於“三面紅旗” .....	373
1、總路線萬歲！ .....	375
2、大躍進萬歲！ .....	389
3、人民公社萬歲 .....	406
4、背離“三面紅旗”後造成的後果 .....	421
八、徹底批判“決議” .....	435
1、“決議”背叛了馬克思歷史唯物論 .....	436
2、否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階級、 階級矛盾和鬥爭 .....	441
3、“決議”邏輯混亂、自相矛盾百出 .....	448
4、“決議”踐踏了黨的組織原則 .....	449

## 目 彙

---

九、1976年10月6日右派武裝政變	452
第四章 “文革”的主要教訓	460
一、關於接班人的問題	461
1、把接班人看作是選一個人的問題	461
2、關於老幹部終身制	463
二、毛主席軍權旁落	464
三、正確對待左派的問題	466
四、關於黨的建設問題	467
結 語	471
編後記	473

## 第一章 我親歷的文化大革命

我作為“文革”全過程親歷者，雖有局限性，但我作為原國防科委（以下稱科委）“文革”自始至終的“造反派”骨幹成員，有責任毫無保留地把我的親身經歷，實事求是地向人民作個交代。由於自己的政治思想水準、立場等因素，會有不足或錯誤之處，望批評、指正。

### 一、我為什麼成為“造反派”

在“文革”時期，我不贊同把群衆分成什麼“造反派”或“保守派”，而主張革命不分先後。但華國鋒、葉劍英叛徒集團篡黨奪權後，把造反派污衊醜化為無惡不作的一群“敗類”，而保守派很吃香。為了鮮明表明我的立場，我才自稱是“造反派”。

在“文革”期間，我成為“文革”自始至終的“造反派”，決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有其錯綜複雜的內、外原因。

#### 1、解放後受的教育鑄就了“造反”性格

我在解放後所受教育（包括黨、團組織和學校、社

會、各類書刊報紙等等宣傳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造反”。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使歷史向前推進一步。歷史上不管李自成還是洪秀全，都是造反，想推翻封建王朝，雖都失敗了，但他們向腐敗的舊王朝造反的精神對後人有很深的影響。孫中山先生造反，推翻滿清王朝，更為中華民族建立了卓著功勳。而以“五·四運動”為起點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了壓在勞動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第一次消滅了人壓迫人、人剝削人，使被人誣稱為的“東亞病夫”的人民又挺直了腰杆，窮人翻身做了主人。這都是許多革命志士對國民黨反動派造反取得的。這個造反精神，深深扎根在人民心中。歷代農民起義取得政權後，無例外地發生過復辟倒退，迫使造反始終不能停息。實踐證明，共產黨也不例外。因此，我認為“造反”始終是社會中堅力量在三大革命實踐中的神聖職責。如果把“造反”看作“反動”、“非法”，這正說明社會出了問題，出了復辟、倒退的逆流。

## 2、本人的成長史培育了我“造反”的性格

1949年4月解放時，我17歲還差一點。因此，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舊社會度過的。由生至今，死過兩次，“閻羅王”說我去得太早，把我趕回來了；病危了三次，又治好了；“文革”期間，被整了三次，其中兩次鬥爭十分殘酷，我都堅強地挺下來了。我始終認為：沒有白來這個世上一趟，很有意義。

我出生在江蘇省武進縣西夏墅鎮東莊村的一個農村家庭。這裏離長江僅 10 華里，是一個富饒的魚米之鄉。東莊村最早是個獨家村，西鄰為我惲家祠堂，前後三幢較富麗的高大瓦房，南向，大門莊嚴，門前一石板鋪的廣場，場南是一條貫穿全村東西向的養魚大池塘，池塘四周是稠密適宜的高大樹木；祠堂後面有個大花園。這是惲姓家族擺放祖宗牌位的所在，舊社會每年冬至節，年滿 30 歲男性來祠堂拜祖宗，並吃一餐豐盛的冬至酒席。祠堂有戶人家負責看護祠堂，長者老太我叫她乾媽。乾爹早過世，我沒見到。祠堂西鄰是觀音廟和土地廟。觀音廟有和尚三個，終年香火興旺。土地廟簡陋、敗落。

我的祖輩很窮，祖母做幫工（相當於傭人），生一獨子，即我的父親。由於祖輩窮，僅我祖父娶親成家，其餘和親房（即隔了數代的同族兄弟）都未成家，去世後我父親繼承了他們的遺產，一下成了殷實之家，並讀了點私塾。母親八歲做了童養媳，一世認不得一個字，是全家勞動的臺柱子，又是管家。她 46 歲生下我這個落梢巴（即最小的）。生下不到一週，家人以為我死了，媽把我按當地風俗，把洗澡用的長圓木盆反過來，底朝上，把我擺在木盆底上。我父親走來一看，見鼻子還略微扇動，趕緊抱在懷裏，說抱去請人扎針試試看，急忙抱著我到後村（離 3 華里），扎了幾針，說是有哭聲了，抱回後，活了一條命。

1937 年，日寇到了我家鄉，當時我 6 虛歲。一天，天將黑，日本鬼子從鎮上出來，直奔我們村子來。我爸爸背了我，領著全家（我媽、哥哥、嫂嫂、小姐姐和比我

小兩歲的大侄兒），逃到村後小河北面名為安寧河北的一片剛出苗的麥田裏。將近黃昏，天已冷（初冬），遠看著我的家火光衝天，鬼子放火了。哥哥不甘心，衝回家想搶點糧食之類出來，結果被鬼子抓走了。很久，哥哥不回，天又冷。眼看著家被燒著，媽和嫂嫂他們都哭了，我和侄兒也都跟著大人哭。快天亮了，哥哥突然回來，說是鬼子讓他到河邊挑水時，乘機逃跑回來了。全家才收住眼淚。天亮後，我們走回家。一個殷實家庭，就這樣全成了灰燼，全部家當就剩下每人隨身穿的衣服。秋收在家的糧食還在冒著煙。大人從火堆捨出一些基本燒盡成了焦炭的“糧食”出來。全家住進了土地廟，吃了幾個月的焦炭糧。飯中總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焦煙臭味，夾雜著焦炭，實在難以下嚥。吃飯時大人們咬牙忍著，我和侄兒不懂事就哭，不肯吃。全家抱成一團哭，大人們還得好說賴說讓我們吃下去。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個月，一直到田裏的麥子可以吃青苗為止。我父親本來就有病，這麼一折磨，又無錢看病，第二年夏天就去世了。為此，母親請親戚幫忙，在廢墟上蓋了點草房，借了一口棺材，把父親的遺體入殮後，放在草屋一年，因當時沒錢，出不起殯。從此搬出了土地廟。我和母親、姐姐住進了惲家宗祠，直到解放（姐姐于1944年去世）。這期間，8歲（虛歲）那年，大伏天，我到地裏撿人家拔豆子掉下的黃豆。我從小太陽下不愛戴帽子，中午暴曬，約一點多鐘時，背著撿的豆子回到家，沒吃飯就睡了。全家幹完農活，吃過晚飯，大家都逐個洗完澡，我媽才突然發現沒有見到我吃晚飯，到處找我，怎麼喊也不見人應聲。擔心我

淹死在池塘裏，全家到池塘邊找也不見蹤影，我媽就急得大聲哭喊起來。最後跑到房間，把蚊帳一掀，見人躺在床上，怎麼喊也沒有回應。點著豆油燈蓋一照，發現兩眼向上翻著，全家一下嚎啕大哭。我現在還記憶猶新，我耳朵聽到他們大哭、大喊，眼睛看著桌子上的汽水瓶（即早些檢的黃豆，賣了買回一瓶汽水）就有一米多高（現在知道瞳孔放大了），但嘴裏講不出話。只聽我哥哥勸大家別哭，但誰也沒了主張。只聽哥哥說，把汽水打開，灌點汽水試試。結果灌了幾口汽水，突然我說：我自己喝。一下全家收住了哭，都望著我。這時，我也能清楚地看著他們，不再是高大無比的巨人。約 10 多分種，鼻孔、嘴巴大量鮮血衝了出來，什麼辦法也止不住，足足放了約一碗（半斤多）血，才慢慢停下來。這一下就倒下了，吃了好多副中藥才能起來走動。醫生說，高溫使血液向上，嚴重中暑，幸好鼻腔血管破裂，流了出來，要是堵在頭部或頭部血管破裂，大量血流在大腦，就沒救了。這就是“閻羅王”第二次把我趕了回來。

日本鬼子來後，我家很快成了新四軍聯絡站。新四軍和地下黨在我家常來常往。有時他們把我領著上街當掩護。有時也見到他們從我們家出去殺日軍外出的散兵、炸日軍碉堡、在公路阻截日本運兵車……。過了很久我才知道哥哥那時是共產黨員。

1945 年，我小學畢業，也稱抗日勝利屆畢業生。由於哥哥進步，送我上了幾個月中學。新四軍北撤，哥哥一走，我失學了。國民黨反動派一來，就更慘了，給我家扣了“共匪家屬”帽子，經濟上接連敲詐，政治上迫

害，又破產了。嫂嫂被國民黨反動派逼得於 1947 年秋上吊自殺，丟下四個孩子。我媽當時已 60 來歲高齡，大侄兒 13 歲，小侄女還是幾個月吃奶的嬰兒，只得送給了人家。家庭的窮困狀態可想而知。我恨死國民黨反動派了。窮困的家，養成我撈魚摸蝦的技能和習慣，靠這改善點生活，還賣到點錢。什麼野兔我都能捉到活的，養在家招待來客。螃蟹、蝦常常一抓就好幾斤、10 多斤，又吃又賣。每年冬天都能捉到幾隻黃鼠狼，吃了肉、賣了皮，錢給媽買回小豬或棉布。但是，經常下湖撈魚摸蝦，我染上了血吸蟲病，到解放前夕已是後期，肚子已鼓起來，人像粒大麥，兩頭尖而中間粗，皮包骨頭，每天吃的很少，晚上大多嘔了出來，大便基本上是帶血的膿液……。就在這危急時刻，解放了。在我家鄉，病到這種狀態能活下來的，真是寥寥無幾，絕大多數都死了。我家的後村，因血吸蟲病死了不少人，成了“寡婦村”。共產黨一來，有了醫療條件，我得救了。後來，1958 年毛主席《送瘟神》詩發表後，我們這裏成立了血防站，我住一個多月醫院，終於徹底治好。

1949 年 4 月份我們這裏解放，6 月份我參加了縣積極分子訓練班學習，回來後，參加減租減息、土地改革運動，其間還擔任區秋徵糧庫總會計兼總保管。11 月，上級發給一張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志願書，填好上交後，不到一星期就當上了鎮第一任團支部副書記，三個月候補期只補了幾天，就當了副書記，很快任書記，後改為總支任總支書記。那時的薪金是每月 120 斤大米，全家吃糧有餘了，這對一個解放前借高利貸吃了 3 個月徽豆餅的“共

匪家庭”，簡直是一步登天。土改結束，組織上交代我完成全區土改土地清冊編制工作後，出去念書。鎮黨支部書記找我，對我說：你寫個申請，可以入黨。我說：入團沒寫申請，組織上發展了，入黨寫什麼申請，由組織發展嘛！這一拖就好多年。說實話，那時，對參加革命與入黨，我分不清楚，認為參加革命，就是入黨，更不知道還要申請才能入黨，更想不到入黨是一件光榮的事情。參加革命，只知道幫窮苦人鬧翻身。

土改結束，正值抗美援朝，我當時是總支書記，帶頭報名參軍，大侄兒惲玉奇也報名參軍。我母親在全鄉動員青年參軍大會上訴苦，並送子、送孫參軍。我們成了全區搞得最好的團支部（總支），受到表揚。我戴上紅花、唯一的一個騎著馬（我們家鄉不養馬，是政府從別處借來的），人民敲鑼打鼓歡送我們參軍。體檢時，醫生在我參加縣訓練班學習時給我看過病，他認得我，說我有血吸蟲病，未經體檢我就被淘汰了，區、鄉領導出面說情也無效。我大哭一場，好男有淚不輕彈，但我掉淚了。侄兒體檢合格參軍，於次年壯烈犧牲在朝鮮。後來志願軍回國後，當場見我侄兒犧牲的同志告訴我：玉奇犧牲得很慘，整個腦袋都被炸得不見了。這一情況，直至我母親去世、哥哥（玉奇的親生父親）去世，我都沒有告訴他們，怕他們承受不了。

我後來把全區土改清冊搞完後，鎮壓反革命開了個頭，鎮江地委介紹我到省立鎮江中學插班初中二年級念書。進入學校念書後，鄉黨組織以鄉政府名義致函鎮江中學：惲仁祥同志在農村土改等工作期間，立場堅定，

工作能力強，望貴校重視培養，……。這可能就是對我兩年多農村工作的評價。我解放前雖上幾個月初中，但只學了算術，對幾何、代數、物理等一無所知，插入初二的困難可想而知。女同學王靜儀讓我和她同桌，她對我的說明太大了，我終身難忘。另外，當時的班主任洪鳳儀老師、教導主任毛主席，經常找我談話，教導和指點我。我有一股不服輸的勁頭，不相信一個農村幹部念不好書。頭一學期連課間、自由活動等都不休息，啃書本。到期終考試，成績優秀，數、理、化全滿分；政治課不用看書，也可考 90 分以上；語文和外語不復習也可考 85 分以上。唯歷史、地理兩門，因思想不重視，課後從不復習，考試時復習的精力大多都用在這上面，但歷來是 70 至 75 分，沒考過 75 分以上，也沒少於 70 分。第二學期，洪鳳儀老師就要求我每天早自習，給數、理兩門課學習有困難的同學輔導。學習上去了，就有了空餘時間。初中畢業前，我通讀了《資本論》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實踐論》等。以前在農村工作時，總是覺得缺乏理論知識，現在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學習這些著作非常用心。遺憾的是沒有能通讀一遍政治經濟學。

初中畢業前一個多月，我突然患上了盲腸炎，由於校醫誤診，吃了止痛藥，最後送醫院已腸穿孔，腹腔化膿，病情非常嚴重，醫院已經給家長發了病危通知。幸運的是最後還是治好了。出院後，畢業考試已結束，教導處毛主席說，不參加畢業考試，不能給畢業證書，問我怎麼辦。我問能否補考，他說可以，問我有什麼要求。我提出：數、理兩門課，請老師把我沒能聽講的那部分

各給我補講兩小時，其餘都自習，並請求能否給我半個月復習時間。他全部答應。結果，數、理、化考了滿分，有關老師感到非常驚訝。

初中畢業離校時，洪鳳儀老師、毛主席以及吳校長，都分別找我談話。他們非常關心我的身體健康。初中期間上體育課，我連最低的雙杠都上不去，都是體育老師抱上去的，籃球都摔不到籃板那麼高……。當時我已 19 週歲，可見身體虛弱到何程度。他們對我說：學習成績再好，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也不能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勸說我一定要練好身體。從高一起，我就花精力鍛煉身體，除拿到了勞衛制二級獎章和三級運動員獎章，5000 米和 1 萬米長跑都得冠軍，5000 米長跑高三畢業全校運動會冠軍。一直到大學畢業，我都保持全系冠軍。學習成績下降了，維持在優、良水準。中學到大學都還擔任一些社會工作，分別任過團支書、校總支宣傳幹事，還參加了鎮江市一個廠的“三反、五反”，高一時被學校指派每週給一個初一班級講一堂時政課；大學擔任了班主任、班反右中心小組組長等。反右時，我內心不贊同在學生中大量抓右派，所以凡本班同學貼大字報的，都及時勸說他們撕掉了。我沒有揪一個右派。

高中畢業時，教導處毛主席找我談話，問我想考什麼大學。我說想考上海醫學院，因為我吃夠了病魔的苦頭，想做個醫生，為人民健康服務。毛主席說：現在國防建設很需要人，幾個國防工業院校都來我校招生，學校決定保送你上國防院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你可任選一個。

因我課餘時間愛自己裝收音機，我選了成電。正巧國務院確定華東地區必須保留一個無線電系，南京工學院無線電工程系保留而不合併到成電，並決定成電在華東地區錄取的新生全部到南工無線電系報到。這樣，我是在南工上的大學。

大二暑假，我同惲雪琴（中等專科學校講師）確定了戀愛關係，第二年勞動節結婚。其實就是領了張結婚證，沒有辦什麼婚禮，第二天我就返校了，全部結婚費用僅花了三角錢一張結婚證。同姓結婚，我們的族規不准進祠堂門、不能上家譜，我破了這個例。這是本鄉兩個革命家庭的結合。我的妻子惲雪琴家中因革命犧牲 3 人，送掉嬰兒一個。其大叔父惲雨棠烈士，1922 年入黨，是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3 年工人罷工的領導人和罷工宣言的起草人。這次罷工在工人運動史上第一次把揭露資本家剝削工人剩餘價值寫進工人造反宣言。他兩次去蘇聯留學，回國後，先後任中共機關報《紅旗報》發行部部長、上海市黃包車夫罷工委員會主席、上海市市政總工會主席，並介紹了陳雲等入黨。1931 年初，由於叛徒出賣，同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 24 位我黨建黨初期的骨幹、工人運動領袖、年青的著名作家等，被國民黨殺害在上海龍華刑場，史稱“龍華二十四烈士”；惲雨棠犧牲時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也是中共第二任南京市委書記。他的愛人李文烈士一同犧牲。李文 1927 年入黨，先後在常州市芳輝女子中學領導學生運動，在家鄉組織紡織工人罷工，犧牲時任上海市政總工會機要秘書，年僅 21 歲。她於 1930 年生育一女，因夫妻倆革命，生下不久就送給

了育嬰堂；解放後，華東局和上海市多方尋找，至今沒有下落。惲雪琴的小叔父惲玉棠曾在地下黨《新華日報》工作，任過縣委常委、書記員等職，約1941年同日寇的戰鬥時犧牲。三、四年前，我發表文章介紹了這些情況，常州市委機關報《常州日報》一字未動，於2006年清明節刊登了我寫的紀念文章，許多互聯網轉載了這篇文章。

到大四快期終考試，在臨考的前一天下午，系（南京工學院無線電工程系）黨總支黃書記突然找我談話。黃書記說，找你來，商量一件事，當前國防建設急需要人，應屆畢業生中夠條件的全部選走了，還不夠，經國務院總理批准，在四年級中選一些德才兼優的，提前一年畢業，享受五年制待遇，文憑照發，組織上研究，決定你提前畢業，看你有什麼意見？說心裏話，當時的學生，大多在分配問題上，都是一個回答：服從組織分配，黨叫我幹啥就幹啥！在現代人眼裏，我們這代人“太馴服”、“不懂價值法則”。可我反而覺得我們這代人太幸福，我們信賴和依靠的共產黨太靠得住啊！什麼生活、住房、醫療，包括嫡系長者，尤其子女的上學、醫療等……，都為我們安排得很周到，不用操心，即便臨時遇到點困難，不是組織上照顧解決，就是同志們不聲不響支援解決了，那是真正的革命大家庭，一人有難衆人幫。我們這代人幾乎不懂什麼叫為生活、醫療、住房、子女上學等“發愁”。把話題再回主題，黃書記接著說：那好，回宿舍準備一下，不要聲張，不要影響別的同學準備考試，明天下午5點多，在大禮堂門口，學校派車送到下關火車站，部隊派來了人在那接你，分配到哪裏去，我也不知道。第二

天我上火車，同一個系、同一個專業提前畢業共八個同學，其中有同班的一個女同學汪月芬。上車後，一位大尉（當時有軍銜）向我們宣佈到國防部報到，國防部會向你們具體宣佈分配方案，有的分配在北京，有的會分配在外地。這時才知是去北京。第二天到北京（記得已近中午），坐上部隊來接的大轎車，路上第一次見到天安門、人民大會堂。到了一個招待所，吃飯、住下。第二天早飯後，一位元軍人來介紹情況，並宣佈分配方案。才知道我們到了當時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七機部、即航天部的前身），我被分配到“國防部國防科學技術情報資料研究所”。當時研究所地址在五院的西鄰，國務院委託五院代管。從此，我成了一名人民解放軍戰士。直至49歲時，張愛萍非法剝奪了我為黨、為人民工作的權利，身體健康、中年正當年，而不按規定給離休而“退休”，被強迫“養起來”，成了中共史上一名身體健康的中年“老年退休幹部”，活到現今80歲。儘管這段歷史我講得囉唆一點，但如實記錄了我對反動派造反的本性，由自發進入自覺的轉變，隨著進一步實踐和學習，造反的能量逐步提升。

我在大學學的是工科，對情報工作一無所知。我們於1960年進所，是情報所調進的第一批理工科的大學生，以往進的都是外語專業。當時，蘇聯剛撤走專家不久，我們要自力更生研製自己的導彈。我調到所後，突擊學了兩個多月英語，參加了高教部和國防部聯合舉辦的火箭導彈師資訓練班的學習，就投入工作。當時正遇上稱為“攻關”（即導彈研製中的難題）。我第一篇文章，是同另一位同志合寫的“彈上天線”。實踐證明，這篇文章

是起了作用的。直至上世紀 70 年代，有關部門還拿著被翻爛了的文章來找我，來要求我再給一份。接著是解決導彈頭部的外層蒙皮在再入大氣層後的燒蝕和溫度變化情況的測試方法。我提出三種方案，一種是用熱電偶測，另兩種測試方案因時間太久已經忘記了。測得的資料通過無線電遙測系統直接發送回來，或用記錄設備，導彈在適當高度把記錄設備彈射出來。為尋找方便，記錄設備內可安裝無線電信標和放射性元素。這些方案被採用了。接著是研究無線電制導在導彈中的應用前景。當時地對地彈道導彈國內外都一致採用慣性制導，無線制導都下馬了。我在一份美國雜誌上看到一篇報導，美國的土星火箭，有可能採用無線控制橫偏。但僅有這一句話，再無別的內容，也查不到其他旁證。我反覆思考，即使地對地彈道導彈不用無線制導，就當時的技術狀況，如果研製飛航式戰術導彈，無線制導無疑有一席之地。我寫了無線制導在導彈制導中的前景一篇短文。這篇文章被當時的第五研究院（七機部前身）院長王秉璋看到後，批示二分院對無線制導進行研究，並成立了無線制導研究室。新任室主任帶領了幾位科技幹部來找我，詢問我寫文章的依據，最後要求查一下我自己製作的有關一些國外報導的文章卡片。結果，江濤同志從他們取走的卡片（列印了出來）上看到，我把《國際電信技術動態》之類簡寫為“動態”，而大發其火，狠狠批了我一通，問我，什麼“動態”？“外軍動態”？……？我一再解釋這是我自己用的為了查找方便而製的卡片，不是對外的。他仍一股勁的批評，直到劉毅民來解了圍方休。

### 3、階級鬥爭的深入進一步推動我“造反”

到情報所工作後，一進門不久，所一把手，黨委書記（當時是支部）、政治委員劉毅民（當時軍銜是上校，不久升為大校）找我個別談話。他勉勵我好好幹。先到本所辦的英語訓練班短訓了兩個多月（因早已開班，我是中途插進去的），接著送我到由高教部和國防部（實際是委託五院）聯合舉辦的火箭導彈技術師資訓練班。這個訓練班主要為地方有關院校培養火箭、導彈方面的師資。訓練班學習條件好，強調理論聯繫實際。學習課程中除把導彈分解開，供我們任意觀看和研究，從整體到任一零、部件，還常參觀北航一些實驗室；有不少專家講課，例如錢學森同志等。一般課程由北航老師講，自動控制由剛從蘇聯回國的宋健同志講……。學習條件很好，四個多月的學習，收穫較大，為我後來工作打了好的基礎。這期間，劉毅民常召回我，請我在全所大會作憶苦思甜報告，最後講的主要內容就是前面介紹的（註：我岳父家的情況，一字未觸及），同時啟發我爭取入黨。自此，劉毅民經常找我談心，話題逐步轉入問我群衆中有些什麼意見，自己有什麼意見。我的性格一向敢想、敢說、敢幹，這是在兩年多的農村工作中養成的。那些區長、區委書記等，除站在臺上作報告外，平時和大家打成一片，很隨便。我這個當時的團總支書記，也讓他們帶成了這個作風。所以我把聽到的群衆中議論的一些意見，都照直而對他講了，只是決不說明是誰或哪些人的意見，也

不說我自己的態度。開始他很虛心，聽後還表示謝謝我。一次，在師資訓練班一起學習的二分院的同志，專門同我談了他們那裏有個國民黨三青團員，被清理而調入我所。為此，我專門找劉毅民講了這一情況，並講了我個人意見：不宜重用。他聽了不舒服的樣子，但沒有批評我。這之後，傳出他背後批評我搞“唯成分論”。對此，我接受不了，一是他當面不說，背後批評；二是三青團同家庭成分有什麼關係？不久，同我住一個房間的一位留蘇研究生（調幹）告訴我，他同劉毅民一起吃中灶，發現劉在大會上誇誇其談，高談艱苦奮鬥，共度經濟困難期，會下把食堂的東西往家裏拿。我聽了很生氣，非常痛恨這種對人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的歪風。我聯合了幾位同志在食堂貼了大字報，揭發了這事。這就成了被定為轟動全所的“食堂風波”。研究所由此罷了我團支部書記的職務。對這些，我沒把它當回事，當不當書記無所謂。但劉毅民不放過我，又不敢公開整我，還又一次找我談心。我乾脆對他講：你好大喜功，愛吹不愛批；對上唯唯諾諾，對下壓制不同意見；喜歡一些人圍了你轉、吹捧你，喜愛和重用一些向你送“小報告”的人；幹部問題上，重用日本漢奸、國民黨三青團員……。這次談話不歡而散。

1964年下半年，黨支部書記找我談話（大意）：組織決定，讓你到五機部某廠去搞“四清”，希望通過“四清”，解決好同領導的關係問題。我一聽很生氣。我說：“四清”我去，這是毛主席同毛遠新同志談話中強調的，知識份子要參加工廠、農村“四清”，受教育；但是組織上用這個辦法堵住我的嘴，不讓對劉毅民提意見，我決不接受。

我鄭重宣佈，收回我的入黨申請，我決不會爭取做一個丟了原則，而對領導同志吹捧、拍馬屁的黨員。接著我參加了工廠、農村的“四清”，于1965年國慶前回到北京。當天晚上，劉毅民找我到他辦公室談話，問我“四清”有什麼收穫？我直言不諱答：“很抱歉，我沒能完成你希望我完成的任務，相反，沒四清前，我還只認識到你只是工作中一些缺點，通過‘四清’，我認為你的錯誤，已帶路線性質（具體事略）。”他一聽，臉色變得鐵青，但只是似笑非笑地喔、喔，哼了兩聲，再沒講什麼。兩人不歡而散。沒過多久，劉毅民又找我談話，主要談我愛人調動問題。因為1960年他對我說，當我愛人大學一畢業，就調到本所來。後來同我發生矛盾後，他就不提這事了，而我從未提過調愛人的事。這次他說：你愛人暫時調不來，要正確對待，我們那時（註：估計指解放前），也沒有帶了老婆幹革命……。我說：請你放心，我不會為這事考慮太多，更不會另找一個。這話對他有很大刺激。他進城後，不認前妻，找了個新的。我這是諷刺了他自我吹噓“沒有帶了老婆革命”。談話再次不歡而散。

1965年上半年，五院改為七機部，脫軍裝穿了便衣。情報所同科委九局情報局合併，一套班子兩塊牌子，負責全軍科技情報工作的協調，模仿“美國三軍武裝技術情報局”的建制。

1966年，科委政治部主任和保衛部副部長來所調查情況。他們來調查前，劉毅民打腫臉充胖子，自查情報所存在的問題，一下揭露了大量問題，有的支部就癱瘓了，一些先進標兵倒的倒、爛的爛掉了。劉毅民是按王光美

“桃園經驗”搞的，整的是群衆、“小官”，而且重點是整生活作風問題。在這前就整情報所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隨便給幹部亂扣帽子。科委政治部領導來所後，找我談話。我明確提出了問題出在下面，而根子是劉毅民搞修正主義路線，坑害了一些幹部，他這套搞法是轉移目標而保自己。我明確建議科委抓緊在情報所搞“四清運動”。這已是 1966 年“文革”的前夕。

我在成長過程中養成的“造反”性格，又遇上了難以調和的矛盾。內、外因的綜合作用，促成了我成為“文革”中的“造反派”。

如果一分為二看待我自己，在文革前，我向劉毅民提的意見中，其中包含了我當時“唯成分論”這個缺點，但決不表現在對三青團的態度上。這個問題也不是我同他矛盾的主流。“文革”初期，我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在某些大字報、批判稿中也夾有這個問題，誤傷了幾個好同志。後來，清查五·一六時，號稱林彪最親密的戰友聶榮臻企圖把我打成“國防口‘五·一六’組織部長”，我在思想上認真反思我在“文革”中一些行動，我才認識到這個錯誤。後來當我主持全所工作和受科委常委派出任第十、第十四研究院工作組副組長、組長時，再沒有受到這類錯誤的干擾。我“造反”不是一時衝動，而是學習、社會實踐、階級鬥爭等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形成的。一旦形成後，的確“改也難”。至於“文革”中，是否有人一時衝動“造反”、投機“造反”、公報私仇“造反”……？有，確實有！“文革”中，“造反”這兩個字非常吃香，誰都爭，必然魚龍混雜；但這類人，在“造反派”

中佔少數，不起主導作用。後面文中我會介紹幾個親自領教過的典型例子。

“文革”期間，我從未自稱“造反派”，但近30多年來，“造反派”被走資派、文痞們醜化成“無惡不作”的“敗類”後，我才一再宣佈我是造反派。但我思想上仍堅持“革命不分先後”，不贊同把群衆組織分為“造反”和“保皇”。事實上，任何個人，對一些事物的認識，都存在“造反”和“保守”部分，僅是那方面佔主流而已。毛主席都坦誠說過他學什麼就信什麼的經歷。另外，有些人把“造反”同反領導等同起來，這是十分錯誤的、有害的。千萬不能拋開造反的階級內容而妄談“造反”。

## 二、接待紅衛兵

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從外地回到北京。8月1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在開幕的這一天，毛主席回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于6月24日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和7月4日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大字報中一條重要內容是，引用了毛主席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大字報遭到了資產階級司令部派駐的“工作組”反對。細查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可以說毛主席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不僅是紅衛兵運動的開始，而

也是真正用“四大”方式開展“文革”的起點。紅衛兵這一新生事物具很強的生命力，很快在全國推開。8月5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8月7日全會印發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毛主席在大字報中尖銳地指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不僅給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敲響了喪鐘，同時也標誌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從此開始直接領導“文革”。

為便於有關問題的研究，更便於辯清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同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功、過和是、非，我把8月7日之前的50多天，劉、鄧領導的文革稱為“前文革”；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變後，至清查“三種人”結束，稱為“後文革”。這“前、後文革”，實質是“資產階級文化大復辟運動”。從1966年8月7日“文革”開始，至全國“一片紅”或九大勝利召開為“文革”勝利結束，簡稱“文革”時期。九大後至1976年10月6日為處理文革一些善後問題時期，即已不是“文革”期，因為轟轟烈烈的群衆運動結束。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革命串聯問題的補充通知》，決定串聯的師生必須在12月20日前返回原校，從此，乘車、船不再免費，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停止全國大串聯的通知》，大串聯結束；在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前，

群衆組織都大聯合，革委會成立後，在老、中、青三結合的各級黨委和革委會領導下“抓革命、促生產”和處理“文革”的善後工作，群衆組織解散；九大勝利召開，宣告了“文革”要解決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被粉碎，“文革”的主要任務完成。所以，九大後不應該再稱“文革”時期。至於“四大”是憲法規定的，不能把“四大”同“文革”劃等號。我認為這樣劃分比較符合實際。就像土改結束後，還有復查等等許多善後工作，也拖了好多年，有些問題在“四清”中還處理，就不能說土改一直到“四清”才結束。其實所有政治運動結束後，都在相當長時間做善後工作。“反右派運動”善後工作拖的時間更長，不能說 1957 年“反右”沒有結束。同樣“後文革”走資派搞的“清查‘三種人’運動”，善後工作至今未做，很可能要拖到走資派的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垮臺後，因為走資派同一切反動階級一樣，迫害人民永遠不認錯，但不能說“清查‘三種人’運動”還沒有結束。所以要稱 1976 年 10 月 6 日後為“後文革”，因為中央、葉劍英等領導一再宣佈用文革的辦法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這一劃分，“前文革”、“後文革”同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性質、方法、鬥爭物件完全不同的文革。“前文革”、“後文革”的功或過，完全由資產階級司令部承擔。而“文革”和處理善後工作，已有充分證據，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間的鬥爭十分劇烈，是誰的功過就是誰的，必須盡全力嚴格區別開。這樣來研究文革，更利於接近真實。眉毛鬍子一把抓，永遠說不清。這些年一

些文痞，就是用這種手段攬渾水而蠱惑人心的。我這裏花點筆墨，劃分一下文革時段，十分必要。

再來談我接待紅衛兵的問題。到 1966 年的冬天，全國“文革”已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上述中央全會精神、毛主席的大字報、北大和清華附中的大字報內容，也從各種管道傳進了部隊。我們所的“文革”已是一觸即發。劉毅民十分恐懼。我和一些同志已在考慮寫大字報。當時軍隊還未允許開展“文革”，但已是勢在必行，只待中央一聲令下，即刻就爆發。劉毅民很清楚這個情況，所以一方面把像我這樣的人支出去接待紅衛兵，便於跟蹤、盯梢；另一方面組織力量搜集黑材料，以攻為守。我就是這樣參加接待紅衛兵的。由此，足見劉毅民很蠢，這正好為我瞭解中央有關指示精神和地方（尤其高等院校）的“文革”情況，創造了合法而方便的條件。

### 三、情報所第一張大字報

接待紅衛兵任務勝利完成後，我回到所裏。在接待紅衛兵期間，我基本上清楚了中央發動文革的精神和全國大中院校運動情況，心中有了底。同時我還收集了一些紅衛兵造反的小報。回到所裏後，我同另一位同志商討貼大字報。我把大字報草稿寫成後，考慮到事實一定要準確，不留後患，召集了一些同志，反覆徵求意見，力求把大字報寫準確，一舉擊中劉毅民問題的要害，同時又留有餘地。我把大字報歸納為 10 幾個大問號。一切準備就序，就等中央文件。

1967年2月10日中央軍委《關於軍以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向下傳達。按規定，國防科委屬以“四大”開展“文革”的單位。我同另一位同志在大字報上簽字後貼在所辦公樓大門外牆上。這就是本所“文革”時期第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在政治路線方面，劉毅民對上迎合拍馬，對下壓制不同意見；組織路線方面，大搞順者昌，逆者亡，喜歡聽下面送的“小報告”，樹的標兵基本垮掉；經濟上多吃多佔等等。看的人很多，但回應跟著貼大字報的不多。遺憾的是，這張大字報底稿因反覆搬家丟失了。

## 1、我們貼大字報前和後國防科委運動開展情況

### 1) 文化大革命初的國防科委

當時，國防科委全稱為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直屬中央軍委領導，集中了國家一些知名科學家和大量拔尖的科技優秀人才，號稱擁有20多萬知識份子。聶榮臻元帥為主任、黨委第一書記。科委設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一個直屬所即國防科學技術情報資料研究所（現改稱總裝備部信息中心）。司令部設九個業務局，例如，八局為院校局，九局為情報局，等等。科委除管轄幾個試驗基地外，還管轄二機部至七機部六個機械工業部的科研機構，文革初擴大為18個研究院，並接管了一部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管轄11所重點高等院校，如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還有第二炮兵。說好聽一點，是個知識份子最集中的單位，

大專以上畢業的有 24 萬人左右。說真實一點，是聶榮臻拉山頭、搶地盤的單位。周總理曾經風趣地說：“聶老總背了個大包袱。”其實聶榮臻也並非像現在一些書、刊吹得那麼神，林彪譏諷他為“聶老五”（即本事不大）。但聶榮臻緊跟、緊追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是很有兩下子的，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凡資產階級司令部反中央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少不了聶榮臻的身影、一份貢獻。文化大革命一開始，矛盾全面爆發，聶元帥除鎮壓群衆，再無別法。毛主席、周總理、黨中央費了很大精力來處理科委的問題。科委的“文革”，基本上可以看出中央兩個司令部門鬥爭的概貌。凡聶榮臻領導的在全國各地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大多都是“文革”中的老大難單位，並直接干擾著所在地區的“文革”運動。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黑手就是聶榮臻和緊跟他的王秉璋、張愛萍等幾個幹將。我所在的情報所既是科委的直屬機關（九局），又是科研單位。情報所的同志造資產階級司令部聶榮臻的反，批判聶的錯誤，聶榮臻感到“後院失火”。情報所的造反派，佔科委機關總人數的 65% 以上，佔本所 90% 以上。情報所位於國防部大院外（科委後勤部也不在國防部大院），在北京西釣魚臺附近，搞情報工作的優勢是各種管道和信息暢通。因此，聶榮臻用十倍的精力鎮壓情報所造反派。這樣，情報所的“文革”，遠超過其他研究所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具一定的典型性。我作為科委系統的造反派，在“文革”期，一再“大紅”“大黑”被“翻燒餅”，對科委的文革有一點發言權。

## 2) 聶榮臻領導的 50 多天的文革

按前面關於文革的時段劃分，聶榮臻為首的科委黨委常委（以下稱聶常委）領導的 50 多天的文革，即“前文革”。劉、鄧在全國大派工作組，聶榮臻積極緊跟，先下手為強，以攻為守，向所轄高等院校派工作組，抓“右派”。他們要抓的“右派”，其實都是對聶領導集團或成員有意見的幹部、教師和學生，一些家庭出生不好的或 57 年反右有些錯誤言論但未被定為右派的首當其衝。

早在 196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 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主席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看一下劉、鄧在 50 多天裏，派工作組鎮壓師生的情況：他們很熟練地把上述經驗移植到 56 天“前文革”。以劉、鄧搞的樣板清華大學為例，下面是清華大學群衆組織 4·14 一位頭頭發表的文章片段：

6 月 4 日，自 93 班的同學貼出了《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繼續反對蔣南翔和校黨委。因為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大字報上簽了名，這張大字報格外引人注目。6 月 9 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葉林為組長的 513 人的龐大工作組進清華，罷免學校黨委及各級幹部的官，由工作組代理行使校黨委職權，領導清華文化大革命；這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一派、二罷”。工作組在各系組建了文化革命委員會並指定了各系的文革委員，那些反蔣（南翔）積極的幹部子弟自然成了工作組的依靠對象，成為各系的文革委員。

我們班由一位高幹子女負責，團支部、班委會停止工作。他們把幹部揪到臺上鬥爭，給幹部戴上高帽子遊街，並強迫他們勞動改造。從六月九日工作組進校到六月二十三日這段時間，在清華文革史上是所謂“鬥黑幫”時期。後來《紅旗》雜誌調查員對這個時期的清華有個形象的描述，叫做“遊街一大串，鬥爭會一大片，勞改一大隊”。

一篇達 20 來萬字的反文革的文章對“前文革”的情況介紹說：

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 24 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 10211 名學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們僅幹了 56 天，就打了這麼多“右派”、“反革命”。在此算一筆帳：56 天迫害了這麼多知識份子，平均每天打了 182.34 個“右派”、46 個“反革命”。參照這個打法，他們說文革搞了 10 年，每年按 365 天計，則共 3650 天，就該打多少“右派”和“反革命”？這就是走資派們大力宣揚的他們“愛護知識份子”的真相。慶幸的是，毛主席、黨中央及時發現了他們的暴行，並給予了迎頭一擊，才沒有造成更慘重的後果。但是，56 天的挑動群衆鬥群衆，嚴重干擾、破壞了整個文革。鄧小平自己也承認：“群衆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

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

另外，《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中共中央的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記錄）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老總進行嚴厲批判（註：毛主席不在北京，當時更無“四人幫”），把朱老總批成了“野心勃勃”的“大野心家”，這件事正好發生在“5·16通知”後第七天；會議最後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處理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這是文革初，劉、鄧為了保自己、整別人，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又一例證。

聶榮臻緊跟劉、鄧在科委機關佈置抓右派，並積極向所屬高等院校派工作組，大抓“右派”、“反革命”。上述26所高等院校工作組大抓“右派”、“反革命”的巨大“成績”，包括科委所屬院校北京航空學院（後改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工業學院（後改為北京理工大學）在內。聶榮臻鎮壓革命師生，把“文革”壓下去所作“貢獻”不小。

在聶常委的統一安排下，情報所劉毅民積極行動，組織力量大抓“右派”，大整黑材料、迫害群衆。

## 2、劉毅民組織反撲

大字報貼出後劉毅民十分恐慌，組織力量進行壓制。劉毅民除了組織人員內查、外調整黑材料外，還組織一些處、室幹部到他家中密謀，企圖把我們鎮壓下去。

### 1) 劉毅民組織處、室幹部貼保劉大字報

劉毅民組織處、室幹部貼大字報為他評功擺好，還

宣揚什麼“新同志（分配到本所工作不久的同志）要調查研究”、“老同志要獨立思考”，不要上當受騙（即指不要相信我們貼的大字報內容）。

### 2) 製造恐怖

劉毅民指使其他所領導，每天早飯前強迫全所同志出操，強行要求全體人員跪下，並訓話。本人強烈反對這一套做法，從此拒絕出操。更嚴重的是，他還召開全所幹部大會，進行霸道訓話，製造恐怖氣氛，氣勢洶洶地宣佈，誰要是不聽話，“我就是師級幹部，有權對營以下幹部進行處理……”。有位女同志，承受不了這樣的軍閥訓話，當場退出會場。劉毅民竟在當天對這位女同志作出“警告處分”的決定。

### 3) 召開會議對我們進行圍攻

劉毅民組織貼大標語宣佈，“大辯論的時候到了”，連續召開會議，對我們進行圍攻，要我們把大字報的具體內容講清楚。本人一笑置之，不予理睬。這些圍攻會議，一是說明我們貼的大字報擊中要害，令他寢食不安；二是大字報以提問題的方式寫的，無把柄可抓，劉毅民無法招架。只要把問號改為句號，就揭露了劉毅民的主要問題。劉毅民甚至派人對我們進行跟蹤盯梢。

從減租減息、土改、“三反、五反”，直至反右、“四清”，我都是第一線最基層的領導運動的成員。憑我對劉毅民的瞭解，搞群衆運動，我可能比他“內行”得多。大字報我是作了精心考慮的。我要讓劉毅民看了，即便非常恨我們，也無奈我何，狗咬刺蝟，無從下口。劉毅民上述種種醜惡表演，說明大字報達到了目的，是成功的。

他的表演，基本上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沒有想到他們竟會召開全所大會，公開以勢壓人，打擊報復不滿他們做法的同志。

### 3、大字報擊中了所“文革”的主要鬥爭目標

我們的第一張大字報的鬥爭目標集中在劉毅民一人身上。對劉毅民在文革期間的表現，我的結論是：劉毅民在“文革”期間，失去了權力，為了篡黨奪權，奪回失去的權力，一步步走上了反黨、違法犯罪的道路。

貼大字報不能以個人好惡為準。自我進所以來，劉毅民是很看重我的，多次找我談話，花了精力培養我。慢慢地，我發現他重視、培養我是為了增加一個吹捧、樹他自己的一分力量。我開始也是善意向他提意見，希望他改正這些問題；不料一提意見，反遭打擊，矛盾由此一步步加深。劉毅民對我的器重，在全所是衆所周知的，如果我為了個人“前途”，只要順杆爬就什麼都順順當當。大字報貼出後，有的同志找我談心，問我為什麼你的大字報和以後的批判發言，都集中批劉毅民，而不批江濤同志（當時的黨委副書記、所長）？我剛分配到所，幹了第一件影響較大的工作，江濤同志不僅沒表揚我，反狠狠批評我一通，從上午10點批評到下班吃中飯還在批，最後還是劉毅民來解圍，讓我下班吃中午飯。

知道內情的同志，看到大字報未批評江濤同志一句，反而全部批劉毅民，有些不解。我對他們說，江濤同志儘管沒有能正確評價我寫的文章起的重要作用，反而嚴

厲批評我，還批過了點頭，但目的是為了搞好工作，把工作應做得很細緻，出發點很好。寫大字報，千萬不能以個人恩怨為出發點，更不能利用大字報為自己的錯誤辯護、以至美化自己，傷害旁人。不久，江濤同志不幸患肝癌住院治療，在他病危時，我專門去醫院看望他。他緊緊握著我的手，眼淚一下掉了下來，對我說：“惲仁祥同志，很對不起你，我看錯人了……”。我含淚不讓他說下去，對他說：“江所長，你不能這麼說，你批評我批得對。現在你千萬保重身體，安心養病……”

#### 四、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全國造反派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經歷了較長時間。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北大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8月1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毛主席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周總理親自為清華大學蒯大富平反，宣告了造反派同劉、鄧資反路線鬥爭的勝利。

科委聶常委仍負隅頑抗，死捂著蓋子。1966年10月13日，哈軍工“八八紅旗戰鬥團”到北京要求科委副秘書長路揚交出工作組整的“黑名單”，仍沒能衝垮聶常委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的防守。

1967年4月，北航學生韓愛晶帶領一、二百人到國防部南門（即科委大門）外，要求科委領導出來澄清問題。科委領導拒不接見，師生們就在大門外靜坐。科委領導幾晝夜不接見，影響越來越大。毛主席、黨中央知道了

此事，毛主席指示：“搭個棚子……，給水喝”。北航師生一直靜坐了二十八晝夜。北航一些師生把工作組鎮壓師生的情況，報告了毛主席、黨中央。毛主席明確表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主席的指示大大鼓舞了革命師生鬥志。聶榮臻對他壓制群衆運動造成的嚴重後果，不是認真總結教訓檢查錯誤，而是把長期住院的與派工作組不相干的鍾赤兵同志（科委副主任）從301醫院逼出來，帶了氧氣瓶交北航師生批鬥。聶榮臻坐在批鬥會主席臺上，對鍾赤兵同志說：“你身體不好，戰爭中受過傷，我也保不了你。”在背後，聶常委把工作組整的師生的黑材料轉移到總政治部隱藏起來。李敏同志把批鬥鍾赤兵同志的情況，回家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鍾赤兵同志是好人，是打仗打出來的，他在婁山關戰鬥中負的傷（鋸掉一條腿）。”北航師生知道這情況後，轉向追究向北航派工作組的後臺。聶榮臻捨身保帥，把科委副主任羅舜初推了出去，交北航師生批判，承認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聶榮臻在北航問題的認錯，只是像擠牙膏似的擠出了一點。

北航師生同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反動路線的鬥爭，在毛主席、黨中央支持下，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這一消息很快傳遍全國，對貫徹《5·16通知》和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情報所造反派大受鼓舞。我們乘北航同聶常委鬥爭勝利的東風，要劉毅民領隊去科委，要求科委領導解決情報所的問題。我們一下去了四卡車造反派。唐延傑副主任接待了我們，

我們介紹了劉毅民迫害幹部的情況。唐延傑同志表示，常委將進行研究，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不久，科委召劉毅民去開會，聶榮臻同意機關搞“四大”，承認這以前執行了劉鄧資反路線，點名叫劉毅民處理好這些問題。情報所開始批判劉毅民執行的資反路線。

聶榮臻問題在北航暴露，這位在科委機關一向被奉為“神”一般的元帥的“尊嚴”隨之一落千丈，又被迫承認在科委機關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劉毅民嚇得驚惶失措，找到我，要我出來組織文化革命小組領導運動。我對他說：“我只主張批你的錯誤，沒有別的想法，希望你認真檢查錯誤，並更好搞好工作，千萬不能躺倒不幹。”遺憾的是，他很快召開黨委會議，作出了改組黨委決定。聶常委批准了改組的報告。選舉中劉毅民落選。他在辦公室檯曆上寫道：“睡在我身邊的是什麼人？”企圖把矛頭引向所長江濤同志，我動員大家別上當。

在黨委改組前，我們要求劉毅民對受迫害同志作出平反決定、銷毀“黑材料”，尤其對前述退出會場受了警告處分的女同志，除撤銷處分外，還要向她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劉毅民都答應了。全所 90% 以上的幹部、群衆、職工都被動員起來批判劉毅民，批判劉、鄧資反路線。運動搞得轟轟烈烈。

北航批資反路線時，除批羅舜初和工作組外，校文革籌委會負責人孔令華同志（毛澤東主席的女兒李敏同志的愛人），也被批了，並給戴了高帽。被科委派往北航任工作組成員的李敏同志也被批判了。孔令華李敏夫婦

回家時，江青同志說，“保皇派”回來了。毛主席問有沒有戴高帽遊街。他們後來都成了造反派。七機部葉正光同志（葉挺將軍的兒子）等，“文革”一開始就造聶榮臻、王秉璋的反，直至文革結束。這些事例說明，文革初，“紅五類”不一定都造反，後來也不是都“保守”。就我本人來說，可能不紅也不黑，從“文革”開始造反至今未變。因此，希望千萬不要用唯成分論來劃分“造反”還是“保守”，這是對後來者的誤導，對史實的歪曲。一個人走什麼路，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另外，人是容易變的。人所處的環境發生變化，思想觀點也會隨之發生變化。有的人在文革中支持過造反派，文革結束之後反戈一擊，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因此就斷定這個人文革期間的行為是假的，是投機。

關於如何批資反路線，此處不再細述。筆者本人親歷過戰勝劉鄧資反路線的鬥爭實踐，現在看來，有不少問題值得研究。筆者不揣淺陋，提出一些見解，供讀者參考。

## 1、關於群衆組織問題

“文革”一個大特點，同以往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運動不同是，在“文革”開始一段時期內，除了紅衛兵可免費大串聯外，允許群衆自己組織起來，造走資派的反。這就是當時遍及全國各行各業的名稱各式各樣、人員多少不一的“造反派”群衆組織。群衆組織的出現，大大加快了走資派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覆滅，這是無可否

認的事實。如果不是像北航造反派群衆組織“北航紅旗”那 28 畫夜的頑強鬥爭，要衝垮聶榮臻資反路線統治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大量興起的群衆組織也有不可忽視的負面效應，例如，群衆組織也是劉、鄧派工作組挑動群衆鬥群衆能延續的重要原因。有些地區或單位的一些群衆組織被走資派所利用。走資派不僅藉以保自己，而且挑動兩派群衆組織武鬥。如何防止被壞人利用，這一教訓很值得總結。

我本人自始至終不贊同軍隊搞群衆組織、以及同地方間串聯。因此，我這個“造反派”很特殊，從未組織群衆組織，更談不上當過群衆組織頭頭。

我曾以我個人名義調動幾卡車志同道合的同志，搞了一次集體行動，這是本所唯一一次。當時主持科委日常工作的唐延傑副主任，聽了我幾分鐘陳述，跟我也就是一面之交。有一天，所政治部突然通知我說唐副主任讓你立即去科委。去後，唐延傑同志開門見山說：找你來聽聽你對新黨委分工的意見，主要是誰任書記。我說，我不是黨員。他說：我知道，因為報上來的名單上沒有你，問了一下，才知道你不是黨員；不是黨員，也可以發表意見。我向唐延傑同志開誠佈公地講了我對新黨委分工的一些看法。最後結果，新黨委分工基本上是按我的意見定的。通過上面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不一定要組織群衆組織當上頭頭，才能和大家一道造反。我不贊同搞群衆組織，而主張黨委領導，不怕黨委主要領導有問題。我認為，只要中央是無產階級掌權，則下面只要自己堅持的路線正確，最後必能勝利。如果自己堅持的路線錯了，

由自己一人負責；如果當了群衆組織頭頭，錯了就連累一大串，甚至禍害一大片。

## 2、嚴格掌握無產階級政策

在“文革”時期，毛主席有句語錄，“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可能絕大多數參加運動的人都能背誦。但事實上，一些造反派犯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這個“生命”問題上粗心大意了，而且在鬥爭實踐中，從上到下，很少人在這個問題上不出偏差，都不同程度地“粗心大意”了。這也符合辯證法。要完全不偏不倚是不可能的，但作為造反派，必須在主觀上念念不忘黨的無產階級政策，要絕對避免在原則問題上犯錯誤，尤其是明知故犯。而同時又要敢想、敢說、敢幹。在此，我只能把問題提出來，無能力講透它，只能講點“文革”中遇到的一些事例的處理情況，作個介紹。

### 1) 如何對待不同觀點的同志

批資反路線之初，劉毅民在背後組織一些幹部對我進行圍攻。我曾公開這些情況，但是這種做法並沒有打擊劉毅民，相反卻打擊了那些反對過我，隨後又認識到自己錯誤的同志。後來我發現，這種做法是完全錯誤的，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於是逐步糾正這種錯誤做法，並對這些同志當面表示歉意。雖然如此，也不能說我完全處理好了。我的一些處理方法，對個別同志造成很大的隔閡，至今難以彌補。當然，有些問題雙方都有責任，但對我自己的責任，還是應該多反省。

## 2) 批鬥“保皇派”

在文革期間，我反對將群衆劃分為“造反派”、“保皇派”，堅決反對批鬥“保皇派”，也勸阻某些與我持相同觀點的同志不要這麼做。由於本人水準問題，工作做不通，勸阻不了，我最後唯一的辦法是拒絕參加這類活動。有些人給幹部戴高帽、遊街等。我對搞這些活動的人，除勸說外，還很嚴肅地指出，被鬥爭的這些同志都是共產黨的幹部，戴高帽、遊街，是人身傷害，是對黨的醜化。同前面一樣，勸說、批評無效，本人一概拒絕參加這些活動。

在此，我想講一個觀點，即群衆發動起來後，我們的頭腦不能發熱，在沒有發動起來前，倒是要熱一點。這也是毛主席教給我們的。發動起來後，有一種很值得引起重視的傾向，即極少數人認為越“左”越“好”，怕別人說你“保守”。其中極個別其實是投機分子，而不是要造資產階級的反。這極個別人，在順利時，比任何人都“左”，但一不順利，遇上逆境，當投降派最積極的就是這類人。舉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電視劇《江姐》中的甫志高，就是個好教材。另舉兩個“文革”期我親歷的例子。一個例子是，有些人積極主張給幹部戴高帽、遊街，其中有人特別堅決，但是這個人很快就變成了人們所說的走資派的捍衛者，脫離了造反派。另一個例子，在清隊時，一位同志被派出外調一個當過日軍翻譯的人的情況，在敵偽檔案意外發現江濤同志曾參加國民黨一個訓練班學習，後突然跑了，離開了這個訓練班。我們政府把這個訓練班定為國民黨特務周邊組織。外調的同

志長途電話報告了我這個情況。接電話後，我找了兩位同志商量這件事。我說：突然不見，很可能是棄暗投明，參加革命來了；在他們年青的年代（江濤同志 1938 年參加革命），一些知識青年找生路，找錯了門，發現後棄暗投明，很正常；另外，江濤同志參加革命後，未發現任何異常。這只是我的分析，缺證據。我說，他愛記東西，是否可以到他家看看，如他的日記中有這段記載，問題就清了，但不能去抄家，他家屬（江已住院）同意就看，不同意則作罷。這件事沒弄清之前，不得向任何人透露。有一位同志當時就說我“右傾”，他要寫《打倒狗特務江濤》的大標語，我們怎麼勸阻也勸阻不住。他在我們所大門口，用很大的字寫了大標語貼了出來。他是以“衛東革命造反派”名義貼出的，其實就是一個人、也只代表他一個人寫的。江濤同志的夫人和子女，也許至今也認為是我同另一位去查閱江的日記的人幹的。事實上，我們二人在這個問題上無任何過錯，還不便向江濤同志的夫人、子女講清楚。前些時候我們倆相遇還談到這事。可是，就是這位刷大標語的朋友，後來在聶常委製造“國防口 5·16”這一大假案時，那個製造冤、假、錯案的專業隊，對他毫不費力，他就順杆被誘出一大堆見不得人的假口供，誣陷了我們倆，他便“光榮”地被招安了。今天是第一次公開這件事，以前我從來沒有透露過。

通過這些實例，我深感緊緊掌握政策的重要，還應特別警惕“左”的衝擊。這可能是所有造反派都會遇到極少數“極左”的，弄不好就會“一缸清水”，讓“一條泥鰍”攬混了。對一些頭頭，更是一種考驗，看你能不能

能堅持原則。

### 3) 批判犯了錯誤的幹部問題

犯了執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幹部，理應受到群衆批判。但批判他們，不僅應實事求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而且特別要注意不亂扣帽子。理論上好講，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沒有把握好，有些右傾保守，但我至今認識不了自己保守。

批資反路線，劉毅民肯定是批判的重點。當時，本所有不少同志不同意我不贊同軍隊成立群衆組織的意見。各處、室都成立了群衆組織。有的組織批這個領導幹部，有的批那個……，“百花齊放”，但主要集中在批劉毅民。在揭批中，揭出了副政委姜某的問題。在土改後，姜某帶了武器回家，對當地農會把他家定為地主表示不滿，說我在前方打仗，你們在後方這麼幹……。鬧得很僵。農會把他的槍繳了，並把情況通報了部隊。這樣姜某就成了挨批的第二重點對象。

關於如何批的問題，我找了影響較大的群衆組織頭頭商量。我說：劉毅民的錯誤很嚴重，該狠狠批。但是，劉毅民家庭出身中農，他的母親因劉毅民參加革命，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因此，我認為不能把他作為走資派批。何況，說他是走資派，證據也不足，弄不好反造成群衆意見分歧，這就更不好。關於姜某的問題，同樣可以批，但不能作為階級異己分子批，因為土改早已過去，並且是他的錯誤，當時他所在部隊已作了處理。他們聽不進，認為照我這一說，我們所的“文革”就沒有什麼好搞了。這次商討不歡而散。後來，新黨委書記在全所

大會上喊口號：“打倒走資派劉毅民！”會後，我隨即找他。我問他：“你作為黨委書記，說劉毅民走資派，證據是什麼？”他說：“不這麼喊，一些人通不過。”我說：“你這樣喊原來是為了迎合一些人，是不是為了保住書記的‘寶座’？我倒擔心一個黨委書記這樣幹，想把運動向哪裏引？”他被我批得連連認錯。

至於劉毅民自己為了奪回失去的權力，而一步步走上瘋狂反黨、反毛主席的路，是後來的事。我在這裏將批判犯資反路線錯誤的幹部問題，同一些群衆組織的大小頭頭討論、爭論的實際情況介紹給大家。其中是是非非，我不想發表意見。但這些問題，不僅是“文革”，即便平常工作中，也會遇到，有可供討論的意義。

## 五、“5·13”北京展覽館的演出

1967年5月13日，為了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週年，周總理指示北京陸、海、空三軍文藝團體兩派聯合演出。這本應是促進軍隊兩派聯合的良好機會，然而，“李作鵬等違背周總理指示，有預謀地支持一派演出，壓制另一派，釀成‘五·一三’兩派武鬥流血事件。……，（之後）林彪通過觀看演出等活動支持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所支持的一派。這一派就成了所謂‘林副主席支持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註：以下稱‘三軍無革派’，又稱‘大三軍’）”。（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至1976年下卷，第153頁）。另外，肖華同志和陳伯達還到現場勸阻一派演出，楊成武同志也不

贊同一派演出。參加 5·13 演出的，當時是支持、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的，人數較少，所謂“保守派”也稱“老三軍”。反對李、吳、邱的人較多，也稱“新三軍”、“造反派”。這次演出，不僅成了肖華同志被打倒的主要原因，還成了駐京部隊“革命”、“反革命”的分界線。凡是去現場衝擊演出的就成了“反林副主席”的反革命，定為“小三軍”（註：以一次演出劃線，這在中共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從此，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等組成軍委辦事組，取代了中央軍委。下屬各總部、科委、軍兵種等成立了“三軍無革派”“總勤務站”，領導運動。（註：詳情可參閱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2010 年 5 月出版《新發現的周恩來》第 247 ~ 249 頁）

## 1、聶榮臻操控的“科委三軍無革派總勤務站”的起家

聶榮臻並不甘心忠實推行資反路線的失敗，很快以體制調整為名，大樹山頭（當時被稱為“聶氏山頭”），以中央軍委名義，召開了科委系統數百人參加的幹部大會，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在主席臺就坐的有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我參加了這個會議。

葉劍英說（大意）：“今天由聶老總作體制調整的報告（註：設十八個研究院），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報告‘高舉毛澤東思想’……”他話風一轉說：“聶老總是林

(彪)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他黨性很強，羅（瑞卿）長子一直想奪他的權，他一直放在肚裏不吭聲……”聶榮臻滿意地領受了葉劍英對他的“林彪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這在當時最為顯赫的加封，從此，科委就打出了“以林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聶副主席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常委的正確領導”的旗號，號令科委系統。並組建了以張某某（後來工宣隊告訴我張某某是國民黨偽保長，最近幾年有同志說他是保隊副）為頭子的“科委三軍無革派總勤務站”，自封為“大三軍”，領導科委機關和直屬單位的“文革”運動。

## 2、聶榮臻的御用工具“總勤務站”

聶榮臻拉起偽保隊副“總勤務站”，目的很清楚。一方面表示效忠林彪，同林彪死黨黃、吳、李、邱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另一方面，把“總勤務站”作為大樹特樹聶榮臻權威的御用工具，為其拉山頭效犬馬之勞。再就是聶榮臻想幹，但又不便於出面的事，讓“總勤務站”充當其走狗。咬錯了人，聶可推在“狗”身上，他可擺脫干係；“狗”咬對了，是“狗”主人聶榮臻的功勞。這方面事例太多，為節約筆墨，僅簡要介紹一下聶榮臻通過“總勤務站”創辦的1967年第6期《紅旗漫捲西風》雜誌（群衆稱它“西風雜誌”）。該期雜誌全部內容為一篇文章，標題是《國防科研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回顧》。全文約3萬多字，共分五大部分。現簡介如下：

第一部分：國防科研戰線兩條路線鬥爭是建國

以來全國、全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我軍兩種軍事思想，兩條建軍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彭德懷、黃克誠、賀龍、羅瑞卿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他們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林副主席，反對突出政治……。

彭、黃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裏通外國，勾結蘇聯赫魯曉夫集團……。

第二部分、第一階段：1956 到 1959 年。

劉少奇說：科學研究工作主要應該向蘇聯學習。張聞天也主張“拿來主義”……。鄧小平……。薄一波叫囂：“怎麼迎頭趕上呢？趕是從後面上去的。”彭、黃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極力把我國的國防抵押在蘇修的“保護傘”下。……。張愛萍的很多奇談怪論，什麼“叫花子打狗”……。在彭黃的影響下，趙爾陸等提出，應在發展航空的基礎上再發展導彈，……。

彭、黃……，國防工業某些人反對軍隊搞科研……。

必須指出，彭、黃反革命……路線，同蘇修是遙相呼應的。

聶副主席召集各工業部門……研究成立五院，主要呼籲支持技術幹部。……當時黃敬則公開抗拒……。

.....

.....，以林副主席、聶副主席為一方，以鄧小平、彭真，羅瑞卿、孫志遠為另一方，兩個司令部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後鬥爭。

(註：以上均選自《西風》雜誌)。

《西風》雜誌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批判一些主張暫緩的同志。周總理婉轉地批評聶榮臻不該把同志間正常的討論，提高到路線鬥爭高度，以抬高自己而貶低旁人。另外，《西風》雜誌這篇文章的另一重點是關於部院合併問題。聶主張科研併吞國防工業，被吹成“正確的革命路線”。聶樹的對立面，劉、鄧、彭、羅、黃、孫，還有方強、劉秉彥（包括張愛萍）等一批高級幹部，支持中央部院合併決定，被聶打成“修正主義路線”，遭到無情批鬥、打擊。這就是文章的另一主題。文章描繪的兩派鬥爭的劇烈場面就不抄錄了。聶堅持反對部、院合併，被《西風》雜誌吹成是一條“革命紅線”，是“一貫正確”的“紅線司令”，凡反對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場爭吵，聶榮臻至死表示對部院合併想不通。我摘引這一段文字的目的是說明聶榮臻打著科研統帥生產的旗號，搞山頭，不惜打擊了一大批持不同意見者，而且都上綱上線，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偽保隊副的《西風》雜誌，也就成了大樹特樹聶榮臻、打擊一大片老幹部的工具。

今年（2011年）年初，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連續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詳細介紹了60年代我國研製兩彈一星的艱辛歷程。1961年，因自然災害造成暫時經

濟困難，中央提出了“壓縮、調整、充實、提高”的方針，涉及到常規武器和兩彈一星的問題。有些人主張保常規，原子彈暫緩一步，有些人（例如陳毅、聶榮臻等老帥）不同意。電視劇歪曲事實，重筆抬高聶榮臻，編造了聶榮臻立下軍令狀堅決主張原子彈不能緩後搞。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時，陳毅同志拍了一下桌子說：當了褲子也得搞出來。兩種意見爭論，下不了結論，報告了毛主席，並建議先調查，再結論。由當時二機部部長劉傑領頭，劉西堯同志和張愛萍參加，調查後給中央寫報告：只要各方支持，有把握於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毛主席、中央批准了這個報告。然而，為大樹聶榮臻，電視劇不惜對事實作了歪曲。以至歪曲到了張愛萍復辟後，看了《西風》雜誌這篇文章（註：文中的張愛萍是反聶的修正主義分子）後，竟把原本想重用的這篇文章的執筆永遠打入了“冷宮”，而對聶榮臻他不僅不敢吭一聲，反加倍奉承。

### 3、聶榮臻把情報所90%以上的幹部、群衆打成“反革命”即“小三軍”

聶榮臻通過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和劉毅民，把情報所90%以上的幹部、群衆打成“反革命”，即“小三軍”。這是聶榮臻同“總勤務站”骯髒關係的突出典例。從“5·13”演出，至科委成立聶氏偽保隊副“總勤務站”，這期間我正好在休每年一個月的年假。休假結束回到所裏，我發現所裏已經被“總勤務站”、劉毅民折騰得烏煙瘴氣。在

我休假期間，所各處、室群衆組織聯合成立了“紅色造反兵團”，但很快被偽保隊副“總勤務站”打成“小三軍”，而停止活動。新黨委書記鞠芳同志和一名委員張伯恒同志被偽保隊副打成“小三軍”的“黑後臺”、彭德懷“蘇修特務”，無任何合法手續被非法關押。新黨委徹底被偽保隊副搞癱瘓，從此全所進入無政府狀態。整個所全面癱瘓長達3年左右。唯劉毅民被偽保隊副選拔為科委“審幹組組長”，奪了科委政治部的權。偽保隊副每天把情報所處、室以上幹部叫到“總勤務站”去受教育“做思想工作”，宣揚什麼“站隊論”。同時，他指派“總勤務站”成員到情報所召開群衆（“小三軍”）“座談”，實質是代表聶榮臻來招安。遺憾的是，受招安的人數幾乎是零，“總勤務站”成員反遭“小三軍”們反擊，以至無言以答。與此同時，偽保隊副企圖在情報所成立“鬥批籌備小組”。群衆稱這個小組為“鬥屁臭”。請問，佔全所不到10%的人員搞個什麼組，行得通嗎？何況還是偽保隊副當後臺。這裏，我不想對另一些幹部、群衆作任何評論。觀點不同是合情合理的。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好同志，其中還有幾個業務尖子，其頭頭和我的私人關係一直很好。混進兩派的壞人是極少數。這幾個壞人中，既有“紅五類”、也有“黑五類”，而且造反派的還多一點。以上是我休假期滿回所見到被偽保隊副和劉毅民依仗聶榮臻支持，折騰成的慘狀。在共產黨領導下，偽保隊副能非法關押師一級黨委書記和委員，把黨委砸爛，讀者可能聞所未聞，可這事就偏偏是在聶元帥領導下幹的。

#### 4、堅決斬斷伸向情報所的黑手“總勤務站”

我回所後，見上述情況，就對“5·13”北京展覽館演出情況進行調查。結果是，5月13日那天，情報所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天有什麼演出，更談不上有人去看或去支持演出，也談不上有人去衝或反對演出。因此，即便按林彪等定的標準，情報所的“大三軍”純屬是偽保隊副捏造的冒牌假貨；同樣被打成“小三軍”即“反革命”的，純屬是偽保隊副捏造的假案。不用太高明的政治水準都能判別清楚。至於事後，有的人贊同以那場演出作為劃分“革命”、“反革命”的標準，有的人反對這種標準，這種分歧是很正常的，沒必要干涉。但偽保隊副和劉毅民這類政工幹部，贊同以那次演出劃線，甚至事後還不允許旁人反對，否則就是“反革命”，這只能說明偽保隊副和劉毅民之流是別有用心。我調查清楚後，堅決反對以那次演出劃線。我感到他們真是荒唐到了常人無法理解的地步。在我弄清了問題時，傳來消息：劉毅民企圖同偽保隊副勾結，把一些總部、軍、兵種的“大三軍”請來，在情報所召開“三軍無革派”誓師大會，策劃在會上以本所“小三軍”頭頭“罪名”逮捕原“紅色造反兵團”頭頭，以“小三軍後臺”罪名逮捕黨委書記鞠芳同志。我當機立斷，當晚派三卡車造反派，直搗科委司令部宿舍，揪那個偽保隊副，想把他揪來關起來。三卡車人，有170多人，比司令部總人數多一倍多，聲勢較大。一進門，他們知道是情報所去的人，那個偽保隊副嚇跑了，

沒有揪到。這件事影響很大，聶常委知道後，表示願聽取我們的意見。我認真考慮了揪偽保隊副的嚴重後果，但我認為理由充分：一個隱瞞 20 多年混入革命隊伍的偽保隊副無理由可關押所黨委書記、委員，插手本所運動，目無法紀，造成本所全面徹底癱瘓。既然聶核心重用包庇他，我們就有充分理由把他揪來關起來，請聶常委來把事情講清後，再接回去。遺憾的是他逃跑了，沒揪到。

## 5、制止武鬥

揪偽保隊副的這天，參加行動的三卡車造反派，約佔全所人員（不包括工廠工人）的 50%，即一半多一點沒有去，本人也沒有去。就在那天晚上，在劉毅民挑唆下，少數人抄了另一位新黨委成員的家，激起了院子裏一些中、小學生（其中主力還是他們自己的孩子）的憤慨，與抄家者發生了武鬥。這少數人打不過學生，部分人就去打被他們關著的新黨委書記鞠芳同志。一鬧開，一下 100 多造反派相繼出來了，我們把武鬥現場分隔開，雙方才無法再打下去。我到現場宣佈雙方無條件撤離現場。個別被學生打傷的不願撤離，我勸他們說：一旦我們不管，都走了，你別吃了大虧，還找不著申冤的。讓我勸走了，一場武鬥結束。清理結果：去抄家的兩人受輕傷，其中一個被砸破了頭，臉上有血；黨委書記鞠芳同志胸部被抓傷；去打他的一位女同志胸部不知被誰打了兩拳。都是輕傷，請醫生到現場處理一下了之。

這是“文革”期間本所發生的唯一一起武鬥。這次

武鬥沒有死人，僅兩人流了點血、兩人挨打，沒造成大的傷害。但這次解放軍幹部同中（初中）、小學生，其中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孩子間發生了武鬥，不僅在全軍、而且在全國都是聞所未聞的。造反派現場勸阻武鬥，無一人動手，自然也無一人受傷。這不能不算是“文革”中一大奇聞。從這裏也透視出，聶榮臻一手操縱的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多麼不得人心，劉毅民為了奪取失去的權力又到了何等喪心病狂的地步！

## 6、同聶常委談判

上述事件後，聶常委表示願聽取我們的意見。我和另三位同志去了。參加的常委有羅舜初、劉華清、蔡順禮（註：其他常委都被聶榮臻打倒了，而從海軍調來劉華清，從昆明軍區調來蔡順禮，勉強湊成三人常委會）。我講了三點意見：其一是，“總勤務站”算什麼東西，有什麼資格到情報所指手劃腳？情報所只承認黨委領導，從今天起，如“總勤務站”再有人到所裏指手劃腳，一切後果由你們常委負責；其二、你們慾惠“總勤務站”無任何合法手續，就把所黨委書記、委員關起來，你們必須向群衆講清楚，如堅持可以隨便關人，對不起，就別怪我們也學了隨便關人；同時，什麼叫“小三軍”，請你們講清楚；其三、你們把劉毅民調進科委“審幹”幹壞事，你們必須讓劉毅民回所參加運動，接受群衆批判。

當時主持常委日常工作的羅舜初（科委副主任），想了半天後說：情報所的運動，直接由常委領導；關於鞠

芳（所黨委書記）的問題，我們把問題看重了……。我插話說：是看重看輕的問題嗎？羅說：看錯了，我通知他們把人放了；但關於張伯恒的問題，勸你們別介入；關於劉毅民，同意讓他回所參加運動。

這下斬斷了那只黑手“總勤務站”，什麼“三軍無革派”“誓師大會”，再無聲息。從揪偽保隊副的那天起，他的“總勤務站”再沒敢進情報所大門。

“三軍無革派”這面黑旗，在北京到處參與、干涉地方的“文革”，幹盡了拉一派、打一派的壞事。科委偽保隊副也打著這面破旗，干預科委在京科研單位的“文革”，拉一派，打一派，使不少單位成了文革時期的“老大難”。其中最嚴重的是七機部。

## 六、聶榮臻砸爛政治部、劉毅民立“大功”

聶榮臻把劉毅民調任科委“審幹組”組長，統掌科委機關幹部的命運。劉毅民一去就投靠到偽保隊副門下。

聶榮臻利用偽保隊副“總勤務站”，情報所高喊“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砸爛了情報所新黨委，把情報所徹底搞癱瘓了，同時，在科委砸爛了政治部。在聶榮臻一手操辦下，國民黨偽保隊副同走資派劉毅民（註：這時劉毅民已是一名稱職的走資派）的“大聯合”，在全國可能為數不多。這對“強強大聯合”，是聶榮臻在“文革”時期創“奇跡”十分重要的舉措。只有這個“大聯合”，才能幹出大量傷天害理的壞事。這樣的事情，別說是共產黨人，即便一般群衆，只要不對共產黨懷刻骨仇恨，

絕對幹不出來。

## 1、砸爛科委政治部

林彪指揮砸爛了“總政閻王殿”，並打倒了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同志。聶榮臻緊跟、直追，操縱偽保隊副“總勤務站”，經林彪批准砸爛了“總政閻王殿的黑分店——科委政治部”，開創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中央軍委到科委、到情報所沒有政治工作機關的先例，由什麼“總勤務站”群衆組織取而代之，向下屬單位發號施令。一支黨指揮槍的部隊，成了偽保隊副擺弄的部隊。

當時科委政治部主任由“聶核心”手下的常委蔡順禮兼任，日常工作由副主任徐平同志負責。他們無任何理由就打倒徐平同志，同樣無任何理由打倒組織部長吳鳳翔同志、副部長畢庶模同志、宣傳部長宋力生同志、副部長劉景路同志、保衛部副部長楊萃民同志等。其口號是：打倒“徐、吳、楊、宋、畢、劉”。政治部基本癱瘓，由“總勤務站”和劉毅民奪了權。請問，就因為林彪打倒總政治部，聶榮臻就砸爛科委政治部，還稱不上是奇聞嗎？全軍有如此效忠、緊跟林彪，而整別人、樹自己更為出色的典型嗎？

總勤務站砸爛科委政治部後，繼而打倒一大批科委和科委司令部中、高級幹部，並都關押起來迫害。被打倒者有唐延傑、張震寰兩位科委副主任（張愛萍由總參審查）和一局局長劉某某、四局局長李某、五局局長李某某、孫某某、八局局長龐某、科委副秘書長范某某等。

科委副主任一級被打倒了僅剩下一個羅舜初，當時還交給北航在批鬥，聶榮臻成了光杆司令，只好把交給北航批鬥的羅舜初調回主持日常工作，並從海軍調來劉華清、昆明軍區調來蔡順禮，兩位新副主任，拼湊成個“常委”班子。司令部打倒那麼多正、副局長，處於半癱瘓狀態。

被打倒的，大多都被關押。而且批鬥大會，偽保隊副“總勤務站”骨幹，都無例外搞武鬥，搞幾小時的“噴氣式”。所有“批判發言”，都是帽子滿天飛，沒有一條實質性問題。正因為這樣，我對偽保隊副等人一天批鬥九名師以上幹部（包括科委兩名副主任）表示抗議，貼了署名大字報《責問一天揪鬥九個幹部，科委機關的幹部還夠揪鬥幾天》，這也是我組織三卡車造反派去揪國民黨偽保隊副，要求劉毅民必須回所接受批判的原因之一。

## 2、揪鬥羅瑞卿同志

一個頭腦正常的人，都不會直接插手去干涉相鄰（在同一座大樓辦公）的國防工業辦公室（簡稱“工辦”的運動，去揪鬥國防工辦的常務副主任羅瑞卿同志。更惡劣的是，偽保隊副“總勤務站”用籬筐把羅瑞卿同志抬到臺上批鬥，對我們黨的幹部人身污辱到了如此令人髮指的地步。一夥敗類，包括那夥殘酷迫害幹部和群衆的走資派，毫不反省自己殘害幹部的罪行，反誣衊造反派、毛主席如何如何迫害幹部。請問，有誰見過真正的造反派、毛主席如此迫害幹部的嗎？我堅信無人能拿出實例來。看到聶榮臻操控偽保隊副幹出如此殘酷迫害幹部，李敏

等同志都當即退出了會場。

葉劍英曾經稱讚“聶老總是林（彪）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他黨性很強，羅（瑞卿）長子一直想奪他的權，他一直放在肚裏不吭聲，……”聶榮臻仗著這塊遮醜的“光榮牌”，撕掉偽裝，暴露了聶榮臻一直致力奪國防工辦（賀龍元帥為主任，羅瑞卿同志為常務副主任）的權的真面目。早在 1964 年，聶榮臻就佈置情報所搜集國外科研單位設生產工廠的材料，為他吞併國防工辦造輿論。而國外大多是生產工廠（公司）設科研機構。事實上，到後來通過其幹將張愛萍出任科委主任後，終於實現了吞併了國防工辦，國防科委改成為“國防科工委”。為此，當時被工辦借用的情報所的科技人員，在那發表了不利於吞併工辦的論文，張愛萍大動肝火，立即把這位同志調了回來，……。至今還有傳說：聶榮臻臨死還對部院合併“想不通”（註：因後來鄧小平又把國防科工委併入了國務院，把原國防科工委改成現在的總裝備部，作為給聶榮臻留了一點面子）。

聶榮臻批鬥羅瑞卿同志，就不是“黨性很強”了，而是撕破臉皮批羅瑞卿贊同搞“部院合併”。所謂部院合併，就是把各研究院例如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併入業務範圍相同的第四機械工業部，等等；這顯然同聶榮臻搞獨立王國想當科研山大王的野心相背。所以，批判羅瑞卿同志贊同“搞部院合併”，目的是為聶榮臻拉山頭、搞獨立王國造輿論。同時，聶榮臻很清楚，部院合併的決定，是中央決定的，由周總理具體負責實施的。但他不敢公開反中央和周總理，轉個彎把部院合併栽在羅瑞

卿等同志頭上，藉批羅瑞卿同志之名，實質批中央、批周總理，以至把工辦副主任趙爾陸同志迫害至死（參見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講話）。所以，聶榮臻批羅瑞卿等同志部院合併問題，是一箭雙雕，既為自己搞山頭造了輿論，又批了黨中央和周總理。用心良苦啊！

以上這些事例，讓我清楚地看清了聶榮臻為了保自己，而指使混進黨內隱瞞了 20 多年偽保隊副和劉毅民等，瘋狂地迫害廣大革命幹部，手段殘忍，目的險惡。解放後，共產黨執政後，竟發生一個混進黨內的偽保隊副，砸爛了科委政治部和情報所，用籬筐把共產黨大將羅瑞卿同志抬著押上臺批鬥，無任何手續而非法關押一個師黨委書記……；這些在全國、全黨可能是奇聞。因此，我組織三卡車造反派揪聶榮臻的走狗、國民黨偽保隊副，貼了責問他們打倒一大片革命幹部的署名大字報，觸犯了“老革命”聶榮臻，這就為聶常委在這後非把我置於死地而後快，埋下了伏筆。

### 3、陷害彭德懷等老同志

前面提到羅舜初要我們不要管被他們非法關押的新黨委委員張伯恒同志的問題，這實質是直接關係到彭德懷同志的問題。近 30 年，有那麼一夥人，利用彭德懷同志的問題，歪曲事實、大做文章，虛構毛主席聽不得不同意見，堅持“大躍進”犯的“極左”錯誤，“製造了冤案”，“迫害”了彭德懷同志。憑本人所見所有資料，彭德懷同志的問題：第一，彭老總自己陳述，那封被稱為的“萬

言書”，批評的是劉少奇；第二，專門召開全會批彭、作處理結論，是另幾個人逼了毛主席召開的，並以否則就不散會要脅毛主席；第三，批鬥彭的會是劉少奇主持的，毛主席沒有參加，會上有人動手要打彭，並嚴重逼供信，逼到了要彭怎麼講他就怎麼講（軍事俱樂部問題除外）；第四，劉少奇主持下的處理結論是一開到底、一撤到底，毛主席堅持了只免去國防部長，其他如黨籍、政治局委員等都保留；第五、劉少奇後來堅持彭的案不能翻。毛主席的責任是偏聽了劉少奇等的彙報、李銳的誣告；以及不知道劉少奇主持的會議有嚴重逼供信，而輕信了彭在逼供下的口供材料。另彭德懷同志本身也有錯誤，尤其是他整人很狠，在高層人際關係不太好。這 30 來年，一些別有用心者美化和突出對彭的誇張宣傳。把這個問題攬得極為混雜。所以我說：整彭德懷的是那幾個人，把他吹上天的，也是那幾個人，是整、是吹，由那幾個人根據需要而定。

在此，介紹聶榮臻支持劉毅民等人誣告、陷害彭德懷等老同志的問題。

本所批資反路線初，劉毅民躺倒不幹，所黨委召開黨委會作出了改組黨委的決定。當時張伯恒同志是原黨委委員、副所長。調來本所前，曾隨彭德懷同志訪蘇任彭的翻譯（因張是留蘇回國的老幹部），後任國家編譯局局長。彭德懷同志的問題出來後，張伯恒調我所工作。批資反路線時，劉毅民作出改組黨委決定的黨委會上，張伯恒同志提出開除劉毅民的黨籍，並一致通過作了決定。前面談到科委副主任唐延傑同志把我找去研究新黨

委分工的問題，實際是討論張伯恒同志的問題。論資格，他該任書記。所以唐延傑同志一開頭就問我誰任書記合適？我說：我說不清這個問題。唐說：你看張伯恒這個人怎麼樣？我說；我沒有直接同他打過交道，僅這段運動，看到他一些表現。唐問：你對他的表現有什麼看法？我說：給我的印象是政策水準不高，當一把手困難。唐說：能否講具體一點？我說：他的資格、級別都比劉毅民老和高，但他不顧場合，把批劉毅民放在嘴上，劉毅民有些錯誤是黨委一致通過的，他和劉毅民是同級幹部，而不像我，他不顧場合批劉就不合適。唐延傑同志聽到這裏立即問我：他提出開除劉毅民的黨籍，想幹什麼，你有什麼看法？這一下讓我清楚了他找我去研究的主要問題是張伯恒的問題，我說：我沒往你講的這方面去想。唐說：張伯恒不僅不能當書記，連委員都不能當。我說：你讓他當個委員怕什麼，你總不能為此推翻下面的選舉結果吧！最後結果是：鞠芳同志任書記、張伯恒為委員之一。

劉毅民為此對張伯恒懷恨在心，利用科委審幹組組長職務之便，策劃了一封誣告信，誣告張伯恒隨彭德懷同志訪蘇之際，參與了彭同蘇修間的“特務活動”。信經聶榮臻送給了康生，康生批示：肯定同蘇修有聯繫。劉毅民拿到這個批示，就同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密謀，決定不讓我所幹部、群衆知道康生的批示，讓“這些人跳一跳”，非法把張伯恒關了起來。從此，成立了劉毅民一人掌控的非法“專案組”。後來本人任所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明確分工我主管運動。當時劉毅民在背後嚷嚷

等待處分。他名義上是核心組組長，實際上不管事。但劉毅民仍背了黨組搞非法“專案”，一直拖到1976年上半年，他給張春橋送去“專案審查報告”。科委保衛部馬副部長拿了全部材料和張春橋的批示來找我。這時劉毅民的問題已非常嚴重，整天散佈“聽候處分”，我成了事實上的一把手。我看了材料，對保衛部副部長說，我是分工管運動的，這個材料我不知道，估計只有劉毅民幹，旁人不可能。我說：這件事我不是對你不禮貌，我不管，你去找劉毅民。由於當時劉毅民本人問題十分嚴重，一般人不願同他直接打交道。保衛部副部長怎麼也不肯去找劉毅民，搞得我很難辦，相持了約10多分鐘。很可能劉毅民知道保衛部來找我，很恐慌，突然不敲門來到了我辦公室。我說：“你來的正好，你報上去的關於張伯恒的材料，批下來了，這事我不知道，核心組也不知道，由你一個人處理去。”我把材料向辦公桌中間一推。很有意思，他竟把材料拿了就跑，連向科委保衛部副部長招呼都不打。本來我只聽說劉毅民幹了這件事，但不掌握任何真憑實據，他毫不猶豫地把材料拿了就走，這正好證實了這事是劉毅民幹的。另外，我讓保衛部副部長去給劉毅民，只要劉毅民收下，也能證明這事是他幹的。而這一來，保衛部副部長還成了見證人。最有意思的是劉毅民拿走材料以後不幾天，搞突然襲擊，召開黨組會議，拉來他那個黑“專案組”的頭頭鍾柏林來宣讀審查報告，在最後一段在原上報的材料上加了幾句：由於調查對象都在蘇聯，調查無法進行下去，待條件成熟後再查。這夥人真卑鄙，就這幾句話能掩蓋匿名誣告的罪責嗎？他

們還企圖用這幾句話把案子永遠掛起來。他們搞了長達 8 年之久非法“專案”的“審查報告”，沒有查出任何東西，哪怕一星半點也沒有。這一“彙報”，恰恰暴露了劉毅民搞的“黑專案”的班底。這次黨組會議，只有我清楚劉毅民想幹什麼，其餘都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回事。因此，理當無一人發言。事實證明，這一誣告案，是劉毅民一手策劃的，“專案組”是劉毅民背了黨組私設的非法組織。

簡要介紹一下這個誣告案的主要內容。

誣告信是一封以部分群衆的名義寫的一封匿名信，說張伯恒陪同彭老總訪蘇一道參與了特務活動。這封匿名信，交到了聶榮臻手裏，聶榮臻親筆給康生寫了一封信，康生在聶榮臻的信上批了“肯定同蘇修有聯繫”。康生的批示，在中央下發的康生問題的材料中，成了康生同志陷害老幹部的一條罪行（註：可直接參與誣告的聶榮臻、劉毅民等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仍“理直氣壯”攻擊毛主席“迫害了彭德懷”）。劉毅民掌控的非法專案組報送張春橋同志的“審查報告”，張春橋同志批示：原來是按特嫌立案的，不正面回答是否是特務，怎麼結案？“審查報告”沒有查到任何一星半點同“特務”有關內容。因為劉毅民的出發點是打擊報復、企圖篡權而誣告的，以上事實就足以證明匿名誣告信，是對彭老總等的惡意陷害。劉毅民非法關押張伯恒，並無理誣陷、非法關押黨委書記，充分暴露了他篡權的卑鄙目的。

按照聶榮臻等慣于說江青等“插手軍隊”之類“罪名”，我不清楚聶榮臻為什麼靠私人關係把誣告信送給在軍隊無任何職務的康生，而不報中央軍委、中共中央、中央

主席和副主席？誰誰“插手軍隊”，是聶榮臻等人政變篡權後，指責別人最常見的事，還都作為犯罪行為上綱上線。而且康生同志的上述批示，成了康生同志的“罪行”，白紙黑字寫在中央下發的“康生‘罪行’材料”裏。那麼，聶榮臻就有權請康生同志“插手軍隊”嗎？而且關於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可大言不慚地誣衊毛主席迫害彭德懷，可在背地裏，他們參與的這些誣告勾當算什麼？那還有臉皮對“文革”說三道四。還有什麼本錢指責旁人“插手軍隊”？

聶榮臻操縱偽保隊副“總勤務站”，打著“三軍無革派”黑旗，隨便參與揪鬥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彭德懷等軍隊老幹部。他們搞“噴氣式”體罰，在夏日炎炎下，把一些老同志體罰、折磨得滿頭冒汗，汗珠不斷向地下滴。可是，當他們篡權後，竟能大言不慚地誣衆造反派“迫害”老幹部，真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他們迫害其他非科委系統的軍內、外老同志的批鬥會，就不一一介紹了。

我要請問：有人不是說張春橋同志是“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康生同志是“四人幫”一夥的，那麼，聶榮臻把劉毅民惡意誣陷彭德懷等老同志的匿名信送給了康生同志；劉毅民背了黨組，私設迫害彭德懷等老同志的黑“專案”，並把“審查報告”送給了張春橋同志；聶榮臻操控的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同劉毅民勾結在一起，利用康生同志在聶榮臻的信上的批示，當作“聖旨”，非法關押了鞠芳和張伯恒同志，挑動武鬥，砸爛了所黨委，把情報所搞癱瘓長達三年之久（直到劉毅民篡奪了權為止）。按照某些人立的“中央清查‘三種人’”的標準，

這算不算“投靠‘四人幫’”瘋狂迫害老幹部、大搞打、砸、搶？為什麼不僅不清查，反而有這夥混蛋打著“清查三種人”的旗號，製造天大冤案，清剿“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僅師、局職以上幹部就20多人慘遭陷害。聶榮臻把科委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迫害到科委黨委常委僅剩下聶榮臻本人，聶榮臻成了光杆司令，成了一人專政的“常委”；砸爛了科委政治部（徹底癱瘓）；司令部一些正、副局長被迫害到所剩無幾，處於半癱瘓狀態；還把手伸到外單位，迫害羅瑞卿、趙爾陸、楊勇、陳再道等老同志；在駐京凡屬科委管轄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例如第十、第十四研究院，尤其在七機部拉一派、迫害鎮壓炮轟聶榮臻一派，都被折騰成了文革期的“老大難”單位。因此，按他們制定的法規，究竟誰是反黨亂軍、揪軍內“一小撮”、篡黨奪權的幹將、旗手？又為什麼把這些人殘酷迫害老幹部的罪行栽贓給“文革”、造反派、紅衛兵、江青同志和毛主席？這些無法否定的事實，不正充分證明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資派，瘋狂反“文革”而犯下的不可寬容的罪行嘛！不正是“中央”要清查的打、砸、搶“三種人”嘛！為什麼貨真價實的打、砸、搶分子被包庇重用、甚至被吹捧和歌頌為什麼“革命家”，而堅決抵制這夥打、砸、搶的廣大幹部和群衆反遭殘酷迫害，被打成“‘四人幫’三種人”？而他們製造的冤、假、錯案成千上萬，遍佈全國。製造這麼多冤、假、錯案的目的，是為了包庇、重用那麼幾個喪盡天良幹盡壞事的走資派。這在古今中外都是極端腐敗的奇跡，然而還死不要臉地誣衊誹謗“文革”和造反派、紅衛兵、江青同志和毛主席。

還有比這更無恥、卑鄙的嗎？

## 七、聶榮臻拉山頭樹自己的“學代會”

聶榮臻等人，攻擊毛主席“個人崇拜”，但恰恰又是聶榮臻們大搞“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大會”。關於全國搞“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的情況我不清楚。在國防科委系統，聶榮臻表面上是在樹毛主席，實際上是在樹聶榮臻他自己。聶榮臻選的“積極分子”，基本上是積極追隨和死保聶榮臻的積極分子。我可以斷言，其中不少在近30年是緊跟走資派，反毛、反毛澤東思想的積極分子。聶榮臻本身就是個反毛、反“文革”、積極參與右派政變的主謀之一。毛主席生前察覺了他們的陰謀，因此病重時一再對周圍的同志說，他死了以後，幾個老帥要鬧事。毛主席看得多准啊！所以有的老同志說毛主席看問題比我們早看50年。

事實證明，聶榮臻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大會”，真實的目的是拉山頭、樹自己、搞獨立王國。在這前，聶榮臻透支使用了葉劍英封他的“林彪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這一當時最嚇人的“光榮稱號”。全國掛上這面“光榮牌”的，唯聶榮臻也！加上他那個最效忠他的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利用《西風》雜誌，把聶榮臻吹成中國科技戰線的“一貫正確”的“紅線司令”。聶榮臻經過這些預演，認為大樹“聶核心”已具備條件，於1968年1月，召開了科委系統空前絕後的“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資格一條核心內容：“擁護以聶副

主席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常委的正確領導”。科委機關的代表是聶榮臻操控的偽保隊副張某和走資派劉毅民私定的。就當時的實際情況，學習毛著積極不積極是個虛標準，即便當時根本不學毛著、甚至反對學，也沒有人知道；不像現在，誰學、誰不學、誰反對學，基本上清楚。但是，擁護不擁護聶核心確是陣線分明，是公開的。別說七機部，就科委機關，至少 60%以上反對這條標準。我更是到大會去公開發表聲明，宣佈反對以這條標準為標誌的聶榮臻拉山頭樹自己的幫代會。這個標準在七機部更是受到相當一部分工人、幹部、知識份子的反對，“打倒王秉璋、解放七機部”、“炮轟聶榮臻”的大標語隨處可見。王秉璋是聶榮臻的得力助手、黑幹將(七機部部長)，後成了林彪死黨。七機部這部分同志顯然被剝奪了代表資格，但不等於沒有真正的學習毛主席著作並見成效的優秀分子。由此，聶榮臻的“學代會”，就成了名符其實的拉山頭搞宗派的山大王會。由於聶榮臻的錯誤行為，會議受到七機部一些同志的強烈抵制，根本無法開下去，“學代會”成了轟轟會。從這次會議轟轟可知，這部分代表懂得了毛主席和中央文件強調的文革的重點，即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走資派不幹，他不服輸，會議就更開不下去了。

問題反映到了毛主席、黨中央。4月20日，周總理代表黨中央來國防科委處理“學代會”的問題。總理發表了有名的 4·20 長篇講話。現僅摘幾段有關“學代會”內容如下：

“同志們，我好久沒有同科技界的同志們見面了。

我首先聲明，不是我好管閒事，是形勢逼著我要同你們講幾句，聽聽你們的意見。國防科委召集的學習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發生了一些問題，你們反映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反映到林副主席那裏去了，在中央開會時，要我幫助國防科委、國防工辦解決這個問題”。

總理問：“（七機部軍管會主任）閻揆耀同志來了沒有？”閻答：來了。總理：“選積極分子代表時有一條標準提到‘要擁護以聶副主席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的正確領導’？”閻答：有。總理：“同意這個就選，不同意就不選？”閻答：對。總理：“按這一條來選就必然出問題……。聶榮臻同志我也熟悉，我們是老戰友，我知道他不是一貫正確的，是有錯誤的嘛！當然囉，今天沒必要在這裏講。我收到他一封信，我想跟他提幾點意見，幫助他。在三月底，楊、余、傅問題出來後，他給毛主席、林副主席有一封信，也抄了一封給我，毛主席加了批語，然後準備繼續寫一份檢討。他自己感到不安，他寫了一份檢討在我這裏，我打算給他提幾點意見。他是四月十六日寫的，我還沒有提意見，毛主席要我幫助他，我就幫嘛！”中間有人揭發“科委機關壓制群衆，我們要到科委機關點火”。總理：“你們不要管科委機關的事，要相信機關的群衆自己會起來，你們怎麼起來的。”

這之後不久，李敏和八局的一些同志貼了“炮轟聶榮臻”的大字報。隨後成立了“衛東革命造反派”群衆

組織。周總理表示支持，並讚揚。毛主席說：炮轟是客氣的。至此，科委機關才真正開始有一部分造反派“炮轟聶榮臻”，揭開了科委機關造走資派反的序幕。

以上，總理一開頭就講“我不是好管閒事”。文革中，總理處理那麼多單位的問題，從未這樣講過，可見他們一再聲稱“擁護總理”，“擁護”到了什麼地步！這以後，又傳達了毛主席對“聶核心”的批評：“核心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從此，科委系統開展批判聶榮臻的“多中心，即無中心論”。直至1969年1月，中央為解決科委的問題，而舉辦了中央國防科研系統學習班（稱中央學習班），在這期間，中央把上述聶榮臻的檢討書發給中央學習班人手一份，掀起了批“聶氏山頭”的高潮。原來擁護“聶核心”的部分同志貼了“打倒聶榮臻”的大標語。李敏同志組織人員四處做工作，動員把“打倒聶榮臻”的大標語撕下來，堅持只“炮轟”不打倒。聶榮臻大樹山頭，結果是抓雞不著，反蝕一把米。但他不思悔改，反而埋下了秋後算賬的大陰謀。

寫到這裏，想講幾句有關同主題關係不大的話。“文革”期間，為解決聶榮臻等折騰成的這個爛攤子，周總理多次親自來國防科委收拾局面。為了研究國防科委的“文革”，我想買一本反映周總理“文革”期間真實活動情況的權威性書籍。有同志推薦我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1949年～1976年周恩來年譜》。我買了一套共三冊。我很關心研究聶榮臻於1968年1月召開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問題，因為這是國防科委的文化大革命的轉捩點，在這前

是大樹特樹聶榮臻時期，4月20日周總理受毛主席、中央委託來處理聶榮臻鬧出的“學代會”的亂子的重要講話，即4·20講話，掀起了批聶榮臻拉山頭搞多中心的熱潮，從此聶榮臻步入下坡路，退出第一線，先後推出其心腹王秉璋、張愛萍到第一線任科委主任。買來《周恩來年譜》後，我首先查4·20講話。讓我大吃一驚的是，這本書竟把歷史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這哪裏還是“年譜”，而基本是按胡喬木憑“聖旨”編造的那個“決議”為框框，把周總理變成按“決議”扭曲虛構的“臉譜”，嚴重扭曲了周總理的形象。現把《周恩來年譜》中1968年4月20日周總理的講話全文抄錄如下：

“4月20日，（周總理）接見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七機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的代表，（註：郭沫若等老同志也參加了會議）。周總理說：要允許別人犯錯誤，不要把別人一棍子打死，國防科委幾位元副主任犯錯誤，要幫助他們改正。趙爾陸同志死了，有人還要打倒他。說句公道話，這個同志一直在後勤工作，勤勤懇懇。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註：請把這幾句話，同後文介紹周總理于八屆十二中全會批聶的內容對照一下）。聶榮臻同志我很熟，我們是老戰友，毛主席要我幫助他。不能說國防科研、生產中有壞人，領導就一無是處。國防科委、國防工業部門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在國防科研、生產、教育上也是做得對的。各有中心，各有重點，不然，我們的東西怎麼能上天？現在國防科研、生產、教學急需把班子組成，不能再等了。

生產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誤了。應該趕快結束爭論。”

把這段話，同我上面摘自當場記錄稿列印件，當時傳達到科委全體工作人員的內容，對照一下，肯定會大吃一驚。因為周總理 4·20 講話很重要，傳達的面也很廣，如有條件能找到當時傳達的材料的，不妨對照一下，看誰如實反映歷史。我的意見：把《年譜》當“經典”引用，千萬要慎而又慎。上面全文抄的《周總理年譜》中 4·20 講話，一眼就看出那次講話的目的是什麼、主要解決什麼問題。如果周總理像《年譜》中講的那幾句話，也要花半天功夫興師動衆講一下，甚至還把郭老等也請來聽這幾句話，是不是周總理那天實在沒有事幹？這同周總理這次受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委託，主要是來解決聶榮臻的“學代會”出的亂子，沾一點邊嗎？《年譜》中竟不見“學代會”三個字的影子，不能不佩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權威編輯”水準之“高”。我太擔心，我們這代人，關於“文革”，怎麼才能向後代交代真實的這段歷史？難道一些知名文史專業文人都成了文痞了嗎？我想絕不可能，良心被狗啃掉了的總是極少數。周總理 4·20 講話，我手頭有科學院記錄列印出向下傳達的版本，七機部兩派根據記錄列印向下傳達的版本，還有去年有同志發給我電子版本。一些文痞，利用周總理在人們中的威望，打著《年譜》的招牌，篡改史實，為一夥野心家所用，對此決不能袖手旁觀。

應當肯定，“文革”期間，是中華民族學習馬、恩、列、斯、毛著作最為普及的時期，是群衆性學政治、學

哲學最普及的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發行這些著作最多的時期。僅就毛主席語錄，就有 500 餘種版本、50 多種文字、總印數達 50 餘億冊（參見武彩霞著《不再沉默》第 139 頁，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通過群衆廣泛的學習，人民的總體理論水準和共產主義思想覺悟有了空前的提高，整個社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良好風尚，社會穩定，較徹底地蕩除了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污泥濁水，封建迷信、詐騙、惡性刑事案等幾近絕跡。我國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之一。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一段從未有過的最光輝的文明史。與之相對照，近 30 年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反動官僚資產階級瘋狂貶損，官員大多信迷信，摒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資產階級思潮復辟、氾濫，官員普遍貪贓枉法，社會極端腐敗，惡性案件、群體事件日益嚴重，甚至到了商店禁賣切菜刀的地步，黨和政府同地痞、惡棍、流氓、黑社會聯合經營的“截訪‘黑監獄’——‘北京安元鼎（公司）’”，殘忍地迫害含冤上訪人員……。這前、後一對比，更顯“文革”時期全民大學習的深遠意義。而聶榮臻等人，藉文革時期群衆性學毛著的熱潮，打著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招牌，實為樹自己、拉山頭、搞宗派。最後還誣陷毛主席搞“個人崇拜”，可見這夥人卑鄙到了何等地步。

## 八、清理階級隊伍

我所 1968 年下半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一開始兩種

意見不一致的群衆沒能聯合一起搞。我主持查了三個人。三人都查對了。其中一個是隱瞞了將近 20 年的國民黨三青團分隊長，原來我只知道他是三青團員，從敵偽檔案查出分隊長會議有他的名字，查出後，他才承認交代是三青團分隊長，雖鎮反時不夠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可劉毅民重用、包庇他絕對是錯的。另一個是日偽時期的漢奸，原來我只知他當過日寇翻譯，但一查在敵偽檔案是漢奸，曾多次率日寇清鄉，燒、殺、搶、掠很嚴重，在當地民憤大，要是鎮反時搞出來，肯定斃掉了。另一個，一直表面很少講話，決不得罪人，顯得超常謹慎，引起我懷疑，一查，解放前作惡多端，要是鎮反時搞出來，雖不夠死刑，但絕對是判重刑。

1969 年後，是聶核心派來的軍管組清隊，逼、供、信嚴重，全部是冤案。

## 九、“聶核心”上了林彪“賊船”

聶榮臻自周總理 4·20 講話和毛主席的批評傳達以後，不僅不思悔改，而是積極投靠林彪，成了林彪反黨集團“五七一工程紀要”中列為反革命武裝起義的“借用力量”。聶榮臻表面上轉入幕後，由其得力助手王秉璋、張愛萍先後登臺為其效忠，成了沒有聶榮臻的聶榮臻核心。首先出臺的是王秉璋，任科委代主任，並調梁軍任科委參謀長；撤銷了中央派駐的工宣隊，回歸了聶氏一統天下。經王秉璋，把國防科委變成了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借用力量”，王秉璋成了林彪死黨。隨

後聶榮臻的幹將張愛萍，在聶榮臻積極參與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右派政變後，走上前臺，當上了國防科委主任，自稱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的“四條漢子”、“四大金剛”，幹了一系列反黨勾當。

王秉璋上臺，主要幹了兩件事。一件事是為林彪搞武裝政變提供大量國防科技絕密文件和材料；另一件事是，不惜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親密的戰友聶榮臻的‘國防口 5·16’”，為林彪武裝政變掃清道路。

## 1. 為林彪武裝政變提供國家絕密文件和科技資料

“聶核心”為林彪搞武裝政變效了犬馬之勞，背著中央舉辦了一個供林彪“參觀”的國防尖端科技“展覽會”，為了搞這個“展覽會”和配合“大有幹校”抓“5·16”，科委把劉毅民從渤海灣“大有幹校”調回北京。“展覽會”具體工作，基本上是劉毅民領導負責策劃、組織的，並同時為林立果選美大開綠燈。“展覽會”展出了國家最新國防科研成果和絕密文件和資料。1970 年 7 月 23 日，“聶核心”組織上萬人夾道歡迎林彪一夥“參觀展覽會”，盛況空前。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出逃，隨後林彪死黨駕直升機外逃被迫降，在直升機上查抄到林彪從“展覽會”竊取的大量國家絕密文件和資料。

以上陰謀活動，均被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粉碎。但聶榮臻變法有術，很快打扮成“林彪的受害者”而遮人耳目。至後來張愛萍上臺，七機部批林、批王秉璋，他

竟公開壓制說：“林彪死了幾年了，還他媽什麼林彪、王秉璋？”至於有人公開為王秉璋翻案就不足為怪了。“聶核心”支持誰、迫害誰？階級陣線清楚，毫不含糊。事實證明，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派、復辟派同林彪是一丘之貉，什麼受“林彪迫害”，只是披了一塊護身的遮醜布而已！

## 2、聶榮臻把造反派“一鍋端”離科委機關大抓“5·16”

1969年9月，聶榮臻奉林彪“第一個號令”，以“戰備疏散”的名義，把科委機關“一鍋端”離北京（註：絕大多數端走、僅留少數人看守）。一部分（司、政、後，包括李敏同志）端到河南駐馬店“遂平幹校”；九局一分為二，在科委大樓辦公的資料處（僅幾個同志）到駐馬店，情報所端到遼寧錦縣渤海灣海邊蘆葦蕩，稱“大有幹校”。“一鍋端”的目的是搞分而治之和大換班，即把炮轟聶榮臻的造反派基本處理出部隊（註：後周總理知道後，大換班計畫破產），隔斷了兩地間，以及兩地與北京的聯繫，關起門來抓“反林副統帥、反林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聶副主席的‘國防口5·16’”。

### 1) 智鬥“軍管組”趙育勤

情報所端到渤海灣“大有幹校”後，聶核心把情報所交四十軍軍長羅舜初（科委副主任）進行軍事管制。四十軍調某師副參謀長趙育勤（後被大家稱為“趙拐子”）率軍管組進駐幹校，趙育勤任組長，同時從錦州石油六廠調來工宣隊。我們感覺聶核心下決心要對情報所下毒

手了，但沒有想到是要抓“國防口 5·16”。很多人知道北京市有個叫“5·16 組織”，專門在夜間出動貼誣陷周總理的大字報，是個反動組織，但人數極少。從未聽說軍隊有個“國防口 5·16”。我們雖然意識到了聶核心要下毒手迫害我們，但決沒想到會捏造個“國防口 5·16”陷害我們。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

“軍管組”一到“幹校”，馬上就給我們一個下馬威。真是來者不善。軍管組想盡辦法折磨我們，零下 24 度的下雪天，深夜緊急集合野營拉練。我們這些北京地區的機關兵，裝備是按北京地區標準發的棉衣和皮鞋，而不是遼寧地區標準發皮大衣、皮大頭鞋。零下 24 度下著雪深夜拉練，誰也明知拉練是假、整人是真。棉大衣等於沒有穿，四肢都凍麻木了，腳上就像沒穿鞋，光腳在冰雪上走一樣。天快亮時，到老百姓家宿營，老百姓看我們凍成那樣子，又聽我們大多是南方人口音，都非常熱情地一再關照我們說：你們凍成這樣，千萬不能立即用熱水泡手和腳，快喝點熱水，讓身子慢慢暖過來以後，再用熱水洗臉、泡腳，否則要搞壞身子的。老百姓對解放軍的熱情支持，讓我這個從高中至大學畢業一直是長跑冠軍的人來說，趙育勤的這類折磨，顯得是小事一椿。生活上不按軍隊標準供應，全部高粱米，南方人很不習慣。但對我在舊社會吃過焦炭、發了黴的豆餅的人來說，也不成問題。另外，開荒地種稻子、割蘆葦等更不成問題。我反而感到，長時間在大城市、坐辦公室，能有機會鍛煉一下很好，覺睡得很香。後來我們自己種糧吃，曾一餐中飯吃了 12 個大蔥肉丁包子（每個 1 兩重），僅次於我

在張家口農村四清時，在當地縣裏開會一餐晚飯吃了一斤饅頭和一斤二兩紅燒肉。一個 1.64 米身高的人，吃這麼多，現在連自己都無法想像。因此，我沒有像當今那些走資派把下放幹校勞動等看成是什麼“關牛棚”的“人間地獄”。野營拉練最後一天自由跑，我又是冠軍，40 多華里，我比第二名早到目的地 40 多分鐘。這裏我講幾句“空話”：人家整你，你不能再自己整自己，要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變成鍛煉的機會。如果我沒有這點精神，這次把我拉到四周蘆葦蕩來殘酷迫害，我惲某那就是真見了“閻王”。這是我所許多同志公認的。當然必須有個最重要的前提，自己沒有做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才能像《紅燈記》李玉和唱的那樣，“什麼樣的‘酒’都能對付”。毛主席說過：坐牢，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是很好的休息。只有這樣，才能把毛主席的這句警句真正熔化在行動上。面臨殘酷迫害，只有不怕死，才能做到渾身是膽雄赳赳。這些，都是我面臨走資派迫害時激勵自己的警語。

在幹校，我還是一個班的班長。“文革”時期，我沒有批過任何走資派，思想上對黨內有走資派認識不上去。籠統講講可以，要批具體誰是走資派我不幹，就更不要說“反林彪”、“反聶榮臻”。整個文革期間，我沒有貼過批聶榮臻的大字報，也沒有發言批判過他，但我支持一些同志“炮轟聶榮臻”是事實。尤其是對林彪，至今我對他仍是只批他九屆二中全會後的問題。我點名道姓批走資派是這 3、4 年的事。是走資派他們在這 30 年來年中，用行動教育了我。我這一批，就再剎不住車。所以，說我 1970 年前就“反林彪”、“反聶榮臻”，太抬舉我了，把

我的路線鬥爭覺悟估計得太高了。

1970 年年中開始，趙育勤對 3、4 個同志辦“學習班”（整人班），但我不知為什麼事。從那以後，趙育勤氣急敗壞地在大會上不點名批我“反林、反聶榮臻”，用詞惡毒，並進行無恥的人身攻擊。當時，有幾位元同志想組織人員去衝軍管組，被其他同志勸阻了。因為軍管組帶有武器，貿然衝擊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犧牲。另外，趙育勤沒有點名，衝了反而被動。這事林彪垮臺後我才知道。不久，劉毅民調回北京掌了所裏的權，至此他篡權成功，把留在所裏的班子調來“幹校”。就在趙育勤倡狂攻擊我時，我向軍管組交了入黨申請。

### （1）我的入黨申請書

我在趙育勤惡毒攻擊我“反林彪”、“反聶榮臻”時，申請入黨，確實有點戲劇性。我在申請中有意不抄黨章關於歌頌林彪等內容，即申請書沒有林彪或林副主席這幾個字，更談不上有吹捧他的內容。我是有意不寫的，特地給趙育勤提供一個攻擊我的炮彈。不出所料，趙育勤在大會上聲嘶力竭地說：有的人還想入黨，想入的是國民黨……。

剛入所不久，劉毅民曾親自培養我入黨，當我發現他培養我的目的是增加一分吹捧、宣揚、捍衛劉毅民的力量後，宣佈收回了入黨申請。這一次申請入黨，我是想檢驗一下自己，在嚴峻的生死搏鬥的階級鬥爭考驗中，夠不夠一個黨員的資格。有知心同志聽了趙育勤對我申請入黨的攻擊，批評我太蠢，不該這時申請，他能接受你入黨嗎？我說：你還不懂，你得慢慢看下去。確實，

我的入黨情況在全黨可能不很多。一般都是順利時申請入黨，哪有在被批鬥、逆境時申請入黨的。其實，我們許多當初老黨員，不少是在同敵人拼搏的戰場上申請入黨的，還有的是走向刑場時交出入黨申請的；這就是我選擇申請入黨的時機。這份申請書，我明顯地表明我不同意黨章中關於林彪的提法。趙育勤不是攻擊我“反林”嗎，乾脆送個炮彈給他，看他怎麼辦？再則，從當時我面臨的形勢來看，來者不善，他是鐵了心要整我，那我就針鋒相對，跟他鬥一鬥。我諒他拿了我的這份入黨申請，也不好對付。

林彪垮臺後，趙育勤在“軍管”檢討的全體幹部大會上，十五個吊桶吊水、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沒有想到他迫害我五個來月，非法關押我三個多月，我在大會上僅講了一句話：不打不相識啊！但趙育勤竟在當天深夜不告而辭、落荒而逃。

我們從幹校全部回到北京後，劉毅民公開佈置各處室黨支部不發展黨員。他心裏很清楚我如果入黨，他獨霸的所黨的核心組將會是什麼情況。他濫用職權，關上黨的大門。因為只要開著，他再有多大能耐也阻不住我入黨。

劉毅民把批林搞得冷冷清清，把他追隨林彪死黨製造“國防口5·16”這一假案的罪行、積極為林立果“選美”給予的一切方便、為林彪竊取國家重大機密效犬馬之勞以及誣告彭德懷等問題，都封得嚴嚴實實，不檢討一句話。為此，在葉劍英召開了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並傳達了江青同志給葉劍英的信後，我把情報所的情況寫

了一封信給江青同志，敞著信封交給了劉毅民，信中沒談具體事，只講了批林批孔無法開展。劉毅民看後提了修改意見，我照他的意見修改後又交給了他，他把信送給了江青同志。不久，江青同志寫了回信，並送來批林批孔材料，由中央辦公廳兩位同志把信交給了我，材料送給了所裏。我把信交給了劉毅民，兩人一起拆開看了全文，他要我陪他把信報送給了科委領導。當時的科委主任黨委書記陶魯筭同志，科委副主任常委錢學森同志來到本所參加全所大會。就在這次大會上，有二、三位同志站出來建議：應儘快吸收惲仁祥同志入黨並參加核心組工作。我所在黨支部書記站出來說：我們支部早已安排計畫發展惲仁祥同志入黨，由於所裏佈置不發展黨員……。這以後約一週內我加入了共產黨，並在不到半個月內當選為所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當選時，政治部告訴我，徵求全所意見，僅3、4個人反對或棄權，其餘都贊同。這說明全所98%以上贊同我任副組長。1961年劉毅民培養我申請入黨，又因聽不得批評而對我打擊報復，我撤回申請書。現在我在同修正主義、走資派劇烈搏鬥中入了黨，這在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我入黨後，馬上就擔任了黨組副組長。不久，我在全所大會上講了一次黨課，重點講了要跟黨、跟路線，不要跟人，特別著重講了什麼叫跟黨走，什麼叫擁護黨，主要是跟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擁護和捍衛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嚴厲批評了有些人把跟黨走、擁護黨，歪曲為跟了某個黨員或領導的屁股轉、送小報告、吹吹拍拍……；有的黨員自己不怎麼樣，對要求入黨的同志馬列主義，對自

己自由主義，還自認為了不起……。這次黨課講得很結合實際，也是切身體會，受到全所絕大部分同志讚賞。不少同志還貼了讚揚大字報。有的同志找我談入黨問題，我對他說：要求入黨很好，你得找你們支部，講幾句供你參考，如果為了更好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共產主義奮鬥，入黨後會幹勁更足；但是，如果僅僅是為了做個黨員光榮，那你入黨後會失望的，你會感到入了黨並不是你想像的光榮，也就是光榮在每週開半天會（組織生活），光榮在一個月交一次黨費。所以，為什麼要入黨一定要考慮好。他說我講的很實在。從此，劉毅民的關門主義被撞開，建黨工作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少數幾個只“光榮”，放鬆自己思想改造的享受“優越感”的黨員，再也特殊不起來。而我的入黨申請書，還就是我當初交給“軍管組”趙育勤的那份申請書，因我寫的申請書中沒有涉及林彪的內容，所以不要重寫。凡寫了有關宣揚林彪內容的，都作廢重新寫。回顧那段同趙育勤智鬥的歷史，就更增添幾分特殊意義。

這裏我談了給江青同志寫信的背景。但後來右派政變後，僅就這封信，劉毅民竟誣陷我“投靠‘四人幫’”。可能誰都會提出：信不僅按劉毅民的意見作了修改，而且是經劉毅民送給江青同志的，劉毅民算什麼？聶榮臻就依靠劉毅民這類“政工幹部”胡混，可稱“物以類聚”，就難怪林彪稱他為“聶老五”。

## （2）趙育勤讓我當“學習班”班長

就在趙育勤指桑罵槐大肆攻擊我“反林”、“反聶榮臻”之時，他突然把我叫去，要我負責對本所原“紅色

造反兵團”的頭頭辦“學習班”，搞清他“小三軍”的問題。我一聽，感到很棘手。以前為此事，我去揪聶榮臻操控的“大三軍”“總勤務站”的頭頭偽保隊副，得罪了聶常委，現在讓我來辦這個學習班，趙育勤用心險惡。我略一考慮答應了下來。當天晚飯後，我約“造反兵團”頭頭出去散步。我同他講了趙育勤要我辦他學習班的事。我說：因為他給了我合法身份，找你個別談話是工作需要，不怕他們說三道四，但今天我同你講的話，在任何場合不能洩露出去，洩露了，倒楣的是你。我接著說，趙育勤這一手的目的，一是摸摸我的態度，也包含穩住我，但更重要是離間我們，用心很險惡。你要堅持實事求是，沒什麼大問題，千萬不能亂說，不能牽涉別人，否則越牽越亂。再就是一定注意著我的臉色行事，千萬別把我的講話當回事，我會講一些你很不願聽的話，但你千萬別當真。再就是“學習班”的情況別向外透，有我在，趙育勤整不了你，相反我要通過這個學習班把趙育勤在這方面的底摸清楚。這就是我辦這個“學習班”的對策。結果，辦了10多天，他們根本就拿不出什麼攻擊的“炮彈”來。我提議軍管組聽取我的彙報。我彙報說：辦了10多天的“學習班”，某某態度很好，實事求是講清和回答了問題。沒發現什麼原則問題，不知你們掌握了什麼重要證據，如果有，是不是可以拿出來商量一下如何繼續辦下去？他們說：有。隨即從保密櫃拿來幾頁紙的材料。我看，是另一些同志在中央學習班散發的材料。我說：要是就這個材料就整人，這些東西我早看過，靠這玩藝整人，不成了打派仗了。科委常委聽取我彙報時，這些

問題被我批駁得連連承認：偏聽偏信了，憑這種材料就辦“學習班”很不妥當。趙育勤說：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辦下去吧。我把“學習班”記錄等交給了他們，宣佈“學習班”結束。

這個“學習班”辦得很精彩、很成功，趙育勤和我都動了腦子，演了一場同床異夢的戲。

## 2) 訂核心捏造“國防口5·16”假案殘酷迫害造反派

1970年初開始，“聶核心”在國防科研系統大抓“反林副統帥、反林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聶副主席的‘國防口5·16’”，重點在科委機關。聶榮臻公開聲言：毛主席的女兒是反革命，也照樣抓。粗看聶榮臻很公正，不管是誰，是反革命就抓，不講情面，一視同仁。但聶榮臻是先把李敏同志定為“5·16分子”，而後編造材料，企圖把李敏同志打成“5·16”，把“炮轟聶榮臻”派打下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此，他們煞費心機、精心策劃。當時毛主席、周總理都健在，聶榮臻雖聲稱毛主席的女兒是反革命，照樣抓。問題是毛主席的女兒不是反革命，“聶核心”要把她打成“反革命”，就費盡了心機。衆所周知，毛主席健在時，不管你功勞多大、職位多高，如果利用職權故意陷害，把一個普通公民打成“反革命”是沒有好下場的。只是鄧某篡權以後，權勢人物隨意捏造“罪名”，致普通公民于死地才成了家常便飯，“合情、合法”。

情報所被搞到蘆葦蕩，“聶核心”為把情報所作為在科委機關抓“國防口5·16”的突破口，精心選派來“軍管組”，並給“軍管組”頭頭趙育勤許願：搞好了可調北

京科委機關升為情報所所長。這一下子刺激了趙育勤，他拼了命效忠聶核心。趙育勤沒有讓聶核心失望，為了效忠聶核心，不惜把一條腿都奔拐了。

聶核心抓“國防口 5·16”，在策略上，他們選擇院校和科研院所為第一道突破口，又以曾參加上述中央學習班“炮轟聶榮臻”的同志為突破的重點人選。李敏同志平時與外界聯繫極少，但她參加了中央學習班，這樣就被聶核心選為“突破口”。他們首先在某研究所，利用誘供、指供、逼供等手段，迫使某某承認是“國防口 5·16‘聯絡部長’”，並仿照京劇《智取威虎山》智審欒平時，欒平招認在全國設了十幾個聯絡點的情節，而迫使某某編出他這個“聯絡部長”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國防口 5·16”十幾個“聯絡點”的假口供，並製成約兩小時的錄音帶。在中央學習班期間，一部分同志批判聶榮臻站在蔣介石像前作報告（註：羅舜初親自旁聽了那次批聶的會，後來他不澄清事實，受到中央調離科委的處分）。聶核心把它改編為一部分人站在蔣介石像前“集體宣誓參加‘國防口 5·16’”，同樣製成錄音帶。另外不知從哪裏搞來了“5·16 後臺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講材料，還有關鋒“迫害江青同志”的宣講材料。被聶核心列為“國防口 5·16”後臺的有肖（華）、楊、余、傅和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同志。另外，他們在北航炮轟聶榮臻的人那裏，發現我所有的同志的電話號碼和親友關係，將其作為突破情報所的“重大證據”。

“聶核心”取得上述“豐碩成果”後，選擇情報所為突破科委機關的突破口，達到最終把李敏同志打成“5·16”

的目的。

### (1) 趙育勤大辦“學習班”

“文革”時期有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種是黨中央和造反派辦的班，是真正學習毛澤東思想，解決實際問題。例如前面介紹的國防科研系統的中央學習班，主要工作就是學習毛主席有關指示和文章，促進對立的兩派統一認識，在共同批判走資派的前提下，消除資產階級派性，聯合起來。又如我所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舉辦的學習班，主要活動就是學習毛主席講話、中央文件，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在共同批林彪的基礎上，進一步肅清派性殘餘。另一種是走資派接過“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班”的名義，實質是搞逼、供、信整人。比如他們迫害我時，指定每晚12點前學習毛主席的《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我回答他們：我既不是南京，更不是政府，也就不存在何處去的問題。我學什麼，我自己知道；是不是學《丟掉幻想準備鬥爭》更急需一點。最惡劣的是趙育勤打著“學習班”的幌子，刑訊逼供。

趙育勤同劉毅民（已調回北京）互相勾結，在情報所抓“國防口5·16”的重點選在我頭上。由於我未參加中央學習班，上述那些假口供涉及的事無法同我連上，因此，他們開始想把我先拘留後審查，打成“國防口5·16‘組織部長’”，但四十軍領導不同意，認為沒有任何材料和證據就抓人，不合適。“軍管組”趙育勤就費盡心機製造“材料”。辦法就是辦“學習班”。趙育勤搞逼、供、信有兩種類型，分別舉例如下：

一種是刑訊逼供，他們對參加過中央學習班的某

同志，就是利用疲勞戰術、武鬥等逼供，逼著按前面介紹的那些製成錄音帶的假口供的方案，逼著某同志順著他們的設計方案，招認惲仁祥是如何如何介紹他參加的“5·16”……。一切成功後，合成一盤系統錄音帶。

另一種方式是不惜代價的誘供。例如，我所有一位同志，文革初期貼過“打倒狗特務江濤”的大標語。他特別想去中央學習班，我同意讓他去了。這次趙育勤選中他，用誘供讓他完成任務。趙育勤讓他把老婆從北京接來，還用國家的錢，陪他到一些地方“旅遊”……。這一套辦法，凡看過國民黨特工搞策反把戲的書刊的都不生疏。對在武鬥逼供信下胡說的同志，我能體諒他們，原諒他們。後來問題搞清後，我只對這些同志說，好好總結教訓，你們軟了，反吃了不小苦頭，而我堅持真理，頂住了他們，沒人敢對我搞武鬥，吃的苦頭反沒有你們大。而對為了一星半點好處就出賣同志的人，我沒有任何話可講。希望後來人，當革命隊伍出現極“左”分子，千萬要特別警惕。

## (2) 趙育勤召開揪鬥“國防口5·16”大會

劉毅民在北京同趙育勤在“幹校”間“和諧”配合。北京把聶常委炮製的上述錄音帶、宣講材料不斷向“幹校”運，趙育勤把上述“學習班”取得的“豐碩成果”向北京劉毅民報喜。折騰了約半年多時間，折磨好幾位參加中央學習班的同志。為培養全所人員對惲仁祥的“無比仇恨的感情”，“軍管組”精心策劃了“控訴惲某罪行”的漫畫展覽會，組織全體人員參觀。漫畫對本人進行了十分惡毒的人身攻擊。後來我要求看一下那個展覽，欣

賞一下“聶核心”的藝術創作水準，但他們把它銷毀了，真是遺憾！

一切就緒以後，“軍管組”召集全體人員大會，播放北京送來的聶核心精心製作的錄音，趙育勤聲淚俱下地宣講北京送去的上述材料。那個“軍管組”趙拐子宣講“5·16迫害江青同志的罪行”材料，真是聲情並茂，又掉眼淚、又淌鼻涕，把一些同志感動得也掉下“憤恨”的眼淚。至此，我還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要揪出我的前奏。“軍管”突然宣佈讓本所某某同志上臺“控訴”。由於某某語言和情緒十分低沉，本人還沒能聽清他講了些什麼，就有人點名要我上臺交代怎樣“發展某某參加5·16”的。這一下讓我明白了放的那些錄音帶、那些宣傳材料是些什麼東西。我只得昂首挺胸走上臺去憤怒宣佈：“如果我是‘5·16’就立即槍斃，別的沒有什麼要說的。”接著是呼口號，要我低頭認罪。我說：“本人無罪，也就談不上要低頭。”結果硬把我按倒在地，本人也不低頭、彎腰。“控訴大會”進入僵局，無法再開下去。這就是聶核心在科委機關揪“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親密的戰友聶副主席的‘國防口5·16’”的最高潮。以本人的堅持真理和以不怕死的勇氣，粉碎了一夥陰謀家、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黨分子，苦心策劃了半年之久的一切“成果”。雖然對我的迫害還在繼續，但不僅再也沒有開成如此聲勢的大會，而且指望著突破我以後，再藉此“東風”在科委機關“駐馬店幹校”大抓“5·16”並揪李敏同志的計畫，只得胎死腹中。

### 3 ) 非法關押我三個多月

趙育勤召開揪鬥我的大會失敗後，就把我非法關起

來，策劃各種大、小會議沒完沒了地批鬥，個別小會也有按我頭，要我低頭、認罪，都讓我頂住了。在非法關押我的三個月裏，每天深夜十二點前不准休息。問題是，聶榮臻這類在文革中拿了高薪，沒有在群衆中檢討過一句，甚至個別人還幹著說不上嘴的禽獸不如的勾當，卻還憋著一肚子對毛主席、對文革、對共產黨的怨氣。這些人的所作所為，有什麼吃不完的老本可以說三道四？

革命還在繼續，說不定還會有堅信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堅持防修反修的同志遭到迫害。談談如何面對反動勢力迫害的問題，供讀者參考：第一、首先自己要相信自己。俗話說心中沒有鬼，就不怕鬼敲門。文革前比較天真，從來不相信共產黨內會出鬼（走資派），碰著了鬼，一定要吃好、睡好，千萬別自己整自己，鬼在整你，你再自己整自己，很可能垮臺。在他們關押我時，只要允許睡，我要不了3分鐘就睡著了，監管我的人說：陪了你我們也不能按時睡，睡的時候你上床就呼呼大睡，我們還好久睡不著。第二、要有堅持原則不怕犧牲的勇氣。走資派整你，都是往死裏整的，比國民黨反動派還黑，如果你一怕死，不僅害己，還必害人。第三、要有一套同反動勢力鬥爭的策略和勇氣並以正氣壓倒邪氣。我在被整時，火氣特大，為說明問題，舉兩個實例。

一個例子是：他們拿不出任何真憑實據，就摧殘肉體。每天夜裏派人強行監督我“學毛著”。我拒絕學他們指定的內容，反而按我自己的需要，學了不少毛著。他們雖是為了摧殘我肉體，但自己別白度時光。白天則強迫我從早到晚幹強體力活。這已不是一般意義的“勞動”，

我量力而行，能幹多少幹多少，不按他們的步調做。一次，監督我勞動的人訓斥我說：你既不好好交代問題，又不好好勞動。我嚴厲回擊：你別看錯了，現在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我勞動得怎麼樣，還輪不到一個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來監督我。他一下滿臉通紅，講不出一句話。當天晚上，那個參加整我的“工宣隊”員來開會，問我你白天講什麼了？我把講的幾句話重複了一遍。他馬上走到我身旁，用肩膀來頂我，並問我你想幹什麼？我向他冷笑了幾下，沒一個人幫腔，結果不了了之。在我看來，大多數工宣隊員確實值得學習，從他們身上看到工人勤勞、樸實、對毛主席和對黨無限忠誠。但解放後的和平環境，確實有少數工人變了，可以說是變質了，已不像個工人，反倒像個“工賊”，學會了油腔滑調。在幹校搞武鬥的就是那像工賊的一兩個人，狂妄，不學習，滿口髒話。

另一個例子是，一天晚上，一名“軍管組”人員到我囚室，他手裏拿著一卷紙，說要開個會。我當即站了起來。他說“你坐下”。我說：“我不站著，顯示不出你們開鬥爭會的氣氛。”他還要我坐下，我就坐下了。他說：“我們重證據，不輕信口供。”他接著把握在手裏的一卷紙舉了舉說：“你發展‘5·16’的表格在這裏，證據確鑿，就看你的態度，……”。我站了起來口氣和緩地說：“既然有那麼多證據，還來找我幹什麼？但我不知道你手裏拿的是馬糞紙（一種很粗糙而厚的紙）還是字典紙？如果是馬糞紙，那還沒有一張，還不夠一個人填寫的；如果是字典紙，那全所每人都填一份還多；可是我倒擔心

你今天一張也拿不出來，擔心你不僅今天的批鬥會不好收場，甚至不知你是臉蛋先出這個門、還是屁股先出這個門。他拉大嗓門說：“惲某某你想幹什麼？”我說：“不是我想幹什麼，而是你今天來想幹什麼？”他啞口無言，灰溜溜離了。在場的搞我“專案”的同志沒有一人幫腔，他們確實也不知是怎麼回事。後來當他們知道是假案後，其中有一位同志認為上當、受騙，氣得神經失常。還有一位同志被趙育勤逼供信逼得深夜帶了繩子，乘上廁所時想自殺，這時他突然想起惲某在批鬥大會毫不屈服的表現，他想到還是應看個結局，又回了宿舍。這使我非常受教育。若我順了“軍管”的意思，胡亂說一通，結果造成人命案，良心不該譴責嗎！

林彪摔死後，“軍管組”一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非找我聊天。他說：“從揪鬥你那次大會上，一聽你表態，我就認定趙育勤碰在釘子上搞不下去了。”接著他介紹說：“老惲，便宜你了，本來趙育勤要把你先拘留後審查，把你當5·16組織部長搞的，軍裏負責運動的副政委不同意，認為就憑一些口供抓人不合適。”他接著說：“趙育勤一些事，我們也看不慣，比如你們有的女同志連洗屁股都在趙育勤辦公室洗”、“那個女同志說是屁股那個地方不舒服，趙育勤就批准她回北京，這些在你們一些同志中也有議論，影響很不好……”。

最後這一次批鬥會後不幾天，他們把貼在我囚室的林彪的語錄“抓5·16一個也不能漏掉”揭了下來。我說：那麼好的語錄，幹嘛揭掉？他們不吭聲。我心想：聶榮臻啊聶榮臻，你還能瘋狂幾天？果然很快就有人向我們

傳達了中央關於林彪問題的文件，並宣佈了中央派駐科委學習組決定：解除審查，參加批林。趙育勤最後嚇得深夜不辭而別，落荒而逃。

### 3、中央逮捕了林彪死黨王秉璋、梁軍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周總理代表黨中央親自來處理科委的問題，查出了聶榮臻要抓的“國防口5·16”黑名單，名單中包括李敏同志以及同她一起簽名貼“炮轟聶榮臻”大字報的八局的其他同志。查清了“國防口5·16”是聶核心製造的假案，對此案作出了徹底平反的決定，我們這些人在差點去見馬克思的路上又跑回來了。粉碎了“聶核心”大換班的陰謀，把我們又分別全部從河南、渤海灣“一鍋端”回了北京。周總理代表中央宣佈逮捕了林彪死黨王秉璋、梁軍，“聶核心”損失了兩員忠實幹將。羅舜初、劉華清、蔡順禮三位聶常委都被調出科委，羅調瀋陽軍區，劉退回海軍，蔡退回昆明軍區，聶核心的班子被徹底剷除。中央對科委“摻砂子”，任命陶魯笳同志為科委主任兼黨委書記，陳彬、李光軍、馬捷、錢學森、朱光亞為副主任兼常委委員。被聶榮臻排斥走的朱卿雲同志調回仍任政治部主任兼常委委員。中央還明確告誡聶榮臻：不要再插手國防科委的事務。

“聶核心”抓“5·16”涉及到科委好幾個研究院、幾十個研究所。雖未見統計資料，起碼迫害數千人之多。情報所卡了殼，在科委“遂平幹校”就沒有敢動手。沒

有一點影子的事，“聶核心”能編導出那麼多驚心動魄、非常離奇的“大罪狀”，其手段的殘忍可想而知。他們還有何臉面對文革說三道四？可以自豪地說，我並沒有因受了迫害，而利用手中之權對本所幹部、群衆進行打擊報復，就連批評也沒有為此而批評的。我相信絕大多數同志能正確總結經驗教訓。有的同志曾按我頭要我低頭認罪，在入黨時有人提出非議。我說林彪集團搞那麼多假材料，如果不是整在我頭上，我也會信以為真，積極參加的，因此決不能因為對我幹了些不合適的事，而影響他們入黨和正常使用；包括那時搞我“專案”的同志，概不受影響。可以說，我認識的造反派都同我一樣，都能從黨的事業著眼，氣度豁達，決不計私仇；決不像那夥走資派，唯我獨尊，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打擊報復、反攻倒算、公報私仇……。他們是一夥躺在“老革命”“功勞簿”上死不要臉的無賴。

1968年10月13日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曾經批評過聶榮臻：“(1) 聶榮臻對科學院、國防科委發生鎮壓學生群衆，給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壓垮，結果使七機部長期武鬥；(2) 聶榮臻同志在晉察冀鬧獨立王國；(3) 聶榮臻藉口保護幹部子弟，說我們是‘不教而誅’，實質上是關心‘聯動’；(4) 聶榮臻同志不但對（七機部）9·15、9·16（兩派群衆組織）的問題處理得錯誤，他硬把趙爾陸同志逼死，還說趙爾陸是自殺的，經化驗，服過安眠藥，但不至於死的程度；(5) ‘多中心論’是聶榮臻搞的。但聶榮臻檢查說這個‘多中心論’是楊成武灌輸的，是受楊成武的影響。其實，是聶榮臻搞的‘多

中心論’，鬧獨立王國。在晉察冀就鬧起來了，楊成武不過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6) 造成國防工辦、工政和國防科委的對立。原來三家是一個食堂，所有權是科委的，由於聶榮臻的指導思想是獨立王國，不給工辦、工政的同志吃飯，逼得工辦、工政的同志臨時在工棚裏開了一個食堂”。關於保護老幹部問題，周總理說：“(1) 聶（榮臻）、葉、徐三人點頭抓楊勇，聶榮臻說：‘要燒，要燒焦。’群衆聽說是這樣，於是就抓起來了。後來他們推脫責任，說是上面點頭的。後經再三追問，鄭維山同志當面對證說：‘是在京西賓館第二會議室，你們三人點頭的’，怕有問題，又找了他們二人，他們說了，要燒，要燒焦，這樣他們才啞口無言。到底是誰保護了老幹部？(2) 中央文革曾保過聶，但他對中央文革不滿。也保過陳毅、徐向前，都不滿，竟說：‘不要你們保。’好像保了他們，他們就不光榮了，他們自以為一貫正確。實際上幾個元帥兩次接見、兩次講話後，群衆要他們檢討，中央文革的同志出來保他們全部過關的。事後，他們對這些不但不感激，反而說中央文革不保護老幹部。”周總理最後說：“他們保護什麼老幹部？他們保護的是劉鄧司令部！”（參見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2010年5月出版《新發現的周恩來》第324～326頁）。

從“文革”直到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變，及以後的否定“文革”的那個“決議”，他們在“清查‘三種人’”等運動中的表現，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毛主席、周總理對聶榮臻等的問題是看得太透徹了。試問，聶榮臻何許人也？

這些事例，還充分證明毛主席、中央決定部院合併非常英明、偉大。1966年底毛主席、黨中央批准了聶榮臻設18個研究院的“體制調整報告”。至1968年初聶榮臻搞獨立王國陰謀的大暴露，毛主席、中央果斷決定把所有國防科研院、所併入國務院相關工業部，決定第二炮兵獨立為一個兵種，粉碎了聶榮臻的獨立王國，維護了國家穩定。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讓聶榮臻統帥整個國防科技和第二炮兵，聶核心把科委變成了林彪武裝政變“借用力量”，其後果不堪設想。可見，聶榮臻死抱著反對部院合併，究竟想幹什麼，不發人深省嗎！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鄧小平那個“決議”和林彪的“五七一”武裝政變紀要，兩者在反毛、反文革等方面的“共同言語”。再聯繫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核心人物聶榮臻把科委變成了林彪武裝政變“借用力量”，就有充分理由認為，毛主席、黨中央同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同聶榮臻搞獨立王國的鬥爭，是同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門爭的繼續。可見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提出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一次不行，要進行多次”的論斷，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以上介紹的聶榮臻的一系列行為表明，他從文革一開始，就效忠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力企圖把群衆運動鎮壓下去。受到毛主席、黨中央批評後，毫無悔改之意，而積極參與反文革的“二月逆流”，同時糾集以偽保隊副張某為頭子的“總勤務站”“造反”組織，殘酷迫害老幹部，挑起一系列打砸搶抄抓等破壞文革的罪惡活動。然而聶榮臻卻利用一切機會和能利用的輿論工具，標榜自己“一

貫正確”，並把自己破壞文革的壞事，栽贓給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江青同志、真正的造反派。全國不少地區和部門都有像聶榮臻這樣的“老革命”，也都有類似聶榮臻操控的偽保隊副之流為頭子的“造反派”。我們決不能容忍像聶榮臻及其操控的偽保隊副“造反派”所幹大量傷天害理的壞事；更不能容忍他們把自己破壞文革的壞事，栽贓給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文化大革命和真正的造反派。只有這樣，才能還歷史一個真正的文革，才能讓後人知道：文革所取得的每一點成就都來之不易，都是在同走資派的劇烈搏鬥中取得的。所以毛主席、黨中央稱“文革是共產黨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完全正確。下面還將繼續介紹聶常委對文革、對造反派進行栽贓和反攻倒算等一系列罪行。

## 十、批林批孔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目的是為防止復辟倒退。1974年中央決定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併發了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號文件，附了《林彪與孔孟之道》附件材料，發至全黨，至同年6月結束，歷時半年左右。

文革結束後，走資派、文痞全盤否定了批林批孔。主要論點是：批林批孔是“四人幫”利用毛主席的講話，背了中央發動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幫”反對周總理“組閣”，陰謀奪權；“四人幫”批林批孔反周總理，即批林

批孔“批周公”。這些問題，都應該弄清楚。

## 1、我親歷的批林批孔運動

### 1) 葉劍英召開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1974年1月24日，葉劍英召開了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文革結束以來，走資派、某些文人，誣衊說這個動員大會是江青同志等背了中央幹的。例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一書（註：中央黨校教材）：“（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現，置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1712頁）。

在揭穿以上這一謠言前，講一下什麼叫插手軍隊。這是這30年出現在一些“權威”人士講話、書刊上很時髦的一句話。也是一些人揭批“四人幫”時的“專利”。衆所周知，軍隊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即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在我們的工作中，軍人不能干預地方的工作，而應接受人民的監督。違反這些精神，就犯錯誤。江青同志還是軍委文革的顧問，但軍委文革開會不通知她，江青同志說他們把她撤職了（註：參見《新發現的周恩來》）。中央文革能不能管軍隊的運動？如果說，在軍隊不任職，管了軍隊的事，就叫“插手”，那麼我要問：軍人策劃並親自逮捕在軍隊不擔責的中央領導人算什麼？軍委主席凌駕在黨中央之上又算什麼？這些

問題，我認為只要沒有野心，任何一級幹部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而一些野心家、陰謀家，這些年，把軍政、軍民關係，隨心所欲、胡亂折騰，以至於矛盾百出。

駐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是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召集並主持召開的。所謂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不符事實。江青同志就沒有到會。有一段插曲：會議遲遲不開，後來聽說是葉劍英一直等江青同志給他寫的信，信一到，會議開始。江青給葉劍英的信，成了葉劍英動員軍隊批林批孔的組成部分，向下傳達也是這樣。包括江青同志給其他單位（包括給地方）的信，都是葉劍英動員批林批孔的組成部分。不知走資派和文痞們該作何評論？如果硬要說這就是江青同志插手軍隊批林批孔，事實是葉劍英請來的。葉劍英作為當時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領導全軍批林批孔運動這一事實，不知是否經過中央同意？然而在中央下發的關於江青等人“罪行材料”中，這一事實竟被篡改為“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京部隊、……‘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對江青同志作了偽證。同年3月8日，中央軍委通知國防科委、七機部，向中央軍委彙報批林批孔運動情況。這個會議，也是葉劍英主持召開的，聽取彙報的其他軍委領導人有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陳錫聯、蘇振華。七機部是國務院的一個部，葉劍英未經周總理授權（下面介紹），插手七機部運動，這算什麼？會上，王洪文同志和張春橋同志講不少話；鄧小平講了話，葉劍英最後總結性發言，對下一步怎麼搞作了指示。這進一步證明，軍隊的批林批孔，不僅是葉劍英主持的

軍委動員的，而且也是在他親自領導、檢查、督促下開展的。葉劍英還把手伸進七機部，“槍指揮黨”。足以證明，走資派、文痞對批林批孔的污衊，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暴露了他們尊孔、保林的真面目。

## 2) 周總理召集並主持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

1974年1月25日，周總理召集並主持召開了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一事實同樣也被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一書攻擊、誣衆成“（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現，置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第三卷第1712頁）。這件事，最早出現于“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中央”聲討王、張、江、姚“四人幫”的“篡黨奪權罪行”，下發全黨、全民的材料（參見《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第七頁）。從此，毛主席為首的中共中央發起並領導的偉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就被走資派、文痞們篡改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十惡不赦”的“罪行”，更成了走資派和文痞們尊孔、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把柄”。

1974年1月25日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議由周總理召集並主持。

現從記錄稿中摘錄周總理在動員大會上的講話部分內容如下：

周恩來：“同志們，現在開會了，請王洪文同志領頭唱一段《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全體起立，唱歌）

總理接著講：“中央機關、國務院機關和所屬單位的同志們，今天在這裏開個動員會，進行批林批孔動員。我們中央和國家機關已經落後了。昨天在這裏軍隊已經大動員了。我們晚了一天，但是現在我們趕上去。中央對批林批孔問題已經發了兩個通知，第一號已經發到你們手裏了，第三號還沒有到大家手裏。……。《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說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實信徒。這個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稱讚……”。中央決定，在傳達學習中發七四年一號文件時，增加以下學習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

接著，總理介紹了江青同志給一些單位寫的信及內容，包括：“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給軍委幾位負責同志的（洪文、劍英、小平）。總理說，信是這樣寫的：‘首先請代我向全軍同志問好，有相當長的時間沒有見面了，當前在全國範圍內，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對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的思想關係都搞不清楚。北大和清華搞的這個材料，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現請謝靜宜同志和遲群同志來宣講這個材料。另外，他們下去搞些調查研究，也可能有所幫助。批林批孔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頭等大事，是國內外帝修反非常驚恐的事，隨著批林批孔的深入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一定會取得更大的團結勝利，現送去《歷代反動派、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的文章摘錄》二十份，魯迅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論摘錄》二十份供參考。文件和材料份數不夠，可以翻印。有什麼問題可報告中央，我們共同

努力學習，保持優良傳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難而進，沒有攻不破的堡壘，我相信在人民解放軍的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我們的任務是光榮而艱巨的，毛主席說，要能文能武。《晉書·劉元海載記（？）》裏說，漢朝的文官隨何、陸賈無武，武將絳侯、周勃、灌嬰無文。我們應該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解放軍報》七四年一月廿六日一版）。我們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的柱石，是文武全才。我們一定能勝利完成黨中央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江青七四年一月廿四日”。

周總理讀完信接著講：“軍委收到此信後，昨天在這裏已經召開了動員大會。我今天早晨得到了這個消息（註：證明葉劍英是背了中央召開的），向政治局幾位同志建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同志今天開這個會議。……。我們現在收到各地的簡報，在批林批孔中，廣大群衆已經開始發動起來了，我們也要求《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記者，要把（這）方面先進的經驗，好的典型及時推廣出去。剛才說了，我們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是落後一步，今天補上這一課，請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開個動員會，我的介紹完了。”

隨後江青講了幾句。而後遲群、謝靜宜詳細介紹了林彪家中掛的孔老二一些言論的條幅、以及林彪、葉群在筆記本中記錄的孔老二的言論，介紹了中共中央 [1974]1 號文件的附件《林彪與孔孟之道》的出處及編輯經過等情況。

這就是“英明領袖華主席”、葉劍英以及走資派、反動官僚資本家、文痞們所說：“(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駐)京部隊、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的歷史真相。華、葉編造的這段“歷史”不僅上了中央文件，同時也編入了上述被稱為中央黨校的教科書《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以培養陰謀史學信徒和接班人，並廣泛流傳社會。

在此，再補充介紹一下周總理在1975年初全國第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的部分有關內容。

周總理：“同志們，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普及、深入、持久地開展批林批孔運動。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決不能因為批林批孔已經取得很大的成績而鬆懈。我們要繼續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為今用的原則，總結儒法鬥爭和整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經驗……。要通過批林批孔，進一步推動文藝革命、教育衛生革命，推動各條戰線的鬥、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堅持社會主義的方針……。”

從上述摘錄的這些材料，談幾點個人意見。

(1) 事實證明“(1974年)1月24日、25日，江青等人不經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在京部隊、在京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等人儼然以黨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現，置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于被領導、被指責的地位”，不僅純屬捏造，而

且證明，周總理積極領導、推動、宣傳批林批孔運動。則走資派和文痞們尊孔、極力抵毀和鎮壓批林批孔運動，不正說明正是他們明目張膽反周總理嗎！

(2) 周總理說：“軍委收到信後，昨天在這裏已經召開了動員大會。我今天早晨得到了這個消息，向政治局幾位元同志建議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同志今天開這個會議。……。剛才說了，我們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是落後一步，今天補上這一課……”。說明葉劍英為了搶功，身為國務院國防部部長，背了國務院周總理，召開駐京單位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造成周總理被動局面，而導致周總理上述講話中一再檢討說：“我們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是落後一步……”。史實又一次證明：走資派自己幹的事，栽贓給江青、文革、毛主席。

(3) 共產黨人應該光明正大，實事求是。蓄意篡改歷史、偽造史實，妄圖達到整別人、樹自己，以至復辟資本主義，決不是共產黨人所為，歷來是野心家、陰謀家的看家本領。

(4) 事實充分證明，1974 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是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和發起的，是周總理、葉劍英分別組織、動員地方和軍隊開展的一次運動。這次運動得到了四屆全國人大的一致贊同和表決通過。但是，全國不知多少積極回應中央號召而投入批林批孔運動的革命幹部、工、農、兵和知識份子，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華、葉叛徒集團武裝宮廷政變後，遭到這夥叛徒集團尊孔派、走資派的殘酷迫害。毛主席去世後，這些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毛主席，而緊跟中央積極投入三大革命

運動的骨幹力量，卻一再遭披著共產黨外衣的走資派、無產階級的叛徒殘酷迫害，這個“共產黨”究竟代表誰？

再則，上述王洪文的口供，本人能查到的這一段內容的證據是王洪文交代材料（參見“英明領袖”的“中央”下發的《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第七頁）。再沒找到旁證。與事實有如此大的出入，竟成了“歷史經典”，成了中央黨校教育、培養接班人的教材。這一夥人高唱“不輕信口供”是什麼東西？更值得懷疑的是，知名“造反派頭子”王洪文竟胡亂招供，是王洪文被招安了，還是搞了殘酷的逼供信？

### 3) 情報所的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初，葉劍英對駐京部隊作批林批孔動員報告，同時傳達關於批林批孔的1974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和附件《林彪與孔孟之道》。當時1號文件和附件，每個支部僅一份。幾十個人一份材料，又是孔孟的老古董語言，顯然影響運動開展。在此之前林彪最親密的戰友聶榮臻追隨林彪，蓄意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反聶”、“國防口5·16”，很多人深受其害。科委的批林和批林彪死黨王秉璋、梁軍搞得冷冷清清。葉劍英召開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一直等到江青同志給他寫的信送來後才開始。因此，我便認為中央可能分工江青同志負責這個運動，於是提筆給江青同志寫了一封信，反應科委批林沒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並如實簡要介紹了我被林彪集團迫害的情況。信寫好後，敞著信封交給了正在主持核心組會議的核心組組長劉毅民。他當即看了信的全文，提出了修改意見。我按他的意見當即作了修改，又交給了他。

他怎麼交給江青的，我至今不知道。約半個多月後，正好是星期天，上午約 10 點多，我在菜市場買菜，中央辦公廳兩位同志由本所一位同志陪同到菜市場找到我，說：江青同志給你寫了信，並送來 400 份《林彪與孔孟之道》等四種材料。我接過信回所，把信交給劉毅民，兩人一道看了信的內容。他說要把信送科委領導看，我表示同意。科委領導看完後，劉毅民批了把信複印了好幾百份，並鉛印了一批。材料《林彪與孔孟之道》給了我 3、4 份，其餘都是他們分發掉的。約過了 3、4 天，政治部告訴我周總理指示：江青同志的信，鉛印件可以下發，影印件不要下發。又過了 1、2 天，政治部告訴我：王洪文同志要看江青同志的信，並指定政治部領導陪同我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又過了 2、3 天，政治部把信給了我。看了信，發現王洪文同志改了信中一個字（筆誤）。不久，國防科委常委在首都體育館召開萬人群衆大會，傳達江青同志的信。這就是江青同志給我寫信的全過程。

江青同志給我的復信內容全文如下：

惲仁祥同志：

你 1974 年 1 月 31 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報（抱）歉，未能及時收到你的信。你們的材料那麼困難，我很驚訝！國防科委的批林批孔運動搞不起來，必有原因，得你們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去做，總會衝破障礙而前進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現送上：

《林彪與孔孟之道》，

周  
國  
辦  
事  
處  
郵  
件  
室  
所  
江  
青  
同  
志  
回  
信  
封  
面  
影  
本

■江青同志回信封面（影本）

時任林彪  
你五七年一月廿一日函  
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報喜  
歡，未能及時收到你的信。  
你們能像林彪那么圓滿，  
我很喜歡。國務院委員會  
①

■江青同志回信正文第一页（影本）

《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

《批林批孔文章彙編》（一）、（二），

以上材料各一百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請告我數位。

這封信可以給國防科委所有願意參加批林批孔的同志們看。不願參加批林批孔的人要看，也可以給看。

不要再鬧資產階級派性了，敵人利用派性挑撥離間，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基礎上團結起來！批林批孔是路線鬥爭，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線鬥爭這個綱，這就是目前我國黨、政、軍、民、學以及其他各界的頭等大事。

勝利定會屬於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同志們！致以

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江 青

一九七四、二、十日晨

我接到江青同志的信，一是高興，我這樣一個土老兒出身的，毛主席夫人江青同志親筆給我寫信，感到高興是很自然的；二是感到壓力大，怕犯錯誤，給黨和革命造成損失。俗話說，“樹大招風”、“人怕出名豬怕壯”。我就是在這種心態下主持全所批林批孔運動的。當時主管行政工作的領導因病住院，我還兼管全所行政工作。關於江青同志給我的信，揭批“四人幫”以後，不知多少所內外的人要我談看法。共產黨人不隱瞞觀點，我始

終是一個回答：“從江青同志的信可見，她一手好字，很有功底；另外，在四屆人大期間，江青同志經錢學森同志介紹，同我面對面談了約40分鐘批林批孔問題，給我的印象是她看了不少書，出口成章，談話中嚴於律己；至於她給我的信的內容，我看不出有什麼問題，如有人認為有問題，提出有說服力的批判，本人願聆聽。我信奉的是說實話，不做兩面派。”

陶魯筭同志、錢學森同志兩位當時的科委領導親自來情報所蹲點，我所的批林批孔運動，是在他們直接指導下開展的。我當時分工主管這塊工作，對全過程很清楚，有發言權。

陶、錢兩位領導一進所，就同我研究情報所的運動如何開展。

首先是領導問題。當初批林時，總政指示科委成立領導小組。科委司、政、後都貫徹了這個精神，成立了領導小組。問情報所怎麼辦？我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我說：按中央文件精神，應是黨委領導下進行，堅持業餘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成立領導小組似乎與中央精神不太一致。

他們說：司、政、後成立後的情況，對開展運動還是有促進作用。

我說：這是可能的，任何新事物的出現，開始都有一定積極意義。但一個單位，兩個中心，一個黨委、一個領導小組，時間一長，必有矛盾，出了矛盾還難解決。你們的意思我明白，認為我當了領導小組組長可能順手一點。但是，如果我任黨組副組長搞不下去，則當了領導小組組長同樣搞不下去。因為不管我頭上頂一頂什麼

帽子，我還是我，還是那點能力和水準，並不會變化。

最後陶魯笳同志和錢學森同志商量說：是不是情報所不搞領導小組，司、政、後搞了，看看到底是搞好、還是不搞好？錢學森同志表示同意。

再一個問題，陶魯笳同志說：情報所是江青同志寫了信的單位，將來可能有外單位來參觀，你（指我）能否考慮不關人，別讓人家一看關了多少人，影響不好。錢學森同志插了一句：惲仁祥同志，這對你可是個很好考驗啊！

我說：這個問題我考慮過，情報所在科委機關是聶榮臻抓“反林、反聶‘5·16’”重災區，他們在這裏幹了不少壞事，迫害了一大批人，有的精神失常，還有的差一點上吊自殺了。確實也有人跟著幹了不少壞事。如果把這件事揭開，民憤極大，就難免要關人。但這件事，在周總理親自干預下，中央派來的學習組已作結論並平了反，我看就不一定牽涉。而且，估計只要我不揭這件事，就可以避開。但必須明確提出：在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有錯誤、跟了幹一些壞事的人，應當在運動中自我教育、總結教訓；大家應相信他們中絕大多數會自我教育、總結教訓；要強調集中批林批孔，不打橫炮，要批出團結、批出幹勁。按中央提出的，批得好不好，就看是否批出了團結、促進了生產、促進了戰備、推動了各項工作。

陶魯笳、錢學森兩位領導同志表示贊同我的意見。陶魯笳同志說：運動中要重視學習馬、列、毛著作，學得好，才能批得深，才能批出方向、批出幹勁。另外，惲仁祥同志你不僅要帶頭學，還要帶頭多作自我批評，

消除派性。尤其要注意團結反對過自己而證明反對錯了的同志。

錢學森同志說：中央已決定，要把型號檔案由情報所保管，任務加重了，一定要落實好抓革命、促生產。

最後我表示贊同按陶主任、錢副主任的指示辦。

這些原則確定後，就召開各處、室領導幹部會議，講了上述意見，並要求各處、室根據自己的情況，也拿出個怎麼搞法的方案，然後一起彙報一下，進一步完備實施方案。再由各處、室派代表，開辦學習班，學習班對照中央文件，討論我們提出的辦法，進行認真分析研究，最後定下一個大家認為合理的方案，經黨組討論實施。就這樣經過幾個回合討論研究，把上述科委領導同我商量確定的原則，廣泛爭取意見後，充實了一些處、室和群衆的意見，成為一個上、下都認同、心中都有數的方案。在每一個大批判的階段，例如學習、批判以進一步清除資產階級派性、研究儒法鬥爭等各個階段，不僅有動員，而且開辦學習班，就這樣堅持了黨組統一領導、充分調動各級幹部和群衆的智慧和積極性。運動搞得轟轟烈烈，業務工作創了建所以來未有過的成績，組織建設出現了新局面，住房等都作了一次大調整，包括建設幼稚園，挖防空洞，把沒有工作的家屬組織起來辦家屬工廠等等，都安排得比較好，不少工作是開創性的，以往從未有過。徹底扭轉了被聶常委破壞癱瘓長達3年多的所有遺留問題。做到了大學習推動大批判、促生產、促戰備、促進了各項工作。

情報所的批林批孔運動，堅持了黨組統一領導下進

行；堅持了業餘鬧革命，除每週半天的黨、團活動，除過組織生活外，可以作為搞運動時間外，整個運動，主要是業餘時間搞；整個運動都集中批林、批孔，沒有一個打橫炮的，不僅沒有關押一個人，沒有批或鬥任何一個幹部或群衆。即便犯嚴重錯誤的，也一概靠自我教育，決不強加。堅持運動是否搞得好，就看生產、戰備、其他各項工作促上去沒有。堅持領導幹部，尤其政工幹部和主管運動的領導幹部帶頭鬥私批修、多作自我批評、消除派性；……。

情報所的批林批孔，有三篇大批判文章刊登在《解放軍報》。軍報刊登情報所大批判和研究儒法鬥爭的文章，這是建所以來第一次。中央黨校辦的學習班中，湖北省和海軍參加學習的同志到情報所實地調查、學習一個多月，也是情報所建以來第一次。情報所的批林批孔運動的做法，被國防科委在駐京單位推廣，我還代表核心組在科委召開的幾百位廠、所以上幹部大會上作了介紹，這也是情報所建以來第一次在科委系統介紹經驗。在這期間，情報所出了不少受上級讚揚的科技情報論文，有的得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好評並安排有關部門落實實施，這也是情報所建以來第一次。我也是在這期間發明了全新概念的巨型相控陣預警雷達（克服了當時國內外相控陣雷達不能移動、維修費用高、造價高的缺點，而且概念和結構都擺脫了當時國內外相控陣雷達框框，是一個全新方案），被證明方案可行，並在全國雷達技術交流會上受到不少專家好評和讚揚。一個科技人員獨立研究出一套全新概念的對保衛國家安全不可缺的至今仍

屬最先進的大型國防尖端設備，這也是情報所建以來第一次。在“文革”期間，我還參與和完成了錢學森同志對情報所提出的兩項任務。一項是我國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和載人飛船要不要建造測控船，我同另一位同志完成了任務，寫了三篇力主造測控船的文章。主要論據是：美國到處有殖民地可建測控站，蘇聯國土橫跨歐亞兩洲，但都建了測控船，彌補陸地站的不足，因此強調中國建測控船是勢在必行；同時還介紹了一些測控船必須解決的特殊技術問題。另一項任務是錢學森同志從進口期刊上看到國外研製測地下目標的雷達，要我們所寫一篇這方面的文章，並附了他看到的那篇報導。任務落在我頭上。完成任務後，在一次他同我閒談時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雷達現在能探測地面下 200 多米的礦藏、能探測海面下 20 多米處的核潛艇，以往都把地面和海面看作反射電磁波的，看來波有一個視窗，在某個頻段能穿透進去，這個問題，你應進一步研究。這以後不久，走資派政變篡權、復辟成功，我同許多造反派一樣，被剝奪了為人民服務的權利，很遺憾沒能繼續研究下去。1981 年我被迫 49 歲健康退休（1983 年強迫辦理了“退休手續”），成了我軍少有的中年健康退休的“老幹部”。上世紀 90 年代，我義務支持農民把飛機搞上了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新聞發佈會，陶魯笳同志、楊成武因身體原因委託他夫人、還有李沛瑤和王光英兩位人大副委員長等出席了大會，出席大會的還有美國駐華使館一等秘書等。國內許多報紙、廣播電臺，以及美、英、日、新加坡等國，還有港臺都報導了這一新聞。北京電臺、北京日報在報導

中，還報導“國防科委退休幹部惲某怎樣怎樣……”。但是，“聶王國”剝奪了我評定軍銜和技術職稱的權利（註：凡被張愛萍打成“以李敏為女頭子‘四人幫’小幫派”的同志都被剝奪了）；而《張愛萍在 1975》一書封了我一個“實習研究員”的職稱。可是聶榮臻的女婿靠用國家的錢和他手中的權，組織情報所幾個人替他從進口書、刊上抄襲文章，成了他的“論文”，他就成了什麼“上將”、“院士”。可見，所謂軍銜、技術職稱在科委成了“聶王國”“駙馬”和“公主”的貴冠以及網羅心腹的工具。

但某些不學無術之輩，以吃奶的力氣，攻擊“文革”把“國民經濟搞到了崩潰的邊緣”，攻擊造反派是“交白卷”、只知“破壞”不會“建設”……。情報所造反派搞的批林批孔的實踐，造反派不僅有能力收拾一個被“林彪的親密戰友聶副主席”以及林彪死黨王秉璋和走資派劉毅民之流砸爛的一個爛攤子，而且能創造一個全新的情報所。這些年，看到許多地方的報導：造反派絕大部分是各條戰線的中堅力量。再看看這 30 年，走資派、文痞們把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稱道的社會主義中國，折騰到了腐敗不堪、成了“中美國”、帝國主義的“組裝廠”、半殖民地。培養了大量吸人血汗的腐敗分子、賣國集團、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有真才實學的知識份子沒有事幹，無立足之地而被逼出國門，尖子理工科畢業生出家當和尚、賣豬肉，甚至被逼為娼。請問那些攻擊“文革迫害多少知識份子”的走資派、文痞之流，是誰迫害知識份子？誰是貨真價實的唯能搞破壞的不學無術之輩？又誰是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野心家、陰謀家？在這

些大是大非問題上，面對走資派、文痞之流，造反派沒必要搞“偉大的謙虛”，情報所的造反派和所有造反派一樣，在這些重大問題上，作出了無可辯駁的回答：走資派、文痞之流一切誹謗，都是徒勞的。走資派、文痞們才是貨真價實的不學無術、只會破壞而不會建設、把社會主義搞崩潰了的敗類。還應指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情報所 98% 以上的幹部、群衆都積極投入了運動，都是批林、批孔的造反派，不批林不批孔的僅 1% 左右，反對批的僅極個別。

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中央確定把型號檔案交情報所統一保管，是對科技情報工作的重視和支援。但由於情報所當時被聶榮臻們造成極大的破壞，一些花了人民大量血汗，平均折合約 10 斤左右麵粉才能進口一頁紙的科技資料，甚至有些同志冒著生命危險搞來的資料，因無地可放，而堆在廁所裏。還有一部分配套資料，乘我們被端到遼寧蘆葦蕩之機，被個別人分散送給了別的單位，再無法復原……。這種局面，很難擔當中央交給的重任，以及承擔協調全軍情報工作的任務。科委常委同意擴建而批准徵用一些土地，並且把科委計畫興建的全軍運動會游泳池建在情報所旁，交情報所管理。走資派篡權復辟後，個別人為了自己離休後享受，把一部分徵用的土地建了科委第二幹休所；馬路對面（馬路東）相同一塊地讓給了別的單位；關於游泳池，劉毅民等說“管不過來”，推了出去，很快被廣電部看中建了現在的中央電視塔。這些走資派破壞科技工作的往事，還有錢學森同志苦心建起的實驗基地被不法反動官僚用推土機推為

平地的事實，把那些“科學”不離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兩面派的畫皮剝得乾乾淨淨。

#### 4) 到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組副組長、組長

情報所經批林批孔較好解決了被轟核心、劉毅民等破壞而癱瘓的慘局，各項工作正常後，1974年約8月至1975年8月，科委常委把我分別派駐第十、第十四研究院任工作組副組長、組長。這都是在文革期間，被轟核心及其偽保隊副“總勤務站”破壞成的“老大難”單位。因周總理要求科委把這些研究院“文革”中的問題儘快解決，以同第四機械工業部合併。現簡要介紹一下。

先到第十研究院。當時科委運動辦公室副主任為工作組組長，並由兩位副部長為成員。科委常委指示我從情報所調幾名幹部為工作組成員。在我們去前，科委派過工作組，但都被群衆轟了出來。所以陶魯筭同志（當時的科委主任、黨委書記）找我談話時，我提出本人不一定能完成任務。陶魯筭同志堅持要我去，我就去了。我一去，由於名氣在外，幾乎絕大部分找工作組談問題的，都是找我。整個工作期間，除白天接待幹部、群衆來訪，幾乎每天晚上要工作到12點以後。我們堅持了不讓任何人隨便揪鬥幹部，同時對一些領導幹部，也不贊同他們隨便“亮相”（檢查問題）。即從頭至尾，未開一個批鬥會，靠大量聽取意見、調查研究、疏通幹群關係，完滿完成了任務。在此僅介紹兩件事：一是經廣泛聽取意見、調查研究，認為該院的主要問題是一部分領導幹部空閒時在一起議論王洪文，一部分群衆認為這是“乘涼俱樂部”（註：同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相提並論），

另一部分反對。也就是常說的“革”與“保”。弄清主要問題後，我向科委常委彙報，提出了我的處理意見：十院的黨委常委，都是老幹部，老紅軍佔相當的比例，王洪文那麼年輕，同我一樣大，一下提這麼高，一些老同志議論幾句，不足為怪；包括我本人，背後也有人議論；誰不背後議論人。因此，這個問題不能算個大了不起的事。但我也贊同這樣背後亂議論，有意見應按組織原則提。對老同志批評一下，以後別背後議論了事，鬧了幾年的問題就這樣解決了。另一個問題是領導幹部中派性嚴重，而各派背後都有一些幹部、群衆。我認為處理這個問題，不宜強調在群衆中檢討，一檢討，勢必一部分擁護、一部分反對，結果矛盾不僅解決不了，反而更激化。我的意見是把派性突出一點的，請到科委常委會來，對他們既是批評、幫助，又是愛護，本人自報重點發言。就這個辦法，還真把問題解決了。因此，我認為張愛萍“整頓七機部”，實際上是帶著聶榮臻拉一派、打一派的框框，去整別人、樹自己。相比之下，我有那麼一點“本錢”批他。不是看不起他，從張愛萍“整頓七機部”的方針，他要是去十院解決議論王洪文的問題，說不定成了他向王洪文獻忠心的機會，不知多少老同志和群衆要為此遭殃。他不一定有我的膽略，因為他不具備造反派無私、無畏的品質。我主張，造反派批走資派就得這樣批，謙虛不得。

其後，科委派我去十四研究院在三線的半導體所任工作組組長，任務是撤銷這個所，並把當時估計約1500多萬元的設備、物資處理了，以及把170左右的人員分配掉。因長期無政府狀態，問題較多。我們進去時，一把

手家大門上釘了鐵絲網，怕群衆打他，其狀況可想而知。在此，僅介紹我處理的其中同張愛萍在七機部處理的（參見《張愛萍在 1975》）相類似的三件事。一件是一個職工，同本地一個女青年通姦，女方懷孕了。女方是軍人家屬，又是當地解放後第一個選為全國婦代會代表，事情正好在婦代會即將召開前夕。這事暴露後，女方的代表資格被取消，當地政府很被動。當地縣公安局破案後，提出按強姦罪，逮捕判刑。我不贊同定為強姦，因都是女方到營區來發生的關係，定破壞軍婚我沒有意見。因為我不同意，地方政府不得到營區抓人。後來他們同地區商量，同意我的意見，我經請示科委領導，同意地方政府逮捕，按破壞軍婚罪判 3 年徒刑。還有一件事是，該所從幹部到群衆，都對一把手有意見，較多是作風方面的，但缺乏證據。好幾次群衆找我說他們要去打他，我嚴肅地勸阻了。我說有意見可直接找我反映，誰要動手打人，立即關禁閉。因此，都沒敢打。那個一把手還很傲，竟把女電話員搬到他家同一套房辦公，議論就更多。因缺證據，我也不好辦。最後他分配走時，竟私自把女電話員帶走。所裏二、三把手都來向我反映。我說：我不知道。他到科委 23 試驗基地報到後，約 10 天左右，基地政委打電話來問我：你們怎麼把電話員分配來沒有給人事關係的材料，也無介紹信？我如實說，不是我們分配的，所以也就沒有任何材料，而是某某（上述一把手）不報告、不請示，私自帶去的。他聽了很吃驚，說：無組織、無紀律，肯定某某要挨一頓批。還有一件事，一天中午，兩個農民揪了兩個穿軍裝的軍人，拎了一洋麵袋木耳，找來非

要見北京來的工作組組長。一瞭解，是該所兩名幹部去偷了老百姓的木耳，人贓俱在。我思考了一下，首先向兩位農民表示賠禮道歉，並檢討我們沒有教育好，損害了老百姓利益，影響了軍民關係……。問他們偷的這些木耳有多重？他們說約 20 來市斤。我問：這是新鮮的，即潮的，幾斤鮮木耳能曬 1 斤乾的？他們說，一般 3 斤多到 4 斤曬一斤乾的。我問一斤乾的能賣多少錢？他們說：1 元 7、8 角錢。我說：按 20 斤木耳算，並鮮木耳按乾木耳折價，合 35 元，再加一倍償還造成的損失，賠你們 70 元錢，木耳還歸你們拿走，這樣處理，你們有什麼意見？他們連聲稱謝，表示很滿意。我再問去偷的兩位同志，這樣處理有什麼意見？也說沒有意見。其實，我心中有數，他們有意見也不敢講。我當即把會計叫來，讓兩人各打借 35 元借條，從下月薪金中扣除。我對農民說：謝謝你們對我們的幹部進行了一次生動的紀律教育，凡還有來糟蹋你們的，都請你們扭送來，並請你們把我的這一請求，告訴鄉親們。請人把兩位農民送出營區。他們走後，我很嚴厲地批評了兩位元同志的錯誤。最後我說：書面檢討不要做了，此事到此了之，也不裝檔案；但千萬別憑僥倖，從寬了你們，要吸取教訓，如再犯，就別怨我不客氣。這一處理，一下傳到了地區都知道，說北京派來了一個很利害的工作組組長。從此，再沒發生擾民的事。偷農民的東西是非常錯誤的，影響也壞。但你能憑偷那點木耳，就定為小偷，裝進人家檔案，背大半輩子包袱嗎？不能，只能是批評從嚴，同時經濟上不讓佔便宜，要讓吃點虧，但政治上不能讓人背包袱。我認為這種處理是

符合黨的政策的（由於當時該所無政府狀態，擾民問題嚴重，經濟上罰重了一點，不這樣刹不住歪風）。

張愛萍在七機部也處理過類似的事情。張愛萍“整頓七機部”時，抓了個“偷魚”的，無限誇大，還同他要鎮壓的轟轟派群衆組織聯繫起來，打擊一大片。另外，張愛萍對一個強姦犯依法處理外，也要同轟轟派掛上鉤，打擊一大片。兩種處理辦法，結果絕然不同。張愛萍整頓還沒有離開七機部，七機部群衆給中央告他的告狀信就接連不斷。

十院的同志後來知道我被張愛萍迫害停發薪金和糧票，被逼得靠養鵝鴨鳥為生，撫養兩個孩子，贍養八十多歲的老母親，他們派專人到我家裏來安慰我，勸我保重身體，並說經濟上和糧票他們可以支援。我表示謝謝！並說，生活上這點折磨我對付得了，謝謝大家的關心。十四院的同志從千里之外專門托人來安慰我。我可以很自豪地說，凡經我處理的問題，後來都知道我被張愛萍殘酷迫害，也沒發生一個提出翻案或要求復查的。這同張愛萍在七機部人還沒有離開就告狀信不斷，形成鮮明對照。

最後，我解釋一下，在十四院期間，工作組其他同志都分工外出落實物資分配和人員安排問題，我坐陣處理各類矛盾，所以經常單槍匹馬處理問題。把我處理的問題，同張愛萍處理的類似問題比較一下，是誰執行黨的政策？是不是還是造反派執行黨的政策？我們千萬別迷信走資派“資格老”，就執行黨的政策。我要恥笑的是張愛萍之流就不懂什麼是黨的政策，他們奉行的是一

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專橫跋扈，獨霸一方。他“整頓”七機部實質是代聶榮臻去鎮壓聶派的，結果只能是越“整頓”越亂。我不是糟蹋他，張愛萍領導科技工作，是個標準的不學無術、好搶鏡頭、不幹實事、賣狗皮膏藥的傢伙。魯迅先生筆下的“牆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幅對聯，是對張愛萍之流最恰當的畫像。如果走資派懂黨的政策，共產黨就不會腐敗到今天這種無法收拾的地步。

因為每天白天黑夜沒完沒了地接待來訪群衆，我自掏腰包買煙和茶招待他們，約5個月，共超支150元。因招待煙、茶不能報銷，回北京後財務分幾個月從我薪金中扣除，老伴還很有意見。那時“升官不發財”，人大代表也無任何補貼。毛主席宣導的這些制約幹部的規定，我是舉雙手擁護並貫徹執行的。同現在的幹部一年“三費”（車費、吃喝費、旅遊費）就耗掉民脂民膏9000億元人民幣一比較，僅這一個側面，就清楚看到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修正主義的本質區別。

### 5) 向中央軍委彙報

1974年3月8日，中央軍委要科委和七機部彙報批林批孔運動情況。會議由葉劍英主持，參加會議的軍委領導人有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陳錫聯、蘇振華，科委和七機部領導人陶魯筩、汪洋，還有一些代表，共計二十多人。會議地址在中央軍委所在地三座門。

會議的大部分時間是一部分代表揭發科委二十基地司令員李某某的問題。後來被打成七機部“四人幫黨羽”的人和科委被打成“李敏為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

的人在這個會上都沒有發言，僅我講了兩句話：“科委的情況比較複雜，但批林批孔是有成績的”，緩和一點會議緊張氣氛。會議時間開了約 6 小時，發言激烈，氣氛緊張。

會議最後由葉劍英代表軍委作總結性講話（大意）：會議溫度不低啊！……，關於二十基地的問題，（面對陶魯笳）你們回去研究一下，派個工作組，去“放火燒荒”……（他講話不多）。鄧小平在這前講了一句話：聽了不少新聞哦！

回科委後連夜開常委會傳達葉劍英的講話，我列席了會議。會議決定向二十基地派工作組，由吳鳳翔同志任組長、楊萃民同志任副組長。會後，我受常委委託，和另幾位同志一道把彙報會的記錄整理出來，爭取第二天一上班傳達到全體同志。我們加了一通宵班。我們把葉劍英的講話當聖旨一樣，逐字逐句反復核對，力爭無誤。

葉劍英政變以後，張愛萍把葉劍英的“派工作組，去‘放火燒荒’”轉嫁給了江青同志：“……，江青給酒泉發射基地（註：二十基地）的兩個參謀寫信，支持讚揚他們‘放火燒荒’的可貴的革命積極性。”（參見《張愛萍在 1975》第 56 頁）這一轉嫁，不僅兩個參謀、工作組正副組長，連積極貫徹葉劍英指示的許多幹部、群衆，都被戴上“跟了江青‘四人幫’‘放火燒荒’”的大“罪名”，遭殘酷迫害。江青同志給那兩個參謀的信，科委傳達到全體人員，科委系統是人人皆知的事。江青的信沒有幾句話，主要講送去批林批孔的材料，沒有“放火燒荒”這句話的影子。張愛萍倒是活學活用了：“把一切壞事給‘四人幫’加上，一切好事給鄧、葉加上，寫的書就好出版，

否則就有‘麻煩’。”這是當今最時興的信條。張愛萍如此信口雌黃，不僅栽贓了江青同志，而且以此迫害那麼多幹部、群衆。如果“放火燒荒”真如張愛萍在書中所說造成那麼嚴重後果，那為什麼不批指使去“放火燒荒”的葉劍英？難道書中描寫得氣壯山河的張愛萍還怕什麼嗎？還其實是個讓人牽著的哈巴……而已！這類事例，在“後文革”屢見不鮮。走資派在文革期間發號施令讓下面幹的事，走資派政變復辟以後，就栽贓到江青同志頭上，把當初執行了走資派“命令”的幹部、群衆打成“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幫派骨幹分子”、緊跟“四人幫”的“殘渣餘孽”……。這夥一再控訴文革中“受迫害”的“老革命”的醜惡表演，極為嚴重地敗壞了黨風、黨紀。一夥敗類、文痞還把這些遭迫害的冤假錯案的責任，栽贓給“文革”、毛主席。

## 2. 關於“批林批孔中‘四人幫’反對周總理‘組閣’”

“批林批孔中‘四人幫’反對周總理‘組閣’陰謀奪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華國鋒、葉劍英等主持下，編寫的江青等“罪行材料”提出來的，列舉的例子是王洪文到湖南向毛主席反映關於國務院所謂“組閣”的意見。這就成了“陰謀奪權的問題”。經查許多公開發表的材料，四屆人大“組閣”問題，毛主席明確決定由周總理和王洪文負責。王洪文向黨的主席反映意見，有什麼錯？即使毛主席沒有確定王洪文參與，而作為當時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王洪文向中央主席反映意見有什麼錯？而且四

屆人大召開時，有幾天預備會議，預備會議就讓大家對國務院“組閣”廣泛發表意見。按照走資派、文痞的邏輯，這不成了動員全體人大代表“反對周總理‘組閣’、陰謀奪權”？走資派、文痞們就是如此明目張膽以反對和破壞憲法賦與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為榮，而把他們背了中央、背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在陰暗角落猖狂進行的篡黨奪權非組織活動，鼓吹成“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莫大“功勳”。世上還有比這更混淆黑白、顛倒是非的嗎？

### 3、走資派和文痞說“四人幫”批林批孔反周總理

走資派和文痞說“四人幫”批林批孔反周總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軍隊的批林批孔是葉劍英親自主持領導下進行的。批林批孔期間，所有中央文件和傳達領導人的講話、各類報紙發表的文章，沒有批林批孔批周總理一說。林彪摔死後，在林彪家中查出了林彪讚賞孔老二的話，製成條幅掛著，作為信條、座右銘。其中有“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等，證明林彪十分尊孔。1973年7月，毛主席在對王洪文、張春橋的談話中指出，林彪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聯繫起來，目的是為防止復辟倒退，而提出“批林、批孔”。由此，為深入批林，把批林同批孔聯繫了起來。這30年，走資派和文痞不向人們介紹這些歷史背景，只說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既不講明這是關於中央決定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1974年1號文件的附件，更不說明《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選自

林彪信奉的掛在家中的孔孟之道的條幅，和林彪、葉群筆記本中學習記錄的孔、孟言論。讓沒有參加批林批孔的年青人看了，批林批孔就成了無的放矢“編造出來的”。但正是這些，充分暴露了走資派、文痞反對批林批孔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

批林批孔運動，其實重點是把林彪信奉孔老二的條幅，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即武裝起義搶班奪權）”聯繫起來批判的。孔老二的“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等和林彪公開搞“天才論”背後搞武裝政變搶班奪權，只是表達的語言不同，實質都一樣，都是要復辟。而且都信奉“韜光養晦”反革命兩面派的伎倆。

孔老二所處歷史背景，已是西周覆滅，到了東周戰國時代，處於奴隸社會崩潰期，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周“天子”已非常衰敗，各諸侯國很少向他“朝貢”，而且戰亂不斷，但生產力較西周時期有較大發展，不僅鐵、銅器已大量生產，而且已發展到了用牛耕地，馬車運貨等。奴隸制即將土崩瓦解。因此，孔老二的“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把它解釋為恢復西周奴隸社會，即復辟西周奴隸制度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批林批孔很自然就用主要精力批孔老二復辟西周，開歷史倒車。我就弄不明白，是什麼技巧，走資派和文痞能把批判孔老二復辟（西周），周禮，同周公而周公又是周總理如何等同起來？西周後期曾有周公、召公兩位同時為相的歷史。長期的矛盾逐漸積累，使王朝產生了深刻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繼位元的西周周厲王，也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暴君。在位期間，他對人民大肆壓迫，卻又禁止人們議

論國事，致使人民怨聲載道；他不僅不採取安撫民衆、發展民生的措施，反而任用佞臣，大肆揮霍，連年對外征戰，變本加厲地剝奪，壟斷山澤之利，引起民衆的不滿和議論；他派巫師監視，殺死議論（國事）的人，使矛盾更為尖銳。三年以後，憤怒的鎬京居民終於發起暴動，憤怒的人民衝入王宮，趕走了厲王，將厲王流放到彘，由“周公”和“召公”（兩位宰相）共同執掌政權，歷史上稱為周召共和，以維護腐敗的奴隸制度。我不記得批林批孔時有批西周時代的“周公”的事。即便有人批了西周的宰相“周公”，請問這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周恩來有什麼關係？由此，批孔老二復辟周禮，因有個“周”字，加上西周還有個效忠奴隸主的宰相“周公”又有個“周”字。天才的走資派、文痞以超凡的智商，把這兩個“周”字，巧妙地同周恩來的“周”字等同了起來：批孔老二復辟西周奴隸制，就等於批周公，也就“等於批周總理”。這樣的推理邏輯，是走資派和文痞的一大發明。因此，上世紀 1976 年 10 月 6 日後他們領導的“後文革”，用造謠、“小道消息”等作為大批判，就順理成章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共黨史上一大發明。不過我倒要問，把沒落腐敗的西周，硬要同周總理等同起來，究竟是想幹什麼？而且那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幾乎與這同時，瘋狂地在陰暗角落搜集攻擊、誹謗周總理的黑材料，並企圖對知情人殺人滅口，又說明什麼？國防科委把羅瑞卿同志用籬筐抬出來批羅“搞部院合併”，實質批周總理。走資派和文痞又一次玩弄了賊喊捉賊的伎倆。我真不敢相信，靠散佈政治謠言，竟能散佈出個“無產階級革命家”

來。

張愛萍夥同劉毅民等人，瘋狂地從進口反動報刊搜集了惡毒攻擊、誹謗周總理的黑材料，並一再企圖對知情人殺人滅口。人證、物證俱在。這個案子，中央不僅知道，而且有要“追查清楚”的批示。但為什麼不讓查下去，反而把主要責任人提拔為國防部長、國務委員，這不正說明，資產階級司令部，大叫什麼批林批孔批周總理，是一出最典型不過的賊喊捉賊的鬧劇！

近 30 年，走資派和復辟派，經過對中央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的造謠、誹謗、栽贓，全盤否定後，把孔老二捧上了天，把尊孔運動推上了頂峰，竟然把孔老二的像供奉到了天安門廣場，以便走資派們朝拜。把孔老二的一套美化為我們民族最完美無缺的典範大肆宣揚，以孔老二命名的商品、店名等滿天飛，不遺餘力地開設孔學等，無限拔高擴大孔子在國內外影響，朝拜“孔聖人”成為時尚。有些人乾脆效仿孔弟子，把貓、雞、魚吹捧為“創 new 理論”，大肆鼓吹。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運動”，其重要內容就包括打倒孔家店。然而八、九十年後的“共產黨”，誰批了孔老二反遭迫害，為孔家店“平反”，還舉得高高的，頂禮膜拜，豈非咄咄怪事！就難怪某些地方和部門發生了殘酷奴役童工等黑磚廠、黑煤窯的慘劇，完全復活了奴隸社會。

#### 4、毛主席談批孔

毛主席同毛遠新同志有一次長談批孔問題。這次談

話，不僅有助於我們瞭解毛主席是怎麼研究和批孔，而且對我們批孔有現實指導意義。現抄錄如下。

### 毛主席與毛遠新同志談批孔

在談到中央電視臺有人講主席詩詞講的非常好時，毛遠新說，1973年主席給郭老寫了首詩，沒有公開發表過，後來有一部分已經成冊，包括主席未發表過文章、詩詞包括進去了，這首詩誰都不敢講，為什麼不敢？涉及政治問題：批孔。因為後來鄧講，批孔就是批總理，那一段都這麼講，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個專題片。講主席詩詞的，叫《獨領風騷》，這個解說片街上有賣的。主席110週年，中央文獻發行的，講詩人毛澤東，從主席的詩講主席的一生，講的水準很高。《獨領風騷》在中央一臺播過，後來在中央四臺播過，有聲有色，作者陳晉，我見過。但主席給郭老寫的這首沒有收入主席的詩集，當年主席給我一句一句講這首詩，我拿著這首詩，主席還給我講了柳宗元的封建論，一種單行本，字很大，還有章太炎的兩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單行本，主席讓我回到瀋陽，召集省委常委給每人印發一本，大家討論學習，還要把黑龍江、吉林兩個省委集中到瀋陽來，同時給他們每人都發這首詩，主席的詩有沒有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請把主席的詩寫下來。毛遠新說，說是一首詩，實際是佈置工作，原本好像是《讀封建論贈

郭老》(記不準確了)。(詩全文)：

《讀封建理論》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秦猶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學名高實秕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寫於十大之前，十大之後給毛遠新講)

祖龍——指秦始皇

十批——郭老的十批

唐人——指柳宗元，他寫的封建論

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遠新說，主席這首詩是1973年夏寫，但跟我講是十大後，十大是1973年9月，我在遼寧工作，十大開過以後，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別，他給我講。

郭老的十批書裏邊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罵秦焚書坑儒。他的書50年代發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論給了我，我詳細讀了，唐朝的古文又不難讀，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還真讀不懂，許多怪字我都不認識，我問毛主席這啥字，主席給我講什麼字，我說怎麼明末清初的文章怎麼比唐朝的還難讀。主席說唐朝的人還沒到那麼嚴重，寫的文章，李白的詩還比較接近老百姓。越到後來，特別是南宋以後，朱熹的理學等，到了元明，好像是越用的字誰都沒見過，誰的水準越高。封建論這本書說的是什麼？網上有，百度查國學欄目，柳宗元詩、文。柳宗元的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主席拿著這

本書給我講。有一段話：說秦二世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為公的“公”）秦始皇，當然後邊也說了，他是以一個人之私來公天下，他自己皇帝還是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對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國家分裂，先是分爭，最後各種各樣的問題中國歷代都發生過這樣的事。秦統一了以後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發生分歧，李斯反對分封，搞郡縣制，皇帝任命省長、縣長，而不是封一個王到全國各地，他的子孫後代都是統治者，世襲。他把這個東西破了，主席說秦始皇功勞非常大，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事。

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後都感覺分封王侯不行，就實行郡縣制。

後來一些朝代又實行分封，如漢朝開始，七王、八王之亂鬧得漢武帝不得安寧，不少王造反。漢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沒有封，實際上內部有爭論，歷朝都有這事，要不要封王。如某某省要封一個王，那就世襲了，他的子孫、阿斗也得說了算，最後國家分裂，都是這樣，封建論對秦始皇是肯定的，所以勸君（郭老）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結論，迫害知識份子（秦始皇：統一度量，還要統一思想）秦滅六國都有一大幫儒生。

詩中祖龍指的是秦始皇，祖龍雖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書。當時我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個祖龍什麼意思，主席說就是指秦

始皇，第二歷代都行秦王政，這個政是嬴政的政還是政治的政（因為秦始皇名嬴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國方略。孔學名高實秕糠，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氣很高，實際上沒用。熟讀唐人封建論，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論（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從柳子厚以後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對於孔夫子的理論，毛遠新說，主席認為，孔子當年，他那套東西沒有市場，周遊列國，到處被趕出來，為什麼？戰國七雄，唯獨秦國是不允許孔夫子的弟子進去的，從商鞅變法以後，其他國家允許孔子的弟子（那時孔子已死）去講學，可為什麼那些相信過孔夫子的國家都滅亡了！唯獨秦國，不聽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統一，是不是這個道理！歷代都行秦王政，從秦始皇死了以後，農民起義，楚漢相爭，劉邦把項羽打敗了又統一了中國，這以後，漢以後，從三國、魏晉，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歷代皇帝都是罵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來都是學秦始皇的，說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這樣？都罵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們做起來並不比秦始皇手軟，秦始皇坑了四百多個，後來的皇帝不是照樣罵！文字獄一個比一個厲害！都學這個，所以歷代都行秦王政，實際上孔學名高實秕糠。主席說，孔夫子的很多話都是好話，現在看起來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現實社會裏，那種複雜的矛盾他都處理不了，他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所以又都是廢話屁話！這都是主席的原話。主席說歷代農民起來造反，統

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改換皇帝，他們起兵造反的時候都是批孔，為什麼呢？因為孔夫子講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換掉，你得違背，違背孔夫子儒學理論，他必須得批孔，要不然師出無名，造反無理，特別是農民起義，舉了個例：如劉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劉邦，見了儒生把帽子拿下來撒尿，史書有記載。可是到漢武帝時，獨尊儒術，這就說明到了統治地位以後，又要把孔子請回來，為什麼呢？要用他那套理論管理國家。宋太祖趙匡胤他搞陳橋兵變，軍事政變，發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當皇帝，這不符合孔子的理論，他肯定不符合。但他當皇帝以後又把孔夫子請了回來。造反的時候批孔，治國時尊孔，都是這樣。成吉思汗他讀過論語嗎？他的鐵蹄殺遍歐亞大陸，見人就殺，簡直是要把所有的農業區都變成牧區、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後邊皇帝，到山東去祭孔啊，給孔的地位那麼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給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嗎？沒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臺以後，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樣，努爾哈赤讀過什麼書，滿清入關，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那符合孔子的理論嗎？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後，要把孔夫子請出來。太平天國洪秀全也是從批孔開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嗎？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後又要尊孔。

毛遠新說，國共兩黨的領導人孫中山也好，陳

獨秀、李大釗也好，“五四”運動就是批孔開始的，是不是這樣？等到蔣介石坐上了寶座以後去尊孔、祭孔。蔣介石把孔家的後代請到臺灣，現在還在那裏。中國歷史不就是這樣嗎！當要起來造反的時候，都要批孔，用我們的話說，你是革命黨的時候是批孔的，當成了執政黨，鞏固地位時又要尊孔。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走過來的，為什麼？這是什麼道理？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席說到現在孔夫子已經不是當年的孔丘本人，歷代的統治階級都給他梳妝打扮，根據統治者的需要，用魯迅的話說，後邊講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經過梳妝打扮過的孔夫子，他們就是以這套思想來束縛統治人，是思想專制的工具，回顧中國歷史是不是這樣？

毛遠新說，你說蔣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嗎？對共產黨員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孔夫子什麼時候教過他這一條？孔夫子是和為貴，所以主席那個時候搞那個東西，為什麼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員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國共產黨也尊起孔子來了，就說明你也到時候了，就說明你統治不下去了，要靠他來維持你的統治了。想想看，是不是這個道理？後邊這話沒有講，這是我悟出來的。主席說，你看看歷代，革命的時候都是從批孔開始，等到他掌權的時候，都要把他請回來，幹什麼呢？把他作為對人民統治的思想專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結論是什麼的，他說孔子作為中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莊子、

韓非子、荀子和他們一樣，都值得我們尊敬、紀念，值得研究，因為他們的思想實際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每個人都值得我們尊重。但是作為孔子的這套理論，它是唯心的，主張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於說我們現在說批孔（魯迅說）已經各朝各代梳妝打扮以後的孔子，不是當年的孔夫子，孔子不過是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可是到了南宋以後，你讓婦女纏小腳，這是對人體的傷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發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時還沒到這個地步，但是理論根據是孔夫子。

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與（對付）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一種迴圈，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也快完了。

毛遠新回憶，主席還說，中國沒有一個真正能夠佔統治地位的一個宗教，不像西方。主席舉例子，主席說西方耶穌和孔子差不多，他那個時候也是到處受人迫害，還被釘在十字架上，他創立的這一套東西，在當時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歐洲的中世紀，教會是統治和奴役人民的一個最壞的工具。主席說你看資產階級革命，從歐洲文藝復興開始，首先就是對著教會，批判神，就像我們批孔一樣，但是這個教會不是說耶穌本人怎麼樣，只有打破這

個東西，資產階級革命才能起來，那個時候教會是宗教裁判所，有時比法院還厲害，科學家好多都是被他們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須自己改變理論，不改變就要處死！這能怪耶穌嗎？不是耶穌問題。但是因為中國沒有這樣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這套東西來統治中國的老百姓。在中國，是實用主義。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起神來了，孩子生下來病好了，早把他忘了。宗教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對它進行了一次批判，然後進行改造，改造以後他適應於資產階級的社會。所以現在的宗教和中世紀的宗教大不一樣。

毛遠新說，主席想的是，我們既然已經認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就應該以這個思想來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雖然話都很好聽，拿出哪一句話你也不能說他錯，他不能解決問題，現在講和諧，和為貴，引起矛盾，處理不了，和得起來嗎？

## 十一、張愛萍“整頓機關和七機部”

### 1、張愛萍整頓科委機關

林彪問題出來以後，回顧毛主席的講話，“毛主席晚年，從林彪問題以後直到去世，一再憂慮：在他死後老帥們要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麼辦？”（參見姚文元《回顧與反思》）。為此，毛主席對軍隊採取“摻砂子”的辦法，提倡地方幹部學軍事，並把王洪文、張

春橋、紀登奎、陶魯笳等同志在部隊兼職或調入部隊工作。對國防科委這個林彪武裝政變的借用力量，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徹底剷除了“聶核心”的班子，並告誡聶榮臻不要再插手科委的事務。把陶魯笳同志調來任科委主任、黨委書記，整個常委會全部換成新的。科委這塊“寶地”，資產階級司令部能甘心丟掉嗎？肯定要排擠出去。陶魯笳同志調科委以後，給我的印象是講民主，不擺架子，能敞開思想研究和討論問題；勤奮看書學習，也一再要求我抓緊學習；他作風正派，不搞派性等歪門邪道，並一再提醒和教育我注意這方面的問題；能正確對待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同志間的關係，……。如果說有不足處，可能因為文革挨過整，處理問題顯得果斷不夠，而民主有餘。

旁觀者看得很清楚，不是“聶氏山頭”的人，來科委站住腳是難之又難，甚至難有好下場。不出所料，1975年，葉劍英“三顧茅廬”把聶榮臻的愛將張愛萍請出山（參見《張愛萍在1975》第62至64頁），任科委主任、黨委書記，陶被排擠為政治委員、第二書記。張愛萍出山的目的是什麼？張愛萍還未到科委上班，給陳彬同志（科委副主任）打電話有一段露骨的描繪：“……，科委那個負責人（註：指陶魯笳同志）一次次上門來，再三動員他儘早上班（註：陳請病假，肝病較重）……，又以為來催他上班。……來電話的竟是他一向敬重的老上級張愛萍。”（參見《張愛萍在1975》第56頁）這段話裏“科委那個負責人”，這句話的含義三歲的孩子也看懂其奧妙，陶還有好結局嗎？因為這裏涉及陳彬同志，我有責任把

真相公諸于衆。張愛萍在書裏，通過陳彬同志把他自己塑造為尊重人才、寬宏大度等等，真實情況是這樣嗎？陳彬同志在文革期間，在總參參與了張愛萍的專案工作，他親自向我介紹說：“張愛萍很霸道，打擊報復心狠手毒，我怕他。”以至張愛萍住院時，陶魯筩同志約陳彬同志去醫院探望張，陳彬同志拒絕去。事實證明陳彬同志對張愛萍看得很透，他的介紹是負責任的。陳彬同志任科委主任後，去中央開會，要看了張愛萍的臉色再講話，中央領導發現後批評了張愛萍霸道。張愛萍不忘前仇（參見《張愛萍在 1975》一書咒罵總參審查他的那些話），並派人去總參調查陳彬同志的“問題”，陳彬被逼得請長假直至去世。

這裏僅說明張愛萍“整頓科委機關”目的是迫害陶魯筩同志以及炮轟聶榮臻的幹部、知識份子、工人和廣大造反派。另外，當時毛主席還在世，“聶核心”有了前面的失敗，也不敢輕舉妄動。因此，張愛萍到七機部去顯威風，他在書裏也主要吹噓“整頓七機部的偉大功勳”。

## 2、張愛萍“整頓七機部”

張愛萍去“整頓七機部”，一進七機部就傳達他登門拜望王洪文副主席的情況，說王副主席要他好好幹，……；以及他熟練的吹捧上司的話。這一套同他到科委升為主任在幹部會上講的是一個版本。他拿了王副主席的令箭，打著王洪文副主席的招牌壯膽、壓陣腳，這也是當慣奴才的看家本領。他從王洪文那裏拿到了“整頓七機部”

的“聖旨”。可是王洪文垮臺後，張愛萍在他的《張愛萍在1975》書裏卻大力鼓吹他早就看透王洪文是個不值一提的小人，並捏造王洪文到科委批評他，為自己撈資本。“整頓七機部”同資產階級司令部完全一致。而李敏向鄧小平揭發張愛萍私造核武器一事，鄧小平表示要查，實際上沒有查；審查王洪文，王很快繳了械，並對江青作了偽證，取得了“手下留情”的判決。這一連串問題值得研究！

關於張愛萍“整頓七機部”具體情況，我恪守不介入兄弟單位運動的原則，僅就《張愛萍在1975》一書中大肆宣揚的“成績”，選幾點談談看法，如有不妥處，望七機部的同志批評指正。

### 1) 文革十年的七機部是不是像張愛萍說的漆黑一團 “今不如昔”

這不僅僅是七機部的問題（僅指科研方面），也與科委有關。國防尖端和高新技術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大部分在文革期間，堅信沒有人能駁倒這個結論。其中七機部的工人、知識份子、幹部，包括他們的家屬，功不可沒，貢獻是巨大的。從現狀看，要突破那時的水準，並非易事。我講的突破是指理論上、原理上的突破，而非打遠一點、精度高一點、尺寸變一點……。決不是幾個“專家”跟了張愛萍罵罵文革能罵出來的。

鄧某的改革對科研的破壞，不少同志用事實作了揭露。我只想補充一點，鄧和張愛萍之類，不是以國家安危為重，而熱衷於摘毛澤東時代的“桃子”，以發射多少衛星之類，樹自己的形象工程或“政績工程”。反正一發射，

所有宣傳工具不計時日連軸吹，而發射的還都是毛澤東時代研製成的運載火箭和衛星。又如有些衛星的遙感解析度提高了多少，同國際水準的差距是縮短了還是拉大了？再就月球探測，美、蘇都花鉅資搞過好多年，結果月球不是仙宮就停了。現在看到我們搞，美國又撿起來，目的很清楚，為了顯示他的軍事實力。我們國家原來也打算搞，後來停了，中央決定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這個決策是正確的。現在有人宣傳開發月球的價值怎麼怎麼，糊弄老百姓。我講句絕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說是開發月球，只能是神話或童話，除非地球與月球間的“載重車”能像北京與天津間來回那麼簡單，何況月球是否有開發價值至今無定論；對我們國家來說，當今連領土、領海權都不維護，還去爭什麼開發月球，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不客氣一點，那套方案還不是跟在人家屁股後面爬。當然，我不是說登月等不能搞，而是有個輕重緩急。放心好了，月球美國人搶不走，有探測的機會，當務之急是保安危、保領土主權。從一些公開資料看，美國已宣佈再次登月破產，不搞了，恰當地說搞不下去了。有足夠的理由證明，美國把人送上了月球並安全返回地球，是為了爭霸而製造的假新聞。我們有的“專家”為美國辯護，竟能誇口說（大意）：美國送給我們“從月球取回的土壤”是“地球上沒有的”。我倒要請問這類“專家”，你掌握了地球上多大範圍的土壤、岩層等標本？如果真如這類“專家”吹噓的，那我們的地質勘探等好幾個行業就早該“休息”了，科學決不是靠吹牛吹出來的。

## 2) 張愛萍“整頓七機部”的制勝法寶

《張愛萍在 1975》一書塑造了他“整頓七機部”的“偉大魄力和輝煌成果”。為此，該書細緻描繪他抓住的“重大”問題：“某某姦污幼女證據確鑿……。案子之所以久拖不決，……之所以抓抓放放，完全是派性作祟……”、“提交公安局法辦”（參見《張愛萍在 1975》第 160 頁）；另關於抓偷魚人的描述（參見第 163 頁）；類似例子就不舉了。張愛萍抓住了這些“要害問題”，一舉扭轉了七機部的局面，而一反以往“今不如昔”，出現了“三星高照”輝煌成就。所謂三星高照，即一年打三顆衛星。

參加過四清的同志都清楚，工作隊一進駐，搬用“桃園經驗”，扎根串聯，摸出類似張愛萍抓的問題，拼湊與領導幹部的關係，把人一抓，幹部雖本身沒有這類問題，但嚇得“老實了”，就打開了“缺口”，讓人見了工作隊就怕，工作隊的“威信”也就大大提高了，工作也就打開了“局面”。這種經驗就是把共產黨幹部隊伍看得一團漆黑，85%以上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裏。整的是群衆，保護的是走資派。後來中央的二十三條扭轉了這個局面，重點整走資派，幹部絕大部分是好的、比較好的。

但我認為，張愛萍能認識到強姦幼女是犯罪，對他這位生活作風糜爛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大進步，我為他高興。感到不足的是，張愛萍沒有抓這樣的案例：有的走資派利用職務之便，霸佔有夫之婦；或把情婦強行安插到下屬單位，有抗命拒不接受者，就殘酷打擊迫害，以置於死地……。張愛萍要是處理這樣的典型，何況他清楚有這類典型，那就更好了。如果能自己投案自首，就還要好，說明這類走資派還可教育。對他沒抓走資派

這類典型，我表示遺憾！

### 3、關於長征運載火箭

張愛萍在書中以及他任顧問拍攝的有關電視劇，都一再誣衊長征運載火箭“生在亂世，先天不足”。不僅有“專家”為此幫腔，還有發表長篇文章進行論述。是的，1974年的試驗是失敗的，失敗在陀螺儀一根連接導線開路，並決定於次年（即1975年）再發射。能由此證明文革中研製的長征運載火箭“生在亂世，先天不足”嗎？我想那些為張愛萍捧場的“專家”，一定會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發射東風二號導彈失敗的事，那次失敗，在今天看來是“很鬧笑話”的，但那時是包括張愛萍在內的“聶常委”鼎盛期，可稱他們的“黃金時段”，我們能說它“生在‘黃金期’，先天不足”嗎？再如到了九十年代，用張愛萍的話1975年就“三星高照”表明長征火箭成熟了，然而九十年代代替美國打衛星，卻發生了我國航太史上空前（但希望絕後）大失敗，能說“生在‘改革開放’，先天不足”嗎？我們的長征運載火箭，研製週期和走的彎路比美、蘇研製同類火箭短而少，這是歷史事實，張愛萍們是罵不倒的。而長征火箭至今仍是我國主要運載工具，因此，可以無愧地講，長征火箭的研製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是我們黨、我們民族的驕傲！張愛萍對長征火箭的污衊，只能說明他技術上的無知，政治上的別有用心！

在此還想補充一點，張愛萍在書中說：“1975年這一

年，卻‘三星高照’。……，我國在一年之內成功發射三顆衛星！這是中國航太發展史上空前壯舉！它成了我國空間技術史上光輝的新起點”、“這一切，便是給張愛萍近一年來夙興夜寐、殫精竭慮狠抓整頓的最好報償。”（參見《張愛萍在 1975》第 229 頁）作為一名科技戰士，我對任何一次發射，都表示高興和祝賀！

但我在這裏講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因為三顆衛星都是長征火箭發射的，上述張愛萍所言，說明沒有他，就是“生在亂世，先天不足”，有了他才有“我國空間技術史上光輝的新起點”。事實果真如此嗎？張愛萍去“整頓七機部”，約是 1975 年 4 月前後，1975 年 11 月初，中央把他召回接受批判。則在七機部約七個月時間，如果張愛萍真能在七個月內研製出三顆衛星（在此還不包括運載火箭），那中央只要發掘出十個像張愛萍的人，那至今航天部就星滿為患了。航天部像張愛萍那點技術水準的人，北京火車站的全部車輛都用上，也夠拉上幾趟的，如果都去搞衛星，都能 7 個月搞出三顆衛星，可能北京市也堆不下了。事實是張愛萍吹的牛皮，同鄧某說小崗村分田到戶單幹一年，糧食畝產就增加 3.6 倍，同樣是牛皮吹炸了的浮誇風。張愛萍把七機部描繪得“亂到了不能再亂”，就算他有“整頓天才”，花三個月“整好了”，餘下四個月搞衛星，別說研製出三顆衛星，就研製一顆衛星的設計方案也拿不下來，更不用說還有運載火箭了。他把研製衛星看作是正月十五為孩子紮花燈似的那麼簡單。事實只能是他把已研製好的庫存衛星和運載火箭拉出來一連打三顆，為自

己歌功頌德、樹碑立傳，摘了文革的“桃子”，還把文革罵得“狗血淋頭”；這同鄧某分田單幹不久，糧食減產，吃掉了毛主席時代積存的夠全國人民三年以上吃的戰備糧，還進口大量糧食（年進1000萬噸），甚至乞求聯合國糧食署救助大量糧食，而宣佈廢除糧票，不僅掩蓋了這些真相，還製造了分田一單幹就靈的假像，欺騙人民，這是一路貨色。但偽裝終將剝去！

第二個問題，像張愛萍這類貪天功為己功，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應進行徹底清查並嚴令禁止。

張愛萍整頓七機部的大量事實證明：他自命不凡，橫行霸道，未經國務院授權，粗暴地干涉兄弟單位國務院第七機械工業部的事務；他以“整頓”為名，樹自己、整別人，為聶榮臻大搞打擊報復，殘酷迫害炮轟聶榮臻的廣大群衆。炮轟聶榮臻是中央、毛主席、周總理明確表態支持的革命行動，張愛萍鎮壓炮轟聶榮臻的群衆，居心險惡；更嚴重的是，張愛萍通過在七機部瘋狂鎮壓群衆，背了中央，私造核彈頭，圖謀不軌，罪惡難赦。

最後，我還得重複一遍：別認為張愛萍這類“老革命”真懂黨的政策，毫不客氣地講，張愛萍這類走資派，根本不懂黨的政策，而只懂整別人、樹自己，獨斷專行，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惜一切手段打擊報復，對上奉承拍馬，對下橫行霸道。如果走資派懂黨的政策，共產黨就不會腐敗到今天不能收拾的地步。

## 十二、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11月3日，毛主席批復了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的告狀信，指出：“清華大學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吳德同志主持了傳達會，以此為標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

11月下旬，在專門召開的“打招呼會”上，毛主席發表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一文，正式將鄧小平定性為“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打招呼的講話要點》，各地開始開展學習，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2月3日，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主持全面工作。2月5日，《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一文向全國人民公佈。2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停止貫徹執行鄧小平、葉劍英1975年7月的講話精神。

2月25日，華國鋒主持召開各地方、軍區一把手會議，傳達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指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開展對鄧小平的點名批評。此後，全國各家媒體紛紛發表社論和文章，批判鄧小平。

全黨、全國轟轟烈烈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毛主席去世不到一個月，由於華國鋒的叛變，至1976年10月6日，夥同葉劍英發動武裝右派政變而夭折。

科委反擊右傾翻案風主要是揭批張愛萍。

由於張愛萍問題多多，毛主席指示批判張愛萍。1975年11月前後，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以後，毛主席把

李先念留下對他說：“張愛萍這個人問題不少，你們要好好的組織批。”李先念把毛主席的指示向當時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作了傳達，陳錫聯又向科委政委兼第二書記陶魯笳作了傳達。

後來，由李先念掛帥，由紀登奎、陳錫聯、華國鋒和陶魯笳組成五人小組，幫助張愛萍（參見《張愛萍在1975》第258頁）。由於張愛萍不認錯，又擴大到科委、七機部聯合召開常委會幫，仍無效，最後中央決定科委、七機部聯合召開常委擴大會（註：以下稱兩委擴大會），由100多人，到後來的200人左右，批張愛萍。在準備召開兩委擴大會期間，七機部舒龍山給毛主席寫信，揭發張愛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此人是9·16左派；擴大會召開後，科委康華清給毛主席寫信，揭發了聶榮臻、張愛萍，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印發政治局。葉劍英政變以後，舒龍山被判了16年徒刑；康華清被開除黨籍。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突然問葉正光（葉挺同志的兒子）哪裏去了。葉正光被葉劍英等無理定為“‘四人幫’黨羽”而處理出七機部，流放到天津，鄧能不知道？明顯是他們都炮轟了聶榮臻，而被打擊報復。炮轟聶榮臻，中央、毛主席和總理是支持的。迫害炮轟的同志，矛頭是對著中央、毛主席和周總理。批張愛萍同江青毫不相干，而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決定。但張愛萍要捏造說江青“四人幫”整了他，為自己升官撈光榮資本。四位副總理親臨會場或每天向他們彙報，領導揭批張愛萍，在黨內是少有的，足見張愛萍的問題嚴重。

關於張愛萍的嚴重問題，合併在下面介紹。

## 十三、右派武裝政變

1976年，周總理、朱老總、毛主席相繼去世。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謊稱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纂問題，誘騙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位同志到懷仁堂。三人被華國鋒、葉劍英武裝綁架，投入監獄。江青同志在住處被武裝綁架；同時被綁架的還有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同志。華國鋒、葉劍英等精心策劃了半年多時間的右派武裝宮廷政變“成功”，華、葉成了證據確鑿的共產黨的叛徒。從此，進入“後文革”即文化大復辟運動時期。地、富、反、壞、反動官僚、走資派重新登臺，篡奪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中國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夭折，封、資、修全面復辟。

### 1、揭批“四人幫”運動

從叛徒集團批鬥江青同志可以看到：凡被毛主席批評過的全批評錯了。毛主席對這些人的批評不僅成了這些人標榜自己、升官的資本，而且都栽贓到江青同志一人身上，藉批江青同志之名，達到批毛主席和醜化文革的目的。唯獨毛主席批評江青同志的幾句話，成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江青同志批評了葉劍英走後門，葉向毛主席告狀，結果毛主席批評江青同志“三箭齊發，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居然成了江青同志一大“罪狀”，成了葉劍英為自己鍍金

的金字招牌。不過，我要請問，走後門對不對，該不該批？

這次掲批江青同志的運動，我稱它為“後文革”。這次運動，目前 45 歲以上的朋友，都親歷親見。因此，具體過程，我就不贅述了。僅是提幾個問題供商討。

### 1) 如此批判太荒唐

我們黨解決歷次路線問題，無例外都是說理鬥爭，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即便言辭很激烈，也不會搞低級趣味的人身攻擊。然而，華國鋒、葉劍英領導的批江青則不然，正經的批判幾乎見不到什麼站得住腳的東西，造謠、誣陷、人身攻擊反而成了主流。例如誣衊江青同志的頭髮等等是“假的”，造謠造到了江青同志身上沒有一處是真的。直到十幾年後，才陸續有些正義感的同志在一些小報上發文辟這些謠言。更荒唐的是造謠毛主席同江青同志結婚時“有約法三章”，甚至把這些謠言寫入《女皇夢》一書。《女皇夢》的作者、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說：“完全如實地寫江青能出版嗎？就是我寫的《女皇夢》，人民文學出版社要出版的時候，也是相當難啊”，“文學作品嘛，沒有合理的虛構是不行的，……”，“我在《江青秘傳》和《女皇夢》（註：作者承認女皇夢沒有這回事）這兩本書裏……，裏面的情節，我是有誇大的，不誇大不行，出版不了”，“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前徵求了黨內許多同志的意見，周恩來、王稼祥、康生、賀龍等領導人都是同意和擁護的。其實並沒有什麼中央對江青的約法三章，也沒有對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謂那些東西都是……小道消息，但是為了政治需要，我們把它作為演義（寫在裏面了）”、“（江青），第一，她長得漂亮；第二，

她會演戲，在全國是出了名的演員，……，絕不是人們所說的她是三流演員，那是根據政治需要貶低她，她的表演是很好的；第三，她善於學習，寫一手好字，會寫文章，……；第四，她看過不少馬列著作，《共產黨宣言》一類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一個國際上號稱的“大黨”，竟如此批判一位女同志，人們不得不問：華國鋒、葉劍英等究竟是想幹什麼？你們為了自己篡權、復辟，竟不惜如此糟蹋我們黨的聲譽到如此不能容忍的地步。

## 2) 搞逼、供、信捏造假案

華、葉等人，批評江青在劉少奇的問題搞“逼供信”、搞“假材料”，迫害劉少奇。他們宣佈江青是“叛徒”。這個問題，毛主席在世時，就有人攻擊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毛主席說（大意）：他們沒有被捕過，怎麼成叛徒。否定了這些謠言。

但華、葉是如何製造江青同志是叛徒的？《作家文摘》報 2008 年 1 月 22 日（第 1107 期）第 2 版發表了題為《樂於泓的坎坷一生》的文章。文章說：“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幫’以後，專案組很快就把樂於泓關了起來，單獨隔離審查，最後他們拿出一份事先寫好的證明材料，要他簽字。這是一份證明江青是與樂於泓在上海兆豐公園接頭時被捕的材料。樂於泓一看，就不肯簽字，說：‘我在上海從來沒有和江青見過面，兆豐公園接頭，從何談起！’‘1992 年，樂於泓去世後，……。鍾曼（樂於泓的夫人）生氣地告訴我（文章作者）：‘樂於泓去世前幾年，多次和我說過，他在上海沒有和江青見過面。那份證明材料，他是違心簽的字。不簽字就不放他出來’。”

關於劉少奇的問題，2010年5月出版，司馬清揚、歐陽龍門著《新發現的周恩來》第326頁：（八屆十二中全會）“依據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提供的證據，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文章註明選自1968.10.18中發（68）155號文件。並介紹了周總理1969年4月14日講話：“如果不是毛主席……，發動群衆進行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不能摧毀，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像毛主席很早就指出的那樣，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面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註：參見同前第327頁）另外，在林彪問題以後，“毛主席關於高層幹部如何安排做了具體批示。在此過程中沒有發現江青等阻撓的事情。至於在解放一些幹部中，江青等針對個別的個別問題提出質疑，也是完全合乎程式的。有些文章說江青等百般阻撓，筆者認為完全是誇大之詞。”（同前第428頁，原書註6：《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次談話解放了175名將軍》，見《黨史文苑》2006年第13期）

江青同志的辯護詞：“劉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監牢所寫出來的，難道是我編造的嗎？他是怎樣出獄的，連延安整風的時候，你們現在的中央裏的人都提出過懷疑，還有揭發，……。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和革命派揭發出他們大批這方面問題，才進一步引起了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才經過政治

局擴大會議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專案組。這個專案組所有的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都參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體審定、共同研究的，你們僅僅抓住我批准了他們拘留了幾個人的報告，就斷定劉少奇的專案是我江青一個人製造出來的，是不是編造得太離奇了吧？”鄧小平看了江青的辯護詞後說：“……，不能讓她這樣為所欲為。否則，就收不到我們審判的預期效果。”這說明，批判、審判江青同志是設計好了“預期效果”的框框幹的。

以上材料不僅足以說明：批判、審查江青同志的過程中，採取逼供信偽造證明材料，完全可信。因為樂於泓同志的夫人敢於在 2008 年在《作家文摘》報，發表揭露他們採取逼供信搞誣陷江青同志的材料，既要有勇氣、還得冒極大風險。中央黨校的同志對師東兵說過：要把一切壞事推在“四人幫”，寫的東西就容易通過、出版，否則就有“麻煩”。

以上材料還證明，華、葉等說江青迫害老幹部，尤其是劉少奇，明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劉少奇的罪證材料，發給了全黨，八屆十二中全會“依據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案組提供的證據，全會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審查報告》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證》”。據這些年各種報導，僅一票反對。因此，即便通過的決定錯了，按慣例，由中央全會承擔責任，而不過多追究個人責任。再退一步講，按華、葉、鄧私立的法規，追究個人責任，但主要應承擔責任的是中央專案組領導人周總理。何況江青同志的辯護，沒見法庭能駁回去，而是強行把她拖出法庭，剝奪她辯護的權利。

這不充分表明是按鄧小平“要達到的預期效果”而表演的一出任意踐踏憲法的鬧劇嗎？何況，許多歷史資料表明，替劉少奇翻案經不起實踐檢驗。

### 3 ) 謣陷江青“反毛主席”

華國鋒、葉劍英大肆造謠：江青“反毛主席”、“搞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現在真相大白，毛主席去世，江青同志爬在主席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你們快來救救他呀！……。在場的人都被感動得哭了起來。這 30 年的事實證明，誰反對毛主席？連小學生都能回答：鄧小平等走資派、反動官僚、文痞之流反毛主席。華國鋒滾下臺後，他同陳永貴同志閒談時說：實際上江青他們沒有搞陰謀，如真搞陰謀，我們也搞不過他們。誰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這 30 年的歷史，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還是那夥走資派。

2010 年 4 月 16 日，署名“國旗”同志發表文章《還原崇高》一文的前言，讓那些靠造謠、人身攻擊的走資派、文痞們看看他們所取得的“成果”：“那段時間，報紙屢載宋美齡的消息，100 歲還去美容，做拉皮，照片也笑眯眯的；宋美齡 105 歲逝世以後，各種畫傳充斥書店，紀念這位協助蔣介石屠殺中國人民、屠殺中國共產黨人的美女；江青被判刑以後，卻被無恥文人任意侮辱、任意敗壞其人格，這人間世界不是喪盡天良了麼？”“那些無恥的文章，因為是連篇累牘，我曾經相信過江青就是那些文章中所罵的禿子，……，就是謀害毛主席搶班奪權的女人。那些無恥文人的無恥行為，天理難容”，“網上有文章說宋慶齡罵江青‘無恥的婊子’，這等無恥下流的語

言絕不會出自偉大的宋慶齡，是那些‘無恥的婊子’假藉宋慶齡之名在辱罵江青，那些‘無恥的婊子’在辱罵江青的同時，也玷污了宋慶齡的偉大品格。有著人類高尚靈魂，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仍然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宋慶齡，絕不會像那些‘無恥的婊子文人’一樣無恥”，“在那些鋪天蓋地的醜惡文章的影響下，我相信過那些罪惡謠言，我也曾詛咒過江青，憎恨過江青——因為她丟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臉”，“我曾經尤其憎恨江青忘恩負義。後來得知，江青在全國解放以後，通過組織關係把那位曾幫助過她的善良的保姆秦桂貞，安排在中南海幼稚園工作，秦桂貞因不適應北方生活，要求調回上海。江青被侮辱的忘恩負義的形象，頓時變得崇高了起來”，“在讀過許多親歷者的文章之後，我發現，是那些無恥的造謠文章欺騙了我。是那些無恥文人，把所有能搞臭一個女人的謠言污水全潑向江青，使人們相信了他們的無恥謠言都是鐵一樣的事實，那些無恥的婊子們、那些無恥的政治流氓們創造了世界上最無恥的造謠紀錄。社會上那些辱罵江青的無恥的婊子們，那些無恥的政治流氓們，沒有一個能像江青一樣對勞動人民有那麼深的感情，並為之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直至生命。”這位元作者用這段文字，足以揭露走資派、文痞們靠造謠、人身攻擊，最後的結果，只能是造謠者自己身敗名裂。這說明，靠造謠混日子，雖有效，但有限。一旦被截穿，曾被欺騙的反戈一擊，其能量遠超過造謠者。這從牛頓力學也解釋得通：長期積累的勢能，一旦釋放為動能，將是爆發性的。

#### 4) 質疑對江青同志等審判的合法性

隨著人們的覺醒，根據憲法規定，人民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有權利提出質疑。對被審判人的問題，有權進行辯護。

東方盼紅同志最近（2011年5月）在互聯網發文《審判“四人幫”居然使用法律錯誤？》。文章說：“昨天，群裏的網友發了鳳凰網的一個視頻鏈結，題目為《中國記憶：‘四人幫’公審記憶》，是對當年（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經參加林彪‘四人幫’反黨反革命集團審理工作的法官王文正先生的人物訪談記錄。整個視頻大約20多分鐘，因此我只是隨便拉動滑動條看了一下。當王文正談到王洪文到湖南長沙告狀一節時說：王洪文當時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儘管他在毛主席面前狀告鄧小平、周總理，就是想搞到（倒）小平同志，思想極其惡劣，但這是符合組織原則的，王洪文通過合法途徑達到他的目的，並不形成罪責。但當時公安部起訴王洪文的罪證就是只有這一條。王文正還說，這一點在國外媒體都引起巨大反響，人家說共產黨就只能以這麼一個形式搞王洪文，這引起了很大的被動。而且當時在北京的各省省長們的意見也不統一。後來小平同志找彭真同志說，你們這麼多法律專家，難道就找不到四人幫的罪名嗎？（本人引用的是王文正說話的大致意思。可能王文正老先生的實際表述與本人的引述有所差異，請王文正老先生見諒）。於是，這些法律專家們就想到了我國的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刑法不正好可以用來定‘四人幫的罪嗎？’”看到這裏，我不覺大吃一驚，原來給四人幫定的罪竟然是按1979年

刑法定的”。“於是我從網上找到了‘四人幫’的判決書，果然如此：‘……被告人江青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98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92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102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238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版，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佈，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第一篇總則第九條明文規定：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衆所周知，‘四人幫’是1976年10月6日被粉碎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在當時就已經被‘隔離審查’，其行為是發生在1979年刑法正式生效日也就是1980年1月1日之前的，根據該刑法，‘四人幫’的行為如果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他們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責任。”換句話說，如果當時的法律、法令、政策沒有認為‘四人幫’是犯罪的，那麼‘四人幫’應該是無罪的；……”。

從以上這段文字可見，他們叫喊的“依法治國”原來如此，只是把我這類法盲騙了 30 多年。

伴隨如此揭批“四人幫”，全國各個角落同時進行所謂清查“三種人”。據近幾年各地揭發的材料看，尤其是被清查的重災區，例如中央直屬單位、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四川、浙江、福建等等省市，走資派、反動官僚打著“清查”的黑旗，對堅決回應毛主席、黨中央號召積極參加“文革”的捍衛社會主義江山的一大批幹部、解放軍指戰員、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等，進行打擊報復、反攻倒算。製造的冤、假、錯案之多，包括打擊報復的殘暴法西斯手段都創了古今中外之最。

高炬同志在我發表的《文革期間周總理談江青同志》一文發表評論文章“轉：‘工言’一文及《展望》三篇附文”，現全文抄錄其中三個附文如下：

附文 1：杭州處決 17 名“極端不滿華國鋒領導的黨中央”的政治集團成員。人大開幕日宣佈，也算湊熱鬧，據法新社二月二十六日北京電，據杭州市公安局張貼的告示，杭州十三個“反革命政治集團”已被解散，它們的八名頭目已被處決。該告示說，這些反革命集團共有 32 名成員。被處決的 8 人，其姓名均用紅墨水劃上交叉，這表示他們被判刑後立即處決。其他的“反革命分子”均被判處重刑。被處決者中，年紀最大為 52 歲，5 名由 21 至 28 歲，1 名 38 歲，最後一名 31 歲。其中一個集團，成員大部分不足 30 歲。它被指控“以政治綱領組織反革命活動”，並企圖散發“宣傳品，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這份張貼在杭州數區的告示說，這個集團的成員“極端不滿華國鋒主席領導的黨中央”。（香港《展望》雜誌 1978 年 3 月 16 日號，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附文 2：武漢處決四人幫。武漢消息，1977 年 11 月 28 日下午，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委會召開全省揭批控訴“四人幫”及其湖北的黑幹將罪行的廣播大會。大會控訴四人幫在湖北省的四人黑幹將，他們是在湖北的幫派體系掛帥人物、前臺總指揮、狗頭軍師和善於投機鑽營反革命兩面派。大會有武漢部隊司令員楊得志，第一政治委員王平，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陳丕顯，省委書記張玉華、顧大椿等黨軍政領導幹部出席。群衆六萬人參加。武漢部隊副政委兼湖北省委書記張玉華主持。省委書記顧大椿在大會上“代表省委宣佈：經省委報請華主席、黨中央批准，對四人幫在湖北的這四個黑幹將的處理決定。”王平在講話中首先表示處理“四人幫”的決定就是槍斃他們。處決這四個黑幹將將“大快人心，大快軍心，好得很！”“我們武漢部隊全體指戰員堅決支持”。（香港《展望》雜誌 1978 年 1 月 16 日號，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附文 3：大治聲中，大開殺戒。據合衆國際社倫敦 1977 年 10 月 30 日電：《星期日電訊報》星期日稱，在華國鋒主席的整肅毛澤東遺孀的擁護者中，處決浪潮正橫掃中國，今年的處決總數當以千計。該報駐北京記者維德的消息稱，最近雲南省已處決數十人，其中且有婦女。該消息引述黑龍江省高級官員

之言稱，昔日受江青及四人幫保護的分子，已經處死。又謂近日中國全國外國遊客，獲睹各城市的處決通告，幾已司空見慣。遊客稱，在雲南省會昆明的名單中，許多名字，是被控有反革命活動，或組成反革命團體。消息又稱，從外國分析家所得的證據推想，今年中國全國處決的總數一定會達數千。據路透社北京 1977 年 10 月 31 日電：在雲南昆明市，人民法院的通告透露，至少有 23 人由於政治罪行而被處決。直至今日，除了昆明外，全國另 12 個城市都有處決反革命分子的事件。今年三月，在四人幫權力基地的上海，曾經處決 26 人，另外有 27 人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中共黨政領袖最近曾屢次號召消滅“四人幫”的餘毒。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早在 8 月份就曾經表示，必須將批鬥“四人幫”的運動進行到底。（參見香港《展望》雜誌 1977 年 11 月 16 日號，中國文革研究網掃校）。

以上就是被宣稱為“撥亂反正”、“沒有階級、階級鬥爭”，而攻擊毛主席“個人崇拜”、“獨裁”，那段最熱鬧時期中華大地“和諧”歷史的一角。清查“三種人”，全國殺害多少無辜人民，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至今未見官方公佈統計數字，歷史終將會把這筆血債清算清楚。

## 2、聶核心打擊報復迫害幹部的罪行

聶榮臻大抓“反林副主席、反林副主席最親密的戰

友聶榮臻的‘國防口5·16’的陰謀徹底被粉碎以後，中央逮捕了聶榮臻的兩員幹將王秉璋和梁軍，即林彪死黨。在聶榮臻等右派政變後，很快把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批判、審查的聶榮臻的幹將張愛萍抬了出來，官復原職。張愛萍全力以赴為其後臺老闆聶榮臻對“文革”進行反攻倒算。

聶榮臻的夥伴葉劍英（註：科委一些老幹部稱葉、聶穿連襠褲）利用科委、七機部向中央彙報揭批“四人幫”情況，信口雌黃：說什麼科委有一個“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小幫派”。主子一聲令下，奴才張愛萍立馬由住解放軍總醫院的“重病號”，一下精神抖擻，回科委主持工作，把葉劍英的信口雌黃奉為“聖旨”，並創造性發揮為“科委有個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本來常委討論葉劍英的講話“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小幫派”時，常委委員李光軍就提出：“小幫派”是不是屬於內部矛盾？張愛萍把葉劍英的話篡改為“‘四人幫’小幫派”，即成了“敵我矛盾”。這一過程，足以說明他們是先定性，而後編造“罪狀”。這就是攻擊“文革”隨便捏造罪狀“迫害老幹部”的張愛萍們幹的。

從張愛萍製造“天大的冤案”迫害知其嚴重罪行底細的同志的全過程，再聯繫劉、鄧主導的“前文革”50多天，在26所高等院校殘酷迫害一萬多師生的慘案，和上述他們在“後文革”清查“四人幫的‘三種人’”，加上他們在文革期間破壞文革而製造的打、砸、搶血案，就能清晰地分辨清楚，到底是誰憑空捏造罪狀，蓄意迫害革命老中青幹部、解放軍指戰員、革命知識份子、人

民群衆……；也就能看清葉劍英胡謔的“文化大革命發生的 10 年期間，整了 1 億人，死了 2000 萬人”是個什麼玩意；也就能看清這夥蓄意嫁禍栽贓誣陷毛主席的走資派們的叛徒嘴臉。

### 1) 李敏同志因揭發張愛萍私造核彈頭而遭迫害

孔淑靜著《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一書指出：“1975 年，……某主要領導人（註：原稿為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當時中央有關部門審核時，不讓點張愛萍的名），要……搞核彈頭。李敏聽說這件事後，因為正在青島養病，就讓哥哥（註：孔令華，李敏同志的愛人）及時報告鄧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說：“這事我不知道，軍委也不知道，要查。”小平同志還說：“要李敏好好養病，回來後讓她到我這裏來，有我在，以後江青不敢整你們了。”（參見海南出版社《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第 165 至 166 頁）。該書出版經中組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審查批准；書名由當時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題寫。

張愛萍多次密謀後，還親自佈置人員落實實施生產核彈頭。後來，張愛萍把有嚴重心臟病的某同志（即張派他去落實生產核彈頭的），打成“李敏‘四人幫’小幫派骨幹分子”，關進張愛萍私造的監獄進行迫害，企圖殺人滅口。

《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一書指出：“僅舉幾例，(1)、作家文摘 1993 年 1 月 1 日創刊號《悲劇式的人物李敏》；(2)、1993 年 6 月出版的《紅色貴族》一書，頭篇文章是《‘第一公主’的悲劇——毛主席的女兒李敏》；”(3)、“《北京晚報》1996 年 1 月 19 日第 11 版特約連載李鳴生寫的

《走出地球村》一文中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指名道姓對李敏進行造謠、誹謗。還特意點出是毛主席的女兒，蓄意給毛主席抹黑，造成極壞的影響，好多瞭解事實的人看到《北京晚報》這篇報導很氣憤。為聲張正義，我們親屬曾給當時還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尉建行同志寫信反映，尉建行同志很重視，還批了要《北京晚報》認真查處”。（參見《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第 163 頁）。

《我的父親毛澤東》一書指出：“曾與她（即李敏）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的革命造反戰友們，有的紛紛作鳥獸散，有的在清查交代說清楚時，痛快地供認他們的‘黑後臺’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人李敏同志’，說是她向他們傳達了‘最高指示’，才幹下了那麼多‘暴行’的”、“別的單位揭批查的目標是‘王、張、江、姚四人幫’，她所在的單位批判的物件卻是‘王、張、江、姚、李’。李即李敏也！（以上均引自《紅色貴族》一書）”。“但像《紅色貴族》一書中寫的那些話，恐怕就不只是針對我個人了。這樣寫的目的，不只是對我個人的辱罵和人身攻擊，恐怕是藉攻擊我之筆，想繼續燃起那般早已被黨中央否定了的批判毛澤東、否定毛澤東的餘火吧”！“對於我個人而言，說我什麼話……，都無所謂。因為我就是我，我就是一個普通公民，一個普通的軍隊幹部，無關於黨和國家大局，無損於黨和人民的利益”、“歷史是昨天，歷史是過去，過去的歷史自有公論”、“人們所以這樣關心我，是因為我的爸爸是毛澤東，是因為我是毛澤東的女兒”。（以上參見李敏著、遼寧人民出版社《我的父親毛澤東》第 377 至 379 頁）。李敏同志被迫害得精

神失常，後余秋里同志把她調總政而脫離了聶核心的虎口，送安定醫院治療一年半，為毛家減少了一位烈士。

孔令華同志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孔令華同志從38軍調到北京衛戍區後，因受李敏同志委託向鄧小平揭發了張愛萍私造核彈頭之事，衛戍區既不讓他工作、也不讓轉業。老孔的父親孔從洲（西安事變立了顯赫功績，解放後任炮兵司令）托人想把老孔調解放軍政治學院工作，遭政治學院拒絕。孔淑靜同志最後直接去找了習仲勳同志，習仲勳同志說：怎麼毛主席的女婿都不給出路？何況令華還德才兼備。由習仲勳同志批示，讓老孔脫離了衛戍區，轉業回北京航空學院，並評定了教授職稱，最後支持他到深圳開了個公司。老孔把掙的錢，全用在出版毛主席的文獻，並準備在廣州設毛主席紀念館，為此事應廣州之邀去廣州商談此事，在返回深圳途中因車禍住院，由於醫療事故而早逝。北航為老孔舉行的追悼會的悼詞中，嚴詞譴責了對孔令華同志生前的迫害。孔從洲革命老前輩最後對他女兒孔淑靜同志說：你哥哥要不是受牽連，也不會是這個樣！詳細內容參見孔淑靜著《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一書。聶核心對“文革”反攻倒算，株連李敏同志的愛人情況，是典型的滅九族。其他被迫害同志的親友遭株連的慘況就可想而知。我本人不僅妻、兒都遭株連，所有親屬、甚至同學都遭株連。

## 2) 張愛萍憑空捏造假案迫害同志

張愛萍憑空捏造了“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這一假案，用高壓、升官等手段誘使一些處、團以上幹部編織“罪狀”，迫害知道張愛萍嚴重問題的

二十六位同志，從而達到他掩蓋密謀私造核武器圖謀不軌，以及他非法搜集攻擊和誹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等嚴重罪行。

張愛萍私造監獄，非法關押八位同志，把他們打成“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骨幹分子’”。被非法關押的八位同志是：司令部的葉某某（司令部領導小組副組長）、魏某（一局局長）、張某某（陶魯筭同志的秘書，已含冤去世）；政治部的劉某某（幹部部調配科長）、尹某某（幹部部幹事）；後勤部的常某某（後勤部領導小組副組長，已含冤去世）、尹某某（後勤部政治部宣傳幹事）；情報所的惲某某。被迫害含冤去世的還有後勤部副部長王某某、司令部領導小組副組長薛某某、政治部組織部長吳某某、保衛部副部長楊某某、情報所原黨委書記鞠芳同志等。

我很尊重李敏同志，因為她是毛主席的親骨肉；但我們間無任何私人交往，更談不上搞“陰謀活動”。然而張愛萍指使其心腹常勇、劉毅民等人，憑空捏造了一大堆“滔天大罪”：

(1) “惲仁祥與陶魯筭、李敏及其‘小幫派’，整死了肖向榮同志”（註：原科委副政委，因病長期住院治療無效病故）；

(2) “惲仁祥同李敏合謀，向毛主席寫誣告信”、“惲仁祥與陶魯筭、李敏合謀，製造了聳人聽聞的政治誣陷案”（註：均指張愛萍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下面介紹真相）；

(3) “惲仁祥同李敏合謀指使鞠芳同志寫大字報批張愛萍”（註：李敏至今未到過情報所）；

(4) “(惲仁祥) 態度惡劣，負隅頑抗，同李敏訂立‘攻守同盟’”。

(註：以上材料選自“1977年國防科委政治部編《內部文件》第14頁”)。

他們把這份《內部文件》上報中央、下發各下屬單位，製造混亂，蠱惑人心。並流傳到社會，煽動了一股反毛、非毛妖風，造成的社會後果十分惡劣。上述李敏和孔淑靜兩位同志分別在著的書中揭發的僅是很小一部分，當時《北京晚報》連載了張愛萍捏造的李敏的“問題”，藉此惡毒攻擊毛主席。孔淑靜同志報告了當時北京市領導尉健行同志，尉批示嚴肅查處。但有關部門並未查處此事。張愛萍、常勇、劉毅民等人，捏造的這些“罪狀”，已遠超出了對陶、李、惲三位同志迫害的範圍，其用心十分險惡，反革命目的昭然若揭。決不能坐視聽任這夥惡棍逃脫黨紀、國法嚴懲。

張愛萍編造這些“罪狀”主要目的，明顯是殺人滅口，並為聶榮臻解對炮轟聶榮臻派心頭之恨。在科委召開的一千多群衆大會上，宣讀了這些“罪狀”後，並宣佈對我撤職、停止黨的生活，當場把我押赴張愛萍專門私造的監獄，配一個排的武裝看押，搞白色恐怖，企圖把我作為他迫害陶魯筭同志、李敏同志的突破口。張愛萍無合法手續，非法關押在任的全國人大代表，無視人大代表人身自由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同我被一道關押的還有政治部尹某同志，就因為他住在李敏同志對門，張愛萍怕他同李敏同志“通風報信”，把他定為“以李敏為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骨幹分子’”，關進張愛萍私

造的監獄。這些充分暴露了這夥走資派為了打擊報復，鎮壓群衆，捏造罪名到了何等瘋狂的程度，又是何等的無恥卑鄙。

上述“罪狀”，後經組織核實，除張愛萍搜集黑材料問題，屬於張愛萍對我們栽贓、誣陷外，其餘三條“罪狀”均屬莫須有，嚴重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關於他們捏造“整死了肖向榮同志”的問題。我以前不認識肖向榮同志，他調來科委時，我由科委派往三線某單位任工作組組長。他長期住院，我們從未見過面。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揭批張愛萍的兩委擴大會，科委的代表分三個大組，司令部、後勤部各成立一個，政治部和情報所以及 507 所為一個大組，我和吳風翔同志任召集人。一次我主持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突然來了一位老年軍人，吳風翔同志看出我不認識他，馬上向我介紹肖副政委來了。我馬上讓座，並倒了杯開水端了給他。他坐下後，有的同志提議：請肖副政委講講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體會，給大家啟發啟發。他一直講到下班，約講了 40 來分鐘。我和吳風翔同志一邊一個，扶著他把他送上電梯。會上，我沒有講一句話，陶魯筩和李敏也沒有參加這次會議。這就是我一輩子唯一一次見到他，唯一一次聽他發言。這以後十多天，通知說肖向榮同志去世了，讓大家去向遺體告別。編造出我們“整死了肖向榮”這樣的謠言，我只能說張愛萍們卑鄙無恥之極！可這夥人，還賣他們的“老資格”，還喋喋不休地辱罵“文革”、造反派“迫害老幹部”、知識份子……，直到斷了氣去見了赫魯曉夫為止。

據近幾年瞭解，陶魯笳同志見肖向榮同志到兩委擴大會，勸阻他不要來，好好養病。保健醫生專門寫信給陶魯笳同志，說：關於肖向榮同志，你（指陶）一再囑咐讓肖好好治療，說你“迫害”肖向榮太冤枉，不符事實。李敏同志和肖向榮同志關係很好，李敏同志說肖向榮同志很尊重毛主席；肖向榮同志住院期間李敏同志還曾去醫院探望。再則，陶、李、惲三人從未有過在一起商談那怕是閒談的事。因此，科委和情報所兩級紀檢委研究我的問題，除張愛萍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張愛萍對陶、李、惲三人栽贓、誣陷外，其餘三條“罪狀”完全是憑空捏造。現將當時所黨委書記向我傳達兩級紀檢委研究的結論，公佈如下：

### 所黨委、紀委書記趙玉山同志的談話紀要

時間：1981年9月19日下午2時至6時。

地點：趙的辦公室

下午一上班，所辦公室王荷珍同志通知我：趙政委找你去他辦公室。

趙說：今天找你來談談關於你的問題，我以前沒有插手過。那次我和所紀委其他同志找你談話以前，我不認識你，所以你到會議室，我還不知道你就是惲仁祥同志。（註：所紀委聽取我陳述意見，我先到會議室等候，人都到了一段時間後，趙問：惲仁祥同志來沒有？我當即站起來作了自我介紹。他說：喔，我一直把一高高的同志認為是你）。上次（指

9月9日至10日)我們專門聽了八小時的陳述(註：兩個半天)，我做了詳細記錄，耐心聽取了你的意見。原本上面(指國防科委)只讓我們在他們交給我們的材料(即處理決定)上蓋個(公)章，報上去，另外發一個處理你的通報，沒有叫聽取你的申述意見；我們認為應當聽聽你的申述。聽完後，我們沒有說你態度不好。接著我們聽取了“專案組”(註：實際是左朝彬、鍾柏林兩人)的意見，也是八小時，那八小時可以說是聽取意見，也可以說是辯論。雙方意見聽完後，我們紀檢委幾位同志坐下來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和作了必要的調查核實，提出了我們的看法，並向科委紀檢委作了彙報。是唐延傑(科委副主任、紀委書記)、徐平(科委政治部主任)兩位領導聽取我們的彙報。今天找你來談談這個問題，我下面講的，有許多是我們彙報時的原話。關於你給江青的信的問題，我們又反覆研究了你給江青的信，提出了我們的看法：你的信大致有四層意思，一是你說林彪反黨集團把你當作“國防口5·16組織部長”整，事實上把你關了幾個月，這是事實，因此不能算是誣告；第二層意思是說批林批孔的學習材料不夠，事實是你寫信以後，所裏印發了人手一份，因此這談不上誣告；第三層意思是所裏批林批孔搞不起來，這個問題中央已明確了，批林是“四人幫”包下來了，沒有搞好，因此也不能說是誣告；第四層意思是表示批林批孔的決心，那不能說是誣告。因此，那封信屬一般反映情況的信，不能算是

問題，我明確對你講，那封信的問題不要你檢討。你上次陳述時講到《人民日報》1978年底，發表的評論員文章，我也看過，總之，你給江青的信不再作為一個問題。

趙接著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張愛萍同志佈置劉毅民同志搜集的材料問題，你向上級黨組織報告這件事，沒有問題。我們在向科委領導彙報時就講，如果今後你們哪位領導同志佈置搜集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我要向組織報告了就處分我，那行嗎？而且劉毅民揭發張愛萍同志倒沒有問題，而惲仁祥一揭發就要處分他，這在道理上講不過去。關於你在國防科委中型常委擴大會上的發言，我們查了所黨的核心組（會議）記錄，上面明明寫著是劉毅民主持所黨的核心組討論通過的，劉毅民首先發言贊同那個材料（註：劉多次修改過）。核心組討論通過的東西，不能作為對你作結論的依據。

趙：我們彙報後，唐副主任表示說：原則上同意你們的意見。因為唐延傑副主任表了態，所以才找你來談談，你看還有些什麼想法？

惲：對於我，就這兩件事，你們能這樣認真負責地進行調查、核實、研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我表示支持。但常勇不是這樣，他聯合劉毅民搞假案……

趙（打斷我講下去）：這些你上次已講了，再講我也不聽了。

惲：關於我的入黨問題說成“突擊入黨”不符

事實，我是1970年林彪集團誣陷我是“5·16”時申請入黨的，同江青給我回信毫不相干。林彪垮臺後，劉毅民四年關門不發展黨員，目的是什麼？……

趙：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查了你們支部記錄，支部有發展計畫，並幾次支部研究你入黨問題，並多次找你談話，這都是在江青給你復信之前。因此，你的入黨手續是完備的，不能算“突擊入黨”。

趙：時間也不早了，我看你是不是坐下來認真總結一下文化大革命中的經驗、教訓。對自己、對別人都有好處。

惲：問題沒有了，總結經驗、教訓是應該的。問題清了，我想先休假回老家看看我老母親。事情沒搞清前，我不會提出休假，以免誤解。

趙：休假一下散散心也好。（我休假一個月）。

### 3) 張愛萍為掩蓋自己罪行而栽贓陷害他人

張愛萍們捏造的上述第二條“罪行”：“惲仁祥同李敏合謀，向毛主席寫誣告信”，“惲仁祥與陶魯笳、李敏合謀，製造了聳人聽聞的政治誣陷案”。

這個案子的真相是：張愛萍背了科委常委，濫用職權，電話指使劉毅民從進口反動報、刊搜集我們報紙上沒有公開發表的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註：軍委成立情報所，明文禁止搜集政治方面的情報）；劉毅民背了黨組，私自組織十幾名四種語種的翻譯，加班加點突擊搜集了內容十分反動，攻擊、誹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加班譯成中文，並電話向張愛萍作了彙報；張愛萍的秘書接的電話，張愛萍看了電話記錄，親筆在

電話記錄稿上作了批示；劉毅民接到電話記錄，按張的批示，批給丁某某（所核心組成員，組織搜集材料的重要成員，下面的丁某某均指他）；一次黨組會議上，劉毅民、丁某某突然在會上揭發張愛萍這件事，本人勸阻了他們，丁某某離開會場回辦公室打電話給科委政治部揭發張愛萍。劉毅民加班寫揭發張愛萍的材料，於第二天，背了黨組，由丁某某直接報送科委（包括那份有張親筆批示的電話記錄）；科委報中央後，陳錫聯、華國鋒作了查清後報中央的批示；科委根據批示，清查了這件事，並給中央寫了調查報告。事情的本來面目就這樣清清楚楚。

中央右派政變後，就不知劉毅民、丁某某是為了什麼，開始把他們揭發張愛萍（內容下面介紹）嫁接到本人頭上，後來張愛萍派來常勇為組長的“工作組”，而同劉毅民等人一道策劃捏造為上述涉及陶魯筭、李敏和本人三人的“罪狀”：“惲仁祥同李敏合謀，向毛主席寫誣告信”，“惲仁祥與陶魯筭、李敏合謀，製造了聳人聽聞的政治誣陷案”。

劉毅民在江青同志等被綁架後，篡奪了所政治運動的領導權，目的很清楚，其一是要掩蓋他涉及的誣告彭德懷等的問題；其二是要把他們揭發張愛萍的問題做手腳。但是，在1976年上半年，丁某某貼了一張很長的萬言大字報揭發張愛萍這事，基本上如實向全所公開了這件事的全過程。因此要180度大轉換，栽贓給我，難度很大。所以丁某某主筆的《惲仁祥同志是如何製造一樁聳人聽聞的政治迫害案的！……關於張愛萍同志佈置劉毅民同志找所謂中央領導同志材料問題》長篇萬言大字報，

在劉毅民控制的“揭批‘四人幫’《情況反映》第十三期”，成了發表丁某某這篇萬言大字報的專刊，其內容就無法避開先前那張批張愛萍的大字報的一些事實。正是劉毅民篡奪政治運動領導權後，親自把持的所“揭批‘四人幫’《情況反映》第十三期”，已足以澄清張愛萍搜集黑材料的事實真相。其可信度無疑比我抄其他材料的高。我們所的《情況反映》，每期都上報科委，科委認為內容好，還摘報中央。以下內容全部選自《情況反映》第十三期，就不註釋了（其中表有“註”字樣的，為本人解釋，另外，標題為本人加的）。

### （1）張愛萍電話佈置劉毅民搜集中央領導的材料

劉毅民：1975年9月18日下午三時前後，張愛萍在電話中對我說：“你們那裏不是訂有香港和國外報刊？據說你們那裏的資料中，有我黨中央領導人對外國記者談話的報導和評論，你查一下，送到我這裏來。”我問屬於哪方面的？他又說：“就是我黨中央領導同志與外國記者談話的報導、評論，我們報紙上沒有發表的，已發表過的不要，屬這方面的材料都給我送來。”最後還說：注意不要擴散。

丁某某：“劉毅民對我說：張主任要我們查一下國外報紙中有關我中央領導同志與外賓的談話的報導。不是公開報導的內容，查了後送給他”，“並要我找幾個文種的翻譯來，他親自佈置。根據劉的指示，我先後通知了三處領導和辦公室教研組。到會的包括劉同我共八個人。劉毅民同志親自給大家佈置任務，講的內容同跟我講的差不多。由於講的很簡單，

當時就有人提出任務不明確，有的提像鄧小平在宴會上的講話要不要，劉說，公開宴會上講話就不要了”，“關於這件事，張愛萍先有一個電話指示，後有一個書面批示。兩次都沒有講明查什麼人的材料”。

## (2) 張愛萍搜集了黑材料的物證

《情況反映》第八頁整頁為電話記錄全文，其中張愛萍親筆批示用手寫模擬張的筆跡可亂真，這裏只能改為打字，特此說明。現全文抄錄如下：

劉毅民同志電話報告：

遵首長指示，找了《紐約時報》的幾篇文章（目錄附後）。這些文章內容是對我政策、領導人和領導人的變動。主席、總理對外賓談話的評論、分析。以及訪問中國隨筆。其中有許多對我歪曲、污衊的話。現只有七月廿日以前的報紙。七月廿日以後的未到。且星期日報紙我們沒有訂購。故現找到的不一定是所要查的內容，如以後查到再報。

目錄：

- 1、《北京的哲學》五月廿日
- 2、《中國領導人逐漸採取向外看的政策》五日
- 3、《新中國》訪問中國七月三日
- 4、《老兵在北京掌舵的不多了》四月九日

(張愛萍秘書) 邱景春(簽字)

21/9。

張愛萍親筆批示：

劉並資料所諸同志：據說你們那裏的資料中有我黨中央某領導同志對外國記者個人談話摘報。如

無就算了。以後如有請（送）我，切勿他傳。

這幾篇（註：他用箭頭括了目錄中四篇文章）如已譯出請（送）我，未譯出就算了。（註：他在《紐約時報》下面畫了一杠，批道：是否還有其他報）。

張愛萍（簽字）22/9

以下是《情況反映》對搜集到的材料及譯成中文等情況：

劉毅民：1975年9月21日下午，向張愛萍的秘書彙報了四篇文章的來源和題目，及“主要內容是對我政策、領導人和領導人的變動。主席、總理對外賓談話的評論、分析。以及訪問中國隨筆。其中有許多對我歪曲、污衊的話”。對此張愛萍作了批示。

丁某某：“有評論我四屆人大的內容”、“有沒有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談話”、“有江青的一張像”、“一條矛頭指向毛主席的反（動）標（語）……”、“一共查到了六篇文章”、“都摘譯成了中文”（註：所謂摘譯，就是反標沒有直譯，而是加了說明）、“對六篇文章的處理是有缺點的……，不應該接收，不應該摘譯，不應該向張愛萍報告”。

### （3）劉毅民、丁某某揭發張愛萍

丁某某：“（1975年）12月17日，核心小組全體成員，聽取了23、24、26號文件傳達……。我當時感到張愛萍調查的這件事也有問題，於是我在當天下午核心小組會上，我準備揭發此事。然而當我剛要說這件事時，惲仁祥同志打斷我（發言），不讓我繼續說下去（註：他當即離開會場，回辦公室打電話

給科委政治部揭發張愛萍）。第二天下午，我將劉毅民同志（寫）的揭發材料（包括電話記錄）送給了科委領導”。

註：以上均選自情報所“揭批‘四人幫’《情況反映》第十三期”。

#### (4) 中央領導批示

註：可能由於周總理去世，科委過了一些時間把劉毅民、丁某某揭發張愛萍的材料上報中央，中央領導作了批示：

建議：國防科委追查清楚

陳錫聯（簽字）1976.3.8.

查清後報中央

華國鋒（簽字）

陶魯笳同志：請按國鋒同志批示辦。組織清查核實清楚並向中央寫一報告。

陳錫聯（簽字）3.24.

#### 4) 科委給中央的調查報告

註：科委按上述中央領導批示，組織了調查組，進行了調查，並給中央寫了調查報告。現將調查報告摘抄如下：

黨中央：

遵照中央領導同志的指示，我們組織專人對張愛萍從外國報刊上搜集黨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問題進行了調查核實，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一、根據劉毅民（科委情報所政委、黨的核心小組組長）、丁某某（註：原材料為真實姓名，參謀、

核心組成員)等同志證明：1975年9月18日15時左右，張愛萍親自打電話給劉毅民同志講：“你們那裏不是訂有香港和國外報刊？據說你們那裏的資料中，有我黨中央領導人對外國記者談話的報導和評論，你查一下，送到我這裏來”。劉當時對其意圖沒有領會，反問張“屬於哪方面的？”張又講：“就是我黨中央領導同志與外國記者談話的報導、評論，我們報紙上沒有發表的，已發表過的不要，屬這方面的材料都給我送來”。最後還囑咐劉說：“注意不要擴散”。劉毅民同志接電話後，背了該所黨的核心小組，向有關業務部門的負責同志和日、英、德、法四種文種的15名翻譯人員作了佈置，其中六人進行了抵制，有九人按照張愛萍的要求進行了搜集。先後從1975年日文《外交時報》上搜集了一篇，從1975年美國《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紐約時報》上搜集了七篇，江青同志照片一張。七篇英文材料中有兩篇翻譯人員當時未交出來。搜集提供出來的共六篇日、英文字材料的內容十分反動，對我黨的方針、政策，黨和國家領導人和領導人的變動，有許多歪曲、誣衊的報導，還有直接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極其惡毒的語言。9月21日下午，劉毅民同志將搜集的情況和從《紐約時報》上搜集到的四篇材料的題目、主要內容，打電話報告了張愛萍的秘書，請他轉告張愛萍。張看了劉毅民同志報告的電話記錄後，於9月22日批示：“劉並資料所諸同志：據說你們那裏的資料中有我黨中央某領導同志對外國記者個人談

話摘報。如無就算了。以後如有請送我，切勿他傳”、“這幾篇，如已譯出請（送）我，未譯出，就算了。”

劉毅民同志接此批示後，於9月23日又批給所有關同志閱，並要求“今後發現這類資料及時報來，以報張主任”。此後至10月24日張愛萍離京去二十一基地前這段時間，張愛萍對劉毅民同志還有什麼佈置？劉是否把搜集到的材料送給張看過？尚未完全弄清。

二、4月14日下午，常委派人將此問題和張見了面……。

三、根據調查情況，經我們常委研究，一致認為，有充分人證、物證，張愛萍確實親自佈置從外刊上搜集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此事已在情報所造成惡劣影響……。

以上報告，當否？請批示。

國防科委黨委常委（黨委章）

1976年4月19日

附：1、張愛萍在劉毅民同志電話報告記錄上的批示影本

2、劉毅民等六位同志的證明材料（摘要）

3、張愛萍交代材料

註：以上材料摘抄自科委調查組手抄件。

懂點常識的人都清楚，科委的調查報告，是針對揭發的人揭發的問題和線索進行調查而證明揭發人揭發的是或否，因此報告必須表明揭發人及其揭發的問題。所以調查報告證明了揭發人是劉毅民和丁某某。何況，電

話是打給劉毅民的，張愛萍的批示也是批給劉毅民的，也是劉毅民給張愛萍電話彙報的，這些內容誰能知道？而調查報告全內容，與我和李敏同志不相干；更荒唐的是李敏同志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張愛萍不僅栽贓、誣陷了陶魯筭、李敏和我，還迫害了科委受命于科委常委而進行調查的楊某某、高某某兩位同志。更卑鄙的是，劉毅民揭發了張愛萍，中央領導批示查清楚後，劉毅民幾次到我家裏，要求我召集黨組會議，把他參與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解決一下。我都以無權召開這個會，你是組長又有解決問題的要求，應由你（劉毅民）自己召集，而予拒絕。如果我真召集了會議，後來他可能什麼大帽子都可給我加，我只能說，這夥人太卑鄙了！哪還有點做人的味道，就更不說是共產黨員了！

以上證據，足以說明：“惲仁祥同李敏合謀，向毛主席寫誣告信”、“惲仁祥與陶魯筭、李敏合謀，製造了聳人聽聞的政治誣陷案”，純屬是張愛萍指使常勇、劉毅民等人蓄意製造的栽贓、誣陷、政治迫害案，確實到了聳人聽聞的地步！常勇、劉毅民等人都靠這種惡劣犯罪行為官升幾級，常勇還升為科委政治部主任。

為進一步說明張愛萍們政治上的腐敗，在此補充一案例：

就在劉毅民揭發張愛萍後，劉毅民發現了本所日文翻譯林某某，工作中從日文刊物上看到一條對毛主席的不實報導（大意）：“說毛主席已去世了，現在中南海的不是……”。這位日文翻譯下班回家後對家人講了這一不實報導；其親戚向劉毅民揭發了此事。劉毅民當即把林

某某隔離審查，很快就查清了，劉毅民立即作出決定：“逮捕林某某法辦的決定”；但不久毛主席去世，未逮捕他，不久林某某病故。（註：當時我出差不在所裏）。

這同劉毅民本人等搜集那麼反動的材料，不僅無事、官升幾級，還栽贓陷害了他人，這同他處理日文翻譯林某某的問題一比較：所謂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些什麼貨色？他們幹的，同封建王朝、國民黨反動派還有區別嗎？可笑的是，他們竟還有臉面攻擊“毛主席獨裁”、攻擊文化大革命、攻擊造反派。在毛澤東時代、文革期間、造反派中，能找到如此荒唐無比的案例嗎？

張愛萍們儘管使盡全力，遺憾的是，從被迫害的二十六人中，沒有查出一個人給“四人幫”寫了誣告信、“勸進信”、“效忠信”的；沒有查出一個人同“四人幫”在組織上有聯繫的；更沒有查出有一個人跟了“四人幫”幹了壞事的；也沒有查出一個人受賄或貪污一分錢的。我可以自豪地講，二十多位同志都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老中青中級以上幹部、革命知識份子。事實無情地證明，除張愛萍本人同王洪文勾搭外，另外，鐵的罪證證明：真正參與給康生送了誣告信，誣告彭德懷等老幹部是“蘇修特務”，並私立專案迫害彭德懷等的是張愛萍的心腹劉毅民等人。國防科委迫害那麼多老同志、把科委政治部打成“總政閻王殿黑分店”、踢開黨委鬧革命、搞噴氣式或用籬筐把羅瑞卿抬出來批鬥，都是被稱為“林彪的親密戰友聶榮臻為核心的國防科委黨委”領導偽保隊副“總勤務站”幹的，而都讓張愛萍包庇了。

常勇在“文革”初，在科委 21 試驗基地任政委，為

篡奪司令員的權，策劃武裝武鬥，而被調離部隊，到七機部五院任政委。後七機部不要他，退回科委難安排工作而待命。他一進我們所，七機部副部長曹光琳同志就對我講：“常勇這個人政治品質不好，你要防著點。”還有同志對我講：“文革初期，常勇在二十一基地任政委，想奪司令員的權，挑起了動用武器的武鬥，科委處理不公，一人‘五十大板’，司令員調瀋陽軍區當參謀長，常勇調七機部五院任政委”；還有一個瘦高個兒同志專門找到我對我說：“我是七機部五院政治部的，你是惲仁祥吧？（我答是）。知道常勇到了你們所，你千萬多加提防，夜間千萬別出門，常勇什麼卑鄙事都幹得出來。”他一講完轉身就走，連個姓名都沒有留下。常勇在情報所為運動事，多次拍桌子同他人對著幹；甚至後來張愛萍給他封“官”後，他在科委某單位吹噓在情報所的“戰功”時，當場就有同志站出來指責他：“常勇，你把情報所搞成什麼樣啦？還到這裏擺什麼譜。”搞得他下不了臺。我衷心感謝那些不留姓名而冒險對我的忠告的同志。但是，張愛萍、常勇、劉毅民等人對情報所的破壞，十分嚴重，損失巨大，而且無法挽回。這一切決非聳人聽聞，而是有據可查。

1977年，在張愛萍們迫害我之初，中央軍委辦公廳主要領導同志告誡他們：“惲仁祥的問題中央知道，（毛）主席還有指示。這個人不能搞他，誰搞了要倒楣的。”但聶核心反攻倒算、打擊報復心切，“獨立王國”有自己的“王法”。1978年底，聶核心企圖召開第二次批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大會，打算在這次會上，按聶氏“獨立王國”的“王法”，宣佈對我開除黨籍、開

除軍籍，遣送原籍。會場以及各單位的批判稿均已落實，向中央請示。中央知道情況後，據聽了傳達的同志對我說（大意）：葉劍英說，李敏的問題你們不要管了，有什麼材料可報上來；鄧小平說，快把關了的人放了，否則很被動。就這樣在 1978 年最後一天上午，和我一道被非法關押的八位同志走出了張愛萍私造的監獄。第二次批鬥李敏同志的大會被迫流產。

這之後不久，對張愛萍捏造的“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這一假案，萬里同志代表中央對李敏同志的愛人說：“沒有想到國防科委（註：原內容是國防科委張愛萍）把李敏搞成這個樣子，把李敏同江青四人幫連到一起，根本不合邏輯，這是個天大的冤案。問題一定要解決。我的這些話是我們集體的意見（指中央領導集體意見）”；羅瑞卿同志出任軍委秘書長後，得知情況非常氣憤，表示：“等我從國外治病回來，我親自處理。”（註：遺憾的是，他不幸在德國離開了人世）黃克誠同志任軍委紀委書記時，也非常關心這件事，委託軍委紀委副主任甘渭漢同志和總政副主任朱雲謙同志找科委領導談話，要求他們解決問題。黃克誠同志明確指示：“李敏沒有什麼問題，告訴單位領導，要讓李敏上班工作（註：張愛萍收掉了李敏的出入證，不僅不讓進辦公室，連每月的糧票都不讓去領），恢復組織生活。如有什麼問題，黨委可同李敏當面談嘛！”余秋里同志任總政治部主任時，也非常關心，指出：“看來一下子做不通單位的工作，是不是先調到總政來。”（註：調總政後保護了起來才免遭張愛萍迫害）（以上參見李敏著，遼寧人民出版社《我的

父親毛澤東》第377至379頁)。孔淑靜著《唯實—我的哥哥孔令華》一書中有同樣的文字披露了這些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決定和指示。

但自稱是“鄧小平的‘四條漢子’、‘四大金剛’”的張愛萍(參見《張愛萍在1975》第190、269頁)，無視中央的決定和中央領導同志的一再指示。他專橫跋扈，充當了名符其實的黨霸、黨閥、黨棍。他只執行聶氏“獨立王國”的“王法”，而不服從中央領導。而他們卻要求旁人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對我的處理，成了他一個人說了算的一人專政。我所在黨支部廣大黨員拒不參加討論關於對我處分的支部會議，支部大會沒有開成；用強權迫使所新的黨委在常勇等人編造的處分材料上蓋章，結果所黨委把上述那份張愛萍的罪證(電話記錄)主要內容，加進了常勇們編造對我的處分材料；常勇編造的材料，摘抄了科委常委在上報劉毅民等揭發張愛萍搜集中央領導同志黑材料問題時，要我寫一個旁證材料，以及由劉毅民修改並主持黨組通過的批張愛萍搜集黑材料問題在科委常委擴大會的發言(註：這些問題的結論，參見前面介紹的科委、情報所兩級紀檢委核實所作結論)；情報所新黨委加進了張愛萍同劉毅民間的電話記錄，對我的處分材料就成了張愛萍的犯罪記錄；又因為材料沒有說明我犯了什麼錯誤，科委常委討論時，其他常委無一人發言，張愛萍一人說了算。甚至最後還指名要所黨委書記去彙報“為什麼對惲某某處理不下去”，這些可能是中共史上從未聽說過的奇聞。新所黨委書記趙玉山同志對此極不服氣，回所後到我家裏向我講了這一情況，並告訴我陳

彬副主任不贊同張愛萍一個人對我作處理決定。我聽後對他說：“老趙啊，你調來不久，有些情況你不瞭解。張愛萍這個人非常霸道，在我的問題上，你們主持公道風險很大；我不希望為了我，而連累你們。”他說：“沒有關係，最多就是罷官。”果然不久，趙玉山同志就被“免職”罷了官（註：直到張愛萍調任國防部長，趙通過關係，找了當時的科委政委劉有光，經過疏通，趙被調離情報所，安排了工作）。由常勇調來奪了我們所政治部權的牛某升為黨委書記，情報所成了常勇一統天下。張愛萍還在所謂高級幹部會上講（大意）：舒龍山、惲仁祥、康華清之流……，都應交軍事法庭審判（註：張愛萍的講話，有關同志私下拿出來給我看了全文）。科委保衛部的同志見到我，問我知道張愛萍的講話嗎？我說：不僅知道，還看了全文。他勸我要有個思想準備。我說：我等著開庭，看原告張愛萍到庭作證，我擔心這個庭很難收場。但我堅信，現在是“紅漆衙門八字開，有理無權莫進來”。他說有思想準備就好。因當時科委沒有法院，交總政，總政看了材料說：審判個什麼呀，沒有好審判的。趙玉山同志要我在處分材料上簽字，我理所當然拒簽了，並對他說：“請你把我下面的話，即我的態度原原本本報科委常委，張愛萍依仗權勢打擊報復，但別看他張牙舞爪，他還無權砍了我腦袋，即便砍了，無非碗口大一個疤，沒什麼了不起，張愛萍決不會有好下場。”張愛萍要交軍事法院審判的其餘兩位同志的情況是：舒龍山同志因對張愛萍“整頓七機部”的胡作非為，給毛主席寫信揭發了他。毛主席批示：此人（指舒）是9·16左派。科委在

傳達毛主席的批示大會上，舒龍山同志發言時，不點名批評了葉劍英反對“文革”的問題；另外，整個“文革”期，舒龍山和葉正光兩位同志堅持“炮轟聶榮臻”、並堅持“打倒王秉璋”。聶榮臻是何許人？現在都會有公論，王秉璋是林彪死黨，中央早有結論。但舒龍山同志被葉、聶判了16年徒刑，飽受折磨，出獄不久去世。我同康華清同志都是軍人，總政拒受理，張愛萍的陰謀沒有得逞。張愛萍一人說了算，要把我復員送原籍。當地縣民政有關部門領導一看材料，即說：這是明顯的一起打擊報復案，而且性質嚴重，我們不能接收，而明確拒絕。又改為轉業回原籍，民政部門仍拒收。最後改為退休回原籍，民政局明確表示：退休前一切問題，按中央政策，由原部隊負責，地方僅按政策保證生活、發退休金。我在退休手續上簽了意見：張愛萍仗勢欺人，決沒好下場！就這樣，我49歲中年身體很健康被迫退休，很可能是全軍不多的身體很健康中年退休養起來的“老幹部”。可見，這夥“熱愛、重用”幹部而攻擊“文革”、造反派“迫害幹部”的張愛萍之流，迫害幹部到了如此黔驥技窮的地步，連離、退休也成了他們迫害幹部的手段。全國不知有多少精力旺盛的中、青年幹部遭走資派迫害，剝奪了為人民服務的權利？又給人民建設社會主義造成多大損失？由此，我向中央一再聲明：張愛萍對我所作一切處理，均非法、無效，不僅性質屬於嚴重打擊報復，而且不合組織程式。張愛萍張牙舞爪，叫嚷能“一手通天”的本領，到頭來，不僅科委常委沒一個附和他，就連我所在支部都敢於頂他，地方政府公開警告他：要慎重。他們派人到我愛人

單位（北京糧食學校，現改為經濟管理學校）介紹我的所謂“罪行”。該校的黨委書記（女）找我愛人談話說：真沒想到你愛人這樣一個解放軍單位竟是這個水準，鬧派性鬧到這個地步，你一定要想開些，如有想不通就找我。並很快把我愛人吸收入黨。可見，不管張愛萍打著什麼“一手通天”、鄧小平的“四大金剛、四條漢子”等嚇人旗號，手中無真理，就寸步難行。讓這夥人鬧到了黨無黨紀、國無國法，還能不腐敗嗎？

### 5) 張愛萍私造的監獄

簡要介紹一下我們共八位同志在張愛萍私造的監獄共 17 個月的情況。關押我的那個大會，還有科委政治部一位同志被押送張愛萍的牢房。關他的原因主要是他同李敏同志住同一單元，門對門，怕他同李敏同志“通風報信”，這就是張愛萍整人的“無產階級”政策。我們倆被押送到張愛萍的監獄，已是下午 2 點左右，又是大熱天，兩人到那就睡，一直睡到 5 點左右，獄警把我們叫醒，說：怎麼不吃飯，把你們關了，好像沒有一點心事，反呼呼大睡。我們說：毛主席說，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坐牢是最好的休息。

關我們的牢房，圍牆有 3 米多高，內加鐵絲網，門向東，門旁有一個 50 公分見方的小孔，是給我們送飯的，門和小孔對著獄警崗樓，每間牢房約 8 平方米，一張木板床，一張單人課桌，一把椅子，一個燒水煤球爐，房高約 1.8 米（伸手摸著房頂），牆厚約 50 公分。牢房與崗樓間有一條約  $25 \times 2.5$  米的空地，八名“罪犯”輪流在這空地“放風”，每天 40 分鐘。門上上鎖，上廁所要報告，只能一人上廁所，

嚴防“串供”……。約半年不讓家屬探望，身上凡金屬物件一律交獄警。獄警為一個排的武裝部隊，配備步槍、衝鋒槍等輕武器，崗樓獄警一律步槍上刺刀。請問，張愛萍私造如此戒備森嚴的監獄，是誰授權？當時的科委是不讓設法院的單位。在此，重複一下前面介紹過的問題，即（約 1980 年），張愛萍說：“舒龍山（七機部的）、惲仁祥、康華清都應交軍事法庭審判……”。三人中，其餘二同志均因給毛主席寫了信，反映了張愛萍的問題，毛主席都作了批示，科委向大家作了傳達，這是正大光明公開的事；唯有我是張愛萍之流捏造了我“夥同李敏”“給毛主席寫信”，“誣告”張愛萍……。舒某是地方幹部，被地方法院判了 16 年，康某和我因都是軍人，科委沒有法院，交總政，總政說，有什麼問題，判什麼呀？張愛萍未達到目的。這說明，按照黨章，名正言順給黨的主席寫信反映張愛萍的問題，沒有給主席寫信，但上了張愛萍黑名單的，他們也可以捏造寫了“誣告信”；寫也好、不寫也好，反正都是“犯罪”；然而給張愛萍送小報告、吹耳邊風，張愛萍不是把那些小報告、耳邊風按組織原則批轉給有關部門見見陽光，而是暗箱操作，把被小報告、吹耳邊風誣陷的同志，記在小本子黑名單上，無一不迫害；打小報告的，統統受張愛萍重用提拔，其中常勇、劉毅民之類就是典型。以上這些，就如張愛萍在書中所說：“對這樣政治品質惡劣的、一副諂媚相的奴才，（張愛萍）偏偏還就欣賞，破格提拔重用，官位節節高升。這叫什麼風氣？……，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不是把封建王朝最腐朽的那一套搬到共產黨內來了嗎？”

中國有句古語：“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張愛萍對他私設的監獄，雖制定了上述嚴厲的獄規，但沒過幾天，當他們組織看守我們的戰士，觀看了日本電影《望鄉》，並知道了關我們都是受毛主席女兒李敏同志的牽連的情況後，他們講了些電影中不可入目的鏡頭，說：“打擊的是毛主席的女兒，看的是黃色電影，共產黨是不是變啦！”進而說：“他媽的，以後只要科委不來人，你們的門不鎖、不關了，可以隨便散步。”幾個戰士搬來一棵約 50 公分直徑、兩米多長的柳樹，拿來木工工具，說：“你們每人鋸個切菜刀板，帶回去留個紀念”；還拿來不少木料，讓我們做點什麼帶走，還鍛煉了身體；不僅如此，並對我們說：“誰要喝酒、買熟食、買煙，你們說一聲，都給你們買來”；還對我說：“你們專‘暗’組來，怎麼常是你訓他們，是你審查他們、還是他們審查你？以後，乾脆他們來了，我們限制他們講話都不得高聲，你惲某愛怎麼對付他們都可以，只要不打起來”。在此僅舉一例：武鬥司令常勇誣衊我所政治部是李敏“小幫派”的窩，改組了政治部。調來常勇的部下和張愛萍塞進來的人，其中一名任政治部主任兼惲某“專暗組”組長的牛某某，帶了兩名製造冤假錯案的專業隊員來到監獄，對我說：你的問題基本查清了，我們整理了一個材料，今天同你本人見面，你看看有什麼意見？我看開頭：“李敏‘小幫派’骨幹分子惲仁祥，拉幫結夥，篡黨奪權，……”；我無心再往下看，就站了起來，責問他：“聽說你是在常勇那搞政治工作的，而不是像左某某（製造冤假錯案專業隊的骨幹），如果是他，寫出這種玩藝，我不想發表意見，

因為他就那點‘水準’，不值得發表意見，然而你是搞政治工作的，我問你，說我拉幫結夥、篡黨奪權，我是怎麼拉的、怎麼夥的、拉了哪些人、夥了哪些人、怎麼篡的、怎麼奪的權？”他讓我責問得一句話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我說：“共產黨瞎了眼就選拔你這樣的政治幹部，隨便血口噴人，可笑！”就這樣，他們無一人開口，不歡而散。之後，在場的戰士伸著大拇指對我說：“老惲，你真行，好利害！”我們出獄後，好些戰士同我們很親熱，常來看望我們。由於這些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民戰士，勇敢頂住了張愛萍對我們的殘害，出自深厚階級感情，給我們以細緻的照顧，使我們在他們的保護、照料下，健康出獄。除個別帶病入獄的外，身體都結實、長胖了，本人由入獄時的 92 市斤，增加到 120 市斤。我們能做到這一點，一靠毛主席教導，“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坐牢是最好的休息”；二靠人民戰士，把張愛萍私造的法西斯監獄，變成了人民“療養院”。這些，張愛萍不會想到吧！張愛萍私設監獄，非法關押人大代表的罪行，必須依法追究。

## 第二章 走資派大飄翻案風， 對造反派反攻倒算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叛變夥同葉劍英發動右派武裝政變後，掀起了一股翻案、“平反”妖風，與此同時，以清查“三種人”為名，又製造了中共史上規模最大的冤、假、錯案，也是中共史上史無前例地把堅決擁護黨、黨中央、毛主席的廣大幹部和群衆打成“反革命”。在此，主要談走資派翻案、“平反”。

所有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們政變篡權的目的，無一不是首先為自己翻案，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目的是為了當高官，騎人頭上，橫行霸道，享盡榮華富貴，腐敗墮落，復辟資本主義。而且大多一人得勢，雞犬升天。聶榮臻及其心腹張愛萍就更加出衆，也可以說是到了不知廉恥的地步。

### 一、利用職權為自己翻案，樹碑立傳

應當肯定，許多老前輩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鬥一生，把自己走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可歌可泣的經歷，把

它記載下來，包括他們的後代，把這些革命家生前對後代的培養教育記載下來，留下一份寶貴的財富，供後人學習借鑒，人民絕對是歡迎的。但是，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打著寫“傳”、“回憶錄”等旗號，為自己的錯誤、罪行翻案，攻擊和誹謗“文革”、社會主義、共產黨、毛主席，為自己樹碑立傳。這類糟粕，充斥了新華書店、舊書攤的書架。大凡這類糟粕，內容都大同小異，換個姓名，哪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都適用。例如《張愛萍在1975》和《兩代軍人的對話》兩本大肆吹捧張愛萍的書，就是個典例。書中為了為自己的罪行翻案，瘋狂發洩對“文革”、“反擊右傾翻案風”、對中央、對毛主席的惡毒攻擊。這是近30年，流氓史學、陰謀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一些重要問題，必須弄清楚，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些人都披著一件“老革命”的外衣，在戰爭年代都幹過一點有益的事，掩蓋了他們投機革命的本質，因此誤導性很大。不過，像張愛萍這類政治上反動，生活作風糜爛的“老革命”，在子女面前不偽裝自己，而如實介紹自己，不就成了教唆犯了。所以他在子女面前搞點偽裝，可以理解。但散佈到社會，欺騙輿論，決不容許。在此，僅對張愛萍的罪行，結合吹捧他的兩本書，擇其幾個主要問題，予以剖析。

## 1、“文革”中張愛萍無罪嗎？

張愛萍在書中說：“1966年9月軍隊領導機關‘文化大革命’開始。信以大字報的形式公佈出來，原信寫於

1966年5月23日，由總後、科委、總參作戰部三個高級幹部署名。”（註：從前文看，是1966年5月23日，由總後、科委、總參作戰部三個高級幹部署名的一封向中央揭發張愛萍的信，於9月用大字報公開），“一夜之間，大字報就鋪天蓋地而來了。在國防部大院，從總參到科委，從一樓到六樓，到處貼滿了批判的大字報，共5萬張。”

從這兩段文字，三個高級幹部（註：從文中看並非三個單位的主要領導）一張大字報，接著“一夜之間，……，到處貼滿了批判的大字報，共5萬張。”這都是書中的原文，說明文革一開始，揭批張愛萍是總參、科委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群衆自發形成的，書中沒有講是中央或“四人幫”“點火發動”的。總參機關有多少人，我不清楚，科委機關僅150人左右，假設總參、科委機關共500人，一夜貼出五萬張大字報，平均每人寫了100張大字報，若平均每張為30個字（註：文革中大字報，每張一般為幾十到幾百個字，在此按最低數計），則每人寫了3000字的大字報。這說明了一個問題，貼他大字報的人多、量大。在文革初期，在沒有工作組操縱煽動的情況下，一夜之間，幹部、群衆自發貼出這麼多大字報，並集中在一人身上，很可能在全國是創紀錄的。這說明張愛萍幾年積累的問題，可謂天怒人怨。

據我最近瞭解，那些大字報中，揭露了張愛萍很多問題，其中關於他生活作風糜爛一項，後來楊成武代總長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科委派代表列席）同張愛萍當面核實，他不得不全都承認。就憑這件事，足以說明他犯了流氓罪。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運動”，“在街上撒

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輕人在公園談戀愛被逮住也叫流氓罪……”，判重刑、殺頭（參見《京華時報》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報導）。如果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張愛萍為什麼無罪，還能升官？僅就這事，文革對這號人物進行批判錯了嗎？這個案能翻嗎？這種人沒有認真的檢討，沒有改邪歸正的行動，他復出後，又是“舊病復發”，甚至殘酷迫害影響他腐敗行為的同志。我就因堅決頂住他在科委廣為瞭解的他的情婦硬要塞進情報所，而遭他殘酷迫害。事情經過是，約1975年上半年，張愛萍一紙便條，向情報所塞進23位不懂業務的工作人員。所幹部部門的同志把便條送給了劉毅民，劉毅民不敢批，退給了幹部部門。幹部部門來找我，經查有一位女性稱張愛萍為叔叔，在原單位本來安心工作、要求進步，最近突然鬧情緒，說：張叔叔一句話，她馬上可以穿上軍裝（註：她所在單位黨支部寫的證明材料）；更嚴重的是司、政都有師、團職幹部打電話對我說：張愛萍的情婦某某你決不能接收，否則影響極壞。我同張愛萍前世無冤、今世無仇，對23人我也概不認識。而當時本所不僅沒有要求調幹的報告，還應執行中央軍委壓縮現役軍人人員，應無條件精簡25%。因此我在張愛萍便條上批了：23份檔案退張愛萍同志，人員請另行分配。劉毅民知道後來找我，對我說：你批啦？我說批了。他說：這樣的情況還會遇到，這是很平常的事。我說：那你為什麼不敢批而推給了我？如果我們接收了這些大多既不懂外文、又不懂技術的文工團人員，還要精簡那麼多（講了具體數字）業務上熟練的幹部，怎麼

向大家交代、做思想工作？劉毅民不吭聲。科委幹部部見了我的批示，找到我說，他們不敢送給張愛萍，請我考慮。我說：你們直接送給他，可能要挨一頓剋，你們通過內部通信寄給他吧。為這件事，我就上了張愛萍的“黑名單”，遭張愛萍慘重打擊報復迫害。他“整頓七機部”時，連“偷魚”的，都上綱上線“依法懲處”，並擴大“戰果”，以此迫害炮轟聶榮臻派的幹部、群衆。但張愛萍偷人老婆，把人家搞到了家破人亡，反而合情、合法？我因為堅持原則頂住張愛萍把情婦塞進情報所，被張愛萍非法關押後，他隨即把他情婦調進了情報所（已無阻力），不久又提拔為科委某部副部長。這正證明了他殘酷打擊迫害我的卑鄙目的。我自豪地聲明：我堅持了黨的原則，堅守了崗位，我無愧無悔。這些事實證明，張愛萍不僅不思悔改，不僅對阻礙他繼續腐化墮落的同志殘酷打擊報復迫害，還用惡毒的語言攻擊、辱罵毛主席（參見吹捧張愛萍的兩本書）。這樣的人，還能讓他官復原職甚至提拔當一把手嗎？如果說文革有錯，錯就錯在沒有對張愛萍這類人嚴加懲處，反而提拔當一把手，他不成“還鄉團”才是怪事。這種教訓，有其普遍的參考意義。

另外，“文革”期間，聶榮臻批判了張愛萍。不僅在前面介紹的《西風》等雜誌、文件中批了張愛萍，還專門召開了批張愛萍大會，沒有武鬥，張愛萍是站著被批鬥的。時間約是1967年上半年，會上批判張愛萍重點是“部院合併問題”。批鬥張愛萍“追隨羅瑞卿搞部院合併，奪林副統帥最親密的戰友聶副主席的權”。部院合併是中央決定的，周總理具體負責實施的。聶榮臻批張愛萍主張

部院合併，同批羅瑞卿同志“部院合併”除都是把矛頭指向中央和周總理外，確有本質區別。聶榮臻批張愛萍“追隨羅瑞卿搞部院合併”，是一場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是一出現代苦肉計；更恰當地說是主人打狗，愈打愈馴服、愈打愈效忠。這出戲的演員還正像張愛萍在書中說的，是黨的高級幹部、“老革命家”。但這些“老革命家”鬥來鬥去，最後把賬都算在“文革”、毛主席頭上。張愛萍在書中說：“是黨出問題了！是毛澤東那裏出了問題。”

其實，“文革”中主要是林彪最親密的戰友聶榮臻整張愛萍，另外，開始楊成武同志任代總長、總參黨委書記，歷史上林的親密戰友一直是楊成武同志的頂頭上司。文革中批判、審查張愛萍的報告是總參和科委提出的，由林、聶（均是軍委副主席）第一次報毛主席，毛主席批了退回。再一次報告毛主席要對張愛萍隔離審查，列了一系列嚴重問題（例如叛變等……），問題這麼嚴重，毛主席批了照辦。然而，張愛萍在書中除不點名對代總長表示憤恨外，對毛主席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唯獨對在批張愛萍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林彪最親密的戰友”聶榮臻，張愛萍不吭一聲。不僅對聶榮臻不吭一聲，而且以“用人不避嫌”為藉口，把科委變成了被衆人指責、諷刺的聶榮臻後代的“夫妻店”。聶榮臻的女兒成了全軍有軍銜以來女同志最高軍銜中將、科委副主任。那些戰爭年代浴血奮戰、立有赫赫戰功的女革命家，只能歎為觀止。上世紀50年代授銜時，女同志最高軍銜是少將。那麼聶榮臻的女兒是否在科研戰線有卓越成就和貢獻呢？我沒有聽

說過。是否有超群的組織領導才能？據我所知，她能力平平，或者說水準不高能力不強。聶榮臻的女婿被封為上將、科委主任、“院士”。有些同志諷刺說：夫妻兩人在枕邊就可開“常委會”。在這同時，張愛萍本人也撈足了“油水”，不僅把情婦調進科委機關當了副部長（據說：她愛人受不了這份恥辱，被氣死了），老婆、兒子都進了科委，提拔為師、局以上幹部、二炮副司令（當時二炮屬科委管轄）……，雞犬升了天。所以也有人說，張愛萍把科委變成了他的家屬院。相比之下，毛主席唯一在科委的女兒李敏同志，卻被聶常委再三迫害，直至總政主任余秋里同志把她調總政保護了起來，為毛家減少了一位烈士。另外，張愛萍終於實現了聶榮臻的願望：併吞了國防工辦，成為“國防科工委”。後由於聶氏“夫妻店”不爭氣，造成科研慘敗、腐敗不堪。鄧小平下決心恢復部院合併，把國防科工委劃入國務院管轄，成為國務院下屬的國防科工委。張愛萍堅決抵制，據很知內情的同志透露：鄧小平嚴厲批評了張愛萍橫行霸道、專橫跋扈，並不再接見他；中央下達文件，免掉了張愛萍一切職務。從此，張愛萍罵娘罵到死。另外，“三個代表”找聶榮臻的女婿談話，講了幾句無觸痛癢的“批評”，而養了起來（但他真正被罷官的原因，本人暫替他保密），但給聶榮臻留了一點面子，國防科工委一幫人馬，繼續穿軍裝，改為“總裝備部”。據說聶榮臻至死也對“部院合併‘想不通’”。可見，聶榮臻搞“聶王國”，連鄧小平也不能容忍。

張愛萍一直打著受“四人幫‘迫害’”的光榮牌，撈取資本。但如上面所講，文革中批張，是幹部、群衆自發的，

沒有任何人插手。張說江青迫害他，從何談起？但張愛萍私下生產核武器，圖謀不軌，卻是無可推翻的事實（參見李敏著《我的父親毛澤東》）。事實證明，張愛萍在書中鼓吹的受“四人幫‘迫害’”、“王洪文批判他”，均屬謊言，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

## 2、張愛萍大搞右傾翻案

關於 1976 年批張愛萍，我在近 20 多年給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控告張愛萍等材料中，都作了負責任的自我批評，檢討了我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抵觸批張的嚴重錯誤：1、當時我找了三位常委，明確表明我不贊同那樣批。我第一個是對科委副主任馬捷同志談了我的意見，他聽了很高興，建議我直接找陶魯筭同志談；第二個找的是當時的科委常務副主任陳彬同志，他用一晚上時間做我的工作，他講的主要內容是：張愛萍很霸道，打擊報復心狠手毒，他很怕張愛萍，因為在總參搞了張愛萍的專案，說服我批張愛萍；第三個找了陶魯筭同志，他對我說（大意）：“我們原來也是這樣想的，給中央寫了報告，然而陳錫聯說，你們的報告不會報主席，不要抱幻想，回去好好批，否則先批你們”。2、我在科委的召集人會上態度激動地提出：我不贊同這樣鬧下去，照此下去，很難收場……。我身為情報所主管政治運動的領導，對中央決定批張，我不僅沒有召集核心組研究如何貫徹，沒有作一個動員報告，命令式地對所政治部領導講，凡上面下來的有關文件，照本宣讀傳達下去，但不得以黨組名義亂發揮。

根據張愛萍實際存在的問題，我這些做法和態度是很錯誤的，而且是嚴重的，甚至到了膽大妄為的地步。因此，我不只一次地向中央表示，我一定徹底地、無保留地、無所畏懼地揭露張愛萍等人，將功補過。為什麼在認識上我對張愛萍有這麼大的變化，很大因素是張愛萍教育了我，他的行動讓我認識到他的罪行嚴重。我也深感內疚，對不起我犧牲的那麼多親人。但對張愛萍背了組織搜集誹謗、惡毒攻擊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我頭腦比較清醒。這裏說明一下我處理這件事的過程和當時想法。這件事我是偶然發現的。一天，一位英文翻譯問我：劉毅民找我們幾個翻譯開會，說要從進口刊物、報紙上找我們沒有公開發表的關於中央領導的材料，說是張主任要的，你知道這事嗎？我答：不知道。他就走了。我想了一下，這件事得報告科委領導。我當即打電話給陶魯筭同志，我說：政委，有件事得當面向你彙報，電話裏不便講。他說那你就來吧！去後，他同陳彬同志在場。我把那位翻譯的話講了一遍。陶問：張主任這件事，常委不知道，他為什麼搜集，搜集了幹什麼？我說：不知道，劉毅民召集幾個翻譯搜集，黨組也不知道，但按紀律，我們所不准許搜集這類東西。陳問：搜集什麼內容？我說：說不清楚。陳彬同志要我把這一情況寫一寫。我說：我無法寫，那麼幾句話，寫了算什麼，不能寫。過了約2、3天，陶魯筭同志打電話對我說：他報告了中央領導（李先念同志），中央領導說別管它。他反覆講了兩遍，也叫我別管。後來，劉毅民、丁某某突然在會上揭發這問題，我當即勸阻他們不要談這事。丁某某不服，離開會場到

辦公室打電話給科委政治部領導揭發此問題。第二天一上班，科委通知所核心組正、副組長立即去科委。去後，陶魯筭、陳彬、錢學森、馬捷四位常委在座。陶魯筭同志說：丁某某向政治部領導揭發張主任搜集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問題，政治部領導告訴了我，所以把你們找來，這件事常委不知道，是張主任背了常委幹的，由他個人負責；但這件事中央領導同志知道了，指示不要管這事，你們回去也別談這事了。陶把後面這幾句話重複了兩遍。可是，劉毅民當天加夜班寫揭發材料。第二天，由丁某某把揭發材料送科委（黨組不知道）。後來，陶魯筭同志把我叫去，他同陳彬同志兩人在座。讓我看了劉寫的揭發材料（包括張愛萍的手諭），徵求我的意見，怎麼辦？我說：問題同當初我知道的大不一樣，問題嚴重，證據充分，白紙黑字，劉毅民又堅持揭發，這種問題，誰敢壓在手裏？上報。陶同意我的意見，並讓我複印兩份（劉毅民、丁某某寫的揭發材料）。上報時，陶要我寫個旁證，我基本抄了劉毅民的材料。後來華國鋒、陳錫聯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後報中央。但批回的材料中沒有見到我寫的旁證材料。想起來這很可能是，因為確定報中央，我寫旁證時，開頭寫了：主席並中央。中央辦公廳會不會把我寫的旁證給了毛主席？後來張愛萍迫害我時，軍委辦公廳領導同志告誡我們所：惲仁祥的情況中央知道，主席還有批示，這個人不能整他，誰整誰倒楣。但主席批示的內容，我至今不知道。後來，劉毅民幾次堵我家門，要我召集黨組會議解決一下他這個問題，都遭我婉言拒絕。說白了，解決一下是幌子，摸底是真的。他絕對明

白這件事的分量，即便在今天，也是犯罪行為。他摸不到底，就在下面放風“聽候處分”，我只當不知道。按正常程式，劉毅民必然受到嚴厲處分。這也是他聯合張愛萍篡權後，必欲置我死地而後快的重要原因。這一段話，僅如實說明，我在這類原則問題上並沒有糊塗。

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批張愛萍，是毛主席、黨中央決定的。同在這前“聶核心”等批張愛萍，雖然都是揭批他的問題，但有重大區別。從召開科委、七機部常委聯合擴大會即兩委會起，張愛萍一直是在301醫院“養病”舒舒服服度過的，可以說沒有開過一次面對面的大、小批鬥會（這當時都有記錄可查）。

兩委會上真正為張愛萍代過挨批的是陶魯筭、陳彬這些同志，李光軍同志也挨了一點，他甚至把手裏的茶杯都砸了，陶、陳挨批的情況就可想而知，這都有會議記錄可查。在此講幾個主要問題，陶、陳等為張代過被批的情況就不介紹了。

張愛萍在書中藉別人之口，說他就是說了句“今不如昔”，錯在哪裏？因此，他可在書中理直氣壯地挖苦諷刺那些批判了他的人，上了他黑名單的更是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張愛萍在書中高度概括地說：“不是我有什麼問題；也不僅僅是有人想報復我、整死我；是黨出問題了！是毛澤東那裏出了問題。”這個結論公佈後，博得走資派們一片喝彩。但事實並不決定于張愛萍如何給自己塗脂抹粉，而決定于張愛萍實際幹了什麼。

### 1) 關於錢學森同志批張愛萍的問題

錢學森同志是七機部最早表態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

部，在科委機關他也是堅定支持造反派的領導人。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在這方面，某些人為了迎合那個“決議”，對錢學森同志作了一些歪曲事實、不惜損害其形象的報導，例如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就有這類內容。文革期間，錢學森同志不僅支持造反派，而且他本人就很有造反精神。這方面事例很多，僅舉幾例說明。

錢學森同志留洋，但不僅不崇洋，而是利用一切機會揭露美國的黑暗面。他對我說：你別認為美國真那麼富，你要去看看他們的貧民窟，窮人有的是，窮得很，那些公開宣傳的東西，是讓人看的。美國什麼民主、自由，是吹給人聽的，在美國人之間爾虞我詐利害得很，尤其是高層。

他公開反對國家領導人訪美時講洋話、唱洋歌。

錢學森同志頂著美國政府迫害，毅然回國建設社會主義，奉獻了畢生精力。錢學森同志姓錢，但不愛錢，尤其三年困難期，一再召開家庭會議，一致贊同把積餘的錢捐給國家，共度難關；這同當今一夥腐敗官僚相比，是多麼值得我們崇敬的品德。錢學森同志私事不用公車，受到毛主席的讚揚；相比之下，當今官員“三費”（車費、旅遊費、吃喝費）全國達9000億支出，可見腐敗到何程度。

錢學森同志有一句名言：沒有了公有制和毛澤東思想，共產黨就完蛋。請問全國有幾個知名科學家有如此敏銳的眼光和遠見卓識？

錢學森同志在常委會上批評了張愛萍幾句（我列席了會議），張愛萍並不在場，有人給他加油添醋送去了“小報告”，張耿耿於懷，還專門把這事寫進書中，以貶錢學

森同志，還譏諷錢學森、朱光亞兩位專家，他說：“1974年‘批林批孔’，牢騷怪話不少，有一條是：一個儒家（陶魯笳，當時的國防科委政委）（註：當時任科委主任、黨委第一書記）；兩個專家（錢學森、朱光亞）；就缺法家。”張愛萍藉此說明什麼？誰都清楚。錢、朱一直是科委常委成員，張愛萍給他們一人一雙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玻璃鞋”給打發了。真實的情況是，這次會議是常委們揭發張愛萍的問題。錢學森同志面容帶笑地說：前些天，張愛萍對我說，我還得靠你呀。錢學森同志笑了笑接著說：靠我什麼呀，我有什麼好靠的？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錢學森同志就講了這幾句話，結果竟上了《張愛萍在1975》一書，記恨於書，流謗於世。有些話以前還不便講，現在兩位專家都去世了，便於講清楚了。衆所公認，科委機關的專家，不管是技術、政治，還是思想覺悟、政治品德，都受人尊敬，錢學森同志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為錢學森同志上述發言，張愛萍記恨在心，結果錢學森同志被貶出常委，保留中央候補委員，另一位升為中央委員。但凡科委機關同志對此都有公議。但我聲明：我無絲毫意思認為另一位不該升中央委員。兩本書都讚揚陳彬同志，《兩代軍人的對話》還表揚了李光軍同志（註：書中對李光軍手上寫了“三點水”給張看一事，作了很不實事的解讀，這在下面介紹）。但陳彬同志任科委主任後，他到上面去開會，要看張的臉色才敢講話，即便這樣，張還派人到總參去調查陳彬的“問題”，搞得陳彬同志只得請長假，躲著他；李光軍同志不贊同張愛萍迫害李敏同志，而被“請出”科委，到武漢軍區任副

司令。所以，張愛萍對陳、李的表揚，還正如錢學森同志批評張：“不安好心，黃鼠狼給雞拜年”。張愛萍還利用兒子發文章說，因錢學森批評了張愛萍，他當時就心臟病發作而住院。真實情況是錢學森同志批評他時，他早就住院“治病”。

## 2) 國防科委常委所作撤銷張愛萍一切職務問題

1976年約5月，科委常委一致通過了撤銷張愛萍一切職務的決定。這是後來張愛萍記恨於心，報復陶魯筭同志的重要原因。在此，我把這件事的經過介紹清楚，該處理決定是對、是錯？看完全文自有公論。

事實經過如下。在常委作決定的那天下午，在科委一樓小禮堂，召開科委常委擴大會（約30人左右參加），當時正值傳達了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會上，科委領導人揭發張愛萍的問題……；劉毅民搶過喇叭，揭發張愛萍佈置他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激起了與會同志的義憤，強烈要求科委常委立即作出撤銷張愛萍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所有到會的領導沒有一個表態，一部分人更激動，轟了起來，頂住了，會議無法開下去，一直僵持到下午七點，只得宣佈散會。就在當天晚上，科委常委作出了撤銷張愛萍一切職務的決定。從當時實際情況：一是常委頂住，則會議就無法開下去；二是尊重群衆的意見，作出處理決定。

## 3) 關於“大鬧政治局”

1976年6月（？），中央通知兩委會向政治局彙報批張愛萍的情況。據參加彙報的同志對我講，當彙報到中央領導批示查清張愛萍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彙報到清

查的情況時，江青發脾氣，……，嗓門也高。後來，張愛萍把這定為“大鬧政治局”。在那個會上發言的幹部、代表，都以“大鬧政治局”的罪名挨整了。很慶倖，我沒有參加這次彙報會，否則，即便一言不發，也會被張愛萍定為“夥同陶、李批鬥……”，還何只是“大鬧”？

對張愛萍作的處理決定，和張愛萍定的“大鬧政治局”，值得人們深思的是，這兩件事，其起因都是因為劉毅民等人揭發了張愛萍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引起的。從上述兩起“事端”看，為什麼凡揭露這個問題的場合，均如此讓人憤慨？

#### 4) 關於“四條漢子”、“四大金剛”

對這個問題，張愛萍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張愛萍在1975》一書中說：“而江青這時正愁著沒有整垮鄧小平及其‘四條漢子’（胡耀邦、張愛萍、某某、某某某）的材料哩！”（註：從該書上下文看，張愛萍這段話，是針對七機部有的同志給毛主席寫信，反映張的問題，毛主席在信上作了批示，事實上這同江青無關）；《張愛萍在1975》一書中又說：“‘張愛萍同志’，紀登奎說話是很嚴肅的，‘你應該很清醒地認識自己。你犯的是方向路線錯誤。在這次右傾翻案風裏，你是主要的一個’”，“張愛萍已經被‘欽定’為‘右傾翻案風’的主將之一。其餘後來才知道，還有某某、胡耀邦、某某某，這就是後來所謂的鄧小平的‘四大金剛’”。（註：全書對“鄧小平的‘四大金剛’”是誰“欽定”的，似乎是紀登奎同志，但書中沒有說紀講了這話；“欽定”二字，按理張愛萍是指毛主席，但書中沒有講毛主席講這話；“欽定”就只能是張愛萍自

定的)。

另一種說法是《改革大潮中的張愛萍》一文：“他兒子問張愛萍‘鄧小平 1975 年搞整頓，你和某某、胡耀邦、某某某被譽為是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你知道嗎？’張愛萍說‘什麼鄧小平的四大幹將？他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誰的人也不是！’‘批鬥我的時候，就追我這個，問我和鄧，和那三個人有什麼聯繫，有什麼組織活動。我說鄧小平對國防工業的講話你們不都看到了嗎？大概有兩次吧，葉、李先念、包括‘四人幫’有幾個都在場嘛’，“說我是鄧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剛，這是對我的侮辱！一個人怎麼能成為某一個人的工具、信徒呢？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貶低了。對的、正確的，我能跟著你，不對的、錯誤的，我怎麼能跟著你呢？跟著你，也不是跟你個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線方針。”這一段話，張愛萍對“四大金剛”的說法是否定的，更談不上誰說了這話。另外，在揭批張愛萍的兩委會上，我作為一個大組的召集人，在任何大小會上，未聽到任何人說張愛萍是鄧小平的“四大金剛”……，更沒聽到那位領導傳達中央領導有這類講話。所以，只有一個結論：是張愛萍自封的。張愛萍自封這兩頂光榮帽，在當時的含金量是很高的。

### 5 ) “造反派到 301 醫院批鬥張愛萍”

張愛萍在兩本書中都不惜重墨宣傳“造反派到 301 醫院批鬥迫害他”。這既控訴了造反派的殘忍，又宣揚了張愛萍經如此磨難而堅強地頂過來了。這類宣傳，既是張愛萍粉飾自己英雄形象的需要，還更符合那個“決議”醜化造反派、攻擊“文革”的形勢。但只要把真相一揭開，

更顯醜惡、卑鄙的只能是張愛萍自己和為他作此醜惡宣傳的文痞。

事實情況是，張愛萍的心腹、幹將劉毅民揭發了張愛萍讓他搜集中央領導黑材料問題，中央領導批示一定要查清楚，查清後報中央。科委接到中央批示後，科委常委會（本人列席了會議）研究並委託科委副主任李光軍和馬捷兩位常委同志，科委政治部保衛部副部長，一位元同志去當記錄員，加上我。科委指定我去，向我交代是去聽聽，我估計是因為事情發生在情報所，又是所黨組組長劉毅民、成員丁某某揭發的，而我是所黨組分工主管政治運動的副組長，又是兩委擴大會一個大組召集人。共五人去 301 醫院（解放軍總醫院），任務是向張愛萍傳達中央領導同志關於查清張愛萍搜集黑材料問題（以下稱黑材料），中央華國鋒、陳錫聯兩位同志批示。李光軍向張傳達後說（大意）：你聽了有什麼意見？中央還要你（指張）寫一寫報中央。張愛萍作了牛頭不對馬嘴的解釋，李光軍幾次提醒他好好想想。張一再重複開始的講話。李光軍同志甚至手上寫了個三點水，讓張愛萍看，目的是暗示讓張愛萍推在江青同志身上，以減輕罪責。然而張愛萍不理解，還是牛頭不對馬嘴胡謅。最後，李光軍問大家有什麼講的，我講了一句：“老同志啦，實事求是吧！”李光軍就對張說，你抓緊時間寫一寫，報中央，我們就走了。這就是張愛萍在兩本書裏一再宣揚的“造反派到 301 醫院批鬥張愛萍”的真相。坦率講，對這件事，我一直只簡要駁了他，沒有徹底揭露真相。因為就像張愛萍在書中臭罵一些“老資格”不要臉似的，到 301 醫

院向他傳達中央領導批示的場面，講出來我都為他丟臉。我們一進病房，他正在客廳同夫人說說笑笑，一見我們，他立即走進病房躺在病床上，並插上氧氣管，成了“重病號”。當李光軍同志向他傳達說：情報所的同志揭發你要他們搜集中央領導同志的材料問題，中央領導同志批示，要查清楚，今天我們受常委委託，向你傳達這個精神，你有什麼要講的。另外中央還要你寫一寫，報給中央。張愛萍有氣沒力、一字一停地裝成重病在身似的講（大意）：我是考慮到情報所可能會漏進一些烏七八糟的資料，讓他們清理一下，銷毀掉……。（註：事實如何？前面已介紹）。誰又能相信，張愛萍這樣自命不凡的“老革命”，竟會睜著眼睛說瞎話臉不紅、心不跳！甚至誣衊“造反派到 301 醫院批鬥他”。他談話的記錄我還保存著。

這真讓我開了眼界，這個“老革命”原來如此！在這前，上世紀八十年代，各類宣傳機器開足馬力宣傳造反派“殘酷迫害‘老革命’”，揭露“文革‘壞透了’”，一開始我還信以為真。後來看了《張愛萍在 1975》和《兩代軍人的對話》兩本書，領教了張愛萍顛倒黑白造謠惑衆，我才清楚那些大訴造反派苦的“老革命”是怎麼回事。可以說，後來那夥拍張愛萍馬屁向上爬的人，當張愛萍被批時，沒有一個有我惲某那樣敢發表不同意見。這足以讓張愛萍那夥馬屁精顯醜，尤其是劉毅民之流，完全是一夥落井下石、見風駛舵的烏合之衆。當然，張愛萍也不會想到，當他得意忘形之際，還是惲某不怕任何迫害，堅決回擊並頂了他。認清了他的真面目後徹底揭露控告他的罪行的，也還是這個惲某人，這就是“文革”

時期的造反派。

### 6) 張愛萍私造核彈頭、圖謀不軌

這個問題的詳細情況，前面已介紹。就這個問題，如果是任一個造反派幹的，別說會鬧到全國滿城風雨，這個造反派即便有 100 個腦袋，也必將全部落地。為什麼張愛萍幹了，不僅無事、還能升官？可見，所謂的掲批查，是那夥野心家、陰謀家、走資派排斥異己，對“文革”反攻倒算，網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復辟勢力。

張愛萍所犯的嚴重罪行，足以證明，1976 年批張愛萍沒有錯，更談不上過火，而是沒能批下去。華、葉叛徒集團右派政變，不僅使批張夭折，張愛萍還成了右派政變的重要力量，被提拔重用，當上了國務委員、國防部長。張愛萍當國防部長，還有一段插曲：鄧小平提張愛萍當國防部長，因張愛萍很霸道，在軍隊上層人際關係欠佳，鄧的提議沒有通過，選了楊勇同志為國防部長候選人。張愛萍氣得到老家四川罵娘。楊勇同志體檢發現絕症，鄧小平又決定張愛萍為國防部長，待人大追認。

### 3、聶榮臻“王國”對科研等造成的慘重破壞

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對聶榮臻等人作了嚴厲批評，但聶榮臻聽不進周總理這些出自肺腑的忠告。

自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以後，正如毛主席生前所料：幾個老帥要鬧事，要出軍中赫魯曉夫。他們篡權後，聶榮臻幾十年的“獨立王國”夢，終於暢通無阻實現了，並最後由他的門生張愛萍圓了併吞了國防工辦的夢。這

時的聶榮臻，一下由聶核心躍升為“聶王國”，並變成了聶氏“夫妻店”，終於實現了統帥中國全部國防科研、國防工業、國防院校、試驗基地、第二炮兵等，一個完整的“獨立王國”。“有功之臣”都分到了一塊蛋糕。聶榮臻的女兒、女婿繼承了聶王國的“王位”，開了“夫妻店”，一等功臣張愛萍的老婆、兒子、情婦都調進王國稱大臣等等。但聶榮臻們花畢生精力搞這個王國的目的是什麼？事實證明，這同歷代王朝一樣：子孫榮華富貴、腐敗。

聶榮臻的女婿封為上將、院士、科委主任（後同步改為國防科工委主任）。聶氏王國一切最高桂冠都一個不少地封給了他的女婿。至今我不認識這位元“大人物”。巧的是，2001年我返母校東南大學（我上學時為南京工學院），一些留校工作的無線電系老同學請我吃飯。席間，有同學問我，你認識丁某某嗎？我說：人我不認識，問他幹什麼？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對我介紹說：他原是南工畢業的，很可能同你一道畢業的，不過他是機械系畢業的；回校可牛皮啦，在大會上大講什麼微電子、納米技術什麼的，他有什麼大發明？我脫口而出：他的“發明”，你們誰也沒本事發明出來。大家非問我他發明了什麼？我說：他最大的發明就是當了聶榮臻元帥的女婿，你們發明得了嗎？大家一聽就轟堂大笑。為什麼我這樣回答？發明權並不屬於我，科委、情報所都在議論“夫妻店”的新聞，只是我不知道店老闆還是我的校友。情報所對他的院士桂冠的議論就更火爆。很多人都知道他的“院士論文”，是用國家的錢，濫用職權，在情報所組織一些人員從進口外文書、刊抄襲的。有的“博士”、“院

士”的“論文”是抄襲的，這已不是新聞。但這些“博士”、“院士”他畢竟還動手抄了，誰寫文章不抄東西？誰搞科研從牛頓定律做起？報刊上揭露的那些抄襲的“博士”、“院士”總還有個說法，抄襲，難聽一點叫剽竊。我要問，這位丁“院士”連抄都沒有自己動手，這叫什麼“院士”？一些專門研究辭彙的專家，還應給這類“博士”、“院士”起個恰當的名詞。

許多同志發表了不少文章，揭露了近 30 年對國防科技的嚴重破壞，許多國防科技專案被強行下馬。有記者在互聯網上發表《總裝稱：中國軍工科研系統落後西方 50 年》一文。2010 年 3 月 3 日，有同志在網上詳實披露了運 -10 大型飛機遭扼殺的詳情。互聯網上還報導了《解放軍一年的裝備費不夠買一架 B-2 飛機》一文。這些文章披露的嚴重問題，可能其背後都隱藏著一隻共同的黑手：“聶王國”腐敗。只要動腦子想一想，每年國家從財政收入中撥出相當的比例用作軍費開支；喊了 30 年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又喊了好幾年的“科學發展觀”……。結果是“中國軍工科研系統落後西方 50 年”，一年的“解放軍裝備費不夠買一架 B-2 飛機”。請問：那麼大的軍費撥款，錢哪裏去了？難道還不該喚起全黨、全民關注這個問題？還不該引起中央徹查這個問題？

早在上世紀 80 年代，“聶氏王國”初建階段，張愛萍最愛寵時期，一些尖端科技部門，就開始把一些單位推行市場化“自負盈虧”，斷了這部分科技隊伍的“口糧”。這派生出兩個問題：其一、一部分科研經費省下了；其二、逼了一部分人去找財路，找的路子就五花八門，各

顯神通。我在市場上見到用製造飛機的高級鋁合金製成洗衣機、高壓鍋等賣的，推銷的技術員聽我講話不像太外行，如實對我說：“名義上用下腳料製造的，實際一上批量生產，哪來那麼多下腳料，大部分是成材，這也是沒有辦法，總要吃飯吧！”還逼了一部分老科技人員離開了國防科工系統。再一個是一直喊到今天還在叫喊的“軍轉民”，本來許多技術和工業，軍、民不好分家，就如我的本行，管電子工業的四機部就是。多年不打仗，把某些轉為搞消費品等民品，是可以的。但在一切向錢看、腐敗了的情況下，搞“軍轉民”，不少單位搞的貓膩，腐敗程度令人歎為觀止。“軍轉民”不是白送，包括軍工專利也不是白送，公開收錢加不公開交易同步進行。不是公開宣判了核工業、航太工業兩個大腐敗分子麼！就兩個嗎？那些沒有發現的、發現了沒有人敢得罪的有多少？可能是那兩個人的 1000 倍也遠下不來。老百姓有個順口溜：10 個官員抓 9 個，還可能 1 個是漏網的。這些省下、掙來的錢幹什麼？公開了的是科委大搞倒賣外匯案、走私汽車案等。這都是穿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裝幹的，地方公安、緝私等還無權干涉。再就是造供大官腐敗的“賓館”、“飯店”等樓堂館所。據說，張愛萍到某地“視察”，一夜要兩個女青年為他“服務”，以至在門外為他站崗的哨兵看不下去，去報告領導，答復是：你就管自己站好崗，別的就別管。張愛萍最得勢時科委還專門造了大樓開辦了某大公司。所以，瞭解這些內幕的，看到張愛萍在兩本書中把自己樹造成一身正氣，一塵不染的“鐵骨英雄”，我只能說他糟蹋了文字，浪費了紙張，全是屁話。同陳

良宇、許宗衡這夥大腐敗分子在問題未暴露之前，站在講臺上大講“反腐敗”一樣。就憑張愛萍為一座立交橋塗了三個字，就索要5萬元，和他作風糜爛，就夠概括他的人品了。

當“夫妻店”執掌“聶王朝”後，就青出于藍勝於藍了。在科研方面，造成接二連三的失敗，並造成了中國航太史上空前慘敗，不僅嚴重損壞了國際聲譽，而且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本來，科學試驗發生失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但“夫妻店”造成的失敗不能原諒。因為，在這之前，長征運載火箭早已成熟，早在1975年，張愛萍還以“三星高照”為自己樹碑立傳，即或之後偶爾失敗還可原諒，但連續接連失敗，一次比一次嚴重，最後造成嚴重人員傷亡，必須追究主要領導人的責任。聶榮臻不是說，毛主席的女兒是反革命照樣抓。但為什麼他的女婿犯嚴重失職罪，並造成人員嚴重傷亡，就不該追究責任？上樑不正下樑歪。這些年不斷的礦難去追究領導的責任，人們能服氣嗎？

在經濟方面，從“聶王朝”後，除前述倒賣外匯、走私汽車等外，其他大小經濟案件接連發生。其中最嚴重的是“夫妻店”期間，發生了折合人民幣20億元的琺瑯經濟大案，無人追查到底，半途而廢。以至一個走街穿巷的磨刀人，在群衆中都有板有眼的說：科委某某主任（註：“夫妻店”後任），花幾億人民幣進口一架飛機送給了某“大人物”……；丁某時發生了特大經濟案，結果替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某某造了一幢豪華別墅，就不了了之……。坦率講，其中有的事我們許多同志都

不知道，但一個磨刀人能講得滾瓜爛熟，可見社會影響之大。以前我也只是一次在火車上聽人議論送飛機的事。至於下面傳說“夫妻店”老闆到瀋陽出差的極不光彩的事，就只好省略不細介紹了。

一個單位，折騰到這個地步，國防科技落後西方 50 年，一年的裝備費買不起一架破 B-2 飛機，還奇怪嗎？問題是，其敗落的後果是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亡黨、亡國，不一定是杞人憂天。

## 二、劉少奇的案該平反嗎

劉少奇叛徒案，自十一大後，是爭論較大的問題。因為在 1968 年 10 月 13 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其中一項議程就是關於劉少奇問題。

至目前所見材料，劉少奇的叛徒問題經八屆十二中全會表決通過，僅一人表示反對。以前所傳達的，劉少奇專案組由周總理負責，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出版物也有說周總理是專案組組長的。但從華國鋒宣佈對劉少奇的平反決定以後，大多數出版物都按華國鋒定的基調宣傳。例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一書，就是個典型。書中說，劉少奇的案子就是江青、康生、謝富治等用逼供信、殘酷迫害等搞出的假材料，誣陷劉少奇。這同十二中全會傳達的內容發生了 180 度的大變化。這種急速轉彎，有的人跟得上，甚至能超前跟上；有的人就跟不上，甚至很難跟上。不僅因為這相反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論，都是以黨中央的

決定的名義傳下來的。作為個人，你相信哪一個決定，組織原則上都不犯錯誤。道理很簡單，你華國鋒說十二中全會的決定是一些人搞出的假材料；那麼你華國鋒搞的就一定全是真材料，你都能偽造毛主席“你辦事我放心”而搞右派政變，你就不能在劉少奇問題上搞假材料陷害旁人？這些等等議論，能說沒有道理？

我既沒有當過叛徒，也沒有見過叛徒，所見到的叛徒，都是寫在書、刊上的或電影、電視裏的。我有兩位親人因叛徒出賣而犧牲了，“上海龍華二十四烈士”中佔了兩位，一道被出賣和犧牲的還有何孟雄、林育南（林彪的堂兄）、李求實等二十四人，《陳雲傳》說我的叔叔惲雨棠是他的入黨介紹人。解放後，中央和華東局用了不少精力挖掘出賣“龍華二十四烈士”的叛徒，但一直未找到，出了不少誤傳。其中，因烈士們生前極力反對王明路線，所以有誤傳是王明出賣的。因此，我對叛徒只有仇恨而沒有實踐認識。

劉少奇問題，同時涉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對此案有不少人發表了看法。

李先念：“據我所知，毛主席一開始並不想打倒劉少奇，但是聽了許多人揭發批判後，毛主席才改變了自己的初衷。其中有個重要證據，就是薄一波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

汪東興：“1935年11月以後，……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當時日寇侵佔華北，全國救亡工作繁張，北方局幹部缺乏。據他們講是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提出了把關在北京軍人反省院的一批

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北方局同意這一建議，作出決定，並報中央批准。當時張聞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准了北方局的決定。這個決定傳到監獄後，反省院的黨員不相信這個決定，沒有執行。後來，組織催促，他們才發表‘反共啟示’出獄，陳雲和鄧小平認為這些人不是屈服於敵人，而是服從了組織決定，他們出獄後，許多人成為抗日戰爭的領導骨幹。在歷次審查幹部中，他們並沒有遇到任何麻煩。這就是中央認為他們沒有問題的有力證明”。“1966年8月，康生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出來，讓彭真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進行調查。9月16日，康生給毛主席寫信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1936年8、9月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示’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決定。隨信附上1936年有關報紙的印影件”，“毛主席對此不置可否，但是他批准了周恩來擬的中共中央11月24日對西北局關於紅衛兵追查劉瀾濤出獄問題請示的批復，同意周恩來送審此批復時給毛主席的信，這封信裏就說‘當時確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決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審查，故中央必須承認此事。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康生確實親自向這幾個學生組織的頭頭瞭解了一些領導人的歷史問題，從而掀起了抓叛徒的高潮”，“到了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變材料》。中共中央在批語中

說：‘薄一波等人自守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了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中的許多人在重新入黨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個批示裏引用了毛主席 1 月 31 日在譚震林關於農口幾個單位階級鬥爭情況報告上的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進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來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衆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清輕重，酌情處理’”。

華國鋒：“你說毛主席對這件事情的詳細情況究竟瞭解不瞭解？”

汪東興：“知道大概，不瞭解他們具體寫的情況。看了《反共啟示》後才大吃一驚的。”1967 年 2 月 3 日，主席會見卡博和巴盧庫時說過這樣的話：“文化大革命打倒的人中，有些過去是共產黨員被國民黨抓去，然後叛變，在報上登反共的啟示。那個時候我們不知道他們反共，不知道他們所謂‘履行手續’是一些什麼東西。現在一查出來，是擁護國民黨，反對共產黨。這些方面，紅衛兵小將是有功勞的。”

華國鋒：“有人對我說，打倒劉少奇是毛主席受了‘四人幫’的騙。他們搞的這些材料是斷章取義甚至弄虛作假，串起來一看似乎觸目驚心，其實沒有份量。紅衛兵不懂歷史、不懂政策，所以在揪叛徒中搞了許多假案。他們

是要求重新審查這段歷史的。”

汪東興：“我看這就是他們要用偽造歷史來為自己翻案的輿論，你想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想打倒一個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特別是涉及到叛徒這類問題，更是要有詳細的材料。毛主席親自在那裏把關，誰敢胡來？沒有人敢胡來的！我那時在專案組，我知道許多情況。現在安子文說：康生以讓他當中央委員的官位為誘餌，讓他證明劉少奇是叛徒。我就不信他的鬼話。康生對安子文恨得要命，還能對他許那樣的諾？再說，他的叛變，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他推也推不翻，還需要他揭發什麼劉少奇？所以，現在有些人的證明和回憶，都是不可靠的。我最相信的就是原始材料！那是鐵證！現在弄虛作假的東西太多了，沒有一點意思！現在鄧小平這些人攻擊人家張平化和其他的一些人，目的都是為了給這些人翻案。”

（以上參見《汪東興傳》第 357 至 362）。

為更利於說明問題，不妨重複一遍江青同志的辯護詞：“劉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監所寫出來的，難道是我編造的嗎？他是怎樣出獄的，連延安整風的時候，你們現在的中央裏的人都提出過懷疑，還有揭發，……。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小將和革命造反派揭發出他們大批這方面問題，才進一步引起了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才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專案組。這個專案組所有的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組都參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體審定、共同研究的，你們僅僅抓住我批准了他們拘留了幾

個人的報告，就斷定劉少奇的專案是我江青一個人製造出來的，是不是編造得太離奇了吧？”鄧小平看了江青的辯護詞後說：“……，不能讓她這樣為所欲為。否則，就收不到我們審判的預期效果。”

監管人員詢問張春橋有關問題時，張春橋：“熟悉內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義，指使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裏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國民黨政府必須規定的出獄手續’，即在國民黨的報紙上刊登《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後，才能給予釋放的條文，同意他們這樣做。後來，薄一波等人按照這個指示的精神，這樣做而出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為自己辯解說：‘我們是執行中央指示的，是服從紀律的表現。’毛澤東看了他們出獄時發表的《反共啟事》後，氣憤地說：‘這明明就是自首書，什麼出獄手續。’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從這樣的叛變決定。就憑這一條，定劉少奇是叛徒頭子，就不為之過分！”“現在，這些人居然一個個都平了反，重新擔任了中央的高級領導職務。”張春橋幾次哼道：“這樣的中央還能擁護嗎？這樣的中央還能服從嗎？現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義的天下，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寧死也不屈服的！”（參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張春橋在獄中》）。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編者按：書店以該書為某權威黨校用書作廣告）第三冊，有如下內容：1967年“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

國黨的領導人時的談話中還稱‘劉少奇同志’，並且說：‘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按：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毛澤東什麼時候改變了不打倒劉少奇的態度呢？根據現有材料分析，作出這一決定的時間大約是1967年3月”。“3月1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61人出獄問題的材料，在批語中用了‘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等嚴厲的字眼”。我認為，關於毛主席改變對劉少奇的看法這一部分分析，該書只是敘事方面含糊其詞外，但仍看出與其他公開材料及本文上述材料基本一致。但有關劉少奇這個問題，本書其餘部分沒有對上述出獄自首書這一原始根據作針對性的陳述，離題較遠，因此沒有抄錄其餘內容，有興趣的朋友可參閱該書第三冊，第1539至1546頁。

李雪峰在接受師東兵的採訪時，對於1936年的時期他說過一點看法，他說：“我在戰爭年代裏處理叛變革命的人，是要區別兩種情況的：一是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而寫了自首書，但是沒有出賣組織，沒有殺人；二是經不起敵人的利誘和拷打，出賣洩露了黨的機密後，又用同志的鮮血來換得了自己的生命或者也被敵人處死，這樣的人是堅決要鎮壓的。總之，要有區別，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就沒有黨的規矩。關於薄一波和劉少奇他們被捕以後的情況，我沒有發言權。所以康生和戚本禹他們或他們派來的人都找過我，我都是這麼回答的，他們也沒有辦法說什麼。但是，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

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參見師東兵《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雪峰》一文）。

從上述情況看，基本上可以看出：

1、十二中全會作結論的主要依據是他們的“反共啟事”，即歷史證據；

2、第二種看法是以《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一書為代表，它含糊地說“61人出獄問題的材料”是定案主要依據。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指的是“出獄”時的“材料”，而不是有些人說的文革期一些人逼供信的“口供”。遺憾的是該書有關這個問題並沒有針對“出獄問題的材料”的真偽進行是與非的論述，而是避開這個主題，羅列了一堆文革期間所謂逼供信的問題。說是一個權威性黨校的教材，“出獄問題的材料”用詞之含糊，不知是語文水準問題還是有難言之苦？！

3、還有一種是包括華國鋒為代表的一些人公開講的並向下傳達的，乾脆就不講“反共啟事”，全是江青、康生、謝富治搞逼供信的口供，而且全都是假的。《毛澤東傳》這本書也是按這個口徑講的，看了就不知對該書作者逄先知等兩位老同志表示遺憾好呢，還是表示讚美好？

我的看法：

1、說文革中都是幾個人逼供信搞的假口供不可信，例如上述李雪峰講的，文革期間，“康生、戚本禹他們或派來的人……”，就不存在逼供信的問題，而且他明確表態：“讓薄一波他們寫這種《反共啟事》，我保留我自己的看法。”這明顯是不贊同華國鋒們作的結論。但華國鋒們扣壓這種不同意見，更沒有向全黨傳達。這明顯是在

批評旁人搞假材料的旗號下，自己搞假材料。

2、在我已發表的文章中，介紹了周總理的講話：關於被審查的老同志的問題要七個人簽字才有效。這從上面汪東興一段話和江青的辯護詞可見，不僅周總理的高貴人品使人高度信任他的講話，而且證明總理講的是真實情況。華國鋒們不知出於何用心，把如此嚴格的制度，貶為等同于“英明領袖”華主席的中央一樣亂成了一團糟，只能理解是另有打算，是對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誣衊。

3、不管是誰，決定讓關在獄中的人寫反共聲明、並宣揚國民黨，無疑是叛黨行為；華國鋒翻這個案，不管處於何種情況，該以叛黨論處。不這樣處理，不足以嚴明黨紀。

### 三、鄧小平的案該平反嗎

毛主席晚年，從林彪問題以後直到去世，一再憂慮：在他死後“老帥們要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麼辦？”（參見姚文元《回顧與反思》）。他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要反擊右傾翻案風，“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資派還在走。1976年6月5日，重病中的毛主席召集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王海容等人談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歲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同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

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參見時事出版社《新中央機密》第268頁）。

回顧毛主席這些為民擔憂的肺腑之言，再來看看毛主席逝世後某些人的表演，我們可以下個結論，毛主席的理論，是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這裏所談給鄧小平平反的問題，涉及到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和1976年4月5日天安門事件兩大事件。尤其是天安門事件，中央認定鄧小平是後臺，而作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這也是鄧小平平反的關鍵問題。因此，本文重點介紹天安門事件。華國鋒、汪東興為一派，葉劍英、鄧小平為一派，兩派間的唇槍舌戰，也是關鍵的一戰，兩派幾乎人人“上戰場”，在此僅介紹幾個關鍵人物參戰情況。

這一派鬥或內訌，從1976年10月7日起，即兩派聯合武裝綁架了江青等四同志，接著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汪東興、葉劍英精心安排下，以武裝壓陣，誰持反對意見就抓誰，“通過了”他們武裝綁架的行動，並決定華國鋒當了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至中共十一大召開為止。其性質，屬於兩派聯合宮廷政變，武裝綁架了江青等四人後，兩派分贓不均而引起的。那次武裝壓陣開政治局會議，在黨史上是空前的“中國特色”的會議。

政變後華國鋒當了“英明領袖”，汪東興保護華國鋒

“英明領袖”的寶座，以兌現華已承諾他自己在十一大當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綁架江青同志等以後，所謂“揭批和清查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成了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壓倒一切的急迫大事。汪東興總擔心他竭力要保護的這個領袖隨時都有被推翻的危險，日夜擔心江青的保護者們會在一個晚上造起反來，所以預定用三年時間把被稱之為‘四人幫幫派體系’的人統統揪下臺，趕出去，能打倒的打倒，不能打倒的給予清洗。”（參見《汪東興傳》第200頁）。在這個問題上，兩派間沒有矛盾，都有排斥異己的急迫需要。據目前部分省市揭露的情況看，全國上下在這場大清查中製造的冤假錯案，有同志在互聯網披露說全國有四千多萬人被迫害（註：這個數字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其中不少人被殺了頭、判了刑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這次對新老幹部、群衆（包括未成年中小學生）、進步知識份子的殘酷迫害，涉及面之廣、涉及人數之多，均創中華歷史之最，其中不少人被判了長期徒刑。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引起了社會各界強烈不滿，以至黨、軍威信一落千丈。

但有的人他們卻不敢碰。例如鄧小平鬧翻案的問題，汪東興當時在各種會議上說：“還有一種錯誤的議論，說‘四人幫’是反鄧小平的，不對，應該說‘四人幫’和鄧小平都是一路貨，他們都是反對毛主席的。在復辟資本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上，他們的目的和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華國鋒針對一些人為鄧小平翻案的議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汪東興同志的講話很好，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許多問題。我建議把他的講話作為中央文件

印發下去，以此來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認識。總之，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能退步。”

緊接著，“華國鋒召集汪東興……等人經常碰頭開會，研究當前形勢和對策。汪東興說：‘現在黨內圍繞著要不要給鄧小平平反的問題，我們和葉帥……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將會有一場比較大的爭論和鬥爭。依我看，這場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們退步了，就會在全國人民面前敗下陣來，那我們就不是毛主席的繼承人了，而是人家所說的右派了’。”華國鋒說：“可是葉帥這些人也是得罪不得的呀，我們總不能因為這個問題和他們決裂呀。”

葉劍英知道汪東興的講話後，對人說：“汪東興充什麼大頭，在鄧小平同志眼裏，根本沒有他們的地位和說話的機會。和我們相比，他還是一個乳臭未乾的三流政客，他能當什麼黨和國家領導人，這簡直是開國際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戰，也輪不上一個警衛人員出身的人當什麼大頭呀。他連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沒有，我們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見識。”這些傳到華國鋒那裏，“華國鋒怔了一下，但他很懂得這話的分量，沒有和任何人講”。

至1977年1月，“北京市的十幾名青年人冒著風險，在十里長安街上貼出‘強烈要求為鄧小平平反！’、‘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不是反革命行動，不為這個事件平反，天理難容！’‘堅決把繼續堅持四人幫路線的野心家、陰謀家揪出來！’等標語和大字報”。

北京市委書記吳德：“立即破案，同時整了材料，上報到華國鋒、汪東興。報告說：‘今年以來，北京市先後

出現了多起公然為鄧小平翻案，把矛頭直接對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反革命傳單、標語、講演和其他形式的案件。他們的目的就是抬出鄧小平、反對華國鋒、保王洪文上臺，這樣的反革命事件，如果中央不採取強烈措施，就會在全國引起連鎖反應，造成不應有的嚴重後果”。汪東興批示：“請華主席閱。我的意見，對這類反革命案件，必須狠狠地打擊，為首的要堅決殺掉。不採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手腕，我們的政權就有顛覆掉的可能。”華國鋒批示：“對寫這樣的大字報、大標語的人要堅決逮捕法辦，對少數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人，要堅決殺掉。同時批發了 1977 年第五號、第六號文件及國務院三十號文件，要聲勢浩大地開展追查政治謠言的運動，開展打擊反革命破壞的運動，鎮壓這批人，以鞏固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絕對領導。”

接著“許多老同志都為鄧小平的平反公開說話了”。華國鋒急切地說：“真沒有想到毛主席才逝世幾個月，他的話就有人敢這樣懷疑和不尊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明明是毛主席講的嘛，有人便要扣栽在‘四人幫’頭上，即使我講了也不頂用了。”

1977 年 3 月，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汪東興建議，華國鋒在會上講了話：“現已查明，有那麼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直在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的問題上作文章。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鄧小平同志出來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志。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臺，為‘四人幫’翻案。所以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

的當。再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鄧是完全必要的，還是要繼續批的，凡是毛主席決定的東西，我們如果不執行，那麼我們還談得上是繼承毛主席遺志嗎？這個道理簡單易懂，問題是有些同志能不能聽進去的問題。我們現在講抓綱治國，就是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把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事業進行到底。不這樣，我們的同志就還要會政治上犯極大的錯誤。”

這一講就議論開了。這時葉劍英講了活：“我們怎麼能像‘四人幫’那樣呢，動不動就搞大批判，還讓不讓人講話？這種國民黨作風早就結束了，現在我們黨能否興旺發達，關鍵就要看我們黨中央能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使全黨全國人民同心同德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鬥，這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前途問題。如果還像過去那樣鬥來鬥去，我們的國家非滅亡不可。”這話一出，“華國鋒被各種各樣的議論所圍，……。”華國鋒建議他和汪東興和葉劍英談談天安門事件的看法。

華國鋒說：“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葉副主席感到為難的話，我們可以自己承擔責任，不要葉帥負責。”

葉劍英說：“我不是那種害怕負責的人，我是想弄清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參與天安門事件的人，究竟是反對‘四人幫’、還是反對毛主席，我看了吳德他們提供的材料，看不到一句是直接攻擊毛主席的，倒是大量的詩詞、標語都是反對‘四人幫’的。為什麼我們就不能允許群

衆在當時反對‘四人幫’呢？我看這個問題還應該研究。這和鄧小平的問題是兩回事。現在應該看到，不管天安門事件是什麼，都和鄧小平沒有任何關係，他沒有參與那個事件。‘四人幫’為了陷害鄧小平，捏造說他是這個事件的後臺，其實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所以，我傾向於很快給鄧小平平反。這個態度，請你們考慮。”

汪東興說：“葉帥，鄧小平的問題並不是當前主要問題。他作為黨內資產階級代表，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物件。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樣，黨員的一部分，有的已經變了，有的正在變，如果不警惕，也會變。那些犯過走資派的人，……。但鄧小平……。”

葉劍英：“汪主任呀，你的這些話，我怎麼越聽越覺得像‘四人幫’的幫腔幫調，這番大道理究竟他們作的怎麼樣？他們是怎麼幹的？怎麼總是要對準我們這些老傢伙呢？”“現在有少數的人給華主席和你汪東興都貼了大字報，有些信件都寄到了我的家裏，說你汪東興才是地地道道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僅在中南海的住房就好幾套，都是高標準的豪華住宅，說你搞特殊化的行為都有具體的事實。但是，老同志們為了保護你，都在千方百計地為你解釋，替你辯護，這正說明了大家在愛護你。要是按照‘四人幫’的那一套，你豈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了嗎？毛主席說總有那麼一部分人變了，這個話誰說誰有理，這頂帽子可以扣到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頭上，你能解釋得清楚嗎？……，還是都好自為之吧。”

汪東興說：“現在有些人的確是在把水攬混，攻擊我們這些人，但是，這和為鄧小平翻案、為天門事件翻案

是拉不到一起的。是否我們給天安門事件平反了，這些人就不搞了呢？我看照樣鬧。他們為他們的反革命本性所決定，是一定要和我們作拼死掙扎的。”

葉劍英說：“這話錯了，要說天安門事件的後臺，如果硬要說鄧小平一個的話，那也可以把我也拉上，我也算一個。這能說明我們都是反革命嗎？”

汪東興忙說：“葉帥，我決不是這個意思。你老人家千萬別生氣，有話我們慢慢說，什麼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就算我們要為鄧小平平反，現在起碼不是時候，也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機會進行嘛。”

“鄧小平曾讓王震試探過汪東興的態度，讓他在華國鋒面前替鄧小平說幾句公道話”，而碰了壁。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中央寫了一封信（內容略）。華、汪看了這封信後，華國鋒說：“這封信可以給公開，但是僅有這封信還是不夠的。他必須公開對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公開表態，承認那是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事件，承認毛主席給這個事件定的性是完全正確的。”

汪東興：“還是華主席英明，一下子就抓住了根本的要害讓他來表態，……。”

華國鋒：“你也要考慮到老鄧這個人不這樣作的準備。這個人很狡猾，我聽一些人說過，鄧小平是一個最大的實用主義者，他用得著誰的時候，甜言蜜語，什麼話都說，為了達到他個人的目的，他是什麼事情都會幹，什麼語言都會說的。但是他一旦達到了目的，他說過的一切統統都會賴帳，這一點，我看我們還是要小心點。不過無

所謂，反正中央的最高權力在我們手裏，我們不怕他造反。”並要汪親自同鄧談一次。汪要鄧作檢討，鄧拒絕了。

鄧小平：“我出來不出來工作沒有關係，不出來也可以給你們當當參謀嘛。但是，我可以肯定說，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悼念周總理何罪之有？那麼多群衆參加悼念總理，怎麼能把他們說成反革命呢？這樣下去，你就不怕群衆來同我們辯論嗎？毛主席在的時候，可以鎮得住許多人，但是你別忘了真理畢竟是真理，採取高壓政策是不會持久的。”

汪東興：“小平同志，還是放得明白一點吧，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現在依然是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而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這一基本原則的。誰如果動搖這一條，就是背叛。”

鄧小平：“不要這麼說話，真正維護毛主席崇高威望並不是維護他老人家的錯誤，而是要真正繼承他的遺志和事業。我給華主席和黨中央的信裏已經明確地講到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而且我相信我們一定會統一這個看法的”。

汪東興：“天安門事件已經使主席夠頭痛的了。主席說，他們打人、打員警、放火……。”

鄧擺擺手說：“這個你還是不要給我再講了，講了我也是不願再聽下去的。這些東西毛主席在病中是怎麼知道的？都是‘四人幫’那些人給主席灌輸的歪曲事實的東西嘛。如果相信了‘四人幫’和那個聯絡員的捏造，華主席包括你將來都可能要成為比我還要壞的罪人。現在我們再把‘四人幫’捏造的東西翻出來，打上毛主席

的旗號來貫徹，我們的黨和國家會走到什麼樣的地步喲？這個你想過沒有？”鄧小平接著批“兩個凡是”的問題……。

（以上這些參見《汪東興傳》第 202 頁至 235 頁）

最後，華國鋒在“鄧小平平反出來工作會支援他，以及不再分裂等問題得到肯定答復後”，在這樣矛盾叢生的背景下，召開了十一大，兩派都分得一塊“蛋糕”，華正式當上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汪東興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這前他和胡耀邦擔任了中央黨校副校長，華國鋒任校長；鄧小平得到平反，恢復了 1975 年的全部職務。華國鋒在十一大上代表中央宣佈 1976 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是錯誤的，宣佈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在這以後，當一派“勝者為王”後，關於天安門事件某些關鍵情節，才從“暗箱”裏倒了出來：

“1976 年 4 月 2、3 日左右，即天安門事件爆發前夕，鄧小平已靠邊站了，但還沒有被撤職。那天晚上，胡耀邦被人陪著從北京飯店到鄧小平的客廳，這位領導人正在等他。胡耀邦將幾份文件和材料遞到老頭子面前”。

“他（指鄧小平）看了一遍（文件和材料），把材料放下，說：‘參與者並不多’”。

胡耀邦：“是的，但廣大群衆肯定會捲進來的。第一、總理在人民群衆中有崇高威望，群衆都知道那幾個人是反總理的，而你正是總理最信任的；第二、發動悼念總理的計畫極其保密。連我的悼詞也是孩子們送去的，我認為明智的辦法是把參與者壓縮到最小的數目。在需要瞭解的情況下，也不會有人知道真正的目的；第三、反

過來，由於時間特別緊迫，必須儘量少兜圈子。過去採取重大措施時總是習慣於用幾個月，現在必須縮短到幾天，幾小時之內。”

“鄧小平慢慢點著頭：那麼，你認為這樣做能起什麼效果嗎？”

“整個行動的關鍵，是向中央顯示一下人民的力量。讓毛主席知道，人民並不贊成他的這一套計畫的。他老了，糊塗了，以為他的任何決定人民都會俯首地喊擁護，不見得。總理一死問題全暴露了。”

“鄧小平笑笑，說，翻案不得人心。”

“我看，正是人心所向。”

“你說這話要注意呢，你的缺點就是說話總讓人抓住把柄，搞得太過火不行，就是來我這裏也要注意。最後一點，我不想讓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使人看（到）我和天安門廣場的事有什麼關係。我已囑咐我的孩子誰也不能到廣場去，因為，誰也不知道誰會被人監視。或者……（沒說完）。“他把面前那幾份文件和材料拿在手裏，劃著一根火柴，把它們點燃了”。“說話一定要注意，不能像維吾爾族姑娘似的，滿頭小辮子，那幾個筆桿子，最喜歡抓人的小辮子，而我也是小辮子最多的一個人”。

（以上參見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紀實》第 534 頁）。

“當時葉劍英對天安門廣場及全國各地的悼念周的活動極為關注，不僅每天派人去天安門廣場瞭解情況，抄錄詩詞，還冒著風險，親自乘車去天安門廣場看群衆抄錄詩詞，看小字報，瞭解事態的發展”。“原解放軍三零

一醫院護士周美華曾告訴筆者：在清明節那天，首長起床以後，大概是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就悄悄地拉著我和‘馬頭’（警衛參謀馬西金），讓我們陪著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看一看悼念周總理的盛大場面。開車到了天安門廣場，當時車開得很慢，天氣也比較陰沉，這時候我們繞紀念碑轉了一大圈。在這過程中，首長幾次要下去看一看，但是都被我們勸止了”。“葉劍英的一個頗有詩才的孩子馨兒跑到天安門廣場貼上自己的哀詩。事過十餘年，筆者向他索取這首詩，他記憶猶新，當場揮毫相贈。詞曰：人生七十不為天，唯到君歸偏恨早。屍骨未曾寒，風雨漫如磬。五十年來事，錘煉人民志。泣血醉中魂，濟濟後來人。西元 1976 年 4 月 2 日在天安門”。（參見《新中央機密》第 229 至 230 頁）。

當時中央處理天安門事件的情況也隨之公開：

1976 年 4 月 4 日，“當晚，華國鋒主持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會議認為：天安門事件‘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動群衆藉此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干擾、破壞鬥爭的大方向’”。爾後，北京市對天安門廣場事件作了處理。“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開會聽取北京市的彙報，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動’，認為：‘今天取得的勝利，但教訓太深了’，應‘提高警惕，準備應付更大的鬥爭’。會議提出要將這件事‘儘快通報全國’，並給予公開報導”。“四月六日，政治局會議後，毛遠新給毛澤東送去關於政治局會議情況的報告，毛澤東當天在報告上批示，贊同政治局的處理意見”。“四月七日上午，毛澤東再次聽取毛遠新彙報，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對天安

門廣場事件所採取的措施。提議由政治局作出兩項決議：一、任命華國鋒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他主張公開發表這兩項決議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當晚，廣播電臺全文播放中共中央‘兩個決議’、《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導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下冊第 1775 至 1777 頁）。

有的“敗者為寇”者也公開了一些內容：  
如姚文元的部分日記：

1976 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瞭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臺？這個政治後臺，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 4月4日

今日高潮仍是國家機關、七機部、科學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狀，掛在吊燈上。海燕在洶湧的波濤上迎風飛翔，共產主義戰士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反革命活動會鍛煉出一批革命派，這也是歷史的辯證法——太順利了不好。晚上政治局開會，我接到《人民日報》記者電話，告廣

場上有人進行反革命演說，直接點了江青的名，內容極壞，無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報告，激起了多數同志的憤慨和警覺，決定立即逮捕這兩個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隊戒嚴、封鎖進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吳德和倪志福同志緊張地走了。不久，即聽到這個壞蛋被捉住的消息。無產階級專政總得有一點“專”的樣子呵！太軟了！北京市還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謠言一時難以全部肅清。問題還在部隊中？前兩個月批鄧中我曾說：如果下次再來比這次更厲害時，人們都當作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從全國看，太原、西安、瀋陽均有發現。凡不批鄧的，都在保周的口號下集合起來了。這是一次階級陣線的鮮明劃分。

4月5日

今天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門廣場的表演，並自始至終參加了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下午二時，政治局緊急開會，人民（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動，反革命暴動事件，打了解放軍，燒了汽車，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衆，並且衝到人民大會堂東門。一批人在紀念碑進行反革命煽動，號召成立反革命組織，以“悼念”總理為名，倡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鄧小平上臺，喊“某某（註：筆者刪去原文人名）萬歲！”

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陰謀越來越露骨。其中提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鄧小平主持工作是他們“決定性勝利”。聽了這個情況，我提出此事已帶有反革命政變性質，要立即採取措施，開短會，不要多議。當即決定：由吳德發表講話，指出這是反革命性質事件，號召群衆離開廣場，然後立即組織民兵進行包圍、分割後拘留其骨幹分子，予以有力打擊。三時散會，我先到人民大會堂廳外，看見了廣場全景，四大批人擁來擁去，兩堆火還在歷史博物館外燃燒。我即請政治局同志都上來看一看，在江西廳，大家都來了。這是觸目驚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壞蛋始終不動，誰去反對就打誰，另有一夥人進行反革命演說，送花圈、貼傳單。外面有好幾萬人，流來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騎腳踏車的人飛快地來回巡邏，看來是通風報信的。還有不少小汽車，有不少是部隊的。不一會，解放軍營房的小樓著火了，又一輛車著火了，火光熊熊，黑煙衝天。於是，看見樓上把被子、床單、衣服、書箱、紙張一批一批地從視窗擲了出來，擲到火中去燒。救火車無法接近。

望遠鏡中，看見有一個傢伙爬上紀念碑放了一個大花圈，用繩子把它圍起來。政治局同志看到這一切，無不仇恨滿腔，階級鬥爭是這樣尖銳，這已經是武裝暴亂性質了！

近些年互聯網上披露了緊跟鄧小平的楊尚昆的日

記部分內容：“1988年7月19日：胡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慾惡他搞起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19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是秘密地在家裏與師東兵見的面，連家人和秘書都瞞住了。耀邦告訴我，19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悼念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今天我給總理致悼詞，或許我們死後就沒有人給我們致悼詞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3月中旬，鄧又找到我，說他的孩子聽人說，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一點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耀邦又說，小平讓我找幾個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一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但有個別人把矛頭對準主席，這也是我們沒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搶，打傷了許多解放軍，小平後來也很生氣。認為這是讓他下臺的直接導火線。這也是後來我們沒有給‘四·五（事件）’高調平反的原因。因為如果不是那幾個人把矛頭對準主席，不搞打砸搶，主席根本不會讓小平下臺。而他就會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擊江青和張春橋了”。“19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一趟，觀察現場的動靜。回來後，透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但他謊稱是去北京飯店理髮的。其實鄧小平一直都是讓北京飯店的師傅去他家裏理髮”。“1988年8月5日：又和耀邦見了一面，耀邦說，小平是過河拆橋式的人，你要當心。同時，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說這是她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

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處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當然，還有人掌握了聯動成員19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殺人的主謀是高福興和胡德福不是當時就判了刑了麼？耀邦說，是呀，可高福興和胡德福在19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說是聯動成員幹的，他們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任政治局常委，把這件事壓下來了。1983年指示我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著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門的幾個幹部秘密向這些‘黑五類’人員的家屬通風報信，結果這些家屬便起來鬧事，反對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將北京市公安部門的這幾個幹部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我聽了很震驚，說我們現在講法治，怎麼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麼幹過呀！耀邦說，所以我內心很愧呀。但我已指示將這24名幹部作為因公死亡處理了，也給他們家屬撫恤金。其中5個幹部也授予了烈士稱號”，“1988年8月6日，耀邦說還有一件事很後悔，凡是群衆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一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關於楊尚昆的日記，互聯網還公佈了有同志“電話訪問了在西安住院療養的胡績偉同志（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證實楊尚昆的日記確有其事……”。並補充說：“因為朱國華是個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又是朱老總的孫子，‘四人幫’不敢把他怎樣。朱國華當時不到20歲，是北京一個工廠的工人。胡耀邦的兒子請他喝了一頓酒，又講了一些江青和張春橋迫害他爺爺的事。當時朱國華曾問，這些事他怎麼沒有聽說？胡德華便說，你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怕你生氣，沒有告訴你。這下把朱國華氣壞了，發誓一定要讓江青、張春橋好看。他和其他幾個高幹子女便在工人中間透露了許多不利江青、張春橋的消息，這些工人便攻擊江青、張春橋了，朱國華也曾去過天安門。……，1983年嚴打時，（朱國華）因和30多個女青年發生了關係，這些事情現在看來不算什麼，但當時屬流氓罪，判了死刑”。網友問他這算不算滅口？

上述楊尚昆日記的真偽，本人無法調查核實。但值得注意的是，楊尚昆日記中關於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四·五動亂”的情況，同前面官方核准出版的圖書中介紹的情況基本吻合。

從以上史實看，華國鋒宣佈給鄧小平平反，是嚴重的反黨行為。事實說明，文革對走資派太寬容了，一些走資派篡權後，造成了大量無辜人民人頭落地的慘痛悲劇。

以上，劉少奇、鄧小平兩人的案子，證明了毛主席對人的處理，十分慎重，嚴格把握了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的原則。對劉、鄧二人，“文革”初，毛主席都重在

教育，直至九大前，都打算把他們選進中央。關於劉少奇，毛主席親自看到了劉少奇逼了 60 多位在國民黨監獄的共產黨員寫的反黨宣言後，已無法再保他們時，才改變了態度。關於鄧小平，在“文革”時期，毛主席對他基本上是親自安排把他保護起來養著，不讓中央文革和林彪插手（毛主席知道林、鄧有矛盾）；1975 年四屆人大會上傳達的第一個中央文件就是毛主席力主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就是廣為知道的毛主席說鄧“人才難得”。即便到了 1975 年底，毛主席已敏感地斷定鄧小平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資派還在走，也只是批判歸批判，鄧小平還繼續工作，並提名讓他為周總理追悼會宣讀悼詞。但現從公開的一些國家批准出版的書、刊證明：鄧同葉劍英等早就策劃武裝宮廷右派政變，至 1976 年清明節前後，夥同胡耀邦、葉劍英等人，精心策劃了矛頭直指中央、毛主席的震驚中外的“四·五大動亂”，採取的手段是造謠惑衆，製造江青同志等“反總理”，他是總理“最器重的”等謠言。即便到了如此囂張反黨篡權的地步，毛主席還堅持了對他“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鄧小平政變篡權後的表演，充分證明了他背叛了黨、背叛了社會主義、背叛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篡權後，對毛主席一家，迫害了多少人？他企圖殺掉江青同志，激起了世界上不少社會團體、知名人士的義憤，公開提出抗議；在黨內不少老同志，例如陳雲等堅決反對，才不得不甘休。

#### 四、走資派對造反派瘋狂反攻倒算

走資派為自己翻案，替“四類分子”平反、摘帽的摘帽（註：應嚴格區別有些是該平反、該摘帽的，本文指的均指不該平反、摘帽的）。這為走資派上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打下了階級基礎。與這同時，用法西斯手段，把成千上萬解放後緊跟毛主席、共產黨幹革命的造反派鎮壓下去。在華、葉武裝綁架了江青等同志後，在全黨、全國清查所謂的“三種人”，許多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優秀幹部（各年齡段）、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解放軍指戰員等慘遭迫害，不少被判了刑、丟了腦袋。從中央到農村、工廠、街道最基層進行大清洗、大換班。有人公開聲言要選拔“文革”時期的“逍遙派”為接班人，公開保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復辟資本主義的更是飛黃騰達。從近些年各類媒體報導的情況看，一些“重災區”，例如中央、北京、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河北、浙江、廣東等省市和中央直屬部門和單位，遭迫害的人數之多、情節之慘烈，不僅在中共史上是空前的，即便是中華民族史也是空前的。其中許多是憑空捏造的假案、誣陷栽贓案，大量是冤案，以至慘無人道的殺人滅口。河南劉建勳同志就因為當面批評了鄧小平幾句，就被打成“四人幫”的“三種人”；一個15歲的小女孩，因造了師道尊嚴的反，連同家長被強詞奪理地惡毒批到了全國家喻戶曉；像國防科委“以李敏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一類的假案等等，

遍佈了從中央到全國各地。而且，凡被迫害的，都株連九族，大多被剝奪工作權利，開除、判刑成了家常便飯，許多同志至今生活無著落，大量被迫害至死。

2011年1月26日，陳時秋同志發表的《在“揭批查”運動中，張小定之死》一文稱：“據目前部分省市地區揭露的情況看，全國上下在這場‘揭批查’以及清理‘三種人’特大運動中，製造的冤假錯案，全國有4000多萬人被殘酷迫害，其中不少人被投入監獄和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和被槍決。”

緊跟毛主席、黨中央並響應中央一致通過的決議號召而慘遭迫害，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走資派、“四類分子”、資產階級反社會主義知識份子、賣國集團、黑社會、流氓等受到包庇重用並篡奪了各級領導權。香港媒體《東方日報》（2011年）4月19日發出《中華民族向錢看到了最缺德時候》的吶喊，在網上引起強烈共鳴。文章用《三國演義》“諸葛亮罵死王朗”中的一句名言形容今日之中國：“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這也在毛主席的預料之中：“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 第三章 與“文革”有關的一些重大問題 和事件的思考

這近 30 來年，由於鄧小平以及一些復辟勢力，圍繞“文革”，採取歪曲史實、偽造歷史、嫁禍栽贓等手法，達到全盤否定“文革”，為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地、富、反、壞等翻案，為復辟資本主義造輿論。前面介紹的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是其中兩個典例。有關一些重大問題和事件，必須群策群力，把它搞清楚，以正視聽才能還一個真實的“文革”史。

### 一、毛主席、黨中央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

任何事物的發生，都有其主、客觀原因和條件，“文革”也不例外。

#### 1、文化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專利”

其實，翻一下人類歷史，就會發現，任何朝代或歷史階段，統治階級無一不重視對人們思想意識形態的改

造，以符合階級統治的需要。封建地主階級奪取政權後，就宣揚“宿命論”，宣揚地主、長工（被地主雇傭的農民）、富人、窮人等等，都是前世命中註定的。這輩子受苦，是因為前世幹了壞事，“閻王懲罰你投這苦命的胎”。以束縛人們服服帖帖聽從壓迫和剝削，而去燒香拜佛“修來世”……。魯迅先生筆下的名著《祝福》生動而形象地揭露了封建地主統治階級這類說教的樣板。一部《紅樓夢》把封建社會殘酷的階級關係描繪得有聲有色。在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後，就宣揚資本家剝削有功、合理，剝削也是“勞動”，而且資本家是“社會中堅”即“能人”；同時宣揚“民主”、“自由”、“博愛”、“和諧”……；教育工人服服帖帖“歡迎剝削”。日本的八年侵華戰爭、美國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它們的“民主”、“自由”、“博愛”的遮醜布徹底被揭開。大家看得見的中國走資派同美國“接軌”復辟資本主義後，僅就最近揭露的北京“截訪‘黑監獄’——‘北京安元鼎（公司）’”一例，就把資產階級宣揚的那些所有說教的反動本性，揭露得底朝天。統觀歷史，解放以前任何統治階級在奪取政權時，都是打著批孔旗號是造反派；而奪取政權後，就都是尊孔派，以維持其統治（註：即文革時期的“保皇派”）。為利於分析問題，在此重複摘一段毛主席的重要講話：

“我們共產黨人，是從批孔起家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走前面他們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們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來（改造）老百姓的思想時，落入歷史的一種迴圈，這是不行的。如果共產黨也到了自己沒法統治或者遇到難處了，也要把孔子請回來，說明你

也快完了。”（選自毛主席同毛遠新同志的談話）。

目前，國內、外資產階級都大辦“孔學”，走資派更熱衷於尊孔、朝拜孔子。這些人，口頭上還在批評日本官員朝拜二戰戰犯“靖國神社”，揭露他們復辟軍國主義的陰謀。但走資派尊孔，朝拜孔子，大辦孔學，從思想意識形態看，都是一路貨搞文化復辟運動。這些事實，證明了毛主席的上述論斷正確。因為我在這裏用了“文化復辟運動”一詞，為此我認為為了區別起見，把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當初為了分別從奴隸主、封建地主手裏奪取政權，這在歷史進程中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故把其對人民進行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教化，分別稱為“封建地主階級文化革命”和“資產階級文化革命”；當其奪取政權後，逐步腐敗墮落為迫害、鎮壓勞動人民，嚴重阻礙社會發展，這時的思想意識形態方面的教化，分別稱為“封建地主文化復辟（或倒退）”、“資產階級文化復辟”。這樣界定，符合馬克思主義，把各類階級搞的“文化運動”把其階級屬性標清楚。但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他們的共性：都不敢公開承認階級，更不敢承認階級壓迫和剝削，而用一些“博愛”、“平等”、“和諧”之類的名詞，掩蓋赤裸裸的客觀存在的尖銳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就我們身處其境的 30 來年，走資派聲言“沒有階級”、“不搞運動”。但我要請問；一些“官員”宣揚並推廣“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剝削有理、剝削有功”、“資產階級的平等、博愛、和諧”、“先富論”……，以至文化部長到臺灣，馬不停蹄地先去參拜胡適“故居”；與這同時，他們瘋狂貶低、歪曲、否定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是想幹什麼？難道不是走資派在搞資產階級文化復辟運動！

以上說明，“文化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專利。歷史無可辯駁地說明，過去的30多年，是走資派瘋狂地搞資產階級文化復辟運動的30多年，只是他們不敢公開承認和打出這面黑旗，而用“和諧”、“民主”等等把這些掩蓋起來。他們聲稱“不搞運動”，宣佈“沒有階級”，只不過是為了欺騙人民群衆。他們心中有鬼。過去的30多年，也是他們極力醜化、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30多年。有史以來，只有無產階級不僅公開亮明文化革命，並宣佈其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即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還公開宣佈運動的物件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何等光明磊落！

走資派及其御用文人，胡說“文革”是毛澤東“主觀臆造”出來的，“無任何現實意義”……。這些論調，純屬是他們對人類歷史的無知，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無知。毛主席對文化革命的最大貢獻是，不僅人類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文化大革命”，並給予了明確的無產階級階級屬性；而且宣導了發動群衆運動，尤其允許人民群衆組織起來，自下而上，用“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向他自己領導的共產黨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揭露、批判、粉碎走資派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權而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同時讓廣大人民群衆在同走資派的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以避免歷史週期律的重演。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說：“提出一

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解決一個問題也許是一個數學上或實驗上的技巧問題。而提出新的問題、新的可能性，從新的角度看舊問題，卻需要創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標誌著科學的真正進步。”愛因斯坦這段話，雖是針對物理問題講的。但我認為同樣適用一切科學的探索，包括社會科學。大家熟知的馬克思揭露的剩餘價值論、科學社會主義等等，對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可見，毛主席提出的、並親自領導和實踐了將近 10 年之久的一套完整的“文革”理論，不僅必將對無產階級革命發揮愈益深遠的積極影響，而且充分表明了毛主席的足智多謀。但也同哥白尼發現的天體說一樣，必將遭到一夥白癡、無賴、異端，尤其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文痞們的誹謗和無恥攻擊。

## 2、1966 年中央發動“文革”的時代背景

黨中央和毛主席為解決我黨反修、防修、防復辟的問題，先後嘗試了各種辦法，但都收效甚微，沒有解決問題。剛一解放，毛主席和劉少奇就展開了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爭論；1953 年，關於農村合作化問題，毛主席同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走資派，產生了難以調和的分歧和矛盾。但毛主席還是耐心說服、教育他們。1957 年中央決定開展整風運動，廣泛發動人民群衆提意見，但發生了少數右派分子配合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和臺灣國民黨反動派藉機企圖把共產黨轟下臺，取而代之。中央被迫反擊右派進攻。

反右一開始毛主席就擔心黨內一些官僚階層可能藉此對向他們提意見的人打擊報復，一再強調右派是少數人，並一再制定劃分右派嚴格的標準，估計僅 5000 個右派左右。但那個中央書記處幾個要員，反其道而行之。我當時還在大學念書，並擔任一個班級的反右中心小組組長，聽傳達中央書記處按比例抓右派的指示。在鄧小平主導下，反右嚴重擴大化，全國劃了 55 萬個右派分子，比毛主席估計的擴大了 100 倍。毛主席只得及時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一文，明確了右派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留得人在，搞錯了還可以平反。如果反右也像鄧小平清理“三種人”那樣大開殺戒，後果更不堪設想。對此，鄧小平雖也檢討說：“1957 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的，反右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啊。”可是他又巧妙地在“決議”中把自己的責任栽贓給了毛主席。

1958 年大躍進，劉、鄧大飈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干擾破壞大躍進。毛主席一方面採取果斷措施，狠刹“五風”，另一方面替人代過，主動為他們承擔責任。但他們利用毛主席在 1961 年七千人大會主動為他們承擔責任的講話，又把他們破壞大躍進而飈“五風”造成的嚴重後果，栽贓給了毛主席。

1964 年社教運動，劉、鄧仍無認錯悔改之意，不僅公開否定人民公社、大躍進，煽動包產到戶單幹，更是用形左實右的“桃園經驗”進行干擾、破壞，並開始搞非組織活動，企圖架空毛主席。

毛主席所有這些努力，都未能取得預想的效果，迫不得已，才提出搞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事實說明，無

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如何防復辟？毛主席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探索過程，最終提出用“文革”大民主的辦法解決，經中央集體討論一致（包括劉少奇、鄧小平）通過。毛主席說過，“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1945年7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窯洞接待來訪的黃炎培等民主人士。毛主席在回答黃炎培關於歷史週期律的提問時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文革就是防止歷史週期律最有效措施的實踐。

毛主席同劉、鄧在這將近十年的矛盾衝突中，最為重要的是兩件事。

其一、農村的合作化問題，這包括1956年辦農業高級合作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

矛盾的暴爆發點是山西省農民，在土改後不久，出現兩極分化，一些進步的農村幹部和農民，為了防止兩極分化進一步擴大，自發組織農業合作社（稱初級社），山西省委支持了走合作化道路，並給毛主席報告了這件事。報告先被劉少奇看到了，他認為這是“冒進”，指令山西省委作檢討。陶魯筭同志（當時的山西省委書記）對我說：他們頂著不檢討，因為報告是向主席報告的，毛主席是什麼意見，還不知道。後來毛主席看到了報告，批示讚揚了山西的農村合作化。結果，劉少奇等反落了個作了“檢討”，但劉少奇並不是真正認識了錯誤。後來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同志下鄉視察工作（包括去山西省），劉少奇委託安子文同志質問陶魯筭同志，“這些年，是群衆聽你的多，

還是你聽群衆的多”？這話的意思是說山西省委做了“群衆的尾巴”。關於劉少奇等反對山西省合作化的詳細情況，請參閱陶魯筭著《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劉、鄧更是瘋狂地煽動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和吃大鍋飯進行破壞。

原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揭露了劉、鄧搞浮誇風和幾件重大事件，現摘錄如下：

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有過這樣一段談話。

問：你的材料什麼時間寫的，交給了誰？毛主席看到了嗎？

吳（芝圃）：（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寫過一份。聽劉子厚說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劉少奇助長五風的信被劉少奇壓了起來，毛主席沒有看到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縣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是在這次會議期間寫的。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大躍進中的失誤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會開了二十多天。以省為單位分組討論時河南省向中央遞交了兩份書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寫的，另一份是以我個人名義寫的，實際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檢討。材料上提到了劉少奇五八年和我的兩次談話，記得材料交給了大會秘書處，糟糕的是，後來又從劉子厚口中得知，這份材料被鄧××扣了起來，他交給了劉少奇。毛主席看到沒有就不知道了。

吳：事情是這樣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確實找我私下談過話，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說當初周總理不應該提倡搞大躍進，周總理提倡搞大躍進是個人表現，想以此壓他劉少奇。毛主席更不該支持周總理搞大躍進，把一些超越劉少奇權利的事讓周總理去辦。劉還說三面紅旗提法過激，出了這麼多問題。誰提倡搞的大躍進誰應該對問題負責。我們在第一線為他們幹了那麼多工作，不應該再承擔責任挨棍子了。並說五風問題河南是重點省份，要我們河南深挖深究。劉少奇臨走時還對我說，他五八年那兩次關於大躍進和我的談話收回，就當沒說算了。

對劉少奇這種說話前後矛盾、說了又否認的態度我都懵了。大會結束時，我向毛主席寫了一封反映劉少奇態度的信，交給了胡喬木同志。

問：剛才你說了，五八年劉少奇找你那兩次談話，你還是以書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來，當時劉少奇對你這種行為就沒有什麼反映嗎？

吳：劉少奇並沒有什麼反映。不過，之後鄧××找我談了話。

問：鄧小平找你？什麼意思？

吳：鄧小平說劉主席（劉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齡大了，身體又不好，劉主席很快要主持全黨全國的各項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劉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後正需要人才，你吳芝圃盡力爭取麼。鄧××找我談過話後，我就意思（識）到是劉少奇變著說法向我敲警鐘，只不過他沒有出面

罷了”。

吳（芝圃）：劉少奇當時是政治局常委，後來又升為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下級有啥理由不服從上級的？誰知道他當時是別有用心呢？還有，王任重在一次談話中向我透露過，劉少奇正式成了黨中央主席後，準備讓鄧小平當國務院總理哩。當時誰都知道王任重同劉少奇接觸的多，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

問：看來劉少奇、鄧小平早已組成了資產階級黑司令部不是子虛烏有哇？

吳：現在回想起來是這樣。我再補充一句，劉子厚還向我說過，關於河北率先虛報糧食產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劉少奇鼓勵他們那樣做的，並多次讓他們向外省介紹經驗。河南就是吃了這方面的大虧。我個人認為，劉少奇、鄧小平對大躍進中的瞎指揮風、浮誇風和鋪張浪費風是應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當時他們二人在第一線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們佈置的。

劉少奇當時是政治局常委，為什麼還要帶頭大飈五風，以狂熱的極左面目破壞大躍進呢？帶著這個問題我曾拜訪過多位資深的老紅軍將領、高層的老幹部，解放前後五大書記身邊的工作人員，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辦公廳、國務院的工作人員，得到了兩種說法。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得了一場病。周恩來探望他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黨的主席、國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覺有點累。國家主席你擔任好了，我只管黨，會輕鬆些。

周恩來說：我只做總理，不做主席，主席永遠都是你的。並安慰毛澤東說，人吃五穀雜糧難免會生病，你的病很快就會好的。

這段談話在中央高層幹部中慢慢傳開，劉少奇聽到後眼紅了，對周恩來產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節期間，中央領導也像民間一樣相互拜訪、問候。劉少奇到周恩來家拜訪時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話中帶刺地說：“你是主席的大紅人，我遠遠不及你呀。”

所以說，劉少奇帶頭大飈五風、破壞大躍進是為了壓制周恩來。

另一個說法是：劉少奇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時，為了感謝赫魯曉夫對他的厚愛，曾經向赫魯曉夫寫過一封感謝信。信中向赫魯曉夫承諾他畢生致力於蘇中關係友好，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領導，永遠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等。劉少奇回國後，為了炫耀自己，曾經向多人談及過這封信的事。中蘇關係破裂後，劉少奇又否認了這封信。但話從口中既出，否認是否認不了的。

赫魯曉夫每次訪問中國，劉少奇都私自一人到赫魯曉夫下榻（釣魚臺國賓館十八號樓）談話，鬼知道他向赫魯曉夫談了什麼。

再則，五八年毛澤東提出了總路線，成立了人民公社，柯慶施建議大煉鋼鐵，周恩來提出大躍進，朱德正在休息，就顯得劉少奇無所作為。尤其是毛澤東對周恩來提出的大躍進鼎力支持，就更增加了劉少奇對周恩來的嫉妒心。

劉少奇帶頭大颳五風，破壞大躍進的動機是為了策應赫魯曉夫，向赫魯曉夫兌現他的承諾。

(註：以上選自甄石《大躍進五十週年回憶錄(1~19)》。甄石同志還慎重聲明：此文中的大量資料來源於黨史以外的調查，望網友及有關單位下載、收藏。如果政府肯把此文在人民日報上頭版刊登的話，我願意把所調查收集到的資料全部獻給國家檔案局)

### 其二、關於社會主義教育（也稱“四清”）問題。

關於合作化問題，毛主席同劉少奇等的矛盾，雖是根本性的矛盾，但僅在中央內部一些會議上的爭論，而關於社教運動的分歧，就向全黨公開了。

1964年12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說：“我黨至少有兩派，社會主義派和資本主義派！北京就有兩個獨立王國，我不說，你們去研究。”

1965年1月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的一些做法：“你只依靠（四清）工作隊，為什麼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不相信群衆，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衆講清楚，是清幹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

(註：以上選自《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

“1967年1月17日 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說：同劉少奇的鬥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條就是這場鬥爭的結果。圍繞23條的鬥爭，促使毛澤東下最後的決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澤東說道：‘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

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毛澤東傳 1949—1976》P1410）

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同志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了我個人，是為了將來這個黨、這個國家將來改不改變顏色、走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互聯網有文章披露：“毛澤東被逐漸的架空了。有一次會議，鄧小平說，這會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參加了。毛澤東堅持要參加，劉少奇說，參加可以，但不要發言了。毛主席說我為什麼不參加，為什麼不說話？以至於毛主席拿著黨章、憲法去參加會，說我是一個共產黨員，公民，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不讓講話，以示抗議。毛澤東作為一把手，但在講話時，劉少奇竟不斷的插話。主席說，四清主要矛盾是群衆與走資派的矛盾，劉少奇說，我個人認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他老打斷毛澤東的話，對毛澤東很不尊重。第二天毛澤東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上一坐，毛澤東說，第一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大家說有人不讓我參加會，也不讓我講話，對不對？毛澤東的話震動很大，全場氣氛緊張。最後，特別是許多軍隊的將領都站出來罵，哪個混蛋敢不讓你講話？”

1965年，中央一致通過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社教“23條”，並決定撤銷了劉少奇的“四清後十條”。文件明確

批評了“四清”、“四不清”的錯誤論點，還明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當時正在五機部屬下的北京一個工廠搞“四清”（接著到張家口地區的農村搞了一期“四清”），聽了23條的傳達，誰都心中清楚批評的是劉少奇（文件沒有點名），並清楚劉少奇搞的“後十條”，尤其王光美搞的“桃園經驗”作為樣板推廣，錯了。但實際工作中，工作隊主要還是套用“桃園經驗”，大多地區“四清”的情況是：神秘化，像在敵佔區搞地下工作，例如，搞什麼神秘的“扎根、串聯”等；打擊一大片基層幹部，工作隊一進村，大小幹部統統趕“上樓”（統統靠邊站，接受審查），“洗手洗澡”（檢查、交代問題）；工作隊把黨、政、財、文大權一把抓，“包打天下”。因此，不僅整的重點不是走資派，而且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幾乎沒把它當回事，重點實際上就是清經濟，整天忙於內查、外調查帳，和讓大小幹部交代經濟問題，其次是男女關係。有許多地方還搞逼供信，有被逼得自殺的。因為上面每天要報“作戰成果”統計報表，即清出了多少經濟問題，清出的多就表揚，反之則批評。

另外，“根據賀龍子女的回憶，賀龍和劉少奇話不投機，賀龍當面批評了劉少奇：1965年夏天的一個晚上，劉少奇不預先通知就突然來訪。劉少奇坐了一會兒，沉著臉走了。爸爸氣得在屋裏走來走去，憤怒地自言自語：‘想搞什麼名堂？有什麼了不起？不尊重毛主席，我就要批評，就要提意見……’。雖然賀龍子女百般‘澄清’，仍然表明：劉少奇在文革前夕極力拉攏串聯賀龍並不是

子虛烏有的事；劉少奇同樣希望能獲得軍隊高級將領的支持，取得同毛澤東鬥爭的資本，同毛澤東抗衡”。（參見《新發現的周恩來》第 772 至 773 頁）

從上述可以分析出：毛主席提出發動文革，究竟要解決什麼問題？這就是他重上井岡山，以及多次反復對同志和某些外賓一再重複講的問題，其中講得最透徹是：“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物件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麼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麼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選自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 1965 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51 頁）。我認為這就是毛主席提出搞“文革”的內因，也是“文革”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所以我在序言中強調：抓住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為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大目標研究“文革”，有這樣一個明確的目標，作為研究“文革”的綱，才能綱舉目張。

當時的國際背景是列寧領導蘇聯人民建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並進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粉碎了德國希特勒法西斯侵略，和

國內形形色色機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國防尖端領域，世界領先。但赫魯曉夫叛徒集團，在斯大林去世不久，篡奪了領導權，很快復辟了資本主義。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就像倒骨牌一樣相繼變修復辟了資本主義。好端端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就這樣塌了方。更嚴重的是，蘇修一再煽動我國的訪蘇代表團成員，推翻毛主席。甚至趕上門來煽動推翻毛主席。面臨這一局面，劉少奇等還企圖同赫魯曉夫勾勾搭搭。據趙嘉麟《歐福欽：遍訪中國三代領導人》透露：“1989年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真理報》記者歐福欽（原名弗謝沃洛德·奧夫欽尼科夫）以代表團成員、參與起草有關文件專家的身份隨行。此人後來向世人公開了他所聽到的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的一段對話，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令人歎為觀止。據歐福欽回憶，5月16日，他參加戈鄧會談……，只聽到戈爾巴喬夫對鄧小平說：‘我們應當用推土機把這個陳舊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推平，然後所有改革才能進行下去，否則所有一切都將掉進沙堆裏’。”對此，鄧小平回答道：“現在我們和您正行駛在一條鄉間土路，也就是計劃經濟。它是坑坑窪窪的，但已經被車軋平了。而右邊有一條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需要從現在這條路轉向那條路。為了能夠轉過去，必須牢牢掌握方向盤，而您建議去掉方向控制！那麼，您怎麼將汽車從這條路轉向另一條路呢？”（《報刊文摘》第2735期、2009年10月23日週末版，摘自《瞭望東方週刊》第43期）這進一步赤裸裸地證明了他們同蘇修勾結復辟、篡權的事實真相。

抗美援朝的勝利，使號稱不可戰勝、沒打過敗仗的頭號帝國主義美國，創紀錄地敗在毛澤東領導的小米加步槍的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手裏。飛機大炮，打不過小米加步槍，他們找不到任何理論可予解釋，在世人面前丟盡了臉。美帝和它糾集的狐朋狗友，使盡一切手段，對新中國嚴密封鎖，結果是毛主席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靠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在工、農業等各條戰線取得的高速發展的成就，速度遠超過美國獨立運動後發展速度。美國被迫重新審視對華政策。靠硬的一手，它沾不了光，只好把顛複我無產階級政權的希望，寄託在中國第二、三代和平演變上，即現今稱為的“顏色革命”。

從當時面臨的國內外形勢來看，走資派加速了同赫魯曉夫的勾搭，對內架空毛主席，並頻繁搞非組織篡權活動，已經到了公然不讓毛主席參加會議、不讓毛主席講話的程度。“文革”就是在上述黨內走資派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復辟資本主義已是箭上弦槍上鏹的緊急關頭發起的。所以說“文革”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也可以說大民主的“文革”是走資派逼出來的。

### 3、“文革”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我們歸納一下反文革“精英”所有反文革的文章，可概括為一句話：“文革”是毛澤東“主觀臆想出來的，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前面論述了文化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專利。因此，我認為沒有毛主席照樣有文革，僅

是時間早、晚或名稱可能不同。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就包含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即文化革命。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發動的，自下而上以“四大”開展的威力巨大、效果卓著的“文革”，除毛主席外，任何人沒有能預見和提出這個問題，更沒有這個資格、膽略、才能，能發動而帶領全黨、全國人民開展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是毛主席偉大、過人之處。任何其他人，都望塵莫及，這是國內外公認的事實。

文革過後 30 年的今天，我在文革期間一些不理解或不甚理解的問題，現在可以說基本理解了。文革期間，我就認為如果中央有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幾個走資派，用組織手段，罷了他們的官不也行嘛。憑毛主席的威望，人民無比熱愛和珍惜世代才盼來的沒有剝削和壓迫、而走上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幸福大道，罷幾個復辟資本主義走資派的官，是輕而易舉、大得民心的事，何必興師動衆搞這麼大的運動。這麼大規模的群衆運動，必然會出現一些負面的問題，反給一小撮翻案、秋後算賬留下口實。然而，這 30 年一些反面教員教育了我，我把問題看得太天真而簡單了。歷史證明：沒有劉少奇，還會有華少奇、胡少奇、趙少奇、江少奇……；他們不單單是個人，而是復辟階級的代理人或代表人物。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關於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還是不太難解決的，難在存在於各方面的剝削階級思想意識形態，隨時隨地都會產生復辟的危險性。在以前，我們腦子裏關於階級劃分的概念，基本上停留在生產資料佔有的多寡上，而對意識形態的階級、階級鬥爭，認識很膚淺，

沒有看得那麼嚴重。從理論上對精神同經濟基礎的關係理解片面，很不深透。事實上，走資派政變篡權後，利用權、錢交易等等不法手段，一夜成了千萬、幾億資本的資產階級、大地主、反動官僚資本家的現實，讓我們受了一場生動的階級、階級鬥爭的教育課。說明思想意識形態的反動階級，一旦時機成熟，成為佔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很容易。從蘇聯、東歐到中國社會主義變修的現實，充分證明了這一事實。現在重溫毛主席的指示，“八級工資制，貨幣交換……，同舊社會差不多，復辟資本主義很容易”，就倍感親切。毛主席去世後，復辟派打著反“大鍋飯”等等旗號，製造了幾十、幾百級工資制，還何只是貨幣交換，權力、人格、肉體……都可交換，何只是同舊社會差不多，而是不如舊社會，更是超高速復辟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半殖民地。使我們對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和複雜性，有了清醒的認識。正如列寧所說：“革命勝利後，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餘，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對共產主義社會這樣描述：“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的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

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馬克思在這裏強調了“在勞動已經不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社會物質財富豐富以後，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段話的意思是：只有當人們的共產主義思想覺悟達到了把勞動當作生活的第一需要後，生產力高度發達，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使我想起，在解放初期，像我這類剛參加工作的，照搬上級領導的報告內容，向農民解釋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是沒有階級和階級剝削、壓迫，沒有工農差別，沒有城鄉差別，沒有腦力勞動同體力勞動的差別；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高度提高，勞動成了人們的第一需要，社會財富十分豐富，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後改為按需分配）”；沒有軍隊、法院和政府等上層建築；就是列寧說的蘇維埃加電氣化。另附加一些自己的描繪：大家都吃魚、吃肉，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之類。看來，這些宣傳，沒有違反馬列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基本精神。然而這 30 年，成了天天叫喊“先富論”到目前的創建“小康社會”，這無疑都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口號。

馬列主義關於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可概括為思想意識形態和社會物質財富兩大方面的革命，缺一不可。如果人們沒有高度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覺悟，而“一切向錢看”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物質財富再豐富，也決不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如被某些人吹捧為“人間天堂”的美國，據說是世界“頂級富”，

但它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不斷挑起侵略戰爭、殺害弱小國家成千上萬人民、大肆掠奪別國資源和市場，是個十惡不赦的最腐朽、最反動的帝國主義國家。總結現實世界，如果人們沒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覺悟，要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可以說是一句欺人之談的空話；相反，人們雖沒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但錢照樣能多起來，當今某些人不是說我們已是世界“第二富國”，但結果是臺灣國民黨兵痞郭臺銘把建在深圳的“富士康公司”變成了他私人“租界”，對工人實行奴隸制專制，把 13 名工人逼得接連跳樓自殺，其中包括被活活打死後甩出窗外的，震動了全世界，這還是社會主義嗎？在當今科技水準，任何國家變成印鈔機很容易。美國一架破飛機，竟掠奪我國八億件襯衫，美國政府就可兌換發給美國人的幾十億、幾百億美元，折騰到了世界無寧日。薛湧同志在《北京晚報》發表《主流們，你們該懺悔了》一文稱，“一個頂尖巨富，佔有的財富相當於一百二十萬窮人的家當”，“2008 年中國身價超過 10 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 101 名增至 130 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折騰到了人民幣一再高速貶值，有的資本家死了人，竟把百元人民幣當冥幣使；年最高工資為 900 多萬元，最低者不到 1 萬元，工資差為 900 多倍。走資派瘋狂搞的封、資、修文化復辟運動，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折騰到了腐敗不堪，流血事件不斷，最腐敗和最殘忍的惡性案例不斷，成為徹頭徹尾、集封資修大成的、世界上最腐敗的、領土和領海任人入侵瓜分的半殖民地。

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 Bob Avakian 在《三個可供選擇

的世界》裏，尖銳地批判了修正主義：“說的是‘改革’，但並沒有真正的革命的社會變革！說的是‘平等’、‘民主’，但不僅不廢除而且在製造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總之，修正主義社會重建了舊社會方方面面的不平等”。“黨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要建成那樣社會和世界（註：指共產主義）是一場非常深刻的挑戰。它超過了簡單的改變經濟所有制的形式和確立。有一條基本的就是人民的社會財富將被保護，群衆在所有的領域的創造所得，如科學、藝術、哲學等等都將得到保護。政治決策程式將得到簡化”，“不僅是所有制的改變，而且要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保護’，和科學、藝術、哲學等等文化的保證，即：文化的革命。在政治決策程式簡化後，便於無產階級佔領上層建築”。他這段講話中，強調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文化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高吉爾同志說：“中國共產黨在毛同志的英明領導下，進行了這兩場革命，並且在社會主義革命發展過程中，毛從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和中國國內多次反革命陰謀中吸取了許多教訓。這些就是毛澤東同志創立文化革命理論的材料。通過所有這些材料，毛把我們的革命理論從質上推向一個更高的水準。因此我們認為文化革命是頂峰，它解決了防止反革命復辟的問題。許多人說，文化大革命只是一種中國現象，那是在中國發生的，無論對錯，都僅僅是個中國問題。但是，我們認為它不只是一個中國問題，還是一個思想理論問題，而且它是一個普遍真理。我們堅信文化大革命是共

產主義普遍真理。它在中國能生長，在尼泊爾也一樣能開花結果。”

毛主席在文革期間處理武漢問題時對周總理說：“看來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估計過高，包括我。客觀規律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既不能創造，也不能改變。只能正確認識，因勢利導。”

以上證明，思想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即文化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文化大革命，也稱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反文革派、走資派、修正主義者，說什麼“文革是毛澤東主觀臆想出來的，……”，企圖以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強加給毛主席，達到否定文革的目的，只能是徒勞的。

現在再回顧我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後，所經歷的一些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的里程，論述文革的必然性、必要性。

毛主席關於奪取政權，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關於歷史週期律；直至他晚年明確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系列講話。如果 30 年前不理解或不甚理解，則近 30 年共產黨資本主義化的現實教育，就完全能理解了。

共產黨腐敗到了槍口對準人民、對外投降賣國，各類腐敗反動官僚由一個個到一串串到一窩窩……爆炸性的產生，竟到了黨內發生一串串黑社會。僅就各級“官員”每年三費（車費、旅遊費、吃喝費）就耗掉人民血汗錢 9000 億元人民幣；“人民政府”養“公務員”的支出已經佔到財政支出的 44%。“官員”把“和諧”掛在嘴皮

上喊，結果“和諧”到了商店不准賣切菜刀，全年的“維穩”支出高達 5100 多億元人民幣，這筆巨額“維穩”開支，絕大部分是用於鎮壓勞動人民的。以及前面所說的：黨和政府同地痞、惡棍、流氓、黑社會聯合經營的“截訪‘黑監獄’——‘北京安元鼎（公司）’”等等。這些是平常人無法想像的，但 30 年前，毛主席都預見到了。這些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事實、資產階級和反動官僚資本剝削壓迫工人和農民等勞動人民的血腥殘暴，說明僅罷免幾個人的官，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近些年來，是中共史上罷官密集而最多的時期，但結果是越罷、越殺越腐敗，殺到了只好“刀下留情”，對重大腐敗案，只得有頭無尾，不了了之。因為正如有的國家安全部門專家警告：不能深挖，否則將“影響國家安全”。可見，靠走資派自身反腐防復辟和反修是不現實的。解決復辟變修的根本措施是提高全民的社會主義思想覺悟，讓人民自覺地、隨時隨地投入反修、防修的鬥爭；這就證明了文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另外，從我們黨的歷史看，在民主革命階段參加革命的，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參加革命的動機和目的各人是不同的。參加革命後，接受或自覺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更是各不相同。其中大部分人能把自己造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人和領袖人物。但也有一部分人參加革命是找出路來的，甚至是投機來的，革命隊伍成了他們韜光養晦躲藏的窩。這類人混入革命隊伍後，不僅不改造，反而抵觸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這夥人，就像近 30 年又佔領了舞臺的文藝作品

所宣揚的，“中了狀元”或當了大官後搞反攻倒算、階級報復、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這就是他們投機革命的目的。這些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重新佔領舞臺，既迎合了民主派、復辟派、反動官僚資本家等的精神需求，也是他們內心世界的宣洩。這種封建統治階級的道德教育，熏出了一代代“人上人”的反動腐朽的封建貴族，使中華民族數千年停留在封建社會，最終成了資本主義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被稱為“東亞病夫”。這種傳統的封建倫理道德流毒，在一部分“老革命”身上根深蒂固，有著割捨不掉的深厚的封建剝削階級的階級烙印，當他們自認“革命勝利”以後，必然居功自傲、“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老子就得坐天下享清福”、“並子子孫孫榮華富貴”。由這夥人篡奪了政權，盜用共產黨在人民群衆中的崇高威望，以售其奸，就必然重蹈歷史週期律，使無產階級革命推翻了的舊“皇帝”，而又出了這夥掛著共產黨招牌的異類，成了更奢侈、腐敗、反動的新“皇帝”，使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災難，例如強佔農民土地等，逼得農民集體自焚，這類人類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法西斯暴行，就發生在連畜牲都不如的黨內走資派的手裏。這一系列事實，使我們認識到，解決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形態問題，比解決生產資料問題更重要，而且更複雜、難度更大。因為佔有生產資料為特徵的反動階級，是“明碼實價”標著的，隱瞞不了；而思想意識形態的反動階級，一般善“韜光養晦”、玩兩面派，很難鑒別。例如，陳良宇式的人物，問題未暴露前，不天天站在講臺上作反腐倡廉報告嘛。

這 30 來年，許多被判死刑的大腐敗“官員”，其中不少是在封、資、修文化大復辟運動的毒害下，一步步蛻化變質的。剖析走資派瘋狂搞封、資、修“文化大復辟運動”，把許多人變成鬼的歷史事實。請問，“文革”中有這類事嗎？絕對沒有，“文革”把不少“鬼”改造成了人，誰都能列舉大量事例作證；僅《前奏——毛澤東 1965 年重上井岡山》一書中，就有好些這類生動的事例。

以上，從理論到實踐都說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不可逾越的重要歷史使命；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就必然要開展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從蘇聯變修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根據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文化大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並親自領導和實踐了長達 20 多年，經不斷實踐、總結，在理論上日趨完善。這是毛主席發展馬列主義作出的偉大貢獻。

歷史也證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同無產階級武裝革命一樣，無產階級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發動不起來的。馬列主義主張人民史觀，即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不否認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毛主席不僅主張人民史觀，而且嚴厲批評了林彪的“天才論”英雄史觀。毛主席同時也肯定個人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在政治路線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性因素。在批評聶榮臻自封“核心”時毛主席說，核心是在鬥爭中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關於這方面的問題，是哲學家們研究的大課題，我在此僅表明了自己的觀點。毛主席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實踐中被人民公認為人民的

偉大領袖，被全黨公認為我們黨和軍隊的創始人和領導核心。為什麼《東方紅》一首歌曲深得民心、黨心，以至古巴領導人在中國留學生和胡錦濤面前用華語高唱《東方紅》，其深刻的政治寓意人人皆知。以及許多國家共產黨以毛主義命名，說明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已是世界無產階級公認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和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毛主席精通馬列主義，高尚而無私地把一切獻給人類共產主義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品德，以及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並在人民和全黨享有崇高威望……，而成為當之無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領導核心。因此，毛主席不僅及時發現文革的必要性；而且唯有毛主席才具備領導全黨、全國人民開展世界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資格。現在有些人物，對文革說三道四，甚至貶低旁人，而大樹自己，無非是其醜惡靈魂的暴露，可笑不自量，無損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半根毫毛。正如我曾發表紀念毛主席逝世 34 週年的文章《抹不黑的毛澤東、塗不紅的走資派》，在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網一發表，共有八千多人點擊（不包括其他互聯網轉載的點擊人數），幾十位同志發表了歌頌毛主席、狠批走資派的跟貼；《求是論壇》……等轉載了這篇文章。這證明幾個反毛、反“文革”小丑，只是幾隻蒼蠅，嗡嗡叫……。如若不服氣，哪個反毛、反共、反文革的“精英”，敢站出來領導一下文化大革命試試。那個領頭反“文革”的人物，按他的一套折騰了近 30 多年，結果怎樣？成了國內、外公認的腐敗到了不能再腐敗的“中美國”。

特別提醒大家的是：很多人不知道，一九六四年中

央就有彭真掛帥的文革小組，搞文化革命是中央的既定方針，所以，一九六六年全票支持《五·一六》通知搞文化大革命就順理成章了。如果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將會是什麼局面？只要看一下他們領導的 50 多天“前文革”，就迫害了那麼多師生，在全國整了多少“三家村”（吳晗、鄧拓、廖沫沙）等，並把朱老總作為“睡在毛主席身邊的中國赫魯曉夫”進行無情打擊。尤其是毛主席去世後，鄧小平一手搞的“後文革”，全國上下、黨內黨外、男男女女、老中青少被迫害了多少人？至今官方未公開統計數字。然而，鄧小平翻案後，把這一切都栽贓給了毛主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葉劍英更是矢口雌黃栽贓說文革迫害了 1 億多，死了 2000 萬人，掩蓋他在文革時期和“後文革”屠殺人民的罪責。關於葉劍英在文革期間支持屠殺造反派等嚴重問題，將在後面介紹。定能看到這位道貌岸然、矢口雌黃的“老帥”的廬山真面目。

## 二、文革的成績不容抹煞

文革期間，不僅人們普遍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著作，其中絕大部分是自覺地、認真地學的，尤其是廣大工、農、兵和革命知識份子、革命幹部。經過學習，共產主義覺悟普遍有了大的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其中不少由精神轉換為物質力量，不少同志成了改天換地的英雄。例如全國家喻戶曉的陳永貴同志帶領大寨人民樹立的大寨精神，和王進喜同志帶領大慶油田

工人樹立的鐵人精神；以及鞍鋼的同志從三大革命實踐總結出來的“鞍鋼憲法”……等等。在這些先進人物和集體的帶領和影響下，文革期間，在各條戰線都創下了舉世公認的偉大奇跡。毛主席領導下的 20 多年，幹出了世界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100 多年才幹出的事。因為有關這方面的文章很多，本人發表的文章中，也一再闡述了這些問題。在此，側重介紹一些資料，客觀存在的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其中相當一部分選自一些反文革的人發表的文章，在本文不注明材料來源，特此說明。

### 1、請看走資派的後臺美國怎麼說

美國《時代週報》對毛澤東時代和走資派“改革開放”30 年的比較，作了有說服力的統計。

美國《時代週刊》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後 30 年對比：

項目	1949 至 1979 年	1979 至 2008 年
期限	前 30 年	後 30 年
發展環境	一窮二白	系統的工業化現代化
年均發展	16.90%	10%
最高	20% 以上	12%
最低	9.8%	7%
世界平均	3%	3.2%
科技人員	世界第一（絕對已經減少（絕對數量）；	世界第一（相對數很低（相對數量）
原子彈	僅次於美蘇	基本沒變

項目	1949 至 1979 年	1979 至 2008 年
氫彈	僅次於美蘇	基本沒變
人造衛星	僅次於美蘇	神六上天 (70 年代技術)
核潛艇	僅次於美蘇	略有發展
導彈	僅次於美蘇	略有發展
民族工業	中等發達國家	幾乎賣光或倒閉
民族品牌	中等發達國家	幾乎沒有了
先進戰鬥機	中等發達國家	略有發展
大飛機	僅次於美蘇	倒退 50 年
萬噸巨輪	中等發達國家	略有發展
自主品牌汽車	中等發達國家	幾乎都是貼牌

這張美國統計的表格說明：毛澤東時代（主要成就都在文革時期）各方面從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取得了高速發展，工業、科技許多重要領域已名列世界第三名。然而，“改革開放”30 多年，許多工業、科技領域停滯或倒退了 50 年，民族工業被破壞殆盡。

## 2、再看一組重要資料

中國衛生部《中國衛生發展簡報》稱：“1949—1978 年，中國人均壽命從 35 歲增長到 68 歲，這是當時發展中國家難得的成就。到 2008 年中國人均壽命增加到 72 歲。”

從這組數據可見：前 29 年人均壽命增加了 33 歲，平均每年增加 1.138 歲。這個數字，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史上都是奇跡。這個奇跡，唯有在高舉偉大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的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創造的奇跡。

而後 30 年，“改革開放”的 30 年，人均壽命由 68 歲增加到 72 歲，共增加 4 歲，平均每年增加 0.133 歲。

前 29 年為後 30 年平均每年人增長壽命的 8.56 倍。

事也湊巧，國民黨統治舊中國三十七年，人均壽命由 30 歲延長到 35 歲，共延長 5 歲，平均每年人延長壽命 0.143 歲。

可見，“改革開放” 30 年，人年均延長壽命反比解放前少了 0.01 歲。

而解放後的前 29 年，比國民黨反動統治的 37 年，平均年人均壽命延長高出 0.995 歲。前者是後者的 7.96 倍。

由上述這些事實足以證明，毛主席領導建國後的 20 多年，成績巨大，其中大多是文革十年中取得的。不僅解決了中國千年沒有解決的人民吃飯、穿衣問題，達到人均年產糧食 680 市斤，糧食夠吃，許多農村姑娘和青年不僅穿暖了，而且穿上了毛衣……，像我這類舊社會穿補丁衣服、光腳丫農村出來的，還穿上了舊社會沒聽說過而穿著走路時咯咯響的皮鞋和毛料衣服，一改舊社會衣衫襤襠的貧困落後形象；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並建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醫療衛生、商業、金融……等較完整的體系，尤其是國防尖端一躍而為世界第三，中國人民挺直了腰杆做人，並成了共和國的主人。

1974 年 12 月 17 日，鄧小平對毛主席說：“工業十年來增加了 1.9 倍，每年遞增 11.9%，這個數目還可以。”（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第 1709 頁）。他在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上對解決了中國十億人吃飯問題，給予了

高度評價。這對那些復辟派們“崩潰論”是有力的回擊。

另外，應當承認近 30 年，人民在走資派、反動官僚資本等剝削階級嚴重剝削、壓迫、迫害的摧殘下，為了求生存，還是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所以我為此在發表的文章中一再承認這些事實：不少人吃得更好了，口袋裏的錢更多了，甚至少數人把口袋鼓破了，市場上消費品更豐富了。但也要實事求是，黨和國家腐敗了，人民怨聲載道，可謂國腐、民怨。

還必須強調，毛主席領導的 30 年，國雖不太富，但民很強。而且是在舊社會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具體內容我在前面已作了介紹。

近 30 年的富，我一再強調要有憂患意識。因為近 30 年的“富”，同毛主席時代的不太富，性質根本不一樣。毛主席時代，是全國上下一條心，為建設社會主義，同天鬥、同地鬥、同反社會主義的階級敵人鬥，大搞科學實驗，即積極投入三大革命運動艱苦奮鬥出來的；消滅了階級剝削和壓迫，基本上實現了各盡所能、按勞取酬，不勞者不得食，少有所學、老有所養，人民當家作主；並為幾代人的發展創了條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毛主席去世後的這 30 年，是靠挖掉社會主義牆腳，摘了 30 年前的“桃子”，不僅提前花了子孫後代的資源和礦藏，還給後代留下了難以治理的環境污染、氣候異常、可耕地禦減、沙漠化、水利設施被毀壞……等後患，並成了美國的“組裝廠”；結果成千上萬工人、農民、學生失業；勞動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死了還火葬不起。所以有同志把這些概括為三句話：吃了前人的，用了後代

的，剩下是給美國的。

### 3、文化大革命大事記

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詳細記錄了文革時期取得的輝煌成就。

#### 1966 年

- 01 月 28 日 中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 02 月 19 日 主席指出，用 25 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 02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制定增加對資本主義國家出口。
- 03 月 04 日 貴昆鐵路比原計劃提前 9 個月接軌。
- 05 月 03 日 中國第一批“紅旗”高級轎車出廠。
- 05 月 09 日 第一次含有熱核材料的核子試驗成功；考古發現並保存北京人頭蓋骨。

10 月 08 日 中國製成第一批 10 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

10 月 15 日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

10 月 27 日 第一枚核導彈發射試驗成功。

#### 1967 年

- 01 月 05 日 中國石油產品品種和數量自給自足，勘、採、煉技術登上世界高峰。
- 01 月 16 日 中國第一臺載重 150 噸中型平板車造成。
- 04 月 15 日 春季廣交會開幕。
- 06 月 17 日 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 07 月 01 日 成昆鐵路建成通車。

07月07日 全國夏糧豐收，比去年增長一成。

07月26日 中國第一臺100噸礦山鐵路自翻車研製成功。考古發現新洞人，正式發掘在1973年。

09月05日 中國援助尚比亞政府10億無息貸款修建坦贊鐵路。

10月05日 中國第一臺電晶體大型數位電腦研製成功。

10月15日 中國第一臺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研製成功。

11月15日 廣交會開幕。

11月29日 中國最大的無線電望遠鏡安裝調試成功。

### 1968年

01月08日 中國第一艘萬噸巨輪“東風”號建成。

01月11日 《人民日報》發表《“自由市場”是殺人不見血的屠刀》。

02月23日 中國特大型軸承製成。

04月15日 根治淮北平原澇災的大型水利工程——新汴河工程開工。

09月03日 中國研製成第一批液壓傳動內燃機車。

11月20日 萬噸遠洋巨輪“高陽”號下水。

12月25日 富春江大型水電站建成發電。

12月28日 中國成功進行一次新的氫彈試驗。

12月29日 南京長江大橋竣工。

### 1969年

02月21日 國內公債已全部還清，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既沒有內債也沒有外債的強大的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

04月02日 第一艘萬噸油輪“大慶27號”下水。

05月05日 中國研製成具有獨特療效的抗菌素——“慶大黴素”。

06月13日 決定在上海、天津、大連6個船廠新建8個萬噸級船臺。

07月08日 十年時間建成河南紅旗渠。

09月13日 丹江變電工程提前完成。

09月23日 第一次地下核子試驗成功。

09月25日 藥品大幅度降價，比年初降低37%，比1950年降低80%。

09月26日 無償援助越南5.56億元。

09月30日 北京燕山煉油廠全部建成投產。

09月30日 中國第一臺十二萬五千千瓦雙水內冷氣輪發電機組建成，標誌中國電機製造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0月03日 中國第一臺5000馬力液力傳動內燃機車誕生。

10月04日 中國第一座旋轉oxy氣轉爐投入生產。

10月28日 加速第二汽車廠建設。

11月14日 加速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

11月16日 中國農業豐收。

### 1970年

04月26日 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06月1日 各地新建一大批化肥廠。

07月17日 農村中小型水電站裝機容量相當於過去的20年的兩倍。

10月16日 大型現代化露天煤礦——新疆哈密礦務

局露天煤礦投產。

10月17日 中國全民援助朝鮮13.14億。

12月25日 葛洲壩一期工程開工。

12月26日 第一艘核潛艇研製成功。

### 1971年

01月02日 中國輕工業形成比較完整的體系。

03月03日 中國成功發射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

05月15日 開展工業學大慶。誕生了中國第一臺積體電路數控機床。

06月27日 第一艘兩萬噸貨輪“長風”號下水。

07月08日 轉發關於做好計劃生育的工作報告。

08月22日 中國第一艘核動力潛艇首次以核動力駛向試驗海區，進行航行試驗。從此中國海軍作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海軍跨入了世界核海軍的行列。

09月27日 中國無償援助越南36.14億元。外援金額70億，建國以來最多的一年。

10月02日 追加基本建設投資51億。

10月25日 聯合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

11月18日 全國建成1800多座小水泥廠。

11月18日 西部地區進行了一次新的核子試驗。

12月07日 全國年度水利建設50億立方米，增加農田3000萬畝。

### 1972年

01月13日 從國外引進化肥、化纖成套設備8套，以後又提出引進43億美元成套設備和單機的方案（即四、

三方案)。

01月28日 解放軍落實五七指示，發展農副業生產，許多部隊做到肉菜自給。

02月21日 毛澤東會見尼克森，雙方同意互相發展貿易。

02月28日 中美雙方在上海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中美關係從此走向正常化。

05月13日 中國電子工業進一步發展，1971年收音機產量相當於1965年的4倍。

08月21日 從聯邦德國、日本進口一米七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另有設備在北京、上海、四川、唐山。

09月10日 40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和邊疆安家落戶。

10月13日 連接中南和西南地區的重要幹線湘黔鐵路通車。

11月26日 援助越南抗美26.57億元。

12月26日中國第一輛載重300噸的大平板車問世。

### 1973年

01月02日 國家計委提出進口43億美元國外設備的方案。

02月13日 新華社報導，1972年是解放以來電力發電站裝機最多的一年。

03月07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發展組合機床取得顯著成就。

03月20日 部分企業和縣社試辦出口工業品專廠、專車間、出口農副土特產生產基地。

04月10日 決定建設邯鄲鋼鐵、煤炭基地。

04月15日 春季廣交會開幕，與中國發展貿易的國家和地區達140多個。

05月04日 中國日本共同投資施工建設中日海底電纜。

06月18日 國際大米價格上升，中國增加出口100萬噸大米換回小麥。

06月28日 中國成功進行了一次氫彈試驗。

07月16日 成立計劃生育領導小組。

08月01日 新華社報導，夏糧豐收，這是建國以來第二個大豐收年。

08月05日 全國環保會議召開，制定《關於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

08月16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水田農業機械化取得新進展。

08月26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電子工業迅速發展。

08月27日 中國第一臺百萬次積體電路電子電腦研製成功。

09月03日 中國第一臺天文測時、測緯光電等高儀研製成功。

09月12日 新華社報導，全國鑽井進尺和建設投產的油井生產能力創歷史同期最高紀錄。

09月26日 國務院重申對外貿易的重要原則。

09月30日 新華社消息，中國化肥產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

10月15日 秋季廣交會開幕，與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貿易往來。

10月25日 西藏發現幾十種有色金屬、稀有金屬和非金屬礦產。

11月01日 幾十座大中型水電站建成投產，小型水電站5萬多個，遍及全國。

11月08日 西藏軍區在海拔3800米高寒地區大規模種植冬小麥豐收。這是西藏歷史上農業發展的重要變革。

11月13日 國務院轉批環境保護若干規定。

12月20日 中國航空線80多條，連接全國70多個城市，與100多個外國航空公司建立業務往來。

12月22日 5年來，8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2月26日 同中國有貿易關係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150多個，其中50多個國家同中國簽訂了貿易協定。

### 1974年

01月12日 為在本世紀內實現毛澤東主席提出的用幾個五年計劃時間趕上和超過世界水準的戰略思想，國家計委提出《關於擬定長遠計畫的報告》。

01月21日 國務院要求很抓計畫用糧、節約用糧、嚴格控制糧食銷量等四點要求。

01月22日 國務院提出在今後三五年內，從國外進口一批大型化學肥料、化學纖維和連續式鋼板軋機等設備。

01月30日 國務院批示防止沿海水域污染。

02月17日 新華社報導，勝利油田去年創年鑽井進尺150105米的全國石油鑽井最高紀錄。

02月19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農村掀起農田基本建

設新高潮。

- 02月24日 漢江丹江口水利樞紐初期工程建成。
- 03月23日 中國西南交通幹線成昆鐵路建成。
- 03月29日 首次發現兵馬俑。
- 03月30日 地熱發電站在河北懷來建成。
- 04月02日 中國第一艘二萬五千噸級的浮船塢“黃山號”建成。
- 04月15日 第三十五屆廣交會開幕，規模為歷屆之最。
- 04月31日 中國第一臺醫用電子感應加速器研製成功。
- 05月15日 華北濱海地區又建立起一個新油田——大港油田。
- 07月17日 中國冬小麥產區推廣優良品種，佔全國小麥播種面積的80%以上。
- 08月09日 壴式太陽爐研製成功。
- 09月12日 中國第一個5萬噸級碼頭建成。
- 09月15日 黃河青銅峽水利樞紐建成。
- 09月30日 大型油田——勝利油田建成。
- 10月03日 中國最大豎井鑽井研製成功。
- 10月23日 中國地方小煤礦去年產量比1965年增長兩倍多，佔全年28%。
- 10月26日 無償援助越南11.17億元物資。
- 12月19日 三門峽水電站建成。
- 12月27日 大慶至秦皇島輸油管道建成。
- 12月31日 中央要求切實推進計劃生育工作。

## 1975 年

01 月 13 日 提出到本世紀末，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中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前列。

01 月 14 日 四川省開發天然氣取得新成就。

01 月 15 日 中國紅麻、黃麻實現自給自足。

01 月 25 日 降低半導體收音機零售價格。

02 月 03 日 景山發電廠首次應用電子電腦控制 10 萬千瓦燃煤氣輪發電機組成功。

02 月 04 日 中國最大的水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建成。

03 月 29 日 高能加速器研製列入國家重點科研專案。

05 月 30 日 中國第一次發現古生界地層油田。

05 月 31 日 國務院決定出口黃金，引進銅、鋁、橡膠、滌綸等原料。

07 月 05 日 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成。

07 月 08 日 秦皇島至北京輸油管道建成。

07 月 19 日 中國化肥產量顯著提高，上半年增產的化肥可增產糧食 100 多億斤或 3000 多萬擔棉花。

07 月 28 日 全國鐵路上半年貨運量創歷史同期最高水準。

08 月 08 日 河南地區特大暴雨，國家撥 7 億元救災費。

08 月 19 日 國務院決定 2 億美元進口。

08 月 19 日 無償援助柬埔寨 6 億元物資。

08 月 30 日 新華社報導，最近三、四年來，每年有

一大批電站建成投入生產。

09月01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今年早稻豐收，單產、總產創歷史最高水準。

09月03日 新華社報導，截止到1974年底，中國小水電發電量佔總量的三分之一。

09月14日 新華社報導，一億隻廣播喇叭連接千村萬戶。

10月07日 由科學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雜交水稻通過鑒定，經過推廣後一般提高產量20%，為世界糧食增產作出了重大貢獻。

10月27日 中國成功進行一次核子試驗。

11月17日 中國原鹽豐收，創歷史最好水準。

11月26日 中國成功發射回收式地球衛星。

12月24日 焦枝鐵路通車。

12月39日 新華社報導，中國農業連續13年全面豐收。

## 1976年

01月21日 又一艘萬噸級浮船塢“華山號”研製成功。

03月13日 大型火力發電廠——萊蕪電廠投入生產。

03月22日 郵電部門發展傳真通訊技術。

04月15日 廣交會開幕

04月21日 京滬杭載波電纜投產。

04月24日 6011米超深井打成。

05月01日 從事海洋地質調查工作的人數比1965年增加7.5倍，調查工作發展到黃海、東海和南海。

05月12日 郵電職工建成全國微波通信幹線。

- 06月06日 第一座現代化10萬噸深水油港大連新港建成。
- 06月29日 上海黃浦江上第一座公路、鐵路雙層鐵軌建成通車。
- 07月06日 人工培植的小黑麥在中國西南、西北、華北推廣。
- 07月06日 滇藏公路建成通車。
- 07月22日 新華社報導，全國夏糧總產量創歷史新水準。
- 07月23日 沿海鐵路幹線津滬複線工程提前接軌。
- 08月07日 北京至山海關鐵路修復。
- 08月23日 第一艘五萬噸級遠洋油輪“西湖號”在大連下水。
- 10月05日 現代化化纖聯合企業——福建維尼綸廠建成。
- 11月16日 新華社報導，全國80%以上的縣建立水泥廠，產量比1965年增長4.1倍。
- 12月10日 江南9省已探明的煤炭儲量比文革前增長了2倍。
- 12月11日 高速大型通用積體電路電子電腦研製成功。

然而“改革開放”的這30多年，走資派號稱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真實情況怎樣？2009年6月19日，《人民政協報》報導，中國財富的“集中度”問題在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專題討論會上受到常委和委員

的熱切關注。政協委員蔡繼明說，“我國在社會財富增長加速的同時，出現了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傾向。中國權威部門的一份報告顯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高於美國。”

2010年5月24日《南方日報》報導《廣東最窮村落後全國30年，300人學校無廁所》：東塘村共有908戶3957人，處於貧困線以下的有468戶2021人，貧困率超過51%。按世界銀行統計，30年前中國的整體貧困率約為52%。也就是說，這裏的生活水準還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談及貧困，省委書記汪洋曾很有感觸地說：全國最富的地方在廣東，最窮的地方也在廣東。到現在這個發展階段，最窮的地方還在廣東，這是廣東之恥，是先富地區之恥。

2010年2月22日“財新網”（記者鮑有斌）：在2月21日召開的工業和信息化部幹部大會上，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指出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60%，過分依賴國外市場。官辦報紙不得不承認每年要大量進口糧食，以至60%以上的油料（大豆）靠進口，美國人自己不食用的轉基大豆賣給中國，有同志稱其為生物入侵中國，不流血地毀滅中華民族，“大官”懂得保命吃特供、建特供生產基地。2010年4月28日《中國經濟時報》，《在華外資企業不是中國企業》一文披露：近十年來，外資對中國製造業的市場平均控制率已接近1/3，超過一般行業市場控制度的警戒線。外資對中國電子信息產業市場的控制度在2004年以後均在80%以上，對中國經濟轉型意義重大的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來也保持在

70%的水準。外資企業已控制中國80%以上的超市。再加上嚴重的頻率越來越高的經濟危機一再發生，而且一次比一次嚴重。去年出現了解放後從未有的綠豆、薏米和大蒜頭、百合……等以及糧食、蔬菜幾天內暴漲價幾倍。今年的長江刀魚每斤賣6000元以上（註：“改革開放”前僅1角多一斤，最上等的4角左右一斤），絕大部分工薪族一個月的工資買不起3兩重刀魚。但今年有的菜農種的蔬菜跌價並賣不出去而自殺。中國被國際上公認為“中美國”（美國人享用中國廉價日用品等，美國開動印鈔機支付紙幣給中國，中國賣國集團又把美元去買美國債券等還給了美國）。尤其表現在軍事上投降賣國：鄧小平私自允許美國向臺灣出售軍火；任憑美帝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和在我國領空撞毀我飛機以及日本等侵佔我領海、領土。

### 三、向紅衛兵致敬

#### 1、革命群衆運動好得很

現在，人們習慣把文化大革命同群衆運動、“四大”等同起來。其實這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前面已經講了，“文革”是指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後，為防止復辟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間進行的思想、路線的階級鬥爭。而群衆運動、“四大”是這場階級鬥爭採取的方式和手段。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武裝鬥爭。由於文革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條件下進行的，所以採取的方式比

武裝鬥爭緩和得多。因此，造成的損失比武裝鬥爭小得多。但它同樣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鬥爭，從這個意義講，有點損失是難免的。有些善良的朋友，看不到“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而資產階級是其混進黨內的代理人走資派結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為其代理堡壘。不這樣看待“文革”，則“文革”發生的許多問題，就解釋不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傳承了我們黨在推翻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的過程中，廣泛採用並證明是十分有效的革命群衆運動。我們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就是以 1919 年的“五四運動”為標誌。我們許多先烈，不少是把鮮血和生命奉獻給了我們黨發動的革命群衆運動。我們黨從建黨初到 1976 年 10 月 6 日前的許多領袖人物，就是群衆運動的領導人。如果我們的黨史，沒有群衆運動，也就稱不上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史。毛主席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反映農民運動的代表作；省港大罷工、五卅運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等，為我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勳，是黨史和近現代史重要組成部分。1949 年建國後，我們黨仍然發動了一個又一個群衆運動，我能記得的有減租減息運動、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農村合作化運動、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社教運動等。另外還有劉、鄧搞的“拔白旗”運動、大飈浮誇風、“共產風”、農村大辦公共食堂運動、“四清四不清運動”、“前文革”和“後文革”運動、三次嚴打運動、

天安門廣場“6·4”大屠殺運動、推倒人民公社運動、私有化運動等。除劉、鄧搞的運動有很大破壞性、反動性外；其餘都對無產階級革命，具有不可否認的積極推動作用。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沒有群衆運動，也就沒有共產黨史，也就無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就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史，同樣如此。無產階級的領袖人物、領導核心，大多是革命群衆運動中湧現出來的，而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凡像赫魯曉夫之類篡權自封的，無一例外都是冒牌貨。

然而，從1976年10月6日右派政變後，很快就否定了革命群衆運動。進而把群衆運動醜化成混亂、破壞的代名詞。把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更是醜化成挽袖子、捲褲腿的“瘋狂”、“無知”、“愚昧”的一夥青少年；用小說、漫畫、戲劇包括電視劇等一切能利用的手段，進行狂熱地歪曲醜化。

許多同志都清楚，解放後我們黨通過發動群衆，不僅僅在階級鬥爭，而且在生產鬥爭、科學實驗的鬥爭中，取得了輝煌成就，最為突出、至今仍造福人民的興修水利，都是群衆運動創造的奇跡。同時，毛澤東時代，黨不變修、國不變色，就不能忘了群衆運動作出的貢獻。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運動，嚴懲了幾個腐敗分子，確保了將近10年的平安。六十年代的社教運動，和十年文革，批鬥了走資派，確保了我們黨將近20年的平安。這個歷史事實，誰也否定不了。那時，社會穩定，公社以下均沒有司法、公安機構，縣公安局僅有二、三十人，中小城市沒有員警站崗，僅有民警維持交通秩序。沒有市管委、保安、聯防隊、交管所等這類名義是治安，實

質是敲詐勒索老百姓的機構。那時，公社以下幹部一律必須參加勞動，許多幹部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大多選在農閒時間搞運動，白天照樣生產，晚上搞運動，七嘴八舌議論揭發，也有大、小字報揭發幹部不正之風，少則半月、多則個把月，問題基本揭露出來了。幹部、群衆積極分子進行查證落實，犯錯誤的幹部檢討的檢討，退賠的退賠。一般3至4個月運動結束。我參加工廠、農村社教工作，均約四個月結束運動。除工廠按“桃園經驗”，工作隊進廠不久就抓人，搞恐怖政策，但很快中央頒佈社教二十三條，扭轉了局面。到農村按23條搞社教，基本是正面教育，比較平穩，我們沒有定一個走資派和貪污分子，僅批鬥了一個有破壞活動的一貫道點傳師。那時的農村幹部，即便是被批鬥的多吃多佔的幹部，同現在一些腐敗官員比，太小巫見大巫了，多吃多佔大多頂不上現在一包高檔香煙錢，上百元的貪污分子極少。正因為那時的群衆運動，形成了對幹部的有效監督，確保了絕大部分幹部是好的、比較好的。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幹部佔多數。群衆運動，不僅使幹部想不到去腐敗，而促成更好為人民服務，更能有效地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教育、挽救了一些問題不大的犯錯誤的幹部。同時，也鍛煉了廣大群衆當家作主的自覺性，幹群間常溝通，幹群關係較好。所以，這些事實說明，真正的無產階級，不僅不反對群衆運動，而很多是群衆運動的骨幹或領導者、組織者。凡害怕或反對革命群衆運動的，十有八、九稱不上是個好的革命者，不少是混進革命隊伍的異類。

近30年，走資派、改革“精英”一再宣揚不搞“運動”，

甚至把革命群衆運動醜化成“洪水猛獸”。然而，全國的各類公安隊伍，這30年一擴再擴，擴大到了鄉、鎮都設派出所，連學校裏都設派出所。編制從幾個人擴大到現在30至40人以上，並另設保安隊、治保組、市管委、交管委等，還有專門的政法委。這一長串“治安”機構，在此不議論它們搜刮、敲詐了多少人民血汗錢（重慶反腐打黑揭露出來的問題，看得很清楚），靠如此中華民族史上罕見的龐大治安隊伍，全國性的治安運動，這30年內，一個接著一個，結果是越治社會越不安，這就是不依靠群衆的結果。說白了，如果依靠群衆，也妨礙那些公、檢、法做“手腳”，直接影響財源。

資產階級、反動官僚資本家真不搞運動嗎？絕對不是，他們搞的運動沒有間斷過。從“大清查”運動開始，接著是在20年中的三次“嚴打運動”、那年春夏之交調動數十萬軍隊鎮壓群衆的運動、全國橫掃人民公社的分田單幹運動，還有“前文革”和“後文革”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是不讓人民群衆參加的運動。其中不少是反人民群衆的運動，許多人民群衆丟了腦袋或被關進監獄的運動，法西斯運動。

以上說明，1976年10月6日前和後，運動從沒有停過。但這前和後運動的性質是決然不相同的。前者除劉、鄧搞的以外，有些運動是毛主席、黨中央發動和領導、廣大人民群衆積極投入的革命群衆運動，人民群衆是運動的主要力量，運動的對象是走資派（例如文革）或大自然（例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運動）；但也有些群衆運動是人民群衆和基層幹部發起的，受到了毛主席、黨

中央支持的群衆運動（例如合作化運動），大多屬於發展生產力的運動。這些運動的目的是反修防修或發展生產力。1976年10月6日後的運動，都是走資派、資產階級搞的，依靠的力量是改革“精英”、資產階級上層建築（軍隊、公、檢、法）等，目的是確保復辟資本主義，手段是強迫命令、白色恐怖，甚至殘酷鎮壓人民群衆；結果是高速腐敗、復辟、倒退。

走資派、反動官僚資本家反對群衆運動，確切地講是害怕群衆運動，尤其害怕“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其中特別害怕大字報。這是十分可笑的，共產黨人不怕國民黨反動派、不怕日本鬼子、不怕美帝國主義。然而，某些“共產黨人”卻非常害怕大字報，但嘴上還要大唱“民主”高調，偽裝自己，欺騙人民群衆。請問，害怕群衆，還夠資格稱共產黨員嗎？心胸坦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會害怕群衆運動和大字報嗎？

群衆路線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我們黨一貫遵循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然而，這30年全變了，人民成了“屁民”，打著共產黨旗號的走資派，成了吸勞動人民血的腰纏億萬貫的反動官僚資本家。他們為了捂住自己的罪惡，反人民就成了他們的階級本性。因此，恰恰是他們反對群衆運動，害怕人民群衆用大字報揭露他們的罪惡。證明了毛主席發動群衆運動，利用“四大”，批臭、鬥倒走資派的決策，英明偉大。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史上，毛主席通過革命群衆運動，利用“四大”，揭露自己親自締造、領導、並已執政的共產黨內的陰暗面，揭露投機革命混入黨內

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防止復辟資本主義。並在實踐中，僅僅花了兩年多時間，粉碎劉少奇、鄧小平苦心經營多年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從走資派手中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領導權，取得了全國山河一片紅的偉大勝利。說明革命群衆運動、“四大”是反修、防修的文革的最佳選擇。而且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推翻一個反動階級，損失最小。

對群衆運動的態度，實質是對待群衆的態度問題。毛主席說：“有些老幹部很怕群衆，一天到晚不敢和群衆見面，這倒成了稀罕事！共產黨代表群衆的利益，這是最根本的特徵。現在反過來了，和國民黨差不多了。蔣介石才怕群衆呢！這是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如果到了共產黨也怕群衆的地步，那麼我們也就離徹底滅亡不遠了”。

## 2、向紅衛兵致敬

紅衛兵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成功的創舉，值得研究總結。

毛主席 1966 年 7 月 18 日從外地回到北京。於 8 月 1 日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在開幕的這一天，回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于 6 月 24 日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和 7 月 4 日的《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大字報。清華附中大字報的一條重要內容是，引用了毛主席 1939 年 12 月 21 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的一段話：“馬克思主義的

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大字報遭到了資產階級司令部派駐的“工作組”反對。細查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大事記，毛主席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回信是紅衛兵這一新生事物產生、發展的重要契機，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具很強的生命力，很快在全國推開；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的回信，也是真正用“四大”方式開展“文革”的起點。全會期間，8月5日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於8月7日全會印發了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進一步支持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毛主席在大字報中尖銳地指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不僅給資產階級司令部敲了喪鐘，同時標誌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從此開始領導“文革”。

我親臨一線接待過紅衛兵。我不僅接待了來自各地的由學校選派並有老師或地方政府領隊的紅衛兵，也接待了完全自發、自由來自各地的紅衛兵。有人稱前一類紅衛兵為“老紅衛兵”、“紅五類紅衛兵”、“保皇派紅衛兵”等，甚至把紅衛兵幹的一些不妥的事歸罪他們，我不贊同這些觀點。對後一類紅衛兵，有人稱之為“黑五類紅衛兵”，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造反紅衛兵”，我也不同意這些觀點。我完全贊同周總理的意見，他們都是“毛

主席請來的客人”。也正因為是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我才可以一名解放軍戰士的身份，熱情而周到地接待了他們。一些文痞、流氓，包括極少數“大官”，利用各種宣傳工具，把紅衛兵醜化成挽袖子、捲褲腳、“無惡不作”的一夥“幹盡壞事的敗類”。我不清楚醜化紅衛兵的一些文痞、流氓、“大官”等，他們有沒有子女等是紅衛兵？有沒有大串聯，有沒有參加“破四舊”等？我坦然講，我既沒有子女和親屬參加紅衛兵，也沒參加串聯等。因我的孩子當時都上幼稚園，親友的子女都成人參加工作，我很超脫。但我無法容忍一夥民族敗類，醜化當時絕大多數年僅13至15歲這一代娃娃。以至他們以自己的無知、不學無術，把一個當時年僅15歲，就敢於向幾千年封建勢力遺留下來的“師道尊嚴”大膽挑戰的小女孩，在各類報刊，瘋狂地惡意醜化、批判到了全國家喻戶曉。一些文痞、“大官”竟如此無恥明目張膽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而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是民族的恥辱、共產黨的恥辱！這30來年，走資派迫害挑戰“師道尊嚴”的少年，而大力提倡“師道尊嚴”造成的極端嚴重後果，這些年大家有目共睹。

雖然人類都把少年看作社會、國家的未來。但新中國成立前，幾乎無例外地大多數富人把孩子關在“象牙塔”培養為壓迫剝削人民的“龍種”；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從事力所不能及的勞動，以維生計。但是，古今中外，有哪個朝代、哪個國家的最高領導層，能供食宿、免交通費、免民勝古跡和風景處門票，穿衣服少的還發棉衣，帶的零用費不夠可借給（據我所知，絕大多數紅衛兵回家後

都由家長還了借款），這樣讓全國幾千萬少年到首都北京“做客”，到各地串聯的嗎？唯有毛主席和以他為領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如此讓青少年見風雨、見世面，在社會火紅的“三大革命”鬥爭中鍛煉成長，一改幾千年大多數農村人，一輩子活動範圍不超過 100 平方公里的狹窄天地。許多人從生到死，沒見過城市、火車、飛機、電燈等等，同我同齡的農村同志，對此都會有深切的體會。請問：埋沒了多少人才？共產黨也能這樣嗎？所以，紅衛兵大串聯，正說明毛主席、共產黨對下一代寄予極大的期待，希望他們在實踐鍛煉中，培養成為建設、捍衛社會主義的一代新人。而且正是這個大串聯的事實，有說服力地批駁了一夥反“文革”派，攻擊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搞“唯成分論”、把紅衛兵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等謠言。事實是我們在接待紅衛兵的工作中，都一視同仁，都當作毛主席請來的客人，熱情而周到地接待和為他們服務，這個事實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我走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交給員警叔叔……”，以及“我們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等，響徹祖國各地，充分表達了當時少年的優良品質和宏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有一位反毛、反“文革”的當年的自稱“造反派”，寫了一本 30 萬字的專談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書，也不得不承認（註：不抄其原文）：當時紅衛兵大串聯，不少是少男少女，火車上都混擠在一起，無一點空隙，但那時情操好，沒發生任何越軌舉動；如果要是現在那樣大串聯，私生子就得拉幾車廂。這段敘述，應該說是很公道的。但必須指出，某些反“文革”的當權派、走資派為了保自己，挑動群衆鬥群衆，煽動

什麼“紅五類”、“黑五類”，應作別論。這些人中，會有不少同志經過30多年反面教員的生動教育，會改變當初醜化紅衛兵的錯誤，正確認識和評價紅衛兵。這些同志態度和認識的轉變，對社會的影響，必將比我們這些人的影響還大，我們應熱烈地對他們表示歡迎！人生誰無錯，改了就是好同志。

我接待的幾批紅衛兵，從沒發生小朋友失竊或偷盜、鬥毆、浪費糧食（尤其農村孩子）等不良現象。在接待中，更沒有發現少年失蹤或被人販賣，也未見少年吸毒、賭博、唱黃色歌曲等封、資、修的流毒。如果在現在搞那麼大規模串聯，這類五花八門的醜聞將會無法收拾。

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總共有上千萬紅衛兵受到接見。參加接見的紅衛兵都熱情高漲，有的一夜不眠盼著天快亮見到毛主席，有的接見後寫日記，表示誓死捍衛毛主席……。每次接見，都秩序井然。八次接見都有新聞記錄片可查，我陪同紅衛兵參加了四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北京，除公共汽車擁擠一點外，首都秩序井然，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而不像當今“太平盛世”、“和諧社會”遇到大喜慶節日，商店不准賣切菜刀，甚至調動一百多萬野戰部隊保駕；絕大多數市民10幾年前，都裝了防盜門，窗戶安裝了鐵護欄，有些人家一遇節日還加固。這些顯明的反差，讓一夥攻擊紅衛兵的文痞、走資派、“大官”大失光彩，不過他們對已有文過飾非的天才，對紅衛兵照舊竭盡所能進行誣衊。

他們誣衊紅衛兵的重點內容之一是“破四舊”。我想對此提個問題供研究：“四舊”該不該破？儘管這類事，

我都未參與，但我認為，不管是誰提出的，“破四舊”並不錯。從當時實際情況看，破“四舊”的結果，社會風氣有明顯進步，最最起碼是搞唯心主義、封建迷信空前大幅度下降，這個歷史事實，誰也否定不了。但破“四舊”，肯定會造成不該破的當“四舊”破了，有的“專家”、“大官”在這方面很辛苦地統計出“毀掉文物”價值多少這類很蠱惑人心的數字。不過我倒要問，一些娃娃弄不清是不是“四舊”而破掉了，從其性質最多只夠得上誤會。從已公開的大量文獻，這一情況毛主席知道後，立即請周總理出面做工作，這股風很快就剎住了。紅衛兵聽毛主席的話、聽黨的話，這也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紅衛兵還真不懂什麼是“擦邊球”、“上有政策而下有對策”。那麼，那些為此大做文章的“專家”、“大官”你們能明白無誤地界定什麼是“四舊”嗎？比如在農村隨處散落的土地廟算不算“四舊”，平掉它改為良田對不對？但現在一些地方“官員”又把廟宇建到遍地開花，還攀比著越建越豪華；拜佛燒香的“共產黨官員”隨處可見，人數之多，向泥菩薩許願出手之大方，一掏就上千萬元，大創歷史記錄；貪官絕大部分相信封建迷信、看風水……，這已是否定不了的事實。這一趨勢的增長，是社會進步、還是在復辟倒退？醜化紅衛兵破“四舊”是為了大肆宣揚“四舊”的現實，“專家”、“大官”們如何把這一現實，同你們天天放在嘴皮上高唱的“科學”之類聯繫起來？不錯，破“四舊”，一破勢必會毀一些東西，即便毀掉一座破爛的土地廟，要重新造出來，土地菩薩塑造起來，少則也要十幾萬。既然“專家”、“官僚”對造成的這些“損失”，

痛心疾首進行譴責。但可以肯定，那些“四舊”成不了為人類造福的生產力。請問，在你們的唆使下，竟能把錢學森同志苦心建立的科學實驗基地，不顧人民反對，而用鏟車等現代工具把它鏟為平地，損失的就不僅僅是價值數千萬元的實驗儀器，而且使一些科學實驗無法進行。這就不能不責問，“專家”、“大官”譴責十幾歲娃娃“破四除”，到底是為了什麼？

“專家”、“大官”譴責紅衛兵另一個問題是抄家。無合法手續抄家，無疑是錯誤的。但千萬別忘了這是娃娃們不懂憲法幹的錯事，發現後，同樣剎住了。但因為是娃娃幹的，只能引導糾正，在任何朝代也不會對天真的娃娃幹了點錯事就判刑。何況抄家的紅衛兵，絕大部分是高幹子女，其中大多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派的子女，而且較多集中在劉、鄧領導的50多天“前文革”期間，事件還是從北京逐步擴散出去的。例如後面介紹的青海問題、湖南道縣問題，大規模抄家，都是走資派指揮下幹的。又例如：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事組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編印的《要事彙報》，這期《要事彙報》說，據雲南省公安廳報告，二十二日晚，十七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雲南省副省長王少岩的家，抄走手錶、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存摺，在取款時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六個是北京學生，其餘十一人，除兩人外，都是高幹子弟。於是，對高幹子弟抄家，毛澤東批示說：“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佔幹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全國規模最大的非法抄家發生在葉劍英等領導的清查所謂“四人幫”“三種人”，即“後文革”向人民反攻倒算運動中。那些懂事、懂法的“專家”、“大官”搞的“後文革”，隨意捏造“追隨”“四人幫”的“三種人”，對上千萬響應毛主席、黨中央發動“文革”的號召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批骨幹和忠誠無產階級事業的共產黨員、幹部、工人、農民、革命知識份子、解放軍指戰員，進行慘無人道的迫害，造成冤、假、錯案遍地。其中，絕大部分受害者遭到非法抄家。就我而言，張愛萍派來清剿“國防科委以李敏（毛主席的女兒）為女頭子的‘四人幫’小幫派”的“後文革運動”，沒有查出有一人同“四人幫”有組織聯繫的，或寫了“勸進書”的；更沒查出一個跟了“四人幫”幹了壞事的。相反倒是基本弄清楚了張愛萍鎮壓七機部的幹部、群衆；背了中央，秘密製造核彈頭，圖謀不軌；指使劉毅民一夥瘋狂從進口反動報、刊等搜集惡毒攻擊、誹謗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領導的黑材料。由於我知道他這些罪行，加上我抵制他把被廣為流傳被稱是他的情婦（逼離了婚，女方原丈夫長久受辱，病故）硬要塞進情報所“升官”，而派來武鬥司令常勇為“工作組長”，憑空捏造罪名，進行殘酷迫害，無合法手續，剝奪我當時在任的全國人大代表的人身自由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非法關進張愛萍私造的監獄，並進行非法抄家。常勇唆使非法抄我家時，因我無任何非法物品和材料，而抄走了我大量私人財物，有些財物很珍貴。他既不給我家屬抄走物件清單（都是背著我抄的，因當我面抄他辦不到，理當遭拒），而至今未歸

還一件，珍貴的很可能被竊為己有，已構成盜竊罪。這夥知法犯法的敗類，有什麼臉面對紅衛兵說三道四。全國統計一下，在走資派清查“三種人”的“後文革”運動，被非法抄家的同志的人數，可能是中共史、甚至是民族史上數量最大、性質最惡劣的非法大抄家運動。其性質，同紅衛兵抄家，決不能混為一談。

“專家”“大官”對紅衛兵的誣衊、醜化，表明了他們為了對“文革”反攻倒算，黔驥技窮到了對少年失去了人心，失去了理智。我想，對13歲至15歲的少年即或做錯一點事，即使是“上帝”也會對他們寬容三分。可一些“專家”、文痞、“大官”，不僅對這一代少年抓住一點，不及其餘，而無限上綱，惡意醜化；甚至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更有“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到頭來只能是充分暴露了他們自身反動階級本性。最可笑的是某些“大官”，想當初你們不也拿著紅纓槍或組織少年拿著紅纓槍站崗、放哨、鬥惡霸和地主造反嗎！為什麼你們當了“官”就阻撓、醜化少年造反，而不是把革命傳下去？

當時成千上萬全國少年，在“文革”的大風、大浪中的鍛煉，練就了一身反修防修的本領，其中相當多的少年，已成為當今反修批修的社會中堅，成了捍衛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紅衛兵的豐功偉績，已載入無產階級革命史冊！

向紅衛兵致敬！

#### 四、如何正確對待“文革”中的周總理

一夥走資派、文痞們圍繞周總理，在這 30 多年中大做文章。其特點是實用主義，按需要像捏泥人一樣，隨便捏來捏去。一時把周總理歪曲為在“文革”時期，“抵制了”毛主席，幫助了不少老幹部免受“迫害”，並撿幾句周總理表揚自己的話，甚至不惜利用一些人捏造的“總理遺言”中有利自己的話，美化自己，用著當官的資本，大肆宣揚；如周總理講了不利自己的話，就說總理“不得不說違心的話，否則他自己也‘保不住’”。這是近 30 年走資派、文痞們對待周總理的通用公式。但有些對“文革”、對毛主席持反對態度的學者，看出走資派、文痞這些伎倆，同史實實在太離譜，不能自圓其說，而只好承認“文革”時期，周總理是全身心地擁護並全力以赴投入文革的，只得承認毛、周是一致的，但他把史實歪曲為毛主席是“獨斷專行”的“君主”，周總理“忠君”跟著“犯錯誤”。其代表作就是 2010 年 5 月出版的《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正如有的同志所說：“周恩來生前在中國百姓心中聲望很高，在非毛化初期，其名望曾一度高過毛澤東，隨著非毛化的深入，香港出了兩本書，一本是謠言傑作《叫父親太沉重》，給了道德化身的周恩來潑了惡毒的髒水；另一本書名為《晚年周恩來》，以知情人自居的作者高文謙真中摻假，深層次地大貶了周恩來一把，從此，周恩來從神壇上跌落下來，爭論日起，右派運用謠言把中共領導說成無好人，包括周恩來。”

總之，這些歪曲周總理形象的書刊等，不僅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而且為研究文革史設置了不少障礙。由於周總理在“文革”中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因此，不如實反映周總理在文革中的活動，就很難反映完整而真實的“文革”史。在此，我先作一點聲明：關於 1971 年 9 月 13 日（即林彪出逃）前後兩天的情況，目前我所見資料，對周總理的作用，各種議論分歧很大，本人無能力鑒別真偽，對此本人暫不發表意見。

## 1、正確評價周總理

這 30 來年，復辟派出於某種需要，誣衊周總理“違心地幹了一些事，不這樣，他自己也保不住”（記得的大意）。一些文痞，以此為框架，各顯神通，把人民的周總理，歪曲成為了“保自己”，不惜“不講原則”、“委曲求全”、“奉承、迎合”、“不講階級鬥爭”……集孔孟之道于一身的現代“大儒”，醜化周總理。周總理成了他們打“鬼”的“鍾馗”，為他們篡權復辟服務。因此，捍衛偉大的全世界聞名的周總理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領導人的光輝形象，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沒有這個水準，更沒有資格來評價一個無產階級的偉人。好在前段時間中央電視臺播放了《紅色搖籃》這部史料性電視連續劇。正是這部電視劇，使我認為談這個問題，有了一定的把握。

陪伴周總理從戰火紛飛的歲月，到建國後的 20 多年的鄧穎超大姐，既是周總理的同窗好友，又是夫人加戰友。

針對有人說周總理“違心地幹了一些事，不這樣，他自己也保不住”。對此，鄧大姐說（記得的大意）：“不能這麼說，恩來跟誰在一起革命都是衷心耿耿的”。這一段話，高度概括了周總理一生的功和過。有同志說：周總理一生最輝煌的歷史就是從遵義會議後，跟了毛主席一起幹了40多年的革命歷程。其實，這句高度而如實的概括，也適用於鄧小平等，但只要背叛了毛主席，他們不僅暗淡無光，而且遺臭萬年。張國燾是這樣，其他人也只能是這樣。黃克誠同志是最有卓見的老同志，他說：說我們黨內誰比毛主席還高明，那是天大的笑話。這完全符合事實。黃克誠同志在文中藉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形象地刻畫了鄧小平等輕薄地否定毛主席的醜惡嘴臉。不管這些人怎麼污衊，毛主席卻像萬古不廢的河水，永遠活在人們心中。

文革期間，周總理日理萬機，處理了大量重大事件。毛主席對周總理的才能和對革命的赤膽忠心，尤其是文革中處理各類複雜事件的原則性和靈活性，一而再地給與了高度評價，並一再要江青同志等好好學學周總理，這現在都是人人皆知的事，更證明了鄧大姐對周總理恰到好處的正確評價。

我們分析一下“不這樣（指不違心），他（總理）自己也保不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作為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為了“保自己”，而“違心”地處理國家事務，還有比這更醜化周總理的嗎？沒有，絕對沒有。某些文痞按這個框架發表了大量醜化周總理

的文章等等，實不可忍。電視劇《紅色搖籃》如實再現了周總理積極參加大是大非的爭論和鬥爭。從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意見。我們回憶一下周總理在文革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沒有參加過文革的同志可以查查文革期間周總理的指示以及一些重要講話，看看是不是這樣？我建議，在看這些材料時，僅看周總理的原話，不看作者分析觀點為好。從前面介紹的周總理處理科委“文革”中的一些問題，僅從這一個側面，也可看出周總理在文革中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和卓越領導才能。那時誰敢摸一下軍隊那幾個老帥的“老虎屁股”？毛主席、周總理一去世，那幾個老帥的所作所為，誰敢說他們一個不字嗎？

我要強調的是，在任何歷史階段，共產黨人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是應具的品德，不在於自己的觀點正確與否。《紅色搖籃》全劇如實反映了我們黨一貫主張的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的場景，所以我認為電視劇好就好在真實兩個字。如果要講點不足處，就是沒有把有人臨陣逃跑的史實反映出來，反而感到有過意突出有的人，個別場景為突出某人而顯得象有“夾三”似的味道。我們黨正因有這種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才顯得很有朝氣，也才能夠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才能真理越辯越明，才能修正錯誤、堅持真理，從勝利走向勝利。解放後，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共同主持下的 20 多年，延續了這一優良傳統，才使我們黨不變修、不腐敗，社會主義各項建設飛速發展。一定意義上講，這一切成就是我們黨堅持鬥爭的哲學分不開的。我要請問攻擊毛主席“個人獨裁”的走資派、文痞們，有哪個“不獨裁”者敢召開“白

天出氣、晚上看戲”的七千人大會嗎？人們憑常識都懂得，一切事物包括人在內，都在矛盾鬥爭中發展，沒有矛盾和鬥爭，這個世界也就不存在。同樣，一個政黨，不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搞“和為貴，”就不會有朝氣，也就會衰敗下去。這 30 年很重要一條教訓就是把黨內不同政見，按刑事犯罪鎮壓下去，搞不爭論，結果是萬馬齊喑，而一修獨放。這些事例，大家都親眼看到，就不費筆墨了。

從《紅色搖籃》電視劇可以看到，毛主席是一再受打擊的重點。毛主席認識不了自己的意見有錯，敢於堅持。在一系列激烈鬥爭中，周總理都不含糊地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鬥爭那麼激烈，但王明、博古等並沒有把毛主席殺了。毛主席、周總理主政後，王明在蘇聯罵了幾十年娘，但還是中央委員。張國燾仍是紅軍重要領導人，但逃跑是他本人的事等等。如果擺在這近 30 年，毛主席就是有 10 個腦袋也保不住。其結果，則如有人所說：我們的黨至今還可能在黑暗中摸索。可見，毛主席從反右起，堅持了一個不殺，搞錯了可以平反，有其深遠歷史意義。順便講一下文革中毛主席對“不翻案”的人處理，是值得後人效仿的，可以說是熟讀《三國演義》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聯合導演的一場現代“捉放曹”。所不同的是，某人只是集曹操缺點之大成，卻不具曹操的優點。有文藝專長的同志，寫個劇本將來如有合適的時間搬上舞臺，很有意義。

積極的思想鬥爭是反孔孟之道而行之。孔孟主張的是和為貴、中庸之道。進化到現在就是不爭論，馴服工具論，表揚和自我表揚……。前兩年，有的領導到上海、

深圳視察，開口就是：你們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央是肯定的……。話音剛落，上海出了陳良宇、深圳出了個許宗衡，一個是上海市委書記，一個是深圳市長，真是拔出蘿蔔帶出泥，兩個市的領導班子腐敗透了頂，深圳更腐敗到了不能向人民公開，否則將“影響國家安全”。我還僅講了上海、深圳兩個例子，他們到那裏去視察，不就是背那幾句套話，這些年有多少類似上海之類的例子發生？誰從根源上去總結教訓嗎？但復辟派對人民卻不和為貴，而是調動幾十萬軍隊和坦克大炮到長安街殺到血流成河，大量上訪人員遭殘酷迫害……。

共產黨的黨章歷來規定，黨員有權對任一級組織和領導人，包括中央主席，提出建議和批評的權利。毛主席更是號召：如果我毛澤東搞修正主義，大家就造我的反。看看現狀，腐敗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公開官辦報刊見不到對中央有指名道姓的批評，甚至還厚著臉皮在唱讚歌。互聯網上，也不能對某些特殊黨員、超級公民點名批評，而出現了 D 某某和 DXP 這類洋中文。查查字典，中國百家姓就沒有姓 D 或姓 DXP 的。共產黨是那麼生龍活虎、朝氣蓬勃的優秀政黨，卻讓一些人奉行孔孟之道，結果腐敗到了可得國際冠軍，可榮獲腐敗諾貝爾大獎。這更促使我們理解了老一代革命家提倡而力行的鬥爭哲學的重要意義。毛、周、朱尤為值得崇敬。同時，我誠摯地表示向所有敢於公開自己觀點的老一輩學習。真理是在矛盾和鬥爭中產生的，沒有矛盾和鬥爭也就談不上有真理，黨的生命也就終止了。

我在《憶 1974 年國慶招待會》一文中，介紹了周總

理這最後一次主持的國慶招待會，也是文革中最隆重的一次國慶招待會，如實介紹了參加招待會的全體同志對人民敬愛的周總理無比敬仰的熱烈場面。尤其是更詳細介紹了參加招待會的許多外賓，竟忘掉禮儀而站在椅子上踮起腳把周總理看個沒有個夠的動人熱烈場面。一些外國人包括敵對國家的總統，以一睹毛主席為榮。我們無不為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毛主席和共和國總理受到各國貴賓如此熱情愛戴而感到光榮而自豪。很自然在腦海回蕩在那 25 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啦！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啦！為此，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們付出了終身的辛勞，成千上萬的先烈奉獻了鮮血和生命。人民共和國來之不易！我要強調的是，那 25 年正是近 30 年被某些人攻擊的狠抓階級鬥爭的 25 年。其中，任一次激烈鬥爭就像《紅色搖籃》中一樣，周總理都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任何人是抹煞不掉的，也是歪曲不了的。同時，也為不久前，現在的總理出訪，遭受訪國群衆砸向他的皮鞋，而感到痛心。總書記到古巴訪問，古巴總統在中國總書記和留學生面前，用華語高唱《東方紅》，其深刻的寓意誰都明白。為什麼短短 30 年，共和國的國際形象會如此直線下滑？說明搞“和為貴”，反馬列毛而復辟資本主義，不受各國歡迎。

就在這次國慶招待會一年多後，1976 年 1 月 8 日，敬愛的周總理離我們而去，完成了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和為全國人民操勞一生的最後一次心跳。在那人民失去這位總理的追悼大會上，所有參加追悼會的同志都放聲長

哭泣不成聲，一再打斷宣讀悼詞。更有十里長街（註：從人大會堂到八寶山）人們從全國各地彙聚來送人民的總理最後一程，幾十萬為總理送行的人們，比失去自己的親爹娘更為悲痛，悲痛的淚水，灑在了長安街上。勞動人民對周總理沉痛哀悼，再一次證明世上無產階級階級的愛，最誠摯、寶貴。相比之下，有的人死了，從解放軍總醫院到八寶山，僅2、3百米路，從電視上看，僅兩個十字路口人多一點，其餘路段是稀稀拉拉，即便這樣，有人說還是就近的一些單位發了錢動員去的。

一些陰謀家，從1976年10月6日起，以武裝壓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只准喊“英明”而不准說不。從此，人民敬仰的周總理，讓他們折騰得使他在馬克思那裏也深感不安。但陰謀就是陰謀，永遠成不了真理，到頭來只能更充分暴露陰謀家的醜惡嘴臉，無損人民敬愛的周總理半根毫毛！

誰擁護周總理、誰反對周總理？必須弄清楚。

我在這裏，不想講多少讚美話，而是介紹我遇到一些直接同周總理有關的問題，如實介紹一下。講空話、喊口號好辦，辦實事就不那麼簡單。實踐最易顯人心。

### ■ 究竟誰反周總理？

前面已介紹了聶榮臻揪鬥羅瑞卿同志等其主要矛頭指向中央和周總理。資產階級司令部自稱鄧小平“四條漢子”、“四大金剛”的張愛萍更是猖狂搜集了惡毒誹謗攻擊毛主席、周總理的黑材料，而受到提拔重用。這些足以能說明，那夥人高喊“擁護周總理”的事實真相。

### ■ 關於悼念周總理。

周總理去世，上級傳達說：各單位不要戴黑紗；不要設靈堂；不要開追悼會。我聽了感到不舒服，但沒有吭聲。結果各處、室許多同志要求戴黑紗、設靈堂、開追悼會。政治部把這些要求，去請示所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劉毅民，結果劉毅民不表態。政治部來找我，我問了一下具體情況後明確表態：戴不戴黑紗，由各人自己定；全所設一個靈堂，追悼會同人民大會堂同時舉行。靈堂要莊重，搞好後告訴我看一下再開放。結果政治部的同志又來找我說：外面商店已買不到黑色棉布，只有黑的確良（註：當時的確良比棉布貴好多）怎麼辦？我隨即批准買的確良，解決靈堂所需黑紗，但囑他們用多少買多少，別浪費。劉毅民知道我批准後來找我，對我說：不請示一下上面行嗎？我說：如果請示，上面的答復肯定是根據上面的精神你們考慮，這反倒更麻煩。反正我批准了群衆的要求，黨組也不討論、也不好討論，一切責任我個人承擔（註：因本人當時分工負責政治運動和行政，沒有越權）。據我所知，不僅是走資派劉毅民一個人，未見有走資派敢於批准如此隆重悼念周總理的單位。

### ■ 關於 1976 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

這時我正好在京西賓館參加科委常委擴大會。中央關於查參與天安門事件的通知，一個接著一個。為此，一天晚上，我專門回到所裏，找了政治部領導同志。我對他說：去天安門悼念周總理這件事，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但絕大多數群衆肯定真心實意去悼念周總理，因此政治部只能凡上面下來的文件、講話、指示，都照本傳達，不得隨便代表核心組講什麼。群衆去不去天安

門？既不動員、也不阻攔。另外，他對我講了：有人（註：前面介紹我們所貼“我們不掌權誰掌權”大字報和科委製造冤假錯案專業隊骨幹分子左某）去抄回詩詞等，回來一面掉著淚檢討、一面交出抄回的材料等。我說：對這些去了天安門而來交代檢討的，一概只聽、記錄，概不表態，包括交來的材料，收下而不表態。這樣處理的結果，我們所既沒有去了天安門的人受到批評、更談不上受壓；也沒有去了天安門成了“英雄”的。但我的看法，如果查實了是某些別有心的人操縱、煽動的一場矛頭直指中央、毛主席的反革命動亂，則作為一名軍人，不聽中央一再勸阻而去推波助瀾的，到運動後期，不管他是什麼“紅五類”，必將受到處分，這就是我的策略、立場、態度。

近 30 年來，我讀了不少國家有批文的出版物，證明 1976 年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如前面介紹的，確實有那 2、3 個人別有用心地策劃的，而且他們的矛頭是指名道姓針對毛主席的。這說明當時中央的結論正確。就我們所的實際情況，除上述我點名的左某而外，廣大群衆確實是真心實意去悼念周總理，我們所的處理原則沒有違背中央精神，也符合毛主席和我們黨一貫提倡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精神。這件事，揭示了同樣是懷念周總理，但“懷念”的背後大有文章，有本質的差異。

在這 30 年開頭，因為那幾個背後策劃天安門事件的人，把它定為“反‘四人幫’”的“預演”（註：實質是陰謀篡黨奪權右派政變的預演）同“五四運動”類似的“革命的四五運動”；因此，不少當初追查了天安門反革命事

件的同志，在清查“三種人”時，就成了“追隨‘四人幫’”而“鎮壓”，吃夠了苦頭。我想，周總理要是在天有靈，也會對某些人把他當“鍾馗”去打“鬼”而感到憤恨的。從他們打著“悼念周總理”旗號而製造的這一震動國內外的反革命動亂，充分揭露了一夥走資派、野心家、陰謀家“擁護周總理”的真面目。

因為“反周總理”遭迫害的，除上述天安門“四·五”反革命動亂，類似前面提到的劉毅民之流，想盡辦法要挖出“反總理”“罪行”的人，以示他們“擁護”周總理，還大有人在。

在此以我本人為例，作個介紹。我上面講的那幾個搜集總理黑材料的劉毅民等，由於他們的罪證全被我掌握了，為了滅口，他們不僅製造一些聳人聽聞的“大罪狀”，並硬要製造一件惲某“反總理”的罪行，真是機關算盡。由於上述圍繞周總理有關的一些問題，我的態度和處理原則，情報所廣大幹部、群衆是清楚的，因此，他們要給我編造一條“反總理”的罪，尤其是劉毅民之流瘋狂搜集了周總理黑材料的人，談何容易。最後他們不僅技窮，而且在幹部、群衆中碰得狼狽不堪。這些在此不談。介紹他們怎麼編織罪狀。

我在《悼念錢學森同志》一文中介紹說：我們所某處派人去外交部講課，錢老知道後，找我查詢這件事。錢老對出去講課一事，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很生氣，批評某處領導無組織、無紀律，要我重視這件事，並明確要我對今後拿出所的東西必須把關。在一次黨組會上，我點名要某處領導講一下這件事，為什麼不經黨組審查

講稿就隨便代表科委和所出去講課？某人答復：我們的“外交部組”是周總理批准的，沒必要通過你們。我說：好大的口氣，“外交部組”？“總理批准的”？你把總理的批文拿來，我就不相信總理批准你不受所黨組的領導。他還想頂。我說：如果你不接受所黨組領導，什麼“外交部組”？口氣不小，再這樣下去，我都把你那個組撤銷了，任務由有關處、室共同分擔。他就記恨在心，後來就給我扣上“反總理”的帽子，去討好常勇、劉毅民。其實批評他的時候，劉毅民在。搞了幾個半天逼供信，要我承認“反總理”。當然，他們達不到目的，但我也不交底，不說是錢學森同志批評的。因為我有個習慣，從不打著上級的旗號批評人。這樣做比較主動，由我承擔責任。這件事的事實是：為利於外交部進行工作，總理指示可以請科委派人給他們講講國防尖端技術方面的情況，科委按他們提出的要求，派人去講。錢老批評的精神是要重視去講的水準和品質，要把關，不能無組織的背了組織幹。什麼“反總理”，純屬胡言亂語。不過，這30年類似這種“反總理”的案子，絕不是我一個人碰到。我們應理直氣壯地揭露這夥“拉大旗、作虎皮”去嚇唬人的陰謀。

他們真的清查反周總理的人嗎？根本不是。就如我上面介紹的，他們自己反周總理的罪行，人證、物證俱在，不僅不清查，還包庇、重用，官升幾級；而且誰知道他們的罪行，就迫害誰，以至李敏同志不知此事，也要捏造成知道，進行迫害，甚至企圖滅口。可能就是因為她是毛主席的女兒，必欲除之而快。這夥反周總理的敗類，

還要打腫臉充胖子，既要當婊子，還要立碑坊。

這夥敗類，把周總理當作“鍾馗”打“鬼”的冤假錯案，在全國肯定不是一個小數目。必須撕去他們“擁護”周總理的偽裝，還他們反周總理的真面目，以教育人民。

■ 評論“文革”期的周總理，繞不開批林批孔運動。這是一夥走資派、文痞捏造“反周總理”的重點。關於這個問題，前面在介紹批林批孔運動已作了介紹，不再重複。僅作一些補充：

2010年3月2日《文化藝術報》（書刊參考）第3版，發表了摘自《毛澤東品國學》上某某的文章：《毛澤東對孔子從崇拜到打倒的評價之變》。在此僅摘其末尾幾句話：“‘文革’中，毛澤東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從理論上講並沒有錯。因為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和舊的習慣勢力還廣泛存在著。但他沒有具體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響阻礙現代中國的進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極影響，如欣賞個人崇拜、家長制、過分誇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並且，他只看到孔子對現代的消極一面，沒有注意到孔子對現代中國也存在積極的一面。這顯然也是一種片面性。”

我不想對這一段話進行評論，在此，僅建議某某不妨利用點空餘時間看一下《毛主席同毛遠新談批孔》、《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也不妨在網上查查1974年關於批林批孔中央文件、領導講話、報紙上的一些重要有關文章。可能對你寫這類文章會有點幫助。這倒引發我也談點看法。

現在社會上一些趕那個“決議”時髦的知識份子，並不一定出於反毛，而是人云亦云，對毛主席對有關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處理、決策，知之甚少，但好趕時髦。毛主席古典文學知識之淵博，連號稱泰斗的郭沫若也是心服口服，我這類古典文學的文盲，在這方面看看熱鬧都不夠格，我有一點自知之明。

我們能不能說毛主席、周總理這代人民敬仰的偉人，就沒有一點孔老二的思想影響（指某些糟粕）？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包括他們自己也會是否定的。毛主席說：“我自己也不高明，讀了哪個就信哪個，以後又讀了七年，包括在中學讀半年資本主義，至於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馬克思，只知道拿破崙、華盛頓。在圖書館讀書實在比上課好，一個燒餅就行了，圖書館的老頭都跟我熟了。”更說明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一代偉人，無私地把全部精力服務於人類共產主義事業，是他們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同某些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點、患得患失，對自己有利就幹、不利不幹的小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另外，我們不能說身上也有孔老二的某些消極因素，就不能批孔老二。要這樣，我就沒有資格批孔老二，因為他的東西，在我腦子裏太多，比如父道尊嚴之類。但我認為批孔實際是一次全民反復辟教育。參加批判的人，要通過批判，進行自我教育和改造。毛主席是做了榜樣的，老人家一再強調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但他採取逐步解決這個問題。思想意識形態的改造，決不可能搞一步到位，這同生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只能逐步來。毛主席自己減去 200 元的月薪，縮小分配問題上

的等級差，並取消軍銜制和停止評定技術職稱等等。而在發展生產力方面，他贊同和支持“大躍進”，充分利用土改後的新的生產關係，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不妨看看近30年，復辟派是如何對待這兩事件的。他們造出“批孔就是‘批周總理’”，而大批毛主席“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等。從而他們竭力拉大差距，以至到了貧富差距為世界之冠；同時產生了軍隊將軍氾濫，“博士”大躍進。另外，復辟派一面鼓吹“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是當前（指大躍進期）的主要矛盾”……。但同時攻擊發展生產力的大躍進是毛主席“頭腦發熱”。可見這夥不讀馬列的不學無術之徒，搞得你怎麼幹都不行，只有孔孟之道才能“救中國”。

我在《學毛著，“解難題”》一文說，凡中國知識份子都能背誦孔老二的“學而優則仕”等等這類糟粕。我們這代人，從學洋學為啟蒙的，沒有專讀過孔孟之道，然而孔孟那些糟粕也是記得很牢的。何況孤立地看，孔孟大量言論還是正確的，例如孔孟的“三人行必有我師”……。但正如毛主席所說，這些話好聽，但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有幾個知識份子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師”？僅是嘴巴講講，玩弄點文才，實際幹的是不爭論。共產黨執政以來，唯積極批孔的毛主席說：“如果發現我毛澤東搞修正主義，你們就造我的反”，公開“招標”，請幫他反修防修的老師。毛主席還說：什麼萬歲、萬萬歲！最唯心。他還對工作人員說：如果我死了，你們開個慶祝會，就說毛澤東死了。這些都是毛主席闡明唯物主義的生動事例。

有的人不僅自吹，還利用社會上憑空捏造的“周總

理遺言”，鼓吹周總理是“最信任”他，為自己造神，並搬進了自己的文選。有位叫橘子皮的朋友，2010年12月3日在《毛澤東旗幟網》介紹當年打橫幅標語“小平您好”的同志講了大實話，文章標題為《當事者說：打“小平您好”橫幅只為出風頭！》。文章介紹說：“昨天晚上，無意中看了鳳凰網‘魯豫有約’一段視頻，嘉賓是當年北京大學打‘小平您好’橫幅的郭建歲、於宏寶、李濱。當魯豫問他們‘當時打這個橫幅的初衷時’，他們的回答大煞風景：‘完全是為了標新立異，只是為了出風頭！’。”可這條“為了出風頭”打的“小平您好”是20多年來大樹鄧小平的標誌性“證據”，拆穿了這個西洋鏡，讓人把臉向哪擋？他可口口聲聲攻擊毛主席“搞個人迷信”的呀，結果毛主席去世後，還不少人家掛毛主席像、到處唱歌頌毛主席的歌，不少人還在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可是批評毛主席搞“個人迷信”，怎麼自己撈不到人樹他，竟不惜用偽造的“周總理遺言”中吹捧自己的內容大樹自己，還竟用幾個青年為了出風頭打的橫幅標語“小平您好”特樹自己，可能世界上任何一位為自己造神的人，也再沒有比鄧小平為自己如此造神的不惜手段，以至十分低級趣味了吧！

這一對比，人們會看到了什麼？共產黨尊孔的30來年，不僅沒有公開招標拜師批評監督自己的，而是不爭論，貨真價實的極端個人獨裁；即使有人自願出來幫幫他們，根據黨章規定，黨員有權向任一級組織和領導、包括中央主席，提出批評和建議，而對他們進行幫助，你們看到這些批評幫助能在報刊公開點名發表嗎？沒有。不僅

如此，在互聯網上，對某些特殊黨員、超等公民也不允許點名幫助，甚至還出現了 D 某或 DXP 之類創新“中文”，百家姓查不到姓 D 或 DXP 之類的姓。再舉個例子，北京的同志都會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西單“民主牆”上，一夥人貼某人樂意看到的人的大字報時，某人表態，這個辦法好，要作為一種制度，保存下去（記得的大意）。這個“指示”是傳達到基層的，無非號召人們去貼某人討厭的一些人的大字報。但“民主牆”上逐漸出現貼某人自己的大字報時，此人不僅抓了人，還把“民主牆”搬到了偏僻的北京西郊月壇公園，不久被取消，不久又用法律形式禁止貼大字報。世界就是如此奇妙，被鄧小平們批評是“大樹自己”、“不講民主”、“破壞集體領導”的毛主席，沒有一件重大事項不經集體研究而個人說了算的，至今沒有一個人能像毛主席那樣公開宣佈“如果我毛澤東搞修正主義，大家就造我的反”，沒有一個人敢開“白天出氣、晚上看戲”批評中央領導的七千人大會等等。從前面介紹的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揭發的，劉少奇、鄧小平在這個會議期間，卻明目張膽壓制批評、扣壓揭發材料等等。楊尚昆日記更是揭露了他怕知情人揭露他，而用特務手段殺害數十名知情的公安幹部，確保自己“偉人”形象。

又如孔孟的“學而時習之”，官僚們也只是訓教學子好好學習，要相信先富帶後富，別管國家大事，不要上訪，不要貼大字報，更不要上街“鬧事”，要“和諧”、“穩定”、……。如此訓示學子的走資派、“專家”們自己在幹什麼？號稱“公務員”的“官員”們，“有 46%一年裏

不讀書”、即便那 54% 讀書，只是讀 “《官經》、《厚黑學》、《中國歷代君臣權謀大觀》、《曾國藩用人識人術》、《古代帝王馭人術》、《蔣介石的權術》、《孔子為官之道》、《官場文化與潛規則》、《教你如何聰明工作往上爬》、《易經》、《陰陽風水學》、《八字與官運》、《辦公室風水學》、《八卦透解財官運》、《官運桃花》、……”；那個自稱懂得馬列 ABC 的鄧小平，讀的是 “鬼書武俠愛好者，他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參見 2009 年 2 月 24 日和 11 月 28 日《文化藝術報》）。結果，“和諧、穩定”到了共和國六十週年大慶，北京市商店不准賣切菜刀、調動百多萬武裝到北京 “保平安”。即便如此保 “和諧”，國慶前夕，前門大柵欄還是發生了殺人案。普通百姓為享受一下共和國慶典，興沖沖去天安門廣場，卻被 “安檢”到了沒有幾個不罵街。“和諧、穩定”到了反動官僚、地痞、流氓、黑社會同政府聯合開辦截訪公司，迫害含冤上訪人員。

大家不會忘記，他們靠這類陰謀手段，曾蒙蔽多少善良人們，跟著他們高喊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一直 “挽救”到了成千上萬工人、農民、大學生失業，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娶不起老婆，以至死都死不起、火葬一下一萬幾，實在喚不起人再喊了才甘休。接著就換湯不換藥，什麼 “小康” 之類，等等一波一波地喊下去。不管白貓黑貓、“先富帶後富” ……之類動聽說教，成了統治階級維持自己統治的工具，就正如毛主席所說：都是廢話、屁話。

孔老二的那些糟粕，例如 “克己復禮”、“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卻理

當成了復辟派得心應手的孔孟精華，所以才超高速復辟、腐敗。“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等等孔孟糟粕，不僅空前吃香，更是與時俱進地飛速發展。人們都知道孔老二本人沒有多少東西，許多是弟子們幫他添油加醋堆出來的，加上一代代的弟子的添磚加瓦，把他塑造成了“孔聖人”；再過幾十或百年，這些年發明的，貓論、先富帶後富，“三個代表”、“和諧”……，也會添加進去，成為孔孟“創新理論”組成部分。

因此，我希望中央電視臺把《紅色搖籃》多複製些，發到縣級電視臺或閉路電視播放，搞到家喻戶曉。這是一部端正黨風的好教材，也是對那些搞流氓史學、陰謀史學的人很好的教育。

我沒有讀過孔孟的專著，可能出於好奇，前年在秋季書展買了一套線裝孔、孟書籍。走馬看花似的拜讀了一遍。許多語言看不懂，好在都有註解。可能看得太粗糙，好像其中關於自然科學知識，基本是空白。中華民族就靠孔孟那幾本小冊子為標準選拔了上千年的人才，而造成中華民族在封建社會，靠“之、乎、者、也”八股文混了幾千年；一直捧著四大發明自我欣賞。中華民族確實是個聰明的民族、勤勞的民族。我沒有考查，用了不知多少朝代的算盤，可能是我們民族發明的，就那麼百多粒子，能運算加、減、乘、除，派了是否有千年的大用場？至今也還在一些場合用著。但不能運算三角函數、微積分等等。可是我們的老祖宗發明的“皇曆”，能對月球、地球等天體運動推算得那麼准，對指導農事等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直到上世紀 60 年代後，塑膠膜

暖房的逐步推廣，才出現了目前被稱為的“反季節農副產品”，即違背了“皇曆”規律的農產品。如果我們更早擺脫孔孟之道束縛，大興自然科學，很可能第一代電子電腦、第一臺電機、第一座核電站……，是我們民族發明的。被孔孟之道束縛的時間愈短，我們中華民族必將更加偉大。從毛主席領導 20 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我這些推斷，也並非全是空話。因此，我很敬仰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青少年時代受孔孟之道啟蒙而成長出來的革命先輩，能舉起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作為革命的起點，並取得成功，使中華民族又回到了世界先進行列，不僅為中華民族而且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興盛作出了十分偉大的貢獻，值得我們每一個炎黃子孫自豪。

我在《讀毛著“解難題”》一文，十分粗糙地講了幾句為什麼知識份子一統天下執政，反而高速復辟、腐敗，知識份子中孔孟之道的毒是原因之一。我在文中講了兩句概括性的話：革命沒有知識份子不行；革命由知識份子一統天下執政更不行。這是我對我們黨九十來年的實踐，對知識份子的認識。

關於孔孟之道，對它的認識和批判，應歷史辯證唯物的對待。不能說中國出了孔孟後，才出現復辟倒退的歷史悲劇。否則不僅解釋不了孔孟之前發生的復辟倒退史例，即便之後，也不是 100% 的復辟派都信孔孟，但基本都信，這是史實，也是現實。搞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概都承認相對論是真理，絕對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比如我們說蔣介石反動，但蔣介石贊同一個中國。誰都

承認他贊同一個中國是正確的，但又否定不了蔣介石反動這個客觀事實。對孔老二也是如此。所以批孔，我們應當在歷史辯證唯物主義這個基礎上統一認識。孔孟之道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並不是他們有什麼“天才”，大腦裏長出來的，是他對奴隸社會的觀察、認識而總結出來的。它的核心內容，用現在的話就是教會奴隸主，搞好“治安”以求奴隸社會“和諧、穩定”。殊不知，在階級社會空談“和諧”、“穩定”，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

### ■ 學習發揚周總理等老一輩的革命鬥爭精神

上面講了《紅色搖籃》再現的鬥爭哲學，使我們黨生龍活虎、朝氣蓬勃，從勝利走向勝利。有不少同志可能同我一樣，會感到對毛主席太過火了。但如果我們聯繫毛主席的講話，“核心是在鬥爭中形成的，而不是自封的”，再想想我們五十年代看過的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就能理解一句名言：百煉成鋼。正是鬥爭的哲學，煉就了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這代偉人，建樹了中華民族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在“文革”中，周總理仍堅持了“鬥爭哲學”。例如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的嚴厲批評。近30年，在某些人帶領下，我們社會形成了一股極不正常的風氣，把黨內的積極的思想鬥爭，進行了極度歪曲和醜化。似乎領導人間只能是天天“請客吃飯”，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且搞成作為中央主席的毛澤東不能批評人，一批評就是“迫害”、“打擊”……，扭曲並醜化我們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同電視劇《紅色搖籃》的中央一比，使人無法理解。為什麼會是這樣？

也是看了《紅色搖籃》電視劇、看書、看互聯網的文章，算是解開了這個謎，這就是我在《漫談文化大革命》一文最後一段講的，毛、周、朱等等老一代之間的爭論，哪怕拍桌子、鬥爭，都是路線之爭，沒有個人私利或得失之爭。所以能看到會議上一鬥完，會下仍是同志、戰友，這些動人場面。我對老一代領導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的好作風表示欽佩，這種精神值得我們很好學習。這正是共產黨才具備的好傳統、好作風。其他任何朝代、政黨、包括修字型大小共產黨，都做不到。其他朝代、政黨，無一不是孔老二的君君臣臣那一套，甚至大魚吃小魚，俗話說的官大一級壓死人，更有對黨和人民玩弄韜光養晦而要兩面派的。

最近互聯網公開了薄一波同志的一段講話，“我總算看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只為一個目的，就是專門和毛主席對著幹，凡是毛主席生前肯定的，他統統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否定的，他統統都要肯定”，算是揭開了謎底。就是說，這30年來，某些人以個人得失、名利、地位，判定是非。對自己有利的，不惜一切手段也幹；對自己不利的，絕對不幹，還不准許別人幹。這些歪風在黨內佔了統治地位。就是對待周總理，復辟派也是依個人得失，隨意把周總理的形象按他們的需要捏來捏去。因此，不爭論這類獨裁理論，就成了為官之道的法寶。在黨內隨便把人拉下馬、搞特務活動（參見萬里同志講話）、綁架等等就應運而生。由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替換了黨內正常的生龍活虎的民主生活。復辟、變修、腐敗就成必然，進而求助孔孟之道，維持腐敗不堪的統治。

其實，越依賴孔孟之道，腐敗越甚、垮得越快。中國的共產黨，不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信奉孔孟之道，真是天大的怪事。

這一歷史教訓，使我們認識到，我們破孔孟之道的同時，應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大旗，恢復我們黨行之有效的積極的思想鬥爭。

最後，我要重複一下：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等這些老前輩，都是一心為公、一心為人民，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他們同黨內革命隊伍內任何人的爭論、鬥爭，均是路線之爭，無私利之爭。值得我們永遠學習！而走資派，為個人私利，幹盡壞事，葬送了革命，應予徹底揭露。

## 2、周總理嚴于律己

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毛主席、周總理嚴于律己，身體力行，為全黨作出了榜樣。這是我們黨在他們領導下，幾十年廉潔奉公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有句古語：言教不如身教。現僅舉“文革”時期周總理幾段講話為例。

秋石客同志的文章介紹說：“周總理自己曾多次說他見事遲，路線辨別能力不強，犯有許多錯誤，這並不是謙虛話，而是實情。在王明路線時，例如在寧都會議上，擁護王明反對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在武漢，曾贊成一切通過統一戰線，實際上反對毛主席在統戰中獨立自主路線。在建國後，包括在文化革命中，都有此類情況

發生。原因在於周恩來不是理論家，是實際工作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周總理有偉大的人格，黨性最強，每當認識到錯誤，堅決改正，光明磊落，從不搞陰謀詭計。”我認為這一段介紹是負責任的、符合事實的。

周總理說：“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甯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註：以上參見秋石客同志發表的文章《周恩來是毛主席親密戰友》）。

僅就這兩段文字，就足以說明周總理心胸坦誠，嚴於律己。這正是共產黨人獨具的高貴品質。與周總理的高尚品格相對照，一夥韜光養晦耍兩面派搞不爭論的獨裁者們，誰有膽量召開“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七千人大會？誰敢聲明：如發現自己搞修正主義，大家可以造他的反？

### 3、周總理同江青同志

江青“四人幫”反周總理，是近 30 多年，一夥走資派、文痞炒得最凶的問題。涉及重大事件的就有“批林批孔

批周公（周總理）”和1976年天安門廣場的“四·五反革命動亂”等。在此僅想介紹一下周總理同江青同志間的矛盾，說分歧也行，是怎麼引起的？

秋石客同志發表文章說，到目前對周恩來的評價有下列幾種：“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官方對他的評價周恩來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這種評價應該說是準確的”。“當時就有人提出評價不足，認為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外交家、偉大的軍事家。並成為‘四·五運動’的藉口和誘因之一”。

文章說：“在文化革命大部分時間，周恩來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劉少奇專案組組長，許多大案都有他的簽字。周恩來對劉少奇專案材料上批示：‘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註和看法，我也是以無比憤怒的心情看著、想著、批註著這三本（關於）劉賊叛賣我們黨和犧牲同志們的材料。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們要首先歡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沒有這種大革命，怎麼能夠把劉賊及其一夥人的叛黨賣國、殺害同志的罪狀，挖得這樣深，這樣廣？當然我們還要繼續挖下去，不能有絲毫鬆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們要交給後來人！’”

文章說：“在周總理晚年，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以後，在其病重住院去世前，中央發生了一些事情，例如江青在一九七五年遭到長達四個多月的圍攻，雖然是打著毛主席旗號進行的，卻很不正常。因此，一些人懷疑黨內

一夥人敢於那麼幹，背後肯定有人撐腰，此人就是周恩來。甚至連江青等最高層領導，也對周恩來不放心。周總理頻繁同一些人經常見面談話引起高度關注，以至於江青不得不下令王洪文前往長沙向毛主席彙報，以防不測。”

文章說：“對於周恩來晚年究竟幹了些什麼，拿我個人來說，也一度有懷疑，認為他也可能是反文革力量的後臺。直到最近幾年，通過深入研究和瞭解一些重要知情人，才明白了歷史真相。”

文章說，“據知情人講，周總理住院期間，的確同許多老同志談話。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的確經常往總理那裏去。談些什麼，江青等人只是猜對了一半。一些老幹部找總理是不斷做總理工作，希望總理乘毛主席身體不好，站在他們一邊，對江青等採取一些行動，架空主席，遭到周恩來嚴辭拒絕，並說了意味深長的話‘如主席是裝病你們怎麼辦’，直到最後總理死，鄧小平他們也沒有拿到總理任何支持他們的意見。有書回憶，葉帥到總理死前還特別交待，注意總理，希望總理留下點什麼話和文字，結果大失所望，這是事實。另一半，江青他們做夢也沒想到，總理不但沒有支持這些老同志，反而反復語重心長地批評他們，其中有一條是叫他們放過江青，不要再犯錯誤。他們不聽，迫使周恩來帶病參加批評江青政治局會議，阻止他們繼續批判江青，結果被李先念等擋在門外。周總理很生氣，說了一些很重的話，大意是提醒鄧小平等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錯誤，毛主席正關注此事，誰反毛主席決無好下場。知情人講，毛主席的確在政治局會上批評過江青，主要意思是江青不懂

政治，不會團結人，有宗派主義傾向。毛主席用意很明顯，是恨鐵不成鋼，是關心和愛護，是希望政治局同志幫助江青。對此，周總理非常清楚。可那幾個中央領導人，卻大做文章，抓住不放，你說總理能不著急嗎？知情人分析，當時的總理很為難，一方面他是忠於主席的，愛護江青的，同時，他也愛護老同志，他與他們有數十年的交情，不希望他們再犯錯誤。通過這件事，我們可見總理做人是多麼的困難。其結果卻是一方面招致江青等人懷疑，另一方面，老同志也不滿意，一片好心，不得好報，老天是不公的”。

（註：以上參見秋石客同志發表的文章《周恩來是毛主席親密戰友》）

另外，《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第 241 頁也有介紹：“江青雖然時不時向周恩來問罪（中共官方黨史對此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也時不時向周恩來示好（中共官方黨史對此則避而不談）”。“閻長貴回憶：不錯，江青在周恩來面前，比較隨便和放肆，有時還發脾氣，或頂撞周恩來；對這些事和這種情況，在 20 世紀 90 年代我曾問過戚本禹同志，他告訴我：江青同總理的關係很好，她之所以敢於在總理面前發脾氣，那正是他們關係比較好的表現。她怎麼不敢在劉少奇、林彪面前發脾氣？閻長貴還說：1967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我送一份反映貼總理大字報的材料。江青看了看說：‘凡是涉及到總理的事情我心裏都不安！’我知道，中央當時都不允許貼總理大字報。江青、陳伯達曾派我到北大找聶元梓，要她組織人到天安門前覆蓋給總理貼的大字報。江青這句話我印象很深，

影響也很大。”（註：原文註，這段文字選自《王力反思錄》第 243 頁）。

我選這幾段文字，前面秋石客同志文章中的那幾大段內容，許多書刊都能找到類似內容，僅後面戚本禹同志等講的所見不多，但很合人情味。僅從這些可判斷江青同志同周總理之間，總的方面可以說是互相很信任。但後來江青同志對周總理有懷疑，這個分析我認為符合事實。上述幾段文字，基本上解開了江青同志為什麼對總理產生懷疑。在此，我補充的是，約 1975 年全國四屆人大召開後不久，社會上散佈了不少關於江青同志的謠言，特別是造謠美國記者維特克採訪了江青同志後寫一本什麼《紅都女皇》的書，造謠周總理把這事“報告了毛主席”，使江青同志遭到批判；還有一種說法是周總理通過外交途徑想把這本書的版權買來（註：這些謠言現在新華書店都有新書進行闢謠）。這些謠言在駐京部隊流傳甚廣，1976 年 10 月 6 日叛徒集團政變後，這一謠言幾乎成了批判江青同志的重磅“炸彈”，由小道消息走上了大道新聞。約 2 至 3 年後，才見到一些小報對此進行了闢謠。事實是 1977 年維特克發表了《江青同志》一書，我所見看了這本書的人發表的文章，都一致認為書的內容客觀。可笑的是這本書出版時，周總理已去世一年多，他怎麼去報告也已去世的毛主席或買回版權？這類謠言從內容到後果都表明惡意挑撥周總理和江青同志的關係。加上那幾個復辟派，在這同時經常到醫院“探望”周總理，再加上周總理顧全“老戰友情分”，雖嚴詞以拒和他們一道搞政變，甚至把他們逐出門外，但周總理並沒有

把如此嚴重問題報告毛主席、中央。因此，造成江青同志起疑，周總理也有一定責任。周總理在天有靈，看到今天如此黨不黨、國不國，飛船上天而紅旗落地的現實，定會痛心自責。這可能是周總理一生中最嚴重的失誤。毛主席病重時同華國鋒等談及：“葉劍英也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極端不滿的分子，再不要讓他插手軍隊的工作了。這兩年軍認的情緒不穩是和他有關係的呢。許多政治謠言，和他有很大關係呢。”這些就是造成江青同志猜疑周總理的總根子。加上葉、鄧、胡（耀邦）精心策劃煽動的1976年清明節“四·五反革命動亂”，散佈了不少攻擊江青和張春橋兩位同志的謠言（至今對有些人造成的影響還未消除），使矛盾更加深。靠造謠、搞陰謀雖能得逞一時，最終必將敗露，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我再次重申：1976年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廣大群衆，絕大多數都是真心實意去悼念總理的，必須同那幾個陰謀策劃反黨、反毛主席的走資派嚴格區別開。

以上事實說明：周總理同江青同志基本上是互相信任和支持的；但由於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造謠、挑撥，製造了一些誤會。一旦真相大白於天下，將會讓人看透這些造謠、挑撥者的醜惡嘴臉。

當前出現的新動向是，一些文人感到近30年把“文革”時期周總理同毛主席對立起來，以此貶毛揚周，同許多史實實在說不過去，對不上號。由此創造出一種新理論：“文革”時期，“毛離不開周、周緊跟毛”，即把毛主席同周總理捆綁在一起否定，進行誹謗和攻擊。雖說文字上

避開了那個“決議”，但實質與那些反毛主席的文痞們以“決議”為綱，全盤否定“文革”相比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代表作就是在美國吃洋麵包的司馬清揚和歐陽龍門兩人編造、2010年5月1日出版的《新發現的周恩來》一書。在這些貌似“公道”的文人筆下，其通病是無條件信奉“決議”，而否定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客觀存在，更無視走資派橫行了近30年，中國腐敗到了古今中外沒法再腐敗的程度。包括他們寄居在那裏啃著洋麵包的美國，在這夥文人眼裏，美國隨意入侵別國屠殺上百上萬平民百姓，是“美國強盛”，在“維和”、“維穩”。然而，在他們的書中，對待生他養他的中國，就是另一標準：毛主席決策、周總理貫徹實施的“文革”，周總理點了200多人的名（被整了），毛主席就成了“暴君”、周總理成了“惡相”。但說“文革”整了200多人，這話還較公道，說明毛主席領導的“文革”整人不多。但怎麼能得出毛、周成了“暴君”、“惡相”的結論呢？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用這夥吃了洋麵包的中國文人的話，整了200多人，就成了天大的罪孽，而不可饒恕。我還不說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就是貨真價實的瘋狂從事篡黨奪權非組織活動，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這個事實，恐怕已是誰也沒有本事歪著嘴巴再否定的事實。即使這200多人“全整錯了”，則近30年這夥被“整錯了”的人重新上臺掌權後，殺害了多少幹部、學生、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而這夥被“整錯了”的，“文革”時期大多只是被批了幾下，都養在醫院等單位，他們最大損失就是丟了一段時期的“官”。毛主席去世前，大多重新

工作，但還是怨氣衝天。這夥人中，在戰爭年代真正浴血奮戰的是少數，相當一部分打仗是熊包，甚至是逃兵。現在就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天下第一，這夥人後來是對“文革”、對黨、對人民、對毛主席進行反攻倒算最猖狂的一夥人，他們犯下的罪行遠比當初國民黨反動派的地主還鄉團還殘忍。那些吃著洋麵包的中國文人考慮到這些問題了嗎？如果你們還有一點中國人的心，定會感到“文革”對於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如果說“文革”有不足之處，就是毛主席、周總理對這夥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反黨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太心慈手軟了，造成中國當今腐敗、賣國成風，數千萬勞動人民人頭落了地或遭迫害。這血的教訓極為沉痛。但是，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壓迫得越殘酷，反抗得越強烈，人民在反動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下覺醒過來，中國的第二次“文革”正在進行中，該打倒的決不止 200 多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無產階級也再不會心慈手軟，血債必須血來還！這是任何一個朝代、一個國家的法律都堅持的。不知吃著洋麵包攻擊毛主席、周總理的中國文人對此有何高見？

## 五、武鬥和死人問題

### 1、文痞們頻繁地在死人問題上大做文章

近 30 年來，走資派、文痞們頻繁地在死人問題上大做文章。開始我對走資派、文痞們這一伎倆並沒有引起

重視，後來發現他們造成的影響極端嚴劣，似乎共產黨的天下就是個“屠宰場”，把一些毛主席去世後出生的青少年教唆得不僅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老祖宗在解放前受地主、惡霸的殘酷壓迫、剝削的悲慘家史，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是靠毛主席、共產黨才翻的身，反誤認為他們的老祖宗吃了毛主席、共產黨有說不盡的“苦”。如果是解放前地主、惡霸的子孫後代是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黨，我完全能理解，因為這就叫階級烙印。不信可以調查一下，凡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黨的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文痞們，絕大多數是惡霸地主或被我們鎮壓了的“四類分子”的後代。反動分子的後代，雖大多已教育好了，並自覺改造成了國家幹部、軍人、革命知識份子等等，但其中總有少數是不可教育的，是要當反動分子繼承人的。只要氣候一適合，這部分人反毛主席、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決不遜於他們的老祖宗，因為他們的老祖宗在解放前的歷朝歷代，都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的。但在反毛主席、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隊伍中，也確實有一部分是貧窮農民、工人等在舊社會受盡壓迫、剝削苦難的子孫後代，背叛了他們的老祖宗。這些原因，才引起我花了點時間探討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誰要說沒有死人，那真是奇談怪論。別說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國任一次學生考試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數猛增。據報紙報導的官方統計數字，現在每年非正常死亡逾800萬，有8成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其中不包括不可抗因素死亡的。每年非正常死亡800

萬人，“改革開放”30多年，共死亡多少？我已計算不出來了，何況還在一年年繼續。可是走資派、文痞們還在喋喋不休誹謗毛主席害死了多少人，他們在一篇30來萬字的否定文革的長篇大論中，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有一段很長的統計，現將其中講的死亡人數歸納如下（註：力爭原文照摘）：

■ “文化大革命發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

■ “由於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計出文革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全國自殺人數達到20萬人，至於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位需要確切的統計資料證實。”

■ “由於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可能這一總數早已無準確記錄、統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於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誌資料計算，1966～1971年在中國的農村地區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 “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

■ “非官方統計，一年多的武鬥導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主，他們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被抄家、毆打、殺戮，全中國被殺者應不下十萬，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個時期”。

從上述各不相同的資料，其數位多寡懸殊之大，發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實屬罕見。但也可能是我少讀“改革開放”文章、書籍而少見多怪。其中，除葉劍英講“死了2000萬人”是“不爭論”、並居數字頂峰外，其餘大多留了“商討餘地”，即“無法做出可信計算”、“非官方統計”、“應不下……”之類表述。

另外，前面已介紹過，那個反文革長文中，還有這樣一段話：“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主席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結合他們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麼多“右派”、“反革命”，不僅引證了反右擴大化該是誰的責任，而且文革時期死人他們有無可推卸的責任；56天的群衆鬥群衆，可以說嚴重干擾、破壞了整個文革。鄧小平自己也承認：“群衆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

我在這裏想講的是，講歷史真相、講黨紀國法，要求追究惡意憑空捏造死人事件，誣陷、誹謗毛主席、共

產黨的一些人的法律責任。

先回憶毛主席、黨中央在文革中的有關講話、指示、文件。這部分內容全憑回憶，如有原則出入，請知情者指正。

1957年反右時期，中央以鄧小平為總書記的書記處指示按人數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嚴重擴大化，毛主席預計約5000個右派，他們擴大打了55萬個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對右派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留得人在，搞錯了可以平反，人不像韭菜，韭菜割了能長出來，人的腦袋割了長不出來。從此，中央形成一個政治運動處理犯錯誤人員的原則，即“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整個文革期間，毛主席不止一次重申這個原則。據我所知，文革期間所有中央領導、包括中央文革成員，都沒有超出這個原則的講話和文件。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運動，對犯政治路線錯誤的人的處理，都是這個原則；超出了這個原則是毛主席去世以後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說：“前一段時間報刊點名打倒成風。我就要王力限制報紙點名。我讓他搞了個單子，列出已經被中央和各地報紙點名的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可見，即便點名批判的，數量也不大。關於兩派群衆組織，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這方面不僅有中央領導不少講話、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毛主席還專門給周總理親筆寫信，現抄錄如下：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來信問我，

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這裏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不用武鬥，因為武鬥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鬥，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準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還講了文革三、七開，批評了“懷疑一切、全面內戰、不優待‘俘虜’”，並對在這方面不聽勸阻而造成不良後果的幹部、群衆組織的“頭頭”及時進行了處理。例如，處理武漢、青海問題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毛主席去世後，武漢、青海問題平反了。我們要追問一下，是誰支持武鬥？約從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兩派群衆組織大聯合，毛主席指出，“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對促進大聯合發表了一系列講話，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講話、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約1969年，全國已基本上

業餘鬧革命，文革事實上基本已結束。上述長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認這個事實。如果對以上這些事實，沒有實質性的爭議，則把死人的責任推給毛主席就毫無道理。從法律角度講，是對毛主席的誣陷、栽贓、陷害。

## 2、看看究竟是誰迫害和屠殺人民

走資派、文痞們既然對死人問題特感興趣，並一再藉以誹謗毛主席，攻擊共產黨，醜化社會主義，我們應當奉陪，不回避這個問題，看看究竟是誰迫害和屠殺人民。“文革”中，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明令宣佈大部不抓、一個不殺，違者嚴懲。而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派則公開煽動、策劃大屠殺。在此很有必要清理一下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出於反文革的需要，而製造的一系列慘案。

### 1) 劉、鄧搞的五十多天的文革

還是前面那篇 30 多萬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關於“前文革”有這樣一段話：“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鬥事件。僅在首都 24 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 10211 名學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們僅幹了 56 天，就打了這麼多“右派”、“反革命”，他們後來都是大力宣傳文革“迫害知識份子”的，而他們是無比“愛護知識份子”。在此算一筆帳：56 天迫害了這麼多知識份子，平均每天打了 182 個“右派”、

46 個“反革命”。參照這個打法，文革 10 年，全國要打多少“右派”和“反革命”？這就是走資派們大力宣揚的他們“不打擊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黨中央及時發現了他們的暴行，並給予了迎頭一擊，沒有造成更慘重的後果。

### 2) 目前我國每年自殺人數為 225 萬人

據《法制晚報》調查顯示：“自殺已經成為我國 15 歲到 34 歲的青壯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我國有 225 萬人自殺，其中 25 萬人自殺死亡”。“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鄧小虹昨天透露，今年（2008 年）9 月 10 日，是第七個世界預防自殺日，今年的主題是‘社會文化因素與預防自殺’”，“鄧小虹坦言，我國是高自殺率國家，據 2000 年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與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合作開展的有關調查顯示，我國自殺率為  $22.23/10$  萬，自殺已經成為我國人群第五大死因。自殺已經成為我 15 歲到 34 歲的青壯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據瞭解，處於社會和經濟劣勢地位的人群自殺的危險性高”。

這一數字說明，這 30 來年一年自殺 25 萬人，相當“文革”十年期間自殺人數的 10 倍。“文革”期自殺的人中，不少是走資派挑動武鬥等逼死的。“改革開放”這 30 來年自殺的，相當大的比例是生活所迫或承受不了被壓迫和剝削自殺的，例如深圳富士康公司接連 13 人自殺。按“改革開放”35 年計，總計自殺人數約為 875 萬，而這一趨勢還有增無減。

### 3) 安全生產無保障發生死亡事故

“……震驚世界的中國礦難，2001 年到 2005 年，全

國煤礦死亡 10 人以上的礦難平均每週一次，中國每年出口 8000 萬噸煤炭的代價，就是每年平均死亡 6000 多人，相當於每天死亡近 17 人，這還是政府部門的統計數字，實際死亡人數肯定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按照這個統計到的數字，中國每百萬噸煤的死亡率是美國的 100 倍，是俄羅斯和印度的 10 倍，死亡率位居世界之首，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其他各國的總和。在無數死難礦工如山的骨灰之上，堆起了國際壟斷資本的滾滾利潤和中國礦主的驚人財富。”按這個報導：平均每年死亡 6000 多人計，“改革開放” 35 年就死亡 21 萬多。

#### 4) 我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逾 800 萬

2011 年 5 月 12 日《京華時報》A04 版的一篇大標題為《我國每年 800 萬人非正常死亡》的文章稱：“本報訊（記者李秋萌），今天是我國第三個防災減災日。昨天，中國紅十字會訓練中心主任辛寶山表示，排除不可預見的自然災害和人力不可抗拒的重大事故外，我國每年死于非正常死亡人數逾 800 萬，其中八成是可以避免的。”那些對死人問題特感興趣的走資派、文痞們看了這個非正常死亡人數不知有何感慨？這是不是“創新理論”作的“貢獻”？

### 3、幾起性質特別嚴重的案件

#### 1) 1989 年 6 月 4 日血洗北京長安街

最血腥的屠殺發生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北京長安街，鄧小平調動 30 萬野戰部隊，用坦克、大炮、裝甲車等輕、

重武器，鎮壓學生反官倒、反腐敗運動。“官方”公佈的被殺害人數是 300 來人。

據原受周總理邀請來華的美國知名人士韓丁在屠殺現場親見、親聞的情況：“那時已（晚上）10 點 30 分……。第一起人員傷亡肇事始於 27 軍的部隊在長安街西端的軍事博物館前向人們開火”，“我去看一看（天安門）廣場還在發生什麼。廣場完全無須憂慮，有兩排士兵守著長安街，他們後面有一隊坦克，再後面就是一大片的裝甲車。還有堅持從東邊過來的人群，最大膽的去向軍隊靠近，朝士兵們叫喊著，大多數試圖勸說他們停止屠殺。一旦聚集了 200 到 250 人，士兵們便開槍把他們解決掉。我只看到最後的這一幕，但我的朋友整個都呆在那，他還做了記錄，說共發生了六次。就在此刻之前，每隔一小時就要放倒一批人，他們還統計出少了 50 個應該被殺死的人，但沒有傷者……。這我是看到了的，那次長達 5 分鐘交火絕對激烈。有人是如何倖存的，我真不明白”，“後來，當我們去附近一家醫院檢查時，我們發現那子彈原來是爆炸性的（註：也稱開花彈）……。截至那發生後第一個星期三，協和醫院差不多就有 100 具無主屍體，復興醫院 67 具，附近醫院也有差不多數量屍體。所以僅僅醫院太平間裏無主屍體就突破了政府宣佈的被殺數位，而且這些數位僅指那些來醫院治療以後死在醫院的人。還有很多死在街上，或是去醫院後死在家裏。所以死的人應高達 2000，同時，還有上千上千的人受傷。這是對人民的重大攻擊。”（參見韓丁著《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 1978 至 1989》195 至 210 頁）

1996年9月東西文化事業出版社出版的寒山碧著《鄧小平最後歲月》一書，對“六·四”大屠殺作了報導，其中第十九章《鄧承擔屠殺責任，處理“六·四”善後》一章中的小標題《“六·四”傷亡數字》介紹說：“‘六·四’慘案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尚未有正確的統計數字”，“中國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稱，死亡二千七百人，傷3萬人，此僅是死在醫院的數字，街頭死亡的不在之內。但後來紅十字會否認曾對外公佈數字”，“北京某醫院發言人稱：死亡二千六百人以上，其中一千人為大學生，此僅指醫院處理過的數位”，“清華大學自治會稱：死四千多人，傷三萬餘。此數僅調查各大醫院，在街頭處理掉的死屍無法統計”，“即使上述最高傷亡數字是正確的，再加上事後處決的一千人，總共也在四、五千人死亡”……，“用坦克清場，引起世界震驚，全國人民憤怒，全世界人民的譴責。……鄧小平威信喪失殆盡；還落得一個屠殺學生的千古罵名”。（參見《鄧小平最後歲月》第309頁至314頁）。

再介紹本人親見一幕：大屠殺那天下午，我感到氣氛很緊張，考慮到我大孫女正在長安街復興門她姥姥家，擔心別受驚嚇，我騎自行車於下午4點多去到復興門把她接回來。當到了復興門立交橋東，一大群人圍了一輛掛著地方車牌的後面敞開的吉普車。上前一探問，說是解放軍化裝成老百姓帶了武器進城，在復興門立交橋東闖出護欄壓死了人，被群衆堵住，發現裏面全是穿便衣的軍人和武器。我擠到前面一看，群衆已把車裏的衝鋒槍等武器架在車外，還有打了扣的扣人的鋼絲圈套等，

約 6 個身強力壯的年青戰士穿著短袖衫坐在車上。許多群衆要把他們揪出來，一位戴有清華大學袖套的學生勸說群衆冷靜點、要擁軍……，並送水給戰士。我也無心多呆，就去把孫女接回，回來時圍堵車的人仍在。當我騎車從三里河至玉淵潭公園東門時，已聽到軍事博物館的槍聲響了。後來在播放所謂“6·4 動亂”的電視宣傳中，就有我目睹群衆圍堵那輛軍車和那位清華大學生的鏡頭，解釋詞完全顛倒了黑白，那位大學生成了“暴徒”。可不知那位擁軍的大學生後來是否倖存了？如那個晚上被打死了，並被誣陷為“暴徒”，本人願以一位八旬老年軍人為他作證：他是一位擁軍的好青年。可以設想，如果不是他勸阻群衆不要把那幾個軍人揪出來，後果可想而知。不管那幾個戰士後來幹了什麼？但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不可能要求所有戰士都能明辨是非，而敢於挺身而出抵制來自鄧小平大屠殺人民的荒唐命令。

## 2) 幾次“嚴打運動”

溫相同志于 2010 年 8 月 4 日發表文章《83 年嚴打的法制缺陷》說：“從文革結束的 1976 年到 1983 年，僅僅七年時間。在解放思想的口號聲中，中國迎來的卻並非是一派欣欣向榮。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國連續發生多起影響極壞的惡性案件。如 1980 年 1 月發生在廣州市濱江東路襲擊、殺害民警的‘濱江路事件’；1980 年 10 月的‘北京火車站爆炸案’；1981 年 4 月發生在北京北海公園的三名犯罪分子劫持三名女中學生後進行強姦、猥褻的‘北海公園事件’；1983 年 5 月卓長仁等人從瀋陽劫持民航班機飛逃韓國等。1983 年，被稱為‘二王’的王宗

坊、王宗偉兩名兇犯，連續在東北、華北、華南等地區作案，殺害數名公安幹警和無辜群衆；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隊’，外國女記者在北戴河的沙灘上被強姦。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一夥小青年酒後滋事，殘忍殺死了 27 名無辜者，其中包括 75 歲的老人和 2 歲的幼兒，並有多名女青年被強姦、輪奸。這些惡性案件一時震動全國”，“文革……震懾了很多的醜惡的東西。改革使人們……釋放了很多罪惡。原本在文革中不敢說不敢動的一批壞人，在改革的春風裏復活了。這一現象使得相當多的人對改革產生了動搖和懷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80 年 2 月 12 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13 次會議批准：在 1980 年內，對現行的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等犯有嚴重罪行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核准。這一決定，成為死刑復核權下放的開端”，“1983 年 2 月 8 日，中顧委主任鄧小平到無錫視察工作說：‘打幾個戰役，一個戰役打幾仗，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還有的押送邊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殺頭，還有怕吊銷戶口發配邊疆’。1983 年 7 月 16 日，鄧小平對公安部長劉復之開門見山地說：‘為什麼打擊刑事犯罪搞不起來？那一次政治局會議討論打擊經濟犯罪問題，講到從重從快從嚴時，有同志冒了一句，說還要搞准。我說，沒有准不准的問題，經濟犯罪就是經濟犯罪；打砸搶的、搶劫的、殺人的，有什麼准不准的問題？是下不了手！’‘從重、從快’、‘在三年內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一個大城市，一網打盡，一次就打他一大批’，‘這是不叫運動的運動’，‘把判處死刑的許可權交到縣區

一級的法院，同級的黨委領導可以直接決定判處死刑’，‘打擊物件除了刑事犯罪，還有‘現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幫’團夥殘餘分子”。自此，從 1983 年到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裏縣太爺就有權殺人，不僅有權殺刑事犯，還有權殺現行反革命和林彪、‘四人幫’團夥殘餘分子”。——中國封建王朝時代死刑尚且必須經過中央政府批准——‘秋決’，卻在號稱法制時代的改革時期大開殺戒！即使被改革派們稱為“無法無天”的文革時期，尚且沒有把死刑復核權交給縣級”。“1983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嚴打的大幕拉開，一時間警笛轟鳴，公判大會，掛牌遊街、群衆檢舉、群衆扭送，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宣判會。據說，有個小青年和人打賭，親了一個陌生女青年一口，被當做流氓滋事給槍決了。當年轟動一時的名人，有朱德的孫子，影星遲志強等人。他們的所謂的罪行今天看來，太毛毛雨了，無非是玩了幾個女人而已。按照當時的情形，現在那些包二奶、小三的統統都得槍決”，“令人遺憾的是，嚴打雖嚴，卻反彈很快。這裏有一組數字。在 1983 年到 1987 年第一次‘嚴打’期間，刑事犯罪確實得到了抑制。但是，在‘嚴打’後的 1988 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數一下子由 1987 年的 57 萬件上升到 83 萬多件，三年的“嚴打”並沒有達到預期的長效目標。最初‘嚴打’時，打的是流氓犯罪集團，多是一幫年輕人無是生非，侮辱婦女，聚衆鬥毆；而數年後，惡性、有組織犯罪不斷增加……。嚴打不僅沒有打住犯罪率，卻是越打越多，罪行越打越重”。

2008年4月，本人發表了《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之我見》一文中，明確指出了“嚴打”存在嚴重問題，在“烏有之鄉”網上公開發表。在這之前，我所見書刊、報紙，沒有見有指責“嚴打運動”的文章，據說該文後來被所謂監管部門強令刪掉了。2008年11月5日，《京華時報》第一次披露“嚴打運動”的情況，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官方媒體發表此類文章。本人隨即發表了一篇評論“嚴打運動”的文章，現摘抄如下：

發生在上世紀1983年至2006年長達二十多年之久的三次“嚴打運動”，除極少數罪大惡極者該嚴懲外，其中不少被殺害的青年是絕對不該殺的。從這個角度講，“嚴打”構成了濫殺無辜的嚴重政治大事件，是中共史上絕無僅有的。為便於闡明問題，現摘錄《京華時報》2008年11月5日第A12至13版文章內容如下：

該報稱：“目前，本報聯合新浪網及20餘家地方主流報紙結成改革開放30年媒體報導聯盟。該聯盟將在新浪網上開設《改革開放30年全景中國》欄目，回顧各家報紙所在省份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變化與卓越成績”。大標題是：《30年的轉身（1978至2008）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特別報導》，本篇報導的題目是：《從嚴打到收歸死刑復核權》。

文章的開篇稱：“‘判決故意殺人犯崔英傑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第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內，法官用莊嚴的聲音宣判”，“崔本是一個賣烤腸的小販，因城管查抄街邊攤位，他拿出

切烤腸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強”，“崔的辯護律師夏林說，如果此事發生在嚴打時期，崔就是有九條命，也早被判死刑了”，“嚴打始於上世紀 80 年代初，共有 3 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追求公平和正義的脚步從未停止過，死刑復核權最終還是走上回歸之路”。

文章接著以小標題“嚴打拉開帷幕”寫道：“時隔多年，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員劉仁文仍然記得，老家湖南隆回縣治安混亂，當時在鄉村工廠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後，都由家人打著手電筒、騎著自行車去接回來”，“在上世紀 80 年代，這種治安混亂的現象比較普遍。很多律師界人士認為，‘文革’引發的暴力傾向，在改革開放初期，轉化到了刑事領域。曾任司法部部長的劉復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後遺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為主要特徵的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夥犯罪分子”……。“此時（註：1983 年），一場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嚴打開始了”。文章接著寫道：“社會治安的混亂引起官方重視。1983 年 9 月，《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的公佈，嚴打正式拉開了帷幕”，“公檢法系統開始夜以繼日地工作……。經常是公檢法系統一起出動，數十上百名員警穿著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氣勢非常宏大”，“同時，留在人們記憶中的還有公判大會。劉仁文說，當時被押到現場的犯罪分子，戴著畫了大紅叉的木牌，垂頭喪氣，聽候著聲勢浩大

的審判。臺下，上萬名群衆都在圍觀，人們竊竊私語，“這不是誰誰家的兒子嗎？聽說搶了幾千元錢，被判死刑了”，“根據官方通報，嚴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至8月，全國刑事案件發案數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0%，犯罪率接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

文章接著以小標題“沉重代價”寫道：“這樣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來，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1984年，一個農民拉著一大車西瓜進城來賣。在北京火車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販。小販們等在火車站，紛紛計算著自己該進多少貨，大致幾天能賣完。西瓜車來了，小販們一擁而上，圍住農民開始詢問價格。憨厚的農民被團團圍住，不知道該先回答誰。慢慢地，這些只是為了爭得西瓜貨源的小販，開始自行拿西瓜。隨後，更多的小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農民看著自己辛苦種的西瓜，就這樣被人搶了，於是四處阻攔。此時小販們不再聽農民的話，他們裝著西瓜就走了。有個小販，只搶到了一個西瓜”，“這些哄搶西瓜的小販，如果提前預知自己被判刑，那麼即使無西瓜源做不成生意，也不會腦子一熱去冒這樣的危險。他們的罪名都是搶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甚至只搶了一個西瓜的小販，也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被從重從快判刑的人，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現年80高齡的法學家陳光中舉了一個發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對青年男女戀愛，遭到女方家長的反對。

兩人沒有退卻，反而離家同居。女方家長在找到他們後，將女青年領回家，並報案說男青年強姦了自己的女兒。「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了死刑」；「流氓罪，在當時屬於‘口袋罪’。陳光中解釋說，嚴打中被捕的人，很多行為並不符合刑法中規定的罪名，於是就向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來，衆多‘口袋罪’便脫穎而出”，“在街上撒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輕人在公園談戀愛被逮住也叫流氓罪……”，“當時，辦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價是不講訴訟程式，不講訴訟職能，本來只有中級法院才能判處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層法院判的”。

報紙上的內容就摘抄這些，摘抄的這三千來字的官方報導，已基本上構畫出那場“嚴打運動”的概貌，有興趣的朋友可查閱報紙的全文，在此就不再摘抄了。

文章的本意是說明近年來司法已不再“嚴打”，還出現了“刀下留人”的“偉大進步”。不過我倒要問：撒尿、跳舞、談戀愛等等，都要被判刑、殺頭，如果如此“嚴打”真延續到今天，這樣的政府還是地球上人的政府嗎？古今中外發生過類似慘案嗎？我為官方報紙能以揭露“嚴打”部分真相，作為“回顧各家報紙所在省份改革開放30年來的巨大變化與卓越成績”的開篇，表示讚揚！遺憾的是文章沒有對如此濫殺無辜的罪行進行深究；更錯誤的是把走資派引發的社會秩序混亂，栽贓給文革，向毛主席、

共產黨、社會主義潑髒水。

我當時在北京，見到押赴刑場槍斃的八、九名死刑犯竟是青一色十八、九歲的小青年；1985年到南方農村聽老百姓議論：“嚴打”殺了多少談戀愛的青年；反思“從重、從快”這種史無前例的殺人政策，在此它作為重大歷史問題提出來。看了《京華時報》這篇報導，更引起我寫這篇文章，同大小走資派、文痞們商榷。

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大滑坡的根源是什麼？

曾任司法部部長的劉復之說：“‘文革’十年留下的後遺症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為主要特徵的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夥犯罪分子。”言下之意，改革開放不久，即上世紀八十年代，刑事案件開始發生，並一波比一波高漲、一波比一波嚴重，其根源是“文革後遺症”。事實是這樣嗎？

我不知這位部長劉先生是不是從文革中過來的人。劉先生可能當時不患耳疾和眼疾，該屬耳靈、眼明。該能親見、親聞文革期間，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大多地方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別說成年人上班不用“打著手電筒接送”，即使小孩上學也不用接送，不存在人販子、殺人搶劫等情況。即便由走資派挑動的局部武鬥，也基本在兩派武鬥的範圍內，極少波及社會。衆所周知的上百萬紅衛兵大串聯，相當比例是兒童、少年，走南闖北，均無父母陪同、接送，都能安全返回，本人就參加了當時紅衛兵接待工作。

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唯獨劉部長先生們把它“忘卻了”。

再則 1984 年後，“嚴打”殺的大多是 18、20 來歲的青年，即便按文革最後一年 1976 年計算，他們當時也只是十一、二歲的娃娃，也就是小學 3、4 年級的小學生，小學生基本上沒有參加文革運動，學的是學雷鋒叔叔、唱的是走在馬路上拾到一分錢，交給員警叔叔……，跳的是橡皮筋，真正的健康成长，天天向上。這些天真的孩子，怎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後，有些成了“罪犯”？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兩次“嚴打”，被殺的 18、19、20 來歲青年，1976 年還剛出生，甚至他們的父母還沒有談戀愛，請問這又同文革如何掛鉤？是不是劉部長先生們是從“文革基因”研究出來的？再如當今社會比八十年代的案件更複雜、情節更慘重，而且向少年化、知識化層面發展，學生殺老師、師生殘殺……，這在中華幾千年文明史從未聽說過，但恰恰在走資派、文痞們稱為“和諧社會”、“太平盛世”、“理論創新不斷”的當今發生了，還看不出能煞住的趨勢。這些犯罪的青少年，在文革期間可能他們的爺爺、奶奶才剛結婚、甚至還在談戀愛，劉部長先生們是不是要等到比“文革遺傳基因”更新的理論出來後，再研究同文革掛鉤呢？不過我倒是奉勸劉部長先生們放下架子，到人民群衆中去走走，聽聽廣大人民（即你們手裏捧著的“法制”所對付的“賤民”）對上海襲警、以及甕安事件這類接連不斷的事件，聽聽這

些“賤民”是怎麼議論的？同你們的“高見”差距又有多少？我真擔心唯“聖旨”是從，反把自己名聲糟蹋了！千萬別忘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人類歷史的動力。

我對遺傳學對“文革基因學”是擀面杖吹火一竅不通，而只能憑所見所聞談點膚淺的看法，有不妥處，望劉部長先生指正。

“嚴打”的時代背景是“四人幫”已判刑；編造的“三種人”，已殺的殺、關的關、處分的處分，冤假錯案已遍佈全國。但走資派們為了他們子子孫孫安享這份“勝利成果”，還感六神不安，放心不下，因此想出了上述的“口袋罪”，濫殺、濫判了上述不計其數的在街上撒尿、男女一起跳舞、公園裏談戀愛……的青年人。

當然，進入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每況愈下，一天不如一天，這是事實。再想回到毛澤東時代真正的太平盛世，已是遙不可及。即便是員警、武警、防爆警、保安等等名目繁多的隊伍一天比一天壯大，治安裝備日益現代化，即便搞到了商店不准賣切菜刀，馬路上隨便對行人搜身，一年的“維穩”支出高達5000多億，也無濟於事。其根源是官員，尤其是大官不再為民作主，而是橫行霸道，甚至腐敗透頂。我們的黨說國民黨四大家族腐敗，逼得工農大眾造反；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毛主席一去世，共產黨竟也變成不知是幾大家族腐敗，是否比國民黨四大家屬更腐敗？在此介紹美國著名活動家、並受周總理讚

揚的韓丁的評價：“除了兩極分化，改革帶來的最驚人的後果是社會風氣敗壞。”（註：參見韓丁著《大逆轉》第14至17頁）最近有媒體報導臺灣學者魏萼的文章稱：“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是中國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國官員的資產階級化……。90年代初，有一次，我（魏萼）到華盛頓拜訪陳香梅。談話間說到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陳香梅說，中國腐敗帶頭人就是鄧小平家族……”文章還強調說：“歷史上，陳香梅尤其是不喜歡毛澤東”。但是，“不喜歡毛澤東”的陳香梅並沒有像劉部長先生那樣向毛主席身上潑髒水。

從以上境內外人士的看法，揭示了八十年代後社會治安大滑坡的根本原因。但走資派、文痞們是嚴禁在這個問題上說真話的，劉部長先生帶了這個頭。

再回顧八十年代，當時在“改革開放”的口號下，一些進口黃色電影，例如日本的《望鄉》等“床上戲”、兇殺和武打片等大肆氾濫，嚴重毒害青少年，不少家長呼籲救救孩子！

在政治上，走資派、文痞們大肆反毛、非毛，全盤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使剛涉足社會的青年們迷失了方向。

大力宣揚“貓論”、“先富論”，一切向錢看，宣揚一些荒誕的“性服務、性市場”、拾金取報酬等等，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氾濫成災，嚴重腐蝕人們心靈，剛涉足社會的青年成了犧牲品。

吸毒、賭博、妓女、販賣婦女兒童等等死灰復燃，一些由國家核准的烏七八糟的黃色“娛樂”場所，鋪天蓋地開張營業，大大推動了社會治安大滑坡。

更為嚴重的是請進不少洋資本家，竭力為其提供“周到服務”，一些洋資本家盡力宣揚中國妓女……。不僅嚴重喪權辱國，還敗壞了社會風氣。

諸此等等劉部長先生避而不談，誰能設想一個不敢正視現實的人擔任司法部長，靠奉承拍馬混日子，能不冤假錯案遍地，濫捕、濫判、濫殺為能事，甚至社會上稱“嚴打”時比殺多少論功擺好。按照某些走資派唱的“依法治國”高調，按刑律，如此濫殺無辜不應負法律責任嗎？！儘管法律一本本編出來，但都讓劉部長先生這類昏庸之輩執法，法律文本越多，反倒禍害越大。遠不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首革命歌曲，造就了鐵的紀律的幾百萬人民子弟兵，深受人民喜愛。

據揭露，嚴打共殺或重判了 550 多萬人。誠然，三次“嚴打”後，殺人慎重了一些，但“嚴打”時，搶一個西瓜的青年被判 15 年。“嚴打”過後，特巨額貪污、受賄的，傳說是有背景的大官陳良宇也是判 18 年，請問這是“法治”進步了、還是腐敗了？

大小官員腐敗，尤其是大官的腐敗，以及越走越遠的資本主義道路，就談不上能解決社會治安問題，俗話說官逼民反。治安問題，更使人們深刻認識到“同美國接軌”，復辟資本主義，走上這條邪路是極端危險的。中國遲早在文學史上，會出現一本

光彩奪目的巨著：新《水滸傳》，而且比老《水滸傳》更加精彩，其中還沒有宋江這類被招安派。至於誰是“宋代”、昏皇角色？人民自有公論。

可以說，“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而掉了腦袋，使本屬於人民的司法搖搖晃晃，對如此重大人命關天的事件，大凡真正的共產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革命的工農兵和革命知識份子，都會為之震驚，並對兇犯深深的譴責和控訴！

我們這代人，一解放都看過電影《小二黑結婚》，還都知道其取材於一場悲劇：男女青年追求婚姻自由，遭封建勢力的迫害，女青年被殘暴地整死了。《小二黑結婚》把悲劇改編為喜劇，弘揚婚姻自由，成為我們黨反對封建包辦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很有影響力的家喻戶曉的好教材。然而“嚴打”中，女方父母干涉子女婚姻自由，並誣告男青強姦了他們的女兒，經過“改革”後的“人民法庭”，竟公判並槍斃了追求婚姻自由的男青年。這說明如此“人民法院”被“改革”為維護封建勢力的祖師爺、誣告人民的大後臺、濫殺無辜的劊子手。更嚴重的是，走資派竟對如此濫殺無辜，宣揚促成了“社會安定”，“犯罪率下降30%”。更無恥地宣稱“犯罪率接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這裏講的“最低數”，顯然是指毛澤東時代，請問毛澤東時代犯罪率很低是濫殺無辜的結果嗎？豈能容忍魚目混珠，毛澤東時代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沒有兇殺和搶劫、沒有妓女、黃、賭、毒……，社會安定，犯罪率極低，

能造就如此世界公認的太平盛世，靠的是宣傳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靠的是共產黨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靠的是共建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靠的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有苦同當、有福共用，靠的消滅剝削壓迫、富國強民……。這同濫殺無辜是水火不相容的兩重天、兩個階級、兩條道。

我的文章發表後，有的同志發表評論補充說：嚴打重判、屠殺了共 550 多萬人。誰該承擔這個濫判、濫殺無辜青年的責任？

### 3 ) 湖南道縣大屠殺

《鳳凰網》知青頻道《1967 年六千長沙知青大逃亡始末》報導稱：遮遮掩掩講的事情，就是 1967 年發生在湖南的“道縣大屠殺”事件。該文為什麼遮遮掩掩？因為它妄圖顛倒黑白，用這樣的事情誹謗文革，誹謗毛主席（不這樣，文章在《鳳凰網》發表不了）。但是，只要您認真解讀，就發現，文章實際上披露了文革中“走資派”屠殺“造反派”的罪惡真相。1986 年 7 月，章成到湖南道縣調查後，寫的調查報告《西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縣農村大屠殺紀實》，可以說是代表官方態度的資料。報告表明，“道縣大屠殺”非常血腥，慘無人道。

但是，該文章有這麼一段話耐人尋味：【零陵地委的朋友說了這麼一段故事：1980 年 12 月 22 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夕，視察中南五省，專程來到湖南零陵地區，聽取零陵地委關於道縣殺人事件的彙報。聽著聽著，胡耀邦坐不住了，臉色變得越來越難看，他似乎要怒吼幾聲，但他不知道衝著誰去。他坐了下來，

指示道：“沒有處理完的要處理完，主要是要對受害者要安置好。”但這樣的事是不能宣揚出去的。】

道縣大屠殺基本情況：

■【道縣殺人事件……，從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歷時 66 天，涉及 10 個區，36 個公社，468 個大隊，1590 個生產隊，2778 戶，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殺 4193 人，逼迫自殺 326 人……。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 10 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殺 7696 人，逼迫自殺 1397 人；另外，致傷致殘 2146 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 3576 人，四類分子子女 4057 人，貧下中農 1049 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 78 歲，最小的才 10 天。與殺人事件有直接牽連的有 14,000 多人。】

■【一位工作組的朋友告訴我們這樣一件事，1985 年春，他在詢問一個殺人兇手的殺人動機時，這個兇手理直氣壯地回答：“他們是剝削過我們的階級敵人”……。另一個兇手回答得更簡單：“上頭要我殺我就殺，要是現在上頭又要我殺，我也會殺！”】——其實，他們是以殺五類分子為名義屠殺造反派，與 1966 年 8 月北京郊區縣殺害“五類分子”不同，那次是以殺害五類分子來轉移鬥爭大方向。

（註：以上摘自互聯網報導）。

如此嚴重案件，胡耀邦不讓講出去，這位清算文革的英雄，恰恰證明報導所指，是走資派操控殺害的。這

個案例，對照一下前面介紹的毛主席同劉少奇一段針鋒相對的爭論：“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麼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主席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走資派在道縣殺害那麼多“四類分子”及其子女這一史實；還有前面介紹的他們的子女文革時期在北京大興縣殺害的“黑五類”等案例，還不足以教育那些出身不好的後代們驚醒，是誰搞唯成份論？

#### 4) 青海省的慘案

為搞清死人問題，不妨以青海問題作個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的結案報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十五萬餘人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衆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衆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軍管會平反組1967年7月15日）。

“二·二三事件”後，“青海省軍區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在省會西寧，有個自稱八·一八的造反組織，在北京來青海串聯的一些紅衛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強行衝進報社。他們在裏邊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工作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的

人已被活活打死。他們擁有從別處搶來的槍支彈藥，對向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部隊人員進行武裝威脅。……因此，西寧駐軍調集八個連隊對佔據報社的鬧事分子實行武裝包圍，命令他們撤出報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後果由他們負責。”“青海方面的報告說，佔據報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圍他們的部隊開槍挑釁。部隊被迫進行武力還擊，一部分負隅頑抗的死硬分子已被擊斃，其餘的人已被驅出報社，一場反革命暴亂已被平息下去了……”。“三月初，總政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幹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兩人在京西賓館惴惴不安了十幾天。趙永夫卻多次在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驗。”

“青海問題的翻轉，源于中央文革的一個報告，戚本禹這樣回憶：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也不太瞭解青海的情況，只看了趙永夫的報告。但不久，來信、來訪的人多起來了，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紅衛兵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聯生死不明’，‘關鋒也從紅衛兵的來信中瞭解了青海二·二三慘案。我們倆人商量這件事，關鋒說：‘如果是林總表的態，主席會知道，因為這麼大的事，林總一定會向主席報告；如果是葉帥表的態，林總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會知道。但也許他們要報告總理。這事大了，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於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

就值得研究了。’根據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後開了四次調查會。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兵瞭解情況。參加會議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場的紅衛兵，事情敘述得具體、真實。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蕭華參加，調查的仍是逃回來的紅衛兵。戚本禹說：這兩次調查會主要是圍繞主席提出的誰先開槍的問題進行的，調查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作了詳細彙報。他們聽得很仔細。在彙報會上，總理曾反復核對趙永夫組織專人搜查八·一八組織的槍支，結果一無所獲。他聽後歎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你幹嘛還要開槍呢！’接著又問反映這一情況的學生姓名，用筆記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總理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海聯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海戰鬥隊、外地赴西寧紅衛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調查會之後，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彙報。總理說，經過幾次調查會，二·二三事件的主要問題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誰先開槍的問題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就連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事後又謊報軍情，假造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

“第四次調查會是3月24日夜11點35分到25日凌晨

晨，主持人仍是總理，江青、葉群、楊成武都來了。調查的範圍除前三次的人外，還有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次會上，總理和趙永夫面對面地落實了一些關鍵性的情節。”

會議結束時，總理宣佈了中央的決定：（一）中央軍委發佈命令，由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並由蘭州軍區派負責同志協助。……（七）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又一次開了鍋。八·一八成了堅定左派，捍衛隊雖然沒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劊子手的幫兇，‘壞頭頭’們遭到殘酷批鬥”，“一個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種種殘酷刑罰，如今輪到了捍衛隊。一次，近200個‘壞頭頭’被帶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橫飛。

最慘的是‘走資派’，他們都被定為鎮壓群衆的黑後臺，橫遭摧殘。民族學院院長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縊身亡。”

“1976年後，青海形勢再次逆轉，葉劍英兩次指示洗恒漢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放出來，給予平反。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和蘭州軍區司令員洗恒漢都堅持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放趙應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報請黨中央批准，撤銷了1967年3月24日《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並對由這一決定造成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昭雪”，“趙永夫獲釋後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顧問，後以正軍職幹部離休。”

“劉賢權和張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職務。

張江霖同時免去省軍區司令員職務，行政級別由十級降為十四級，改離休為退休。”

青海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雖然頭上也有“老幹部”、“開國功臣”兩頂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倘若確如上面所說那樣的話，那這個趙永夫就是混進黨裏、軍隊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看他，千方百計篡奪了青海軍區的領導權後，立即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法西斯專政，把擁有十五萬餘人的八·一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衆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衆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衆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萬七十九人。被迫害的還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衆組織的領導幹部，據孫文披露，原蘭州軍區司令員洗恒漢在《風雨八十載》中寫道：趙永夫在指揮開槍屠殺群衆後，還“搞了個屍體展覽”，“還押解著劉賢權（註：青海軍區司令員、黨委書記）、張江霖（註：青海軍區副司令員）及其家屬到現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幹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屍體還在燒，發出熏人的惡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總理宣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是這樣下結論的：“經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覆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軍區內部問題是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

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第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二〇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衆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打死打傷革命群衆三百餘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開槍，逮捕革命群衆近萬人。第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衆，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衆組織擁有大批槍支，並首先開槍，毫無根據。經向在場的許多革命群衆調查，守衛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衆，並沒有槍支。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調查，亦未搜到一支槍。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黨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第五、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製造的，廣大的當地駐軍的幹部和戰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衆同人民解放軍當地駐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註：以上參見 2010-12-0310 《毛澤東旗幟網》雲鶴：《文革史的研究，心須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從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鬥慘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紹的事件經過，沒有見說有分歧，但對事件性質有兩種觀點，包括周總理同葉劍英兩人對立觀點，有異議者請查看全文）。

## 5) 關於叛徒集團以清理“三種人”而迫害和殺害的各級幹部

最嚴重、情節特別惡劣、手段最殘忍的屠殺人民的事件除前述“嚴打運動”，就是叛徒集團以清理“三種

人”而迫害和殺害的各級幹部（上從中央政治局常委下至基層造反派），雖至今官方未公佈殘酷迫害和殺害的數字，估計至少在千萬人以上。為說明問題，有必要重複介紹前面摘錄的《楊尚昆日記》相關內容：“1988年8月5日：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說這是他最見不得人的事件，不說出來對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處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鄧榕和其他高幹聯動成員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兇手的證據。當然，還有人掌握了聯動成員1966年8月在北京大興縣殺死大批所謂的‘黑五類’人員的證據。我說，我知道這件事，殺人的主謀是高福興和胡德福不是當時就判了刑了麼？耀邦說，是呀，可高福興和胡德福在1975年9月突然翻供了，說是聯動成員幹的，他們是冤枉的。但75年9月小平同志已任政治局常委，把這件事壓下來了。1983年指示我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我便照著做了。但北京市公安部門的幾個幹部秘密向這些‘黑五類’人員的家屬通風報信，結果這些家屬便起來鬧事，反對給高福興和胡德福平反。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將北京市公安部門的這幾個幹部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我聽了很震驚，說我們現在講法治，怎麼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麼幹過呀！耀邦說，所以我內心很愧呀。

但我已指示將這 24 名幹部作為因公死亡處理了，也給他們家屬撫恤金。其中 5 個幹部也授予了烈士稱號”，“1988 年 8 月 6 日，耀邦說還有一件事很後悔，凡是群衆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一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 300 多人被判刑，其中 60 多人自殺”。請問，這同國民黨軍統兇殘屠殺革命人民有何不同？同國民黨渣滓洞屠殺革命志士有什麼差別？

1967 年 1 月中旬，林彪批准提出“抓軍內一小撮”；葉劍英主持軍委作出了“徹底揭穿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定。“聯動”六衝公安部。毛主席通過中央發出《不要把矛頭指向軍隊的通知》。

這夥人在攻擊、誣陷毛主席“獨裁”的掩護下，瘋狂實行法西斯獨裁專制竟到了如此瘋狂的地步。可見走資派、文痞們高舉鄧小平這面黑旗，究竟想幹什麼？不發人深省嗎！

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言說：“(1) 葉劍英派工作組，好多都派到肖望東那裏去了，所以肖望東對主席那麼凶；(2) 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葉參座的；(3) 二月大鬧懷仁堂後，17 日某某起草鎮壓群衆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後，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動群衆。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個鎮壓運動。於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 170 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事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4) 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衝軍事科學院（王樹聲同志為保護檔案），大字報也上街了，葉是知道的，

他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後的全國綁架（註：葉劍英最後也綁架了江青同志等）……；高幹子女作壞事，就是高幹縱容的。陳雲的女兒陳偉力，徐向前的女兒徐魯濱，反動得很，現在還直接攻擊毛主席……；（5）、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壓群衆，《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300多人，葉劍英還打電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倒（謊）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2月開軍委以上幹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驗，中央看了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

從這裏也更進一步看到滿口“擁護周總理”的葉劍英們，是地地道道的反周總理派。因此，張愛萍那麼瘋狂地搜集誹謗、攻擊周總理的黑材料，能得到葉劍英們的保護、重用，決非偶然。正因這些事實真相的逐步敗露，因此某些文痞，來了個急轉彎，由原來攻擊江青同志等“反總理”，急轉成這些文痞短期內出了好幾本攻擊、誹謗周總理的書，如《新發現的周恩來》。這一動向，很值得注意。這夥資產階級文痞們，正如齊婕雯同志所說：“有人認為，文革……沒有把工農群衆主導國家政治的理想作為一種機制予以制定並傳遞下來。那麼，中國的當今憲法上規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無產階級專政’等，這可是憲法上的機制呀……，為何敢於和憲法作對說‘不論姓資姓社’呢？可見‘機制’這個東西，在中國的當代政治文化裏，是可以被玩來玩去的，比妓女還不如”。當資產階級文痞們“擁護周總理”的假面具被揭

穿以後，就顯出反周總理的真面目。

以上這些血淋淋的史實，讓我們更加理解了“文革”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一場你死我活的大革命，必然遭到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頑固抵抗，而製造一些挑動群衆鬥群衆的血腥慘案。“文革”中，黨和人民同一夥頭頂“共產黨”光榮帽、身披“老革命”外衣的階級敵人即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博鬥，雖然和以往同蔣介石、日本鬼子的武裝鬥爭緩和的多、損失少得多，但複雜得多。因此，也付出了一定代價。這一歷史經驗，有必要深刻加以總結。

近幾年官商以及黑社會等勾結，強徵農民土地、強拆民房等，很多百姓被打死、被逼自焚自殺；由於社會腐敗引起的各類兇殺案等……致人死亡。改革開放這些年，“被精神病”超過一億人；每年非正常死亡 800 萬人。這都是官方專業部門公開公佈的統計數字。人可能活到 80 歲就糊塗了，我現在連簡單的加、減、乘、除都不會運算了，那些頭腦特靈的走資派、文痞們是否可以計算一下“改革開放” 30 多年（即便忽略走資派在文革時期殺害的造反派），總計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他們又殺害了多少無辜人民？既然你們善做死人問題的文章，這些豈不更值得一做嘛！根據官辦媒體《經濟觀察網》的文章《陳錫文：我國糧食自給率不足 90%》（註：陳錫文，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即百分之十幾的人沒有糧吃，要靠吃進口糧食。有人估算了一下：如果美國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將有“約兩億中國人餓死”，同陳錫文說我國現今糧食自給率不足 90% 相吻

合。另有網文轉引《東方日報》報導：《京滬等五十個城市嚴重地陷》一文稱：“摘要：數十年來因基建等發展規劃失當、監管不力，以及過度開採天然資源等因素，造成全國至少二十省區市大面積地面沉降（俗稱地陷）。官方日前發佈首個地面沉降防治規劃，指人口稠密的長江三角洲、華北及汾渭地區，約五十個城市出現嚴重地陷，情況幾近失控；官方媒體更引述有關專家預計，指部分城市會在數十年後消失，估計會有多達兩億民衆受（消失）……。”僅就這兩項，走資派“改革開放”，給4億人民的生存造成了威脅。走資派這種隱性殺人，比公開和暗殺人民更慘重。這就是被境外譽為走資派靠“謠言執政”這30多年的慘狀。然而走資派、文痞們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一方面誣陷毛主席“害死幾千萬人”，一方面大力歌頌“改革開放”創造了“和諧社會”的“太平盛世”。混淆黑白、顛倒是非到了如此天理難容的地步。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賣國集團藉“共產黨”的名義濫殺無辜到了如此瘋狂而殘忍的地步，廣大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應對這夥叛徒集團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 六、黨內有沒有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

黨內有沒有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走資派全盤否定“文革”的核心問題。1966年，中央由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於5月16日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5·16通知），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8日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

定》(簡稱十六條)。這兩個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其中都明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前一個文件，即“5·16通知”是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一致通過的，至今未見中央報導會上有反對或持保留意見的；同樣毛主席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也未見中央報導會上有反對或保留意見的。11年後，鄧小平等帶頭反政治局擴大會和八屆十一中全會；也就是他當初舉手通過的“5·16通知”、“十六條”不算數了。不僅如此，凡積極回應黨中央號召而參加“文革”運動的許多骨幹分子，均遭到鄧小平等人的殘酷打擊、迫害。這在中共史上，緊跟中央的各級幹部、群衆、知識份子、解放軍指戰員、青年學生（包括少年）、農民、工人等慘遭迫害是前所未有的。從此開創了誰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中央（而不是個別領導）誰“英雄”的畸形歷史。並導致黨變修、國變色，飛船上天、紅旗落地，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腐敗到了古今中外無法再腐敗程度。但仍有必要深入研究鄧小平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和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案的問題。鄧小平反這兩個會議的決議，他到死也沒有解釋清楚他當初為什麼舉手表示贊同通過。對鄧小平自己舉手通過的中央決議，而去鎮壓、迫害擁護、積極貫徹中央決議精神的廣大幹部和群衆，並重用、提拔反中央決議的人，必然嚴重敗壞了黨風、黨紀，把我們的黨從根本上攬亂了。這說明真正混淆敵我矛盾的是鄧小平自己。鄧小平慣用的伎倆是把自己的罪行轉嫁給毛主席。鄧小平具有表演賊喊捉賊“天才”是他反動階級本性決

定的。

鄧小平一手操縱下炮製出來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這實質是“決議”中最核心的內容，因為“文革”既然“嚴重地混淆了敵我”，則“文革”就根本否定了。而且也只有否定了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的篡權、復辟才能披上“合法”外衣。所以，這是肯定還是否定“文革”最根本的問題。

首先回顧一下鄧小平篡權政變前對這個問題態度：

鄧小平說：“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穿著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的錯誤路線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個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個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因為我們兩個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線的影響，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個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又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衆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了學生鬥學生，群衆鬥群衆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衆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

（註：以上選自 1966 年 10 月 23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

鄧小平自己曾聲明：“我這個人的脾氣……，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參見時事出版社《新中央機密》第 224 頁）。

鄧小平不僅在“決議”中沒有聲明收回這份檢討，而在檢討後，還一再聲明“永不翻案”。到他篡權後，還慎重聲明：“我這個人的脾氣……，決不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則按慣例，毛主席、中央根據劉少奇、鄧小平多年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又如前面介紹的原河南省委書

記吳芝圃等向毛主席、中央揭露劉、鄧所犯一系列陰謀篡權、結黨營私、勾引赫魯曉夫等嚴重問題，明確而正確、但不指名點出了黨內有走資派、有走資派結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能自覺對號入座，承認同劉少奇搞了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一案子，是不能輕易推翻的。因為鄧小平的檢討是在無任何外力下自覺在黨的工作會議上講的。可供鄧小平選擇的無非兩條路：一條是鄧小平不惜陷害劉少奇，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假檢討，欺騙中央，換取中央的信任；另一條是真心實意認識了自己問題的嚴重性。這兩條，任選一條，鄧小平都該受處分，前者該從重處分，因為他還公開誣陷了劉少奇，後者可認為認錯態度好，可酌情從寬。整個“文革”時期，毛主席、中央基本上是按後者處理的。直到毛主席病重，才發現“永不翻案靠不住”，但為時已晚。全黨在長達10年之久被一個耍兩面派的政治騙子所騙，這一教訓，我們黨付出的代價太慘重了，教訓太深刻了。

至於鄧小平、劉少奇是不是走資派？我在文革時期，對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認識。所以，在文革時期，我寫的大字報以及後來所作報告，籠統說走資派可以，指名道姓批走資派，我基本回避了。甚至不理解為什麼搞全國性的大運動，中央作個決定罷了他們的官，搞一次溫和的群衆性社會主義教育就行了。然而，經過這30年走資派、復辟派、文痞們的教育，我猛醒而認識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且有一個很反動而牢固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真正指名道姓公開站出來批走資派，還是近四年以來的事，我深感

慚愧。王震同志講，毛主席比我們早看 50 年。我太心服了。

共產黨內有沒有走資派、有沒有資產階級司令部？鄧小平篡權後的這 30 年來，走資派的充分表演，已用不著花筆墨論證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從中央到地方隨處都可檢來一大把大大小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前面介紹了去年（2009 年）有媒體報導臺灣學者魏萼的文章稱：“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成果是中國高官的富翁化和中國官員的資產階級化……。90 年代初，我（魏萼）到華盛頓拜訪陳香梅。談話間說到中國出現的腐敗現象，陳香梅說：中國腐敗帶頭人就是鄧小平家族。（註：接著談了鄧的女兒經商等撈錢事例）”這些議論，在國內也隨處能聽到。鄧小平家族出了幾個資產階級分子？可能不少人都有答案。這些事例，也說明鄧小平“改革開放”為什麼大力砍掉國防尖端，推倒了“四個現代化”，而推行“短平快”掙錢的資本主義組裝廠？

2010 年 10 月（總第 5 期）香港出版的《外參》雜誌，首頁用大字標題《中共新元老：安排好自己的子女》：“過去是‘龍生龍，鳳生鳳’，元老當高官，兒子也當高官，元老當將軍，兒子也當將軍。現在則‘廣開就業門路’，除了繼續保持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家可安排一個子女擔任省部級官員”的不成文的光榮傳統，其他子女可以是跨國企業總裁，可以主持私募基金，可以倒賣地皮、房地產，可以經營軍火買賣，可以在通訊、能源、交通、信息等行業當龍頭老大……”。還是這本雜誌第 4 至 7 頁，以標題為《中共新元老退休後幹的事》一文（註：前述內容是從本文提取的要義）稱：“胡潤非在《中共太子巨富排

行榜》一文中，新排出的中共高層十大權貴家族”：“第一家族當數某（當今總理）家族，夫人、兒子、弟弟等資產，加起來共約 300 億人民幣”、“第二……”、“第三、曾某家族……，曾氏家族資產約在 120 億左右”、“第四，李某……，其資產約在 100 億左右”……、“第七，江某…，家族資產估計在 70 億左右”、“第八，朱某…，約在 50 億左右”……（註：這十大富豪的姓名是本人用某等代替的，原文為真名真姓）。本文其中一小標題為《中國人的“元老包袱”有多重？》：“據前述 2005 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老幹部局那份資料顯示：2004 年，12 名享受最高級離休特權待遇的高幹公費開支共 3 億 2600 萬元，平均每人 2725 萬元；而退休政治局委員這一級 105 人，公費開支 6 億 7100 萬元，平均每人 630 萬元。”（註：以上均為人民幣）。該刊物所披露的“高層十大權貴家族”，除第二位榮老闆外，其餘均是政治局常委委員。這一組讓人吃驚的資料，雖我等無法確認其真偽。但可以看出一個問題，腐敗決不是少數，而是從頂層腐敗起的，從一個側面證明陳香梅所言決非空穴來風。

#### 再選幾段媒體報導：

■ 有文章披露：【中華論壇】天啊！政府養公務員的支出已經佔到財政支出的 44%。

■ 消息稱：“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向《中國新聞週刊》提供的資料顯示，2009 年，中國政府官員的灰色收入總額高達 5.4 萬億元，比 2009 年中央財政總收入還要多。灰色收入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

■ 看完新華網《上億紅包送領導：開發商自述如何勾結地方官員囤地》文，真如五味雜陳。文中說，一直以來，社會對建設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腐敗現象雖然是深惡痛絕，但僅僅只是有所耳聞，真正的一個開發專案完全運作下來，究竟需要打通多少關節和哪些關節，都存在些什麼“規則”和“交易”，非業內人士並不清楚，大多還只停留在臆測階段。但近日，一位自稱常年在珠三角、湖北、四川和雲南等地方專門從事房地產運作專案的投資商向記者透露了個中的“奧妙”，揭開了建設專案中的腐敗行為的神秘面紗。——原來“今日不同往日，要能夠把項目運作下來，就要捨得下本錢，學會‘有理有利有節’地與地方政府打交道。”

■ 有同志發表文章：“讀了《北京晚報》作者薛湧寫的《主流們，你們該懺悔了》一文後，使我一個草民十分震撼。改開 30 年取得很大成績，不知不同人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算不算一個成績？文中說‘一個頂尖巨富，佔有的財富相當於一百二十萬窮人的家當’，‘2008 年中國身價超過 10 億美元的富翁人數從 101 名增至 130 名，這個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我記不得過去看的中國封建社會文人寫的一部小說那個人說的一句話：一家富有，百家窮。我不理解，封建社會在 1949 年已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推翻了，解放 60 年了，為什麼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這樣的分配理論，能夠被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執政黨採納？誰解？”

■ 臺灣《工商時報》（2009 年）5 月 8 日文章，原題：中國的新造富運動中國大陸的財富，正在快速向少數人

高度集中，除展現了大陸經濟的成長活力及創富環境外，同時也孕育了一步登天的快速致富方式。

■ 中國的首富大哥日前瞬間讓位，一家股本 4 億多人民幣的“中小企業”海普瑞股票上市，不但創下了大陸股票史上承銷價最高達 148 元人民幣的紀錄，上市首日，企業創辦人的身價更直接暴增至 500 億人民幣，直接從默默無聞，到一夕之間天下聞名，名列全大陸首富。

■ 在大陸資本市場，這種例子從去年 10 月底來就已司空見慣；2009 年 10 月 30 日，大陸股市的創業板正式開市交易，據統計，當日掛牌交易的 28 家上市公司中，就創造 82 位身價上億元人民幣的富翁，而能有此身價，也只是所投資的公司股票上市而已。

■ 股票市場是如此，去年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同樣和股市與時俱進，各省各市各地的所謂“地王”到處冒泡。《福布斯》雜誌全球版副主編范魯賢在 2009 富比世大陸財富榜發佈會上說，通過比較中美兩國的前 400 名富豪發現，美國與中國最大的區別是，美國的房地產商在富豪榜的前 40 位基本上已經消失；而大陸有 154 位個人或家族房地產富豪扎堆在這個前 400 富豪榜上。（註：另有報導：今年來全國地王一覽：北京一天誕生三地王）。

■ 在中國，有些原本名不見經傳者，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皆知的富人。最典型的為福建的首富陳發樹，在 2000 年以 4800 萬元人民幣的價碼，取得紫金礦業 33% 的股權，股數達 21.77 億股；而在去年 7 月份因股價大漲，4800 萬元的市值膨脹至 200 億人民幣。股票市場是大陸富人的另一致富領域。

■ 中國社科院的專家感慨地說，通過資本市場，中國 10 億級富豪俱樂部，又多了幾個新面孔。但中國真的不缺富豪，而是缺實業家。如果這些富豪將更多精力放到企業經營上，而不是關注財富數字的成長，則是中國經濟的幸事；反之，則是悲哀。

我認為此文最後說“如果這些富豪將更多精力放到企業經營上，而不是關注財富數字的成長，則是中國經濟的幸事；反之，則是悲哀”也不正確，因為只要搞私有制，都只能是悲哀。誰能說深圳“富士康”不是實業家，結果成了臺灣原國民黨一個兵痞充當帝國主義的二傳手，搞成了在大陸的“租界”，工人失去合法權利，成了機器一個部件，苦不堪言，造成 13 名工人接連跳樓自殺，其中包括反動資本家豢養的走狗（保安人員）活活打死摔出窗外的。

■ 2009 年 1 月 28 日晚，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鋒在央視《新聞 1+1》節目中透露，“我國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務車開支一年 9000 億”。驚人數字一度讓主持人柴靜吃驚，遂重複追問，但王再次肯定地說：“公款接待、公費出國考察、公車，也就是三公，一年 9000 億元”。佔國家財政開支的 3 成。資料顯示，1989 年“三公”支出僅為 370 億，20 年內該項支出竟飆升 20 多倍。此前，也有媒體曾披露，每年的“三公”揮霍超過萬億。2007 年 3 月，《法制日報》曾發表過題為《浪費是中國走向富強的頭號障礙》的文章，該文披露了這樣一組資料，公款吃喝 3700 多億元，相當於“吃”掉了我國全民的義務教育經費；公車消費 4000 多億元，相

當於“碾”掉了我國大多數人的醫療、養老金；公款出國3000多億元，相當於“遊”掉了我國低保資金，“吃”掉了義務教育經費！一年三公費用相當四倍十年文革的費用？！

許宗衡用上千萬鉅資到北京買到了深圳市長的桂冠。花鉅資買官，他能不腐敗搞一本萬利嗎？腐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於國家安全部專家警告說，許宗衡案不能深揭，否則影響國家安全。就深圳那麼個腐敗官員竟腐敗到了影響國家安全，比他更大的將影響什麼安全？所以，這30來年，腐敗反動官僚資本家拔地而起，榮獲世界第二。

原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在中紀委會議上說：“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對此，有同志發文說：“請大家注意這個數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兩級黨委已經變質，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不合格，這是吳官正講的呀！省市兩級黨委班子，人數可能就是幾千人，但這就是操縱我們國家運轉的那只看得見的大手呀！十個指頭壞了八九個，這雙手還能依靠嗎？還能信賴嗎？同胞們，還記得麼？2008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通過視頻向全世界所播放的關於‘政令難出中南海’的這段民間諺語：‘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同胞們，這是何等惡劣的官場啊！縱觀歷史，古今中外有過如此惡劣的官場嗎？試想，除了‘不管黑貓白貓’、‘不問姓公姓私’、‘不問姓社姓資’、‘一把手

說了算’、‘不爭論’這些‘偉大理論’之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力量能‘創新發展’出如此人間‘奇跡’呢？”

■《讀〈吳官正離職報告〉令人驚歎憤懣！》一文：“反腐倡廉天天喊，貪官色官逃官前腐後繼，原因究竟在哪裏？讀一讀吳官正的講話，就一目了然了”。“前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於 2007 年 9 月下旬，總結十六屆中紀委工作時，說：‘如果人民能對我的工作給予 60 分，我會很感動。面對嚴峻腐敗、消極情況、積重難返的問題，我給自己僅能打 59 分，不及格，這樣，我才能減輕些包袱’”，“2007 年 10 月 29 日，前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出席中紀委工作交接班暨歡送座談會上，回顧了接任中紀委書記五年的工作歷程。吳官正在三十分鐘的講話中，多次因心情沉重而停頓，也多次被掌聲打斷而熱淚盈眶。吳官正說：回顧接任中紀委書記的這五年工作歷程，心情是沉重的。五年前當選中紀委書記，在尉健行的歡送會上作了表態：決不辜負人民的期待、黨的委託，要繼承十五屆紀委正在進行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立志要在若干人民強烈反響的問題上，要有突破。五年消逝了，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藉此向同志們作次臨別交心和自責。吳說：單有決心是戰勝不了現實的。我和紀委同志……，是作過努力，做過艱難工作和必要的鬥爭，還是失敗了。吳官正交班時，沉痛直言三大憾事說：我自我反省，是留下了三件未能完成的工作和遺憾大事而離任的。他所說的三大憾事，也是黨內折騰了二十多年的頑疾：（一）關於幹部財產收入申報公開機制，未能實施；（二）關於改革現行紀委、監察部組織架構和隸屬關

係，未能成功；（三）關於官員以公款或接受免費到高級娛樂場所消費，屢禁不止。關於官員財產申報制吳在會上說：早在八十年代，陳雲、彭真、鄧穎超、胡耀邦……，就多次提出，要建立幹部和家屬財產、收入申報公開機制。陳雲指出：西歐、北歐資本主義國家能做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任何理由不能做到，否則，人民怎樣會擁護？吳說：黨內對財產申報制抗拒、反對、抵制的勢力相當頑固，所持的理由，指揮失控，使幹部和幹部家屬處處和人民處於對立局面，會造成政局混亂等。事實恰好是相反，哪有人民的政黨怕對人民負責的道理。吳又披露：2003年、2005年，要在上海、天津、廣東、江西的省級黨政班子搞試點，最後都以難以推行而中止。據知，2003年，中紀委調查組、中共中央研究室、國務院研究室、中組部，曾就財產申報制，決定到上海、廣東搞試點，結果發生二大問題：（一）黨政幹部強烈抗拒，以消極怠工、政局癱瘓來對待；（二）高、中級幹部在內部申報時，上海市的省、廳級幹部，90%擁有1000萬以上的資金，廣東省的省、廳級幹部，99%擁有1000萬以上資產，如公開，勢必會被社會各界追擊……。”

（註：以上標有■標記的段落均摘自媒體報導）。

僅僅摘抄各類媒體上述星星點點報導的內容，共產黨內有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司令部已一目了然。即便封建朝廷，也不至於集中這麼大比例的大富豪。聯繫到張愛萍1975年就公開宣稱他是鄧小平的“四條漢子”、“四大金剛”；以及吳芝圃揭露劉、鄧搞的那些陰謀活動，1976年清明節，鄧、葉、胡（耀邦）

策劃的矛頭指向中央、毛主席的“4·5 反革命動亂”，“1976 年 10 月 6 日華國鋒、葉劍英經半年多精心策劃的武裝反革命政變”……。有充分證據證明：毛主席、黨中央發動“文革”的“5·16 通知”、“十六條”所確定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完全符合事實。任何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文痞們企圖以種種卑劣手段，推翻中央工作會議、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議“5·16 通知”、“十六條”是徒勞的。

因為走資派號召一切向錢看“少數人先富起來”，“富則光榮”、“窮則可恥”，“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因此，從上到下，從黨內到黨外，老老少少、男男女女，被教唆了不少人都爭著為己，以免天誅地滅。一些小農經濟也不甘落後，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煽得火爆起來後，各顯神通，爭著當資本家。古今中外的“發財”絕招，在中華大地全面開花：

■ 《京華時報》2009 年 10 月 29 日 A10 版：高爾夫球童製造洋橋銀行劫案。副標題：自稱模仿電影暴力情節。文章稱：“今年 4 月 30 日下午兩點，17 歲少年某某穿連帽衫，戴墨鏡，攜帶一把西瓜刀、一把仿真槍，走進建行洋橋支行，劫持一名女子做人質，搶劫 14 萬元現金……”。介紹說因被高爾夫球場停止了他的工作，沒錢花……。

■ 現在的官勢太大了。聽了叫人害怕。西安市碑林區委黨校，在九三年的時候，校長把一個文明舞廳轉給自己的愛人，辦成了妓院，聽說一位教師看不慣，最後舞廳經理被免，辦公室主任被免。到了 2007 年，突然地

說檔案裏找不到主任科員的資料。按科員算，這位教師不服氣，找到組織部，沒想到組織部的幹部科長說：黨校辦妓院，你管它幹什麼？我聽了都覺得可笑，難道黨校是可以辦妓院麼？這樣下去還有正氣麼？

■ 為了 2.5 萬元錢，他賣掉了自己 60% 的肝！要不是看到昨日新華網上《人體器官買賣調查》文，誰能想到在國家領導人正想方設法讓老百姓活的有尊嚴的今天，我國還有這種血腥的“地下交易”——人體器官買賣，並因此也造就了一個本不該有的群體——人體器官買賣仲介。

■ 《京華時報》2009 年 10 月 26 日 A07 版：《全國首例非法經營人頭骨案一審宣判：收購人頭骨華裔博士判 8 年》，小標題：《一封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通報》。文章稱，“去年 5 月，一封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駐京辦的通報寄到了公安部，其中稱，美國聯邦調查局發現，從北京通過 EMS 全球郵政特快專遞送至美國的郵包中，有無名人類骨頭，請公安部協助調查相關情況”。“……經查，是一名 44 歲的美藉華裔博士（丁某），是北京一家信息諮詢公司的顧問，住北京市昌平區一處別墅”。“民警當場從丁某欲寄往美國的包裹中，起獲 20 個人類頭顱骨。而後，經過對丁某所住別墅的車庫進行搜查……又發現人類顱骨 1100 個。經鑒定，均為現代自然人頭骨”。第二個小標題《收購價人民幣 80 元，售 150 美元》。文章稱：“丁某筆記本電腦中存有人類頭骨照片萬餘張，電腦使用者曾將部分照片上傳至易趣網網店，並以競拍形式與境外的買方交易。交易成功後，買家會通過西聯匯款形式付款，

並會在網上留下‘很棒的東西，很好的價格’等留言”……。

■ 公開賣兒鬻女在廣東和吉林出現。世上的事，真是無巧不成書！陽春三月，在充滿歡樂喜慶的氣氛中，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冉冉升起一顆光芒四射的璀璨明珠——“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在這顆新星一出現，立即博得與會人大代表以及政協委員們的熱烈喝彩和雷鳴般的掌聲，立即引得各種媒體充滿溢美言辭的好評如潮水般湧來的同時，人民生活不幸福、無尊嚴，社會不公正、不和諧的又一可怕的重大事件出現了：在解放思想要“殺出一條血路”的廣東省番禺和廣州各出現了一例公開賣兒鬻女事件；另外，吉林省長春也出現了一例公開賣兒鬻女事件！雖然這三起公開賣兒鬻女事件出現在不同的地方，但產生的原因卻是相同的：他們在“更加公正、更加和諧”的“社會”裏，不要說“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了，他們連最基本的“人民生活”保障都沒有得到！——番禺公開賣兒事件是四川農民夫婦因男的患腦瘤無錢醫治而逼迫出賣一歲多的愛子；廣州公開賣兒鬻女事件是廣西一男子因妻子病重無錢醫治逼迫上街頭賣兒鬻女賣器官；長春公開賣兒鬻女事件是一從小患脊髓灰質炎、中年又患了小腦萎縮的男子因妻子離家出走無力養活已經 11 歲的龍鳳胎兒女。

■ 《新華社》的《瞭望》白紙黑字寫的：“研究顯示我國精神病患超 1 億，重症人數逾 1600 萬”（見 5 月 29 日《瞭望新聞週刊》）。

■ “《在殯葬改革腐敗之下發生的驚天大案》，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氣！白天見鬼了？比鬼還可怕！是比鬼可

怕一百倍的喪心病狂兩眼放著綠光的‘人’！看看文中這段話：最近，廣東茂名高州金山出現駭人聽聞的殺人事件。高州警方根據群衆的舉報，成功地偵破一起涉嫌殺人案件，抓獲5名犯罪嫌疑人。近日，高州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接群衆報警稱，金山街道陳垌村委有3名陌生男子強行將一老人拖上一輛汽車。接報後，派出所民警迅速到達事發現場，在群衆協助下抓獲郭某德、賴某印、梁某木等3名犯罪嫌疑人。警方在對三人住所依法搜查時發現一具屍體。根據三人供述，民警又循線抓獲其他2名涉案疑犯。據說這是一個很狠心、喪盡天良的犯罪組織，他們最初是靠挖掘死屍賣給火葬場起家，後來發展到捉那些精神有問題的人，把他們殺害，以販賣器官，再把死屍賣給火葬場來賺黑心錢。而現在他們竟狠心的把那些正常的老人（50至80歲）作為殘害的目標，公然在大白天‘搶人’。現在由於他們的膽大包天，居然在白天公然作案，這也暴露了他們的犯罪行為。員警在他們的現場發現了一些被冰凍起來的死屍，那些屍體慘不忍睹，讓人又想起南京大屠殺的悲慘，這些屍體有的沒有了眼睛，有點缺少了心臟，有的沒有了腎……。還在一個地窖裏關了10多個老人，據那些獲救的老人說，那些狼心狗肺的人每天只給他們吃一頓飯，根本就不顧他們的死活……”。

■ 據瞭解內情的臨沂人透露，以建造“八星級辦公大樓”並姦污上百名幼女而著名的山東省臨沂市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連承敏在今年初被調離並官升一級，成為山東省人大副主任（副省級）。為了斬草除根，

不留後患，在離任前連承敏下令處死關在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臨沂市精神衛生中心，即臨沂市精神病醫院）的 37 名上訪者。這些上訪者都在一夜之間用注射的方式被醫生處死，並在此後幾天內分批送到火葬場火化。這些死難者包括“八星級辦公大樓”的舉報人張建國的母親，被員警燒焦乳頭的 17 歲美少女王琳芳的父母和多名臨沂藝術學校被連承敏姦污的幼女的父母。（註：這一條消息取自互聯網）。

（註：以上均選自新聞媒體）

縱觀以上各類事例，請問：這還不是一個超標準的最腐敗的封、資、修為一體的一小撮走資派結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統治的結果嗎？世上還有比這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更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嗎？還有比這些走資派更走資派的嗎？如果用厚顏無恥形容，則世上再沒有比中國走資派更厚顏無恥的了。而且這些事例證明，真正混淆和顛倒了敵我矛盾的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結果

## 七、關於“三面紅旗”

走資派篡權後，在全盤否定文革的同時，同樣用捏造罪名、嫁禍栽贓、歪曲事實等惡劣手段，全盤否定和醜化“三面紅旗”。尤其是走資派的頭目惡意攻擊毛主席“頭腦發熱”、“違背‘八大路線’”等等，餓死了不少人，並把這些誹謗寫進了“決議”。黑司令一聲令下，一些社會渣滓、文痞們就大肆造謠：“毛主席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鬧到了滿城風雨，把毛主席、共產黨醜

化到了“十惡不赦”。從 1958 年到鄧小平篡權後砍倒了“三面紅旗”止，“三面紅旗萬歲”的口號，共喊了 22 年，其中過半數在文革期間。也就是說“三面紅旗”為我中華民族建樹的大量奇跡，多半發生在文革期間。而且，無產階級同劉鄧資產階級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矛盾和鬥爭，也較多集中在“三面紅旗”；鄧小平炮製的所謂建國後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也以較多篇幅攻擊和否定“三面紅旗”。所以，研究文革就繞不開“三面紅旗”。

“三面紅旗”是指：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年也常分開高呼：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同時也常稱“三面紅旗萬歲”！

我想，大凡不是文盲或不學無術之輩，關於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簡稱總路線），即便字義上理解，也是很完美的，何況概括了很嚴密而無可挑剔的辯證關係。鄧小平砍掉了這面紅旗，而打出了摸著石頭過河這面黑旗，幹了 30 多年怎麼樣？不見了社會主義的影子，成了“中美國”半殖民地。

關於大躍進，我想只要不是別有用心或對共產黨、社會主義懷有刻骨仇恨的人，對於社會主義建設，都會希望快一點，總希望儘快改變舊社會留下的一窮二白的面貌。鄧小平砍倒了大躍進這面紅旗，換上了造船不如買船、同美國接軌這面黑旗，結果成了美國的“組裝廠”，用 8 億件襯衫換美帝一架破飛機。美國加速印紙幣，買回中國不能最便宜的商品，供美國老百姓享用，中國再把換來的美國紙幣去買美國國債，又裝進美國口袋裏，

最終中國幾千萬工人、農民、大學生失業，即便有工作的，不少被壓迫、迫害得跳樓自殺，被壓迫和被迫害的勞動人民“被精神病”就一億多人。一個好端端的受世人敬羨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現在這個樣子，國家總理出訪都被受訪國人民砸來硬皮鞋表示“歡迎”，一些在外華僑更是常被任意屠殺或凌辱。

農民為了防止貧、富兩極分化，而辦起了人民公社。鄧小平砍掉了人民公社這面紅旗，而復辟了農村分田單幹，被打倒的地主、惡霸東山再起，農民頭上又壓上了“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又過上了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一部分被逼討飯、賣淫為生。

下面作進一步研究分析。

## 1、總路線萬歲！

### 1) 總路線的誕生

總路線是指：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指導各方面工作的根本方針、準則；是各項具體工作路線、政策的依據。馬克思、列寧都對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有精闢論述。本文講的是指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1958年，三大改造和第一個五年計劃任務完滿完成。生產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中華民族第一次消滅了階級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第一次成了國家主人。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滿完成，五年內工業總產值增長 5.6 倍；農業產值約增加一

倍，表明生產力取得了高速發展。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一五”開始時的41.5%（1952年）提高到結束時的56.5%（1957年），超過一半，這也是中華民族第一次出現了工業成為國民總產值的主導地位。這些事實說明，毛主席提出的總路線，不僅符合國情，理論上也遵循了馬克思、列寧關於總路線的論述。

但是，由於貧窮落後的舊社會，給我們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解放後，從1949年建國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1957年），雖然發展速度遠超過當時頭號資本主義國家美、英，而且工農業產值比解放前大幅增長了，但仍沒有根本解決溫飽問題，人們生活還較清苦。當毛主席的警衛員馬維從江西探家回到北京，他不但按毛主席的囑咐對家鄉的情況寫了調查報告，還帶回一個又黑又硬的窩窩頭交給毛主席說：“我們家鄉的農民生活還很苦，他們吃的就是這種窩窩頭，我講的都是實話。”毛主席接過窩窩頭看了看，不由得眼圈一下紅了。然後掰開窩窩頭往嘴裏塞了一小塊嚼了幾下，眼淚奪眶而出。他又把窩窩頭分給工作人員吃，說：“人民當家做主了，我們的農民不應該還吃這樣的窩窩頭。”那天夜裏，毛主席失眠了。嘴裏不斷喃喃自語：“不應該麼，不應該麼……。”他一邊還自語：“要想個法子，必須想個法子，怎樣才能讓老百姓都吃上白饃呢？”這段時間裏，毛主席工作、走路、吃飯，連睡覺都朝思暮想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使人民儘快過上好日子。他無數次找過朱老總、周總理等中央領導及社會各界知名人士，懇求他們多動腦筋、集思廣益、多出主意。這就是促使毛主席提出總路線的

初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主席臨時召開了一次最高國務會議，目的是更廣泛的爭取一些人的建議。他在這次會議上激勵大家講：“我們這個民族，是個大有希望的民族。”並且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爭取十五年趕上英國”。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在會上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觀點。一九五八年五月，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由劉少奇提議，大會一致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完全是為了讓人民儘快過上好日子，讓國家儘早強大起來。

以上是總路線產生的過程，可見，從提出總路線，不管從主觀動機、還是理論上和組織程式上，都是正確和完備的，完全體現了執政為民的宗旨。因此，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並在引導我們 18 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總路線的產生，還深刻揭示了毛主席為人民所急、為人民所想的深厚階級感情，世上有這樣的同人民心連心的領袖嗎？

從比較中，更顯總路線的偉大。人們自然會看到，近 30 年“摸著石頭過河”，摸來摸去不都是由那個大人物帶頭，幾個大官子孫永保榮華富貴？為此，他們以種種理由，賣國企、賣土地、賣資源、賣婦女兒童……，腐敗再腐敗，變著法子自己富起來。而不惜讓工人、農

民、學生、復轉軍人……，成千上萬失業，以至乞討街頭、賣淫為生。甚至有報導稱：某地一對年青夫婦下崗失業，月收入共 300 元，還有個該子上學，儘管幹了多種苦活掙扎，生活仍無法維持，星期日一家三口常到父母處“改善生活”，但父母也不寬裕，偶爾講句牢騷話，小倆口騙父母說要外出有事，把孩子留給了父母，小倆口回家上吊自殺了。

儘管反動資本家、反動官僚、走資派掌控輿論工具，可以厚顏無恥地瘋狂反毛、非毛、反黨、反社會主義，誹謗總路線；而竭力宣揚泡在牌桌上出“摸著石頭過河”等“創新理論”。但凡神經不失常的人，只要看看毛主席提倡的總路線，和鄧小平推銷的摸著石頭過河，僅就比較一下其截然不同的初衷，人們自然會作出誰是、誰非的正確選擇！

## 2) 總路線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指路明燈

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中國人民更加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破除迷信，敢想敢幹，把衝天的革命幹勁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開展了大躍進的群衆運動，在全國農村裏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進一步壯大了社會主義力量。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社會主義革命不斷深入，社會主義陣地日益擴大，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我國人民提前兩年在一九六〇年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工業主要指標，在抗禦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的鬥爭中，在克服外來的強加於我們的困難的鬥爭中，在糾正我們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的鬥爭中，都取得

了偉大勝利。根據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我們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以有些人預想不到的速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在建設一個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化的國民經濟體系方面大大地躍進了一步。（參見 1964 年 10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

以下引一段選自《求是》雜誌的文章所公佈的一些具體資料。

世界上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工業化的主要指標，就是看其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70%以上）。根據國家統計部門公佈的資料，1978 年全國工業總產值達 4231.0 億元，佔當時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是 74%，農業的比重是 26%。這與 1952 年工、農業產值是 30% 與 64% 的比重相比，完全是根本的改變。這標誌著中國從此進入工業化時代。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工業不僅在國民經濟總量中高達 75% 以上，而且門類齊全，尤其是一個掌握核技術、電子電腦技術等現代工業類型的國家。即使與現代的各工業國家相比，中國許多產品的產量和技術水準也列前幾位。按當時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說法：“中國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在國防力量和航太工業上，則躍居世界第三位。主要物質生產部門採用了大機器生產，電力、煤炭、燃油成為主要的動力源；農業上達到了半機械化程度等。從主要的經濟指標上看，當時的中國當之無愧地稱得上是一個工業化國家。中國以東方巨人的姿態開始屹立於世界！

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後的。

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由於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從“一五”計畫時期開始，國家以蘇聯援建的 156 項重點工程、694 個大中型建設專案為中心，進行了大規模投資，逐步地建成了一批門類比較齊全的基礎工業項目，涉及冶金、汽車、機械、煤炭、石油、電力、通訊、化學、國防等領域，為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從“一五”時期起到“四五”時期，累計達 4956.43 億元。在鐵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也有明顯的進展。從 1964 年開始的“三線”建設，不僅增強了國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業佈局。在毛澤東生前，中國不僅已經能夠自行設計和批量生產汽車、飛機、坦克、拖拉機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氫彈，試製並成功發射了中遠端導彈和人造衛星。這些進展，全世界為之震驚。同時，新中國還通過興修水利、開展農田基本建設、培育推廣良種、提倡科學種田，較大幅度地提高了糧食生產水準和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這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成就。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不僅使中國在贏得政治上的獨立之後贏得了經濟上的獨立，為增強國防力量和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中國以後的發展奠定了牢固物質技術基礎，為中國與外國包括發達國家在平等的原則下發展經濟往來創造了前提。

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準得到逐步提高。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始終把滿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為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從 1949 年到 1976 年，在人口增加約一倍的情況下，糧食的人均佔有量從 418 斤增加到 615 斤。在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儘管人民群衆生活逐年改善的增幅不大，但初步滿足了佔世界  $1/4$  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是世界公認的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 1949 年到 1976 年，小學在校生從 2439 萬人發展到 1.5 億人；中學在校生從 103.9 萬人發展到 5836.5 萬人；高等學校在校生從 11.7 萬人發展到 67.4 萬人。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醫療事業也得到蓬勃發展，20 世紀 50 年代後期，農村普遍建立了縣、區（社）兩級醫療衛生機構，60 年代又在絕大多數生產大隊建立了農村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國人口的死亡率從 1949 年的 20‰ 下降到 1976 年的 7.25‰。

在全國人民的努力下，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元次：1957 年到 1978 年，穀物由第 3 升為第 2 位，棉花  $2 \rightarrow 3$ ，豬牛羊肉  $2 \rightarrow 3$ ，化學纖維  $26 \rightarrow 7$ ，布  $3 \rightarrow 1$ ，煤  $5 \rightarrow 3$ ，原油  $23 \rightarrow 8$ ，發電量  $13 \rightarrow 7$ ，鋼  $9 \rightarrow 5$ ，水泥  $8 \rightarrow 4$ ，硫酸  $14 \rightarrow 3$ ，化肥  $33 \rightarrow 3$ 。這表明，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稍有後退外，穀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在世界的排位都明顯提前了。

對於這方面的情況，一些公正的西方人士也是承認的。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過：毛澤東時代“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

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這些經濟成就是中國人民自己通過勞動獲得的”。“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現代中國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

（註：以上參見網站轉發沙健孫發表于《求是》雜誌的文章《毛澤東與新中國的創立和發展》，以及 2009 年第 7 期《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應補充說明，建國 60 年中，前 30 年取得的各項建設成就，主要都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全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取得的，即便是蘇聯援建的項目，也都消化吸收為自己的技術。可以說，30 年前在總路線指引下建成的所有工程，都是合格的、過硬的。這同近 30 年，在摸著石頭過河等垃圾理論搞的垃圾工程不可同日而語。30 年前，就不知道什麼叫“豆腐渣工程”、“腐敗工程”，更沒有聽說有像新中央電視臺“設計者承認央視大樓有色情寓意”的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觀”的“先進設計”，更有未使用就讓一場大火出盡了洋相，幾個腐敗官僚落馬當了“替死鬼”；也沒有污染環境……，這些近 30 年烏七八糟的“副產品”。

走資派、文痞們攻擊總路線“只多快不好省”。現僅以毛主席親自肯定的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兩個典型為例，看看是多快好省，還是“只多快而不好省”。

大寨，山西省昔陽縣一個小山村，“新中國成立前，大寨家家住的是破土窯，吃的是糠菜糧。全村不到 60 戶

人家，有 9 戶吃不上飯出門逃荒，有 4 戶滅門絕戶。就是地主家裏，也只是吃玉茭面，還沒有多餘的。山高石頭多，出門就爬坡，地無三畝平，年年災情多。大寨人以改天換地的革命精神，改造大寨“七溝八梁一面坡”，變荒山為梯田，並逐步發展到旱澇保收。陶魯筭同志向毛主席介紹了大寨：這個只有 360 人的小山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在荒溝禿山上造田，從 1953 年到 1962 年的 10 年間，除了解決了自己的吃飯問題，還為國家提供商品糧 100 多萬公斤，平均每戶 1500 多公斤。而且以陳永貴為支部書記的大隊幹部隊伍，堅持參加勞動每年不少於 300 天。毛主席說：“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呀。窮山溝裏出好文章。”全國幾乎每個省都出現了學大寨的先進典型。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山東黃縣的下丁家大隊、湖南岳陽縣的毛田區、河北遵化的沙石峪大隊、河南的林縣等等。到 1975 年 9 月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在昔陽召開之時，全國已有學大寨先進縣（市）316 個，佔全國縣（市）的 13.4%；已有糧食平均畝產上《綱要》的縣（市）725 個，佔總數的 31.2%。持續 15 年的學大寨運動，對中國現代農業史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從 1964 年至 1978 年，歷時十幾年時間，中央關於加強農業發展的一系列決議和舉措都是在“農業學大寨”的總體部署中實施的。當時，興修水利成為全國各地“農業學大寨”的一項重要內容，其規模和投入不斷擴大，並逐步產生了效果。到 1977 年，全國各地共開掘、興建人工河道近百條，建水庫七萬多座；到 1978 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達八億畝，與 1965 年相比增長了 60%。使人最難忘、也是最可貴的是大寨人

精神：“1963年夏季，大寨大隊遭遇特大洪水，大批社員的房屋被衝毀，大量農民無家可歸；更慘的是，大寨人已經修了十幾年的梯田更是毀於一旦。當時，山西省委決定從國庫中調出一批救濟糧和救濟物資，從地方財政上再撥一部分救濟款，扶持大寨大隊。但陳永貴和大寨黨支部卻在此時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決定——不要國家救濟糧，不要國家救濟款，不要國家救濟物資；當年社員口糧不少，社員收入不少，上交國家的統購糧不少。這一口號當時在山西省委和晉中地委很多幹部看來，是‘勇氣可嘉，不可能實現’。他們並不相信大寨人能夠實現這一目標。但最終奇跡還是發生了，1963年下半年，大寨人在陳永貴的帶領下，搶修梯田，重建房屋，搶種莊稼，經過幾個月的苦幹，大寨人在大災之年奪得了大豐收。據統計，大寨在1963年的糧食產量非但沒少，反而比上一年增產，不僅社員的口糧充足，還能為國家上交餘糧。大寨人用集體主義精神，共產主義精神實現了自己‘三不要，三不少’的諾言”。可惜的是，這種精神，在近30年再也不見了。

再來看毛主席提出的全國工業學大慶。1963年，東北松嫩平原傳出振奮人心的消息，我國自主勘探開發的特大油田——大慶油田累計生產原油1000多萬噸。從1960年5月開始，石油工業部集中全國石油行業4萬多職工，來到茫茫大草原進行石油會戰。乾打壘住宿，草籽野菜補糧食不足，肩扛背馱設備，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到1963年底，經歷三年多會戰，把中國貧油的帽子扔進了太平洋，並鍛煉培養出一支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能

吃苦耐勞、能打硬仗的石油工業隊伍。工業學大慶，不僅使我國的工業得到了高速發展，培養出一大批優秀人才，還總結出了管理社會主義工、礦、企業的“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是我們黨領導約 20 年來工、礦、企業的經驗結晶。相比之下，近 30 年摸著石頭過河的廠長負責制，其必然結果就是兩個字：腐敗。

以上在工、農業的兩個典型，都是在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展現了新中國的前 30 年，始終以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立國之本，都是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在他們的帶動下，全國各行各業都以此為榜樣，轟轟烈烈地建設社會主義。

我們再看看摸著石頭過河，鄧小平用霸權強行推廣的農村和城鎮“改革開放”的典型：安徽小崗村和深圳。任何事物，沒有比較，就無所謂優劣，有比較才有鑒別，人們的正確認識，許多是在比較中得出來的，所以才有“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之說。

小崗村這個反面典型，媒體揭露它的文章很多，我在發表的文章中也多次作了介紹，在此就重複一句話：它徹底失敗了。但把這個反面典型，硬行推廣到全國，造成全國各地都有農村發生農民不願種田，大量青壯年進城打工謀生，同時又有不少農民因地主反攻倒算失去了土地，而無地可種。農村發生嚴重的兩極分化，階級矛盾不斷激化，以至於近年來農民造反不斷，為此屢屢暴力鎮壓，造成惡性循環和難以控制的局面。

看看甕安事件。“2008 年 6 月 28 日，對貴州省甕安縣來說，註定是個不平凡的日子，對中國熱心關注國內

形勢的百姓來說，也是個值得思考的日子，這個日子裏，以中學生李樹芬之死引發的萬人大騷亂，以衝擊政府機關為看點，記入了中國人民官民矛盾的歷史史冊”，“從上月 29 日上午開始，該縣縣城即有持槍武警把守各幢政府大樓，並阻止外來車輛進入縣城。據透露，事件中有 1 人死亡，超過 150 人受傷，部分仍然留醫，燒毀幾十輛汽車，經濟也損失不小，公安根據錄影搜捕參與騷亂的人士，已經拘捕了超過 200 人”。

再看湖北鄧玉嬌事件。三個本地惡霸，企圖強姦鄧玉嬌，勸說無效，鄧反擊自衛，致三個惡霸一死、一傷、一呆。

接連發生的此類等等民怨事件，集中暴露了農村摸著石頭過河的這 30 年天怒人怨的悲慘現狀。

再看深圳這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名牌典型。深圳反動官僚許宗衡，被稱“靠金錢，數千萬的金錢，打通了官場上的脈絡”，“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深圳市長”。還有報導稱：“記者從國安部獲得的消息，廣東陳紹基和深圳許宗衡案子相繼出籠，國安部一位經驗豐富的心戰專家，也是我國隱蔽戰線的著名心理學家通過國安部相關部門對中央提出了嚴厲警告，警告中央在辦理類似貪官污吏的案子時，不宜公開貪官污吏的生活作風問題，特別不能過多渲染他們有多少情婦。這位心理學家提出這個警告前，從廣東傳來的消息揭示，目前被抓的廣東腐敗官員，平均擁有的情婦超過 28 名，其中一些政府高級官員，還專門設立了玩弄湖南四川和貴州處女的聯絡處。而深圳一幫官員竟然在香港有專門的窩點，輪番去嫖從世界各

地運送過來供他們作樂的美女。許宗衡為這個窩點親自批款。”深圳這個反面典型的示範，相繼帶動了全國性的官僚大腐敗。就以目前熱報的幾個大型企業鋼鐵行業的反動官僚為例，據報導，僅進口鐵礦石一項，就讓全國人民損失 7000 億元人民幣（約合全國男女老少每人損失約 700 元），從目前所見報導，幾個鋼鐵企業那幾個反動官僚，貪污額上千億。通觀全國城鎮，權錢交易、官匪一家、警匪一家、官辦黑社會、黑幫集團等等貪污腐敗案例，舉不勝舉。把老百姓欺壓得慘不忍睹，有多少普通百姓慘遭迫害慘死在反動官僚的棍棒和槍口下！逼到了人們不得不舉起造反大旗。從上海楊佳殺警案，到近期的重慶、廣東計程車司機大罷工，到目前的通鋼一萬多工人大罷工，抗議反動資本家企圖侵佔國企的罪行，打死一個反動官僚。據通鋼工人揭露，這個反動官僚月工資 80 多萬，而工人最低為 200 元。這一空前殘酷壓榨工人血汗的案例，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刷新了記錄。在通鋼工人運動感召下，河南的林鋼工人大罷工……；以及目前備受人們關注的重慶市“唱紅、反霸、打黑”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標誌著摸著石頭過河的 30 年，把工、農迫害得揭竿而起，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工農推翻壓在身上的“新三座大山”的革命運動。

30 年前的所有偉大成就，不僅造福當代，保國泰民安，全民受益，還造福後代。而近 30 年則是富了 0.4% 的人，大部分人受害（受三座大山壓迫、剝削、迫害）。

鄧小平也承認：“經過（建國初）三十一年的努力，我們的全部工交企業單位已經發展到近四十萬個，國營

企業固定資產比解放初期增長近二十倍。培養了大批熟練工人和上千萬專業人才，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國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較大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所取得的成績比它們大，建設的速度也比它們快。”（《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356、357頁。）

正是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奮鬥，1979年9月，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大會的講話中自豪地宣佈：“我國在舊中國遺留下來的‘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胡錦濤也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中國共產黨的驕傲，是中國人民的驕傲，是中華民族的驕傲”，“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將永遠鼓舞著我們繼續推動中國社會向前發展。”

但是，中國歷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人們本以為共產黨能克服朝代更替的“週期律”，遺憾的是毛主席一去世，並沒有能逃脫這個命運，（某幾個）一朝“臣”篡權以後，雖然名義上沒有變朝代，還叫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實質上這裏的“人民共和”已變味了，已是解放前的“中華民國”，甚至某些方面，還不如“中華民國”。

以上正反兩方面的事實說明：高舉總路線的旗幟，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就蓬勃高速向前發展，為各國敬羨。違背和否定了總路線，就倒退、復辟。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為包括我們自己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出了力、流過汗的總路線，而理直氣壯地高呼：總路線萬歲！

至於總路線涉及到的文化、教育、衛生、外交、統戰等等領域的問題，本文基本上沒有涉及，而這些領域同樣很重要，同樣反映著總路線和摸著石頭過河的不共戴天的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鬥爭。如有機會，以後再談吧。

## 2、大躍進萬歲！

大躍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間，幾億人民建樹的光輝的新生事物，是值得大大慶賀、宣揚、繼承的一件大事。但是，近 30 年來，大躍進成了地富反壞右及其代理人走資派攻擊污衊毛主席的重要題材之一；編造的“罪狀”之離奇、辱罵語言之惡毒，已到了極致。把毛主席、共產黨、社會主義，醜化到了極點，到了實不可忍的地步。好在，我們這代人都是親歷大躍進過來的，在這代人沒有死絕之前，不管是哪個大人物，還是其唆使的地富反壞右以及大小走資派，任何否定大躍進的企圖，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爛了自己的腳。歷史將再次證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

談這個問題，想把重點放在爭論最劇烈的問題上。

### 1) 大躍進的時代背景

1958 年，即大躍進開始的一年，當時正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開始第二個五年計劃。

1957 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圓滿完成。“工業總產值從 1949 年的 140 億元增加到 784 億元，在‘一五’計畫期間保持每年 18.4% 的增長速度，超過計畫中原定的 14.7% 的速度。這是一個很高而又很扎實的速度。其中，鋼產

量從 1949 年的 15 萬 8 千噸，增加到 535 萬噸；煤產量從 1949 年的 3200 萬噸，增加到 1 億 3 千 1 百萬噸。農業總產值從 1949 年的 326 億元，增加到 604 億元，在‘一五’計畫期間保持著 4.5% 的年增長率，超過原定的 4.3% 的增長速度。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也從‘一五’開始時的 41.5%（1952 年）提高到結束時的 56.5%（1957 年），超過一半。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工業部門，如飛機製造、汽車製造、機床設備製造、有色金屬冶煉、高級合金鋼冶煉等，也在這一時期從無到有的相繼建立起來。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增長速率都不高。第一強國美國的年平均增長率不過 3.7%，英國只有 2.9%。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以這樣的速度發展是很快的”。（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1949 至 1976）》上冊第 763 至 764 頁）。

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可見，五年內工業總產值增長 5.6 倍；農業總產值約增加一倍。遠比被“精英們”吹神了的美、英帝國主義增長快幾倍。毛主席領導的 20 多年，幹了美、英帝國主義幹了一百多年的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工、農業產值的增速，儘管當時沒有“大躍進”這個口號，但事實上是大躍進的五年。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即 1958 年，即或保持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發展速度，也是完全合格的大躍進。因此，1958 年提出大躍進是順理成章的事，是歷史的繼續，是人們通過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社會主義認識上的昇華。

## 2) 大躍進的提出

現在某些人攻擊的“大躍進”，實際上指的是“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因為三面紅旗均是1958年相繼提出的，相互間有聯繫，但有區別。本人認為應分開討論三面紅旗，本文主要探討大躍進。

“大躍進是由周總理提出部署的，毛主席大力支持的。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後的一天，毛主席、周總理在頤年堂接待羅馬尼亞客人。客人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從頤年堂出來，向菊香書屋走去，他們邊走邊聊。周恩來：‘主席，現在譚震林他們提出個大躍進的口號，我看這個提法很好。’毛澤東：‘噢，大 - 躍 - 進？’周恩來：‘是的。《人民日報》上都登了，南方有的省份都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毛澤東：‘嗯，這個題目好，拿來給我看看。’周恩來找來報紙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認真地看了一遍，點點頭說：‘這個提法很好。’隨即拿起筆在上面作了批語：‘提法很好。’周恩來回到住所，把這一情況告知了中宣部的陸定一、周揚。很快，大躍進這個口號便在全國喊響了。周恩來為了落實大躍進的具體實施方案，曾經召集譚震林、王任重等人多次座談，擬定文件上報中央獲得通過。大躍進就這樣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

“一九五八年底，黨中央在人民大會堂開會，中宣部的陸定一在大會上正式提出要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和三面紅旗萬歲的口號。中宣部提議的文章清樣擺放在主席臺旁118廳的地毯上。從此，中國有了三面紅旗這個名詞和三面紅旗萬歲這個口號。會上，劉少奇、鄧小平對三面紅旗的提出和三面紅旗萬歲這個口號均極力贊成、擁護，態度比其他人更堅決。（甄文註：

劉少奇、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表態均記錄在案，歡迎有興趣的同志到有關部門查閱。）”

“從大躍進的提出到全國各地轟轟烈烈的回應，周恩來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開會議，聽取彙報，又對各地的進展情況進行檢查、督導。總之，周恩來對大躍進傾注了很大心血。其間，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生產大運動，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無不熱情投入，積極參與。周恩來忙於國務院工作時，劉少奇主動取代了周恩來，親自到第一線指揮全國的大躍進工作”。

（註：以上摘自甄石著《誰嫁禍了毛澤東——大躍進五十週年回憶錄》。以下稱甄文）。

### 3) 大躍進的成績不容抹煞

大躍進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對建設社會主義作出的貢獻也是巨大的，值得後人稱道、借鑒。

1958年的大躍進，我們都是親自參加了的。當時我還在南京念書，一開始我們全班開始煉銅，因為當時銅材很緊張，我們學無線電工程的，銅絲是必需品，大家齊心協力，完全靠兩隻手，去山裏挖泥（耐火泥）等，自己動手造土爐煉銅，但很遺憾，失敗了，銅沒有煉出來。損失幾百斤煤、一點焦炭和幾十斤礦石，可大家鍛煉了砌土爐子，並親身體驗了冶煉的主要流程。接著我們就生產碳膜電阻，一下搞成了，整個工序都是土辦法搞的，生產出了多種規格的碳膜電阻，為國家出了點力，大家都很高興。接著我就在老師的指導下，參加導航課題的研究。這些基本知識，對我後來畢業後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自己用的第一臺12吋電視接收機，除電晶

體、各種電容、電阻、磁性元件、顯像管是買的成品外，各類線圈、中周、高頻變壓器、連萬用表和高頻信號測試設備以及機殼等都是自動手搞的；這同大躍進時培養敢想、敢幹是分不開的。

大躍進最突出地表現在興修水利，全國上下熱火朝天、轟轟烈烈興修水利，不僅為當代造福，而且造福幾代人，沒有大躍進，要取得如此宏偉的興修水利的成就是不可想像的。上自毛主席、中央領導，下至學生、教師、工人、解放軍都在興修水利工地流淌了汗水，這些宏偉的場面，如毛主席和中央領導參加勞動的十三陵水庫建設，就是對大躍進那段火紅日子的真實記載。直到延續好多年才竣工的宏偉的紅旗渠等等，都有電影記錄片可查。有同志作了詳細統計：“淮河、黃河、長江、運河、遼河、松花江、珠江，七大流域都先後進行了規劃治理。不論築壩防洪發電，修堰引水灌溉，國家參與程度，群衆動員人數和總投資額，都遠遠超過了歷代，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統計，由 1952 年至 1980 年近三十年間（註：其中主要是 58 年以後），國家用於水利的資金近 800 億元，其中地方及社隊自籌也近百億元。建成大量的防洪、灌溉、排澇、發電等工程設施。主要是：整修、新修堤防、圩垸、海塘 165,000 公里；疏浚整治排水河道，開闢排水出路；修建大型水閘 241 座；建成大、中、小型水庫 56,000 座（解放前有大中型水庫 23 座），塘壩 640 萬處，總庫容量達 4000 億立方米（包括電力投資的庫容 1100 億立方米）；建設萬畝以上灌區 5000 多處；機電排灌動力由解放初的 9 萬多馬力發展到 7000 多萬馬力；機電井從零開始發展

到 209 萬眼；水利結合發電裝機 900 萬千瓦”。這些工程，大多都是勞動人民靠兩隻手肩挑手推挖出來的，而大多是義務勞動。如果用當今市場經濟折算一下，這些工程增加了多少年總產值？

大躍進從 1958 年到 1978 年鄧某“上臺”，在工業、國防、交通、文教、衛生等等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其中許多是史無前例的，如石油、長江大橋、核彈、火箭、人造衛星、大型電腦、一些高科技信息產品（如各種雷達、鑄射產品、聲納設備、各種遙感設備等等）、各種機電農機具、萬噸貨輪……，都是從無到有。這些在報紙、互聯網、圖書資料、書刊，都有大量報導，在此就不摘抄了。

可以說，大躍進不僅出了豐碩的成果，工、農業高速發展；1960 年 1 月 22 日，新華社公佈：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提前三年勝利完成；充分證明了大躍進作出的貢獻。而且在大躍進時期，全國培養出了大量改天換地的優秀人才，如山西大寨的陳永貴、大慶油田的王進喜（鐵人）、河南帶頭修建紅旗渠的楊貴、還有人人皆知的焦裕祿等等。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能調動全民轟轟烈烈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人們有理由，理直氣壯的高呼：大躍進萬歲！同近 30 年砍掉了三面紅旗後，大量水利設施被廢棄，大量旱澇保豐收田被破壞，造成了旱也成災，澇也成災，大量人民生命財產遭慘重損失。這一比較，更應高呼：大躍進萬歲！

#### 4) 劉、鄧對大躍進的破壞

大躍進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樣，同樣會遭到一些別有用心和階級敵人的搗亂、破壞。這方面的問題很多，有

的還十分嚴重。我想重點講三個問題。

### (1) 浮誇風、“共產風”和餓死人的問題

毛主席健在時，在批彭德懷的會議上，鄧小平對大躍進有一段講話：“我們黨內幾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看不到 1958 年以來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偉大成就，竭力誇大群衆運動中的某些已經克服的缺點，藉以非難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1958 年的大煉鋼鐵運動對於我們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實際生活中愈來愈明顯，而他們卻以為這個運動只能起破壞作用；人民公社已經在總結了初期的經驗以後進一步成長和健全起來，而他們卻以為人民公社正在‘倒退’，只有解散人民公社才是唯一出路；廣大人民群衆都認為我國國民經濟的躍進的局面好得很，而他們卻認為‘糟得很’。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顯然不過是害怕群衆和敵視群衆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在我們黨內的一種反映……”。（參見內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東興傳》第 354 至 355 頁）。

毛主席去世後，他說：“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越來越多。”（《鄧小平文選》第 2 卷第 295 頁）反右派鬥爭“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文選》第 3 卷，253 ~ 254）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民主集中制被破壞了，集體領導被破壞了”，（《鄧小平文選》第 2 卷，

348) “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歌頌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後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文選》第2卷，345）。

以上這兩段文字，發生在毛主席在世和去世後，出在同一個人的嘴巴，但內容全然相反，我很想聽聽叫喊了30來年“實事求是”的先生們，如何“與時俱進”地把這兩段話統一起來？

以常人來解釋，自然會認為講這兩段話的人是神經有毛病還是別有用心。由於各人的階級立場的不同，對這兩段話會“各取所需”，這才合乎辯證法。

再談誰飈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結論是劉、鄧。近年來，關於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僅建議感興趣的同志，抽時間看看幾本書：吳冷西著、新華出版社《憶毛主席》1995年2月第一版；逢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毛澤東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毛澤東文集》，以及張宏志同志編寫的《還清白於毛澤東》，這些書有證有據地用大量歷史史實揭露了劉、鄧大飈浮誇風等等問題。許多媒體這些年也發表了大量這方面的文章，在此就不重複了。從這些書裏，還用大量史實，證明要不是毛主席及時、下大力狠刹五風，其後果不堪設想。這30來年，他們在安徽小崗村親自樹的反面典型，是當年（1958年）飈五風的最新樣板。遺憾的是，毛主席早已過世，既沒有人敢公開剎這股風，也再也找不到替他們代過的人。小崗村這個典型的破壞性比58年還嚴重，在全國死

了多少人？它使全國農村起碼倒退了 50 年。如若不信，不妨看看全國農村什麼時候能趕上沒有分田單幹、堅持公社制度的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的今天。

關於 1959 至 1961 三年自然災害死人的事，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編造出大躍進“餓死了 3 至 4 千萬人”的大謊言，攻擊毛主席。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從互聯網查一下“大躍進”，會看到有的同志寫了一篇基本如實反映大躍進的文章，卻招來一堆人的跟貼，指名道姓辱罵毛主席“餓死幾千萬人”等，其中相當一部分人說：“大躍進時‘風調雨順’，根本沒有災害，完全是‘人禍’餓死的……”。從這些跟貼者的語言看，很可能大躍進開始時還沒有出生，或還是個不懂事的娃娃，對這部分人，責任不在他們，而在教唆犯。大家只要看看被宣稱是中央“黨校”教科書《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有關大躍進等部分，什麼“紀實”，基本上是教唆反毛的大毒草。其他當今一些中、小學“教科書（政治、歷史部分）”，是些什麼玩藝？就可想而知。加上一些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及其沒有教育好的子女為“教師”的惡意宣洩，誤導青、少年。對這些青少年，我們有責任，把真相告訴他們。而對李銳那類從頭頂反動到腳後跟的反動分子，就不必與之爭論了；毛主席如果沒有這類人的瘋狂污辱、反對，毛主席也就不是人民、尤其是貧下中農、工人（而不是工賊）、革命知識份子等的偉大領袖了；也就成了地富反壞走資派“小平你好”了。所以，我在這裏談死人的事，主要是針對那些聽了教唆犯誤導的青少年講的。

我希望他們不唯書、不唯上、而只唯實；不能人云

亦云，凡事要多動腦子，多問個為什麼？包括對本文講的，也應如此。

許多史料證明，用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破壞大躍進是那兩個偽裝為正人君子的“老革命”劉、鄧幹的。但我不認為那兩個“老革命”颱五風餓死了幾千萬人。餓死了人是事實，兩個“老革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死人沒有那麼多，而主要原因是天災，其次是人禍。而且死的人，也不全是餓死的，許多是正常死亡。只要動腦子想一想，那時中國僅約5億左右人口，如果死了四千萬，則平均每12.5個中有一個人死了，你們見到周圍死這麼多人嗎？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前三年就完成了。提前三年完成，說明第二個五年計劃是1958和1959兩年內完成的，這兩年，正是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造謠死人最多的時候，要是餓死四千萬人，全國約平均每三戶人家，就餓死兩個人，哪還有心思和精力去搞社會主義建設並完成“二五”計畫？這些極淺易的常識，都可判別餓死那麼多人是惡意造謠。

憑我老家蘇南地區，我沒聽說餓死人，但有吃胡蘿蔔（家鄉的主要豬飼料）和瓜菜代糧的，有極少數浮腫的。但五風颱得嚴重的如河南省等，確實餓死人了，這在下面介紹。另外，說大躍進期間風調雨順、沒有天災。如果這句話出自從大躍進過來的人講的，則無疑是別有用心。事實是，大躍進的第一年，1958年確實是風調雨順，所以我在前面講了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豐產年，只是由於劉、鄧颱“五風”破壞，豐產沒有豐收，一部分糧食沒有收上來，爛在地裏了。即便這樣，糧食也是夠吃

的，才有下面要介紹的劉少奇大辦食堂，農民“放開肚皮吃飽飯”，甚至大人打著孩子壓住了儘量多吃一點，怕吃少了吃虧。這些，今天聽了是笑話，但當時卻是事實。因此，1958年不存在餓死人的問題，倒是不少人吃撐了，這才是事實。這種放開肚皮吃飽飯，我在假期回家是親自吃和目睹的事。可見，如果說1958年是風調雨順是事實，但說1958年餓死了人，是100%的惡意造謠；但有沒有放開肚皮吃飽飯，吃撐死了的？我不知道。

但是，從1959年至1961年，共和國遭遇了特大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嚴重在受災面積特別大、持續時間特別長；證明說大躍進風調雨順是造謠。不少同志對當時全國受災情況有詳細統計資料已公佈於衆，為縮短篇幅，在此不贅述了。我們的周總理都說是他遇到的最嚴重的自然災害，對我們這代人就更是從未見過的特大自然災害了。我這裏僅舉親見、親聞為例。大家都知道，江蘇無錫地區是有名的魚米之鄉，人人熟知的沙家浜就屬無錫地區。可是，在大災之年，就有無錫人逃荒到我家鄉（現今常州市新北區），甚至有帶了姑娘來逃荒的，就嫁給我家鄉的青年落戶了。因為我家鄉歷來種胡蘿蔔餵牲口。大災年，我們家鄉胡蘿蔔仍豐收，真解決了大問題。僅就此例，說明素有魚米鄉之稱的無錫地區有人逃荒，足以證明當年自然災害之嚴重。1960年6月我提前一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國防科委情報所工作，親見這年我們種的大白菜，不僅棵兒小，還基本不包心；梨樹上結的梨只有棗子大，還很少；四周農民種的玉米，大多結子很少，甚至許多成了灰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

代初，遇到如此嚴重的大面積自然災害，要做到不死人，只能是願望，而不是現實。即或到了二十一世紀的 2008 年，“精英們”吹得富到流油的年代，春季南方遇大寒、有的地方長期乾旱，我們一些官辦報刊不也公佈死人了。“科學發展觀”了幾年的 2009 年 7 月 2 日，《京華時報》A06 版報導：大字標題《22 省洪災致 95 人死亡》。即使走資派吹成“天堂”的美國，也還頻頻公佈自然災害死人的情況。可以說，直至現在，“人定勝天”，還只是人們的願望，人類對有些自然災害還是一無辦法，這是現實。因此，有人用自然災害來攻擊人，只能說他是無知，如果是知情的“大人物”或“專家”藉此攻擊人，那就是別有用心。

應當譴責的那兩個“老革命”，大飈浮誇風、“共產風”等“五風”，給大災雪上加霜，在“五風”嚴重的地區，造成了慘重的死人事件。當時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揭發劉少奇、鄧小平是如何唆使他大飈“五風”而造成死人等悲劇。由於造成了嚴重死人事件，中央把其定為反革命事件，對主要責任人進行了嚴肅處理。但毛主席去世以後，在那個一刀切的“大平反”時期，鄧小平親自給予原受了處分的作了平反，並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可見誰是飈“五風”造成死人的罪魁？還需要爭論嗎。另外，毛主席在世時，艱苦地花了三年精力，狠剎了“五風”，至七千人大會，告一段落。自此，直至毛主席去世，就很少有浮誇風、“共產風”，相反，冒出了個瞞產問題。毛主席去世後，浮誇風、“共產風”不僅在小崗村死灰復燃，而且至今仍是一個難以克服的普遍問題。事情就這樣擺

在我們面前，諸君該作何結論？

## (2) 關於“吃大鍋飯”

近 30 年，走資派藉“吃大鍋飯”問題，全方位圍攻毛主席，“大鍋飯”成了攻擊毛主席不可缺的內容。他們講的“大鍋飯”，是指 1958 年大躍進，人民公社辦的集體食堂。即農民不每家每戶單獨做飯，大家都到集體辦的公共食堂吃飯，還不用掏錢。我上面講的放開肚皮吃飽飯，指的就是在這公共食堂吃飯。

走資派藉“大鍋飯”攻擊毛主席的內容很寬，比如計劃經濟是“大鍋飯”、八級工資制是“大鍋飯”、哪個單位自主權少一點是“大鍋飯”、差距不大是“大鍋飯”……。可以說，“大鍋飯”被醜化得不能最醜。

平心而論，如果農民在自願的基礎上，組織起來辦個食堂，未嘗不可。但要處理好集體補貼的部分和自己掏錢部分，也不絕對排除經濟條件很富裕的社、隊吃飯不要錢。公共食堂，並不是城鎮工礦企業、機關、學校等的“專利”，而農村就不能辦食堂。但問題出在一聲令下，家家戶戶都得到食堂吃飯，並把各家各戶的鍋、灶都砸掉了，斷了各家各戶做飯的後路。還不管條件如何，都吃飯不要錢。可以設想，解放的時間不長，雖然農民的思想覺悟大大提高了，但小農思想的尾巴還拖著，所以出現放開肚皮吃飽飯的情況，大人打孩子逼著多吃一點，糟蹋了不少糧食。更嚴重的是，放開肚皮吃了飽飯，似乎飯是天上掉下來的，在一片歡樂聲中，沒有組織好秋收工作，造成 1958 年豐產沒有豐收。接著來了當時意想不到的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大鍋飯”糟蹋掉的

糧食，尤其是 1958 年豐產沒有豐收，也增加了大災年缺糧的問題。這是我對當時吃“大鍋飯”情況的回憶和粗略的分析。

走資派、文痞們藉吃“大鍋飯”攻擊毛主席，沒有一個人實事求是講清吃“大鍋飯”的來龍去脈。他們也沒有勇氣講出真實情況。講清了情況，不就穿幫了，還能誣陷栽贓毛主席嘛？幾個“大人物”玩的手腕，同上述“死人問題”栽贓誣陷毛主席同出一轍。

請看甄文介紹的以下事實：

《大鍋飯是劉少奇的傑作，他親自提倡佈置的》

“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寧市召開了一次國務工作會議。休息時，劉少奇對毛澤東說：主席，蘇聯的工廠裏和集體農莊裏的集體食堂我看不錯，既節省勞動力，又衛生。我國可以不可以也搞集體食堂？”

毛澤東聽後遲疑了一下說：“國情不一樣，有的在蘇聯行得通，在我國就不一定了。”

劉少奇說：“我們可以先搞幾個試點，不行就解散，這項工作我來做。”

毛澤東說：“我不主張。你要搞試點的話，搞一個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第二天，劉少奇找到朱德說：“朱老總，集體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

朱德：“啥子事？”

劉少奇：“蘇聯的集體食堂是個成功的經驗，很值得在我國推廣。我向主席提出了我們也辦集體食堂的建議。”

朱德：“不曉得，不曉得。”

劉少奇：“你見了主席呀，再吹吹風，使這項工作能夠儘快在全國展開。”

朱德：“嗯，我問下好嘍。”談起了其他事情。

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劉少奇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向周恩來、陸定一說：“我向主席提出來辦集體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試點，你們出個主意，試點放在哪裏最合適？”

陸定一說：“南方放一個、北方放一個，有代表性。”

劉少奇說：“不，我準備南、北、中各放一個。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間的放在河南，我已向這兩個地方的幹部打了招呼。南方麼，見了陶鑄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開了八大二次會議。會議開始前，劉少奇找到毛澤東說：“主席，向你彙報個好消息，集體食堂試點搞成功了。我親自到天津、河南兩個試點進行了調查，當地的幹部、群衆都說好。”

毛澤東說：“會有人說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條件差的會說好，家庭條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話嘍。”

劉少奇：“主席，我講的全是實話，沒有半點謊言。”

毛澤東搖搖手說：“沒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鍋飯，有人說甜、有人說鹹，衆口難調麼。”

劉少奇：“主席說的對。但總的來說是成功的，我建議儘快向全國推廣。”

毛澤東：“不要急於求成。向全國推廣是個大問題，要考慮、要坐下來研究，試點範圍可以大一點，效果究竟怎麼樣？那時再說好了。”

“試點範圍可以再大一點”的大字，讓劉少奇得到了

尚方寶劍。他在全國到處亂跑，到處亂說：“主席同意了他大辦集體食堂的建議。”並向多人吹噓集體食堂是他的傑作。

在此期間，劉少奇沒有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夥，建立了集體食堂，吃了大鍋飯。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見，他已經生米做成了熟飯。

（註：以上選自甄文中有關部分的全文）。

### （3）劉、鄧為什麼要破壞大躍進

前面介紹的吳芝圃揭發的材料說清楚了這個問題，在此不贅述。

從以上材料可見，圍繞大躍進，始終存在兩個司令部間的劇烈鬥爭，這些內幕，常人是很難想像的。從中可以看出，誰是一心為公一心為人民，全心全意帶領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奔向共產主義？誰是為了個人私利而陰謀爭權奪利，破壞大躍進？如果再聯繫近三十年的現實，答案是很清楚的。但是，各個階級會在這個問題上，會選擇符合其本階級利益的答案，就聽便了！因此，對大躍進肯定和否定的鬥爭，還必將繼續，這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毛主席、周總理領導的大躍進，雖遇到了如此劇烈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鬥爭，還遭遇了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但仍能取得輝煌的勝利成果，更證明我們要永遠高舉大躍進的紅旗，高呼：大躍進萬歲！

### （4）走資派誣衊毛主席頭腦發熱、超越發展規律

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文痞攻擊毛主席“頭

腦發熱”的“證據”是鋼產量問題，其一是 1957 年毛主席第二次訪蘇參加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他在各國共產黨會議上說：“我國今年有了 530 萬噸鋼……，赫魯曉夫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中國可以超過英國。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以爬到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鋼，不是超過英國了嗎？”

（見張聶爾著，花城出版社 1993 年 1 月出版《中國第一人毛澤東》第 50 頁）其二是 1958 年 8 月 17 至 30 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胡喬木起草的會議公報《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薄一波說：“他向毛主席建議把一〇七〇（萬噸鋼）寫到公報上。毛主席贊成，當時我通知胡喬木，說毛主席說了，把一〇七〇寫到公報上……。”（見葉永烈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出版《政臺風雲》137 頁）這兩件事就成了某些人攻擊的“把柄”。

我想這兩個問題已沒有必要爭論了，這些年各種媒體都發表了大量文章。事實上不僅鋼產量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超過了英國，而且還有一些重要工業產量超過了英國。說明毛主席估計得非常准。

現在我們倒是應當看看以“實事求是”自居而“頭腦清醒”的先生們在“改革開放”30 多年創的“奇跡”。他們“頭腦清醒”地高喊“步子快一點”和不問姓資姓社“一心一意搞建設”，結果把“四個現代化”搞不見了，吃飯靠進口轉基因糧，八億件襯衫換美國一架破飛機，成了帝國主義的組裝廠。《新華網》報導：“內地 5 年來至少

17座大橋垮塌，近6成建成不足20年。”大肆吹噓的中國高速鐵路，事故不斷以至車毀人亡，被譽為“我們得面子，外資得實惠，即造成鐵道部高負債、老百姓買高價票、外資得高利潤”，成了完全由外國控制核心技術的“中日國”鐵路。即便其中一個顯示器，也不准用國產的，必須以幾倍國產品價格從外國進口。叫喊了這麼多年“科學發展”，實質發展了一個“賣”字：賣國企、賣土地、賣勞動力、賣婦女兒童、賣器官、賣資源、賣國家……。結果是軍工落後西方50年；現在的農村狀況是有地沒有人種，有人沒有地種，我估計農村倒退了50年以上。

以上這些資料和事例，比較客觀地反應了走資派“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不管姓資姓社，不爭論”的本質。我非常歡迎同走資派和文痞們面對現實，深入研究究竟是總路線好，還是“步子快一點”不問姓資姓社好？至於我的態度，在這裏也只能說談了一星半點事例，但僅這一星半點，也足以讓我表明對總路線的基本態度：總路線萬歲！

### 3、人民公社萬歲

1958年，全國大規模成立了人民公社，這是中華民族在農村興起的最具革命性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創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儘管地主、資產階級對其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以極其卑鄙的手段把她扼殺了，使千百萬農民，尤其是廣大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又回到了被剝削、壓迫的狀態，“‘生不起，剖腹一

刀五千幾；讀不起，選個學校三萬起；住不起，一萬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沒房沒車誰跟你；病不起，藥費讓人脫層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萬幾’。”（參見 2008 年第 30 期《書報參考——人物週報》第 14 版，標題為《民謠與官員》，“寧波市委書記巴音朝魯（蒙古族）5 月 6 日在寧波市委第十一次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用順口溜說起民生問題）。但人民公社遲早是會回來的。

人民公社的成立，離我們已是半個世紀，回顧這半個世紀內農村走過的這風雨 50 年，有其十分重要的意義。

### 1) 人民公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在解放前，中國農村的幾千年，都是佔農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富農，但卻佔有 80%以上的耕地，絕大多數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勞苦農民，不是地、富僱傭的長、短工，就是地、富的佃戶，租地、富的土地耕種，過著饑寒交迫的苦日子。那時的人均壽命僅 28 歲，通俗一點講，就是短命的多。國民黨統治 37 年，進了點洋玩藝，有了一點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質的資本主義工商業，人均壽命延長到 35 歲，但也屬於短命的範疇。就是說：舊社會勞苦大眾是民不聊生，是一窮、二命短。例如，我的祖父輩，好幾個都娶不起老婆，而成了絕戶，僅我祖父成了親，祖母是幫人家的（俗稱傭人），生了個單丁我的父親，頂了好幾家絕戶家產，算是有了自耕地。我母親生了 9 個孩子，成活了 3 個，應該說比那些長工佃戶的日子好多了，那些地主的長工佃戶家中的情況就更慘了。所以，舊社會用不著計劃生育，絕戶本來就不少，即便能娶妻成家的，由於生活貧困，加上醫療條件極差，生育率很低，生下

來成活的更低。這些都證明幾千年的小農單幹，其結果極大部分走上破產的路，成了地、富掠奪、壓榨的物件，甚至連傳種接代的權利都沒有。《白毛女》電影，在解放初為廣大農民喜愛，就因為它如實反映了舊社會農村人吃人的階級關係。因此，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擁護共產黨，投身無產階級革命，願為消滅階級壓迫和剝削，實現共產主義而鬥爭。中國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力量是農民。由於舊社會工人階級隊伍並不大，產業工人更少。因為舊社會的工業很少，基本上是個農業大國，而且是個饑寒交迫的農業國，或者說是個填不飽肚子的十分落後的農業國。解放後，雖然工人階級隊伍得到了快速壯大，但其大多數來自農民，帶著農民的階級烙印。由於小農經濟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以農民為主體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奪取了政權以後，毛主席十分重視對農民的教育問題。而混在革命隊伍的民主派、復辟派、走資派千方百計利用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為其復辟資本主義服務。所以，農村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更顯得突出，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

在農村，土地改革後不久，就出現了當時被稱為“三畝地（蘇南地區），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即革命到了頭而不想繼續革命的思想，當時也被稱為滿足於一家一戶的“小康”生活的思想。但好景不長，很快出現了兩極分化，少部分身強力壯而又善長投機取巧的成了新富農，而一些農民遇上不可抗的災難（例如生病、死人、火災等），又貧窮下去，甚至土改分到手的土地又出

賣掉。面臨這種狀況，一些思想進步的農村幹部、貧下中農，開始搞互助組，又從互助組進入初級農業合作社（土地、耕牛、大型農具入股參加分紅），實現了按勞分配為主。起初，一些富裕的農戶不願入社，抱著觀望的態度。但結果合作社畝產糧食明顯高於單幹戶，事實教育了他們單幹不如集體好，而參加了合作社。後來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頂住走資派颳的分田到戶單幹風，堅持集體道路，而取得成功，一些分田單幹戶又回過頭來參加了集體，這同初級社時，單幹戶不再單幹，自動參加合作社的情況很相似。這就反覆證明了合作社優於單幹，是實踐反覆證明了的事實。後來又成立高級社，土地等不參與分紅，完全按勞分配。到 1958 年，農村開始成立了人民公社，當時，河南省領導向毛主席彙報說：“馬克思創建了巴黎公社，這裏的農民自發地成立了人民公社，是件新生事物，省委給以了肯定和支持。”毛主席聽了彙報表示：“好麼，人民公社好。”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就用大字標題登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報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一致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人民公社就這樣產生了。人民公社成立後，逐步明確了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民兵）為一體，概括為其特點是：一大、二公。至 1961 年 6 月 15 日，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以下簡稱“公社條例”），使公社的制度日趨完善。即便今天來看這個條例，也是值得讚揚的好文件。如果中國農村堅持條例貫徹到今天，全國必將是一個相當完美的社會主義農村。華西村、南

街村等等凡堅持這種制度至今的，都為國內外進步人士讚不絕口，要全國農村都這樣，中國整個農村將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嚮往的先進典例。僅就最近見到報導全國僅存的兩個人民公社（僅名稱被資改派強行改名為鄉），其中一個是《河北青年報》報導的，被人們稱為“最後的人民公社”周家莊鄉，今年人均分紅 6000 元；另一個是在西藏西部至今還有一個人民公社，它的名字叫嘎爾措。周家莊人民公社，全體社員除吃、用、住、醫、學、電、水等等全部生活開支後，社員每人年終還分紅 6000 元，也就是說，一個五口之家，年終淨節餘三萬元人民幣。據報導，西藏的嘎爾措人民公社，社員的收入也均比同一地區的農村高很多。除此外，全國僅存的保留公社時期生產大隊的村莊，約 1000 多個，都取得長足的發展，華西村、南街村這樣的典型，佔了一定比例。凡這些堅持公社制度的鄉、村，都有共同的特點：發展都較快，社會穩定，沒有偷盜兇殺，幹部覺悟高，幹群關係好，機構精簡，人民安居樂業，大多沒有外出打工的……；都在縮小三大差別上邁出了一大步，社員的政治思想覺悟都比較高，是那個破落的反面典型小崗村無可比擬的。

## 2) 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

人民公社從誕生的那天起，就顯示了其無比強大的優越性，尤其是依靠集體的力量，開荒平地，甚至荒山變良田，大量擴展了可耕地；農村電氣化、機械化的逐步推廣，全國性的大規模興修水利，在中華大地上，開天闢地第一次大範圍建成旱澇保豐收的良田，逐步擺脫千年一貫制的“靠天吃飯”的局面；有關農業科研院、

所以及農技推廣機構的配套建立，高等院校的普及，以及各類農機具生產企業的建立，為農業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化肥廠的建立，以及化肥的合理使用；輪作制的試驗和推廣，合理深翻和密植，精耕細作等等，至上世紀六十年代，蘇南地區年畝產糧食由舊社會的 300 來斤，增加到 2000 斤以上。至此，全國人口比解放前增加一倍，但全國人均糧食達到了 600 多斤，基本上解決了溫飽問題。1975 年 9 月 15 日，鄧小平在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上的講話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二十五年來，我們做到了農業剛夠吃，這件事情不可小視，由過去舊中國的半饑餓狀態達到每人佔有糧食六百幾十斤，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這是在毛主席領導下，堅持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反對機會主義、反對修正主義，依靠全體農民群衆和全體農村幹部努力的結果”。毛主席對農村醫療、衛生十分重視，提出了醫療重點在農村；推廣農村統籌醫療，普及赤腳醫生，社社都有衛生院，隊隊都有醫療站，農民的健康狀況大大改善，至毛主席去世，全國人均壽命由舊社會的 35 歲延長到 68 歲；也就是說，在舊社會，大多數人都短命夭折，而解放後短短二十幾年，大多數人都活到了古稀之年，這在人類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奇跡。如果毛主席的路線堅持到今天，中國人均壽命很可能是世界之最，退休年齡不是提前，而是要推後 5 至 10 年，因為長在毛主席紅旗下的人，至今七十歲以上的，大多身體仍很健康，可能比現在 50 來歲的農民工健康的不在少數。如果不是那兩個人飄浮誇風、“共產風”進行破壞，情況將更好。關於人民公社促成農業大發展的具體事例，

本人已發表的文章中反覆介紹了一些，加上近期不少同志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文章，並引證了大量具體資料，在此就不費筆墨了。而僅對以下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看法，供探討。

### (1) 公社的組織機構

關於公社組織機構，《公社條例》均有詳細規定，在此不重複。其最突出的優點是機構精幹，幹部參加勞動。公社一級所有工作人員，也就是 20 人左右，但辦事效率很高。沒有派出所、保安隊、市管委、土管所、交管所等等這類名為管理，實為敲詐勒索、欺壓農民的機構。從公社主任、黨委書記到一般工作人員，都必須參加農業勞動，並有具體規定：公社一級幹部，全年最少不能少於 60 天參加勞動；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幹部都必須參加勞動，因公開會等給予誤工補貼，而總的補貼不得超過大隊工分總數的 2% 左右。可以說，那時的公社各級幹部是很辛苦的，很廉潔的，思想覺悟也較高，真是憑著一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赤誠之心而日夜操勞。決不會有花 1300 萬賄選村官之類事件。（2009 年 1 月 8 日晚央視播出，關於遼寧龍門村選舉）可見當今一名村“官”的“錢途”多大，其腐敗程度可想而知。公社幹部參加勞動的制度，不僅密切了幹群關係，而且使幹部對下情心中有數，工作有的放矢，許多問題也可以及時解決。就不易產生幹部坐在象牙塔裏想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官話、大話、套話，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能避免幹部上午圍著輪子轉，中午圍著桌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等等醜惡腐敗。

### (2) 大家做政治思想工作

人民公社不僅生產搞上去了，而且大家做政治思想工作，許多矛盾基本上解決在萌芽狀態，人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覺悟普遍提高，真正做到了一人有難，衆人幫忙；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社會非常穩定，在中華大地第一次出現了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讓人們看到了共產主義曙光。不僅節約了大量用於防盜門、防護欄的鋼材，大大精簡了公、檢、法機構，避免了這些機構的腐敗給社會造成的災難；更重要的是人們共產主義覺悟提高後，認識到了自己當家作主的責任，煥發出無窮的投身三大革命運動的自覺性，這是靠高薪、物質刺激換不來的，是不可估量的改天換地的巨大力量。馬列主義是十分重視正確處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辯證關係。而那些提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看著金錢才幹活的錢迷，決不是共產黨人，更不是幹社會主義。

### （3）社辦工業和文教衛生事業

在此重點講社辦工業。有的人說：分田到戶單幹還出了個副產品，即農村工業，似乎農村的工業是分田單幹後出現的“一大成果”。凡同農村打過點交道，就別說是農村出來的同志，看了這句話定會非常吃驚，一個強迫農村“改革”的人，竟不知道農村工業何時開始，大概是只顧養尊處優打牌了。人民公社克服了蘇聯集體農場單一農業的不足之處，成立人民公社時，就明確了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為一體。人民公社成立後，在經濟上有了公共積累，農村電氣化、機械化的逐步推廣，勞動力也有了富裕，這為社辦工業創造了條件。公社不僅辦了工廠，蘇南地區幾乎是大多數大隊有小學，社社有

中學，個別的還辦了大學。人民公社成立後，社辦、隊辦工業從無到有，並得到了高速發展，許多農戶不僅有農民，還有工人，還是民兵，或者農忙時務農，農閒時務工。農民的統籌醫療、子女上學等（即辦學費用），基本上是工業創的利潤支付的，同時增加了農民的經濟收入。有的社隊是務工、務農統籌安排報酬，也可以說是務農的為農業工人，這也是消滅三大差別的一大創舉。如果社辦工業堅持發展到現在，只要有 20 到 30% 的公社、大隊工業像華西村、南街村等等那樣，同志們想一想，將是怎樣高度興旺發達的農村？同城市還有多少差別？還會有農村小夥外出打工、農村姑娘進城賣淫嗎？遺憾的是讓走資派折騰了這些年，社辦、隊辦工業幾乎全被搞掉了，成了幾個資本家的私人工廠，一些反動腐敗官僚從中侵吞了公社全體社員辛辛苦苦積累的財富。一些農民淪落為打工仔、妓女，不堪再回首，這些才真正是分田到戶單幹的“副產品”。

#### （4）關於糧票、肉票、布票等票證問題

近段時間來，以取消票證來宣揚“偉大成績”，並以此貶低和控訴實行票證之“苦”。蠱惑一些無知的人，仇恨毛澤東時代。我倒擔心這些人別步了王熙鳳的後塵，“機關算盡太聰明……”。票證的實施，直接關係到陳雲提出的，並經中央決定的“統購、統銷”政策。即國家對糧、油、棉等涉及國計民生的農、副產品實行國家統購統銷。如果有人把它說成由於物質財富貧乏而採取的下策，倒不如說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採取的上策，它體現了社會分配平等的社會主義優越性。統購與統銷是同一問題的兩

個方面，統購體現了人們生產的物質財富為社會作出的應盡責任而賣給國家，而不是賣給奸商，或自己去投機倒把哄抬物價；統銷，國家把統購的物資按社會主義平等原則銷售給人民消費，或支援工業、國防、幫助兄弟國家……。許多老同志都看過解放初期，中央和上海市如何戰勝了不法奸商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以破壞社會秩序的大型記錄片。再說近的，2003年非典期間，傳出一股歪風，幾乎是一天之內，北京市內把糧食、食品搶購到斷了貨，搞得人心惶惶，如果憑票證供應，能發生這種局面嗎？再就是近幾年，經濟危機一來，糧、油就漲價，食油幾乎漲了100%，豬肉每斤8至9元漲到近30元，約漲了三倍。這一漲，也搞得人心惶惶，如果憑票供應會發生這種局面嗎？憑票供應一個最突出優點就是避免了地主、資本家、反動官僚吃撐了，貧困戶餓了肚皮，更防止了投機倒把。

有人會說，憑票供應是因為物資短缺，取消了票證，說明物資豐富。事實並非如此，關於糧食問題，後面專門討論，僅肉票、布票談點看法。

肉票問題，如果人們不健忘，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因蘇修逼債，而且大多是用豬肉、花生等折價償還的。毛主席帶頭不吃豬肉，還清外債；但老百姓還是發了肉票。為此短期不吃、少吃肉，就不知走資派和文痞們如何評論了？但1963年下半年起，豬肉多到了銷不掉，蘇修向我們購買豬肉，周總理批准賣給他一車皮豬尾巴，並標上中國產，他也不顧臉面的要了。國內發的肉票，到七十年代初，每人每月發3斤肉票，一般都用不掉，

何況雞蛋、雞、魚、鴨等從未發過票。至於棉布票，因為抗美援越和備戰，需大量優質棉用於軍工，但的確良等化纖織品，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已大量供應，然而棉布票仍每人發 16 市尺。其實，一些人有一種奇怪的心理狀態，一憑票買，就心理緊張。比如糧票，當時發得最少的是一般市民，每月約 26 斤，工人每人從 32 斤到 45 斤不等，特殊工種可能是 50 多斤；軍隊戰士每人 45 斤，幹部 36 斤；有些農村，只是跟了劉鄧飄浮誇風的地區，出現統購過了頭，把一部分口糧也統購了，而出現糧食不夠吃……。事實上，當時大多數人糧票用不掉，少數人可能不夠。再說取消糧票後，又有多少人能吃發糧票時那麼多糧食？肉票也如此，取消肉票後，又有多少人家每月每人吃三斤肉？取消棉布票後，又有多少人家每年每人買 16 市尺棉布？僅以我自己老兩口而言，坦率講，我的身體是健康的，老伴的身體差一點，但一個月兩人吃不掉 30 斤糧，全年吃不掉 15 斤肉，平均每年買棉布不超過 10 市尺（這些都還是誇大了講的）。

到了共產主義，實行按需分配，可以想像，按需分配總要有個憑證去取或有人送這個需吧，因為那時貨幣沒有了，我看只要是憑個什麼分配，你說它是票證也未嘗不可，這只是講幾句閒話。

現在，有些走資派為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竟不顧歷史，鬧了不少國際笑話。比如他們大力鼓吹現在有多少手機、裝了多少程式控制電話、多少液晶電視接收機、電腦等……，以貶低 30 年前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就不說這些玩藝，除外殼是中國造外，裏面有多少是

中國產品，說時髦一點是“中國產權或品牌”？難道就不為其中甚至連一個普普通通的開關都是進口的而臉紅，那還有臉面大吹大擂？更重要的是，這些鼓吹者，就不去考證一下，這些玩藝在世界市場上是什麼時候面市的？中國又是何時成了洋資本家生產這類玩藝組裝廠的？靠這些玩藝來嘲笑 30 年前的社會主義，這好比嘲笑奴隸社會的奴隸不懂自由戀愛，或批評秦始皇、漢武帝沒有給中國人放映一場電影是同樣可笑。走資派如此不顧科技發展史，而一味溜鬚拍馬，倒不如總結一下，這些年發生了多少愛滋病人，奪取了多少中華兒女生命……。

#### （5）關於反面教員安徽小崗村

人民公社正是在中央文件一再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被走資派強令抹掉了，以至不少頂住這股歪風的同志遭到打擊迫害。特別應當指出，有文章披露：“‘分田幫’是少數（據萬里等人回憶，省委書記中間只有遼寧任仲夷、內蒙周惠、貴州池必卿三人贊成，上面農林水利口官員從機械化和水利化要求著眼，都反對分田），雖然 1982 ~ 1986 年胡耀邦、杜潤生等人連續搞了五個一號文件，但還是沒有說服大多數。由於‘分田幫’在黨內始終是少數，始終沒有能夠說服多數人跟隨他們推行的政策。因此，廣泛採用組織手段來保障政策實施就成為一個關鍵措施”，“據杜潤生回憶，河北省曾經被胡耀邦和他認為是‘死堵’黨內高層‘分田幫’政策的省份，為此，胡耀邦指派杜潤生去河北省省委催促分田，這一次杜潤生在省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有個講話，還向省委推薦了河北唯一的分田積極分子邢臺地委書記邢崇

智的所謂‘五統一’經驗，但是，這也沒有能夠說服人。結果，第二次胡耀邦親臨河北，在大會上當場批判河北省委，說他們‘耽擱了三年時間，要撿回來’。然後，調高揚去河北任省委書記，原書記調離。（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頁）。由於胡耀邦、杜潤生等人多次催促河北省委，並以撤職相要脅，才勉強在河北推廣了這個不得人心的（分田單幹）政策”，“杜潤生在主持分田時，非常擔心‘三五牌幹部’（五十年代參加工作、年齡五十多歲、工資五十多元的幹部）反對，因此，在對基層幹部採取組織處理手段方面，更為極端。‘分田幫’中省委書記內部僅有的三個積極分子之一的任仲夷，在遼寧採取極端手段，基本上把基層幹部一掃而光，大連郊縣某公社書記介紹說，任仲夷連公社裏頭的宣傳幹事和組織幹事都一個不放過，全部調離，更不用說公社書記、社長這個級別了；他們實際上藉著深揭狠批‘四人幫’的幌子，把所有的基層幹部都撤職”。這夥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攻擊毛主席“獨裁”的走資派，就是用如此“民主”砍掉了人民公社這面紅旗，用法西斯手段強迫全國農村分田單幹。

至今見到公開報導的僅存的人民公社全國僅兩個，但都改名為鄉；保存人民公社時的生產大隊的，全國有1000多個，同樣改名為村。但許多人仍親切地稱他們為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這兩個人民公社和1000多個生產大隊，成了中國農村真正的社會主義堅實的陣地，她們取得的任何成就都來之不易，都是在走資派層層圍堵、

排擠、壓制下取得的。都有一本可歌可泣的苦難史，印證了一句諺語：“亂世出英雄”。正是這些人民公社、生產大隊，頂住邪惡，創造了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奇跡，成了星星之火，燎原著人類社會的未來，即共產主義一定要實現，一定能實現！

人民公社所以好，這其中也包括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而復辟為資本主義分田單幹的小崗村的反襯而作出的反面貢獻。沒有分田單幹的反面教員的作用，也就襯托不出人民公社好。正是因為有小崗村分田單幹，並造謠僅單幹一年糧食畝產就增產 3.6 倍的神話，幾個昏昏然的人，才舉著這把刀子，一下砍掉了全國的人民公社這面大紅旗，並精心策劃了十八個人“冒死按‘血手印’分田單幹”這一大陰謀，大造復辟倒退的輿論。從這些年關於小崗村的大量報導，其真相可概括為：不僅分田單幹最終是垮臺了，而且垮臺後，一方面讓大城市資本家來租田種葡萄，結果是不僅失敗了，農民還沒有拿到租金，為此還告狀無門；還有一部分讓大學生去種蘑菇，每個種蘑菇的大棚，政府給於財政補貼從開始的 6500 元至目前的 5000 元，結果種蘑菇賠錢，而靠財政補貼“掙錢”混著。成片土地荒著，年青人外出打工養家糊口。這就是當前小崗村鼓吹的“土地流轉”的現狀。我斷言它照此“流轉”下去，比分田單幹失敗得更慘。分田單幹畢竟不少人還有飯吃，只是個別人暴富、不少人虧債，甚至又有打起鳳陽花鼓乞討的。另外，從大量公開報導，揭露了小崗村的問題還有：(1) 那個所謂冒死“按血手印”的領導班子，是個思想十分落後、個人主義嚴重而很不團結的

典型的軟懶散班子，甚至貪污腐敗分子混跡其中掌了權；(2) 在這前，從中央到安徽省，都有正確對待單幹戶的明文規定，而且毛主席對有關中央文件，還親自作了修改：“一小部分生產隊陷於瓦解狀態，這是農業集體化運動的一個曲折，這種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過去有，現在有，將來幾十年幾百年內，也是還會有的。只要就全國來說，只佔一小部地區、社隊和人數，也是並不可怕的，因為社會主義經濟佔了極大的優勢。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還將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可能要繼續幾十年到幾百年。”另外，在小崗村單幹前，在安徽省就有十萬戶左右單幹戶，這些足以證明：十八個人“冒死按‘血手印’”，甚至鼓吹“其中誰‘犧牲’了，其他人還負責把他的子女撫養到 18 歲獨立生活”，完全是小崗村包括那個貪污腐敗分子在內的幾個政治騙子，誣衊黨的政策，誣陷毛主席，而蓄意製造的大陰謀，對全國農村在政治經濟諸多方面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破壞作用，應予徹底清算；(3) 從揭露的材料還說明，所謂單幹一年畝產增加 3.6 倍，是假的，是典型的浮誇風；動用公款為小崗村搞“形象工程”，甚至從江蘇調來 100 多萬元人民幣，塑造假典型，欺騙人民。全黨都清楚，1958 年某些人煽起的浮誇風、一平二調“共產風”、弄虛作假造成了嚴重後果，今天這些歪風在小崗村死灰復燃，瘋狂回潮。對如此明目張膽地明知故犯，應按黨章嚴加查處，對主要責任人給予應得的處分。歷史的經驗證明，如果混淆是非，獎懲顛倒，該獎勵的反遭壓制，甚至懲罰；該懲處的反大肆讚揚；照此辦理，我們的事業必遭損失，甚

至失敗。只有獎懲分明，我們的事業才會興旺。

#### 4、背離“三面紅旗”後造成的後果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這是我們對成立人民公社和某些人強令廢除人民公社正反兩個方面應持的正確的、負責的態度。還應抱著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態度對待這個問題；對極少數蓄意破壞的另作別論。

取消了人民公社後，基本上分田單幹成了主流。毛主席曾告誡說（大意）：分田單幹，可能一時有效，但很快會兩極分化，這是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毛主席還說：“農村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鬥爭，還將繼續一個很長的時期，可能要繼續幾十年到幾百年。”事實也說明，這些年來的分田到戶單幹，不能說成一無是處，在少數山區，地廣人稀，而且人口分佈很分散，又比較落後，單幹並非不可取。但對絕大部分地區，單幹無疑是歷史的倒退，不隱瞞觀點，這是路線、方向的錯誤。那些藉口某些枝節上做對了，而為錯誤路線辯護是不可取的。其實，上述這些年一些同志揭露的小崗村的問題，基本上揭露了分田單幹的嚴重問題，因為分田單幹是以小崗村為典型而展開的，這個典型最終垮臺了，說明分田單幹被徹底否定了。它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回頭是岸”，不再分田單幹。但為避免以點蓋面，出現看問題偏面性，因此，有必要從全局剖析一下分田單幹的情況，這也更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人民公社好。真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靠哪個人封的，

而是同謬誤作比較和鬥爭中產生的。

近幾個月來，一些報刊披露了一些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資料和事例。我看了某些資料是很震驚的，藉此把它抄錄出來和同志們一道研究。以求正確解讀這些資料和事例，其中有些在我已發表的文章中談論過，只是看了這些新的資料和事例，對原來的又有了新的認識，也只好不厭重談了。

### 1) 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解放初二十多年，全國人口約增加了一倍，但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這以後的三十年的情況如何？糧食方面，分田單幹不久，就出現糧食減產，“據農業部統計 1985 年糧食產量比上年下降了 3 千萬噸。從其他部門得到的資料是下降了 5 千萬噸”。（參見美國韓丁著《大逆轉——中國的私有化 1978 至 1989》第 14 頁至 17 頁）。這就只得求助大量進口糧食。2008 年 8 月 5 日《京華時報》B 37 版報導，小標題：《國家統計局發表經濟評述、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超過 60%》，大標題：《輸入型通脹成物價高漲推手》。這就造成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糧食價格暴漲，從原來一角多一斤，漲到一元多一斤，人民幣從發行以來第一次大幅貶值。進口糧食具體情況，2009 年 1 月 20 日出版的《文化藝術報》第 5 版，標題為《足跡遍佈五大洲 30 多國 “中國海外租地種糧 210 萬公頃？”》一文說：“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最新預測，中國糧食淨進口量將由 1997 年的 416 萬噸增加到 2010 年的 976 萬噸和 2020 年的 2224 萬噸。屆時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進口糧食不如進口土地……”。文章又說：“西

西班牙一家非政府組織……發佈名為《富國屯田》的報告，其中列出中國海外屯田的規模已達 210 萬公頃”。文章最後說：“據統計，中國已經與五大洲 30 多個國家建立了農業合作關係”（註：上下文對照，所謂合作關係，指在海外租、買土地，或合作種田）。依據這些資料，為簡單起見，假設全國人口為 10 億，則 1997 年進口 416 萬噸糧食，為 41 億公斤，82 億市斤，也就是說，全國男女老幼，平均每人一年吃了 8.2 市斤進口糧，到 2010 年，則平均每年每人要吃 19.4 市斤進口糧，至 2020 年，假設人口為 15 億，則平均每年每人要吃 29 市斤多進口糧食，也就是說，全年約有一個月的口糧靠進口。對我們吃飯如此高速增長依賴進口，我想同志們定會驚訝。根據 2006 年《聯合早報》披露：20 年來中國“土地沙化年均 2540 平方公里”，“每年減少耕地 8500 萬畝”……。參照這些資料分析，中國人的口糧逐年高速依賴進口，不是聳人所聞。這也說明不發糧票，卻掩蓋了糧食日漸嚴重短缺這一事實。30 年前發糧票，反倒不僅國庫為備戰而保存著足夠全國吃三年以上的糧食，還以糧抵債，還清了抗美援朝“所欠”蘇修的債務，還支援了抗美援越。

上述另一資料：“西班牙一家非政府組織……發佈名為《富國屯田》的報告，其中列出中國海外屯田的規模已達 210 萬公頃”。本人無法證實 210 萬公頃是多報還是少報了，但在海外佔地，從全文看，這已是事實，有興趣的同志可以看報紙全文。210 萬公頃，折合 3150 萬畝（註：每畝為 665 平方米），也就是說中國平均每 10 個人在國外佔據了 0.315 畝地，種糧食來養活我們。作為一個社會主

義國家，這絕對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從這裏我才真正理解了有人為什麼在社會主義前面要加上“中國特色”四個字。但我認為，如此瞎折騰下去是很危險的！就不知道那些對發票證說三道四的人對此有何高見？

“改革開放”30多年，折騰到了由糧食自給自足到大量吃進口糧、吃轉基因糧、油。鄧小平用廢除票證，不僅掩蓋了吃的糧、油靠進口，尤其是60%油靠進口；還攻擊了“三面紅旗”票證供應。可見騙術有方，把不少人騙到了嘴裏吃了進口糧、油（和轉基因糧油），而大罵糧、油自己自足還有出口或支援兄弟國家的毛澤東時代。

## 2) 腐敗成風

農村自分田單幹後，辛辛苦苦二十多年樹立的社會主義精神風貌，被一掃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封建迷信、社會風氣敗壞、吃喝嫖賭盛行、腐敗成風。然而一些媒體還在大力宣傳精神文明建設的“偉大成績”，讓人聽了哭笑不得。在農村興建廟宇很普遍，一些人信奉泥菩薩，勝過信任共產黨，據公開報導，腐敗分子大多信奉迷信。這就怪了，挑選幹部的標準吹得叮噹響，但為什麼實際選上的不少是信迷信而不信共產黨的腐敗分子？華西村吳仁寶同志形象地批評說：“一個黨支部，頂不上一個巫婆”，概括了農村現狀。在此我補充個例子，農村老人過世，大吃大喝、鞭炮不斷、和尚老道吹拉彈唱外，還得請一班唱戲的唱時髦歌曲，有人老母親死了，還要人家唱：“妹妹你慢慢的往前走啊……”，讓你聽了啼笑皆非。賭錢是不分早晚，男女老少幹部齊上陣，“熱鬧非凡”，大大超過了舊社會的“風光”。每當村幹部換屆選舉，請客

大吃大喝已不當回事，賄選、拉選票是堂而皇之，明目張膽，早已不是新聞。歸納起來，農村腐敗已經歷三波高潮：第一波是賣社隊工廠、企業、商店……，一些人發了橫財；第二波是名為開發、實為賣土地，又一部分人發了橫財，例如上面介紹的1月20日《文化藝術報》第13版披露：標題為《遼寧驚曝貪污第一案：離婚後強取豪奪他人夫；五萬元一夜財誘男上司，女國土局長斂財過億很暴很瘋狂》，僅就看一下這個標題，就可見土地“開發”的腐敗程度，文章揭露的內容有些簡直不堪入目，何況土管部門腐敗案例已多如牛毛，大案屢見不鮮；第三波是正在進行的“土地流轉”，實質是撕掉了“土地‘開發’”這塊遮醜布，公開拍賣土地。由黨、政、公安、黑社會和房地產開發商（大多是反動官僚）勾結，強徵農民土地，強拆民房，由此造成的各類屠殺人民的傷天害理的案件，已屢見報端。例如用推土機把農民壓死或活埋等等殘忍手段已很平常，把農民迫害得集體自焚或與去強拆的犯罪分子同歸於盡，把農民逼得集體去求河神“顯靈”為民申冤，更有成群農民跪在西柏坡毛主席故居前哭訴走資派、反動官僚等的罪惡。中華大地，讓一夥走資派、反動官僚、賣國集團折騰到了民怨沸騰，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按目前農村可耕地全國性大量強賣，如北京報紙報導，北京絕大部分菜地等被賣掉開發房地產或娛樂場所等。照此下去，要不了50年，如果遇上1959至1961年類似大面積嚴重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再加上美帝封鎖我國進口糧食，如我曾在發表的文章中說過：一個窩窩頭很可能可換一平方米高檔豪華住

房。坦率講，這是保守而文明的估計。

### 3) 農村人口問題

農村的人口問題，矛盾的焦點是計劃生育。不客氣的講，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村的計劃生育政策，被吹捧為“國策”，是典型的極“左”政策，並違背了我們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說服教育為主的方針。我首先聲明，我不反對計劃生育。但堅決反對強迫命令、違法的、極“左”的計劃生育。老同志在五十年代大多都看過墨西哥電影《生的權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據我國實際情況，提倡計劃生育是深得人心的好事。但由於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強行推行了一條極“左”的計劃生育政策，嚴重干擾破壞了計劃生育的貫徹執行，並造成了嚴重後果。其具體表現是一刀切只准生一胎；用極其粗暴違背憲法的殘忍手段對生第二胎的強迫流產；以及對生了第二胎的，以拆房子、沒收糧食、豬、羊等私人家產以示懲罰。這些細節就不講了。這些極“左”政策，肯定行不通，會遭到強烈抵制。結果就採取經濟手段，即罰款。所謂罰款實質就是只要有錢就可多生，月工資拿幾十萬的，不僅可讓自己的老婆一個一個生到不能生，還可養二奶、三奶……，一道生，廣東省資本家甚至可雇傭幾個婦女“代孕”，一下生七胞胎、八胞胎，因為罰那兩個錢，對他們來說是牛背上拔一根毛；窮人多生一個，傾家蕩產還不夠，還得背一屁股債。這就把舊社會流傳的“多子、多福”，改而成了多財就多子，沒財就沒子。社會分配的兩極分化，搬進了生育上的兩極分化。但窮人不可能輸這口氣，相反為爭這口氣，變著法子也得多生。因此，極

“左”的計劃生育政策、最終必將導致生育大競賽，在農村發生生育高潮的可能性很大。這就是形“左”，而往往最後以實右告終。而且，只要去問問進城打工的年青夫婦，很多已生了三個以上，有媒體報導最多的已生了 11 個孩子。還有報導，有的反動官僚有二奶、三奶、……共 140 多個，就不知生多少孩子？這就叫，你有政策，我有對策。另外，因計劃生育而罰、抄、沒收的錢財一般不上交，也無收據，無帳可查，培植了一批腐敗分子；因為罰、抄、沒收等有“錢途”，因此其違法的手段就觸目驚心，造成惡性循環，損害的是黨的威望。

#### 4) 環境問題

人民公社被人推倒以後，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直接威脅到了人類生存的條件。許多江、湖、河、溝渠，成了污水源，甚至散發出使人噁心的臭味。以前走在鄉村，口渴時，在江南地區隨處可到溝、河邊雙手捧水解渴，許多老電影還常有這樣的鏡頭。但現在，許多溝河臭氣衝天，真要捂著鼻子加快步伐走過去，但農村用這樣的水照計水費。大家每年都能看到或聽到宣傳媒體宣傳植了多少樹，以及一些人物現場植樹的作秀鏡頭，以宣傳取得的“偉大政績”。但若坐了火車在京滬線上走一趟，除了有些路段旁或部分山區能見到森林外，廣大農村村莊、市、鎮，基本上都暴露在外，土話是光禿頭。30 年前農村是森林、竹林密佈，幾乎看不見農舍，而現在都幾乎消失了。以前農村樹上是鳥雀唱歌，田間到處蛙叫聲，還常見野兔、黃鼠狼從面前穿過，回想起來，好不嚮往。遺憾的是這些年來的瞎折騰，這些美景被糟蹋殆盡。就

連甜美的西瓜，由於濫施化肥，裏面長出了發黃變硬的塊塊莖莖，很不是味道，大跌胃口。以前我一家四口每到夏季，總要消費幾百斤西瓜，炎熱時一天消費兩個西瓜。可這些年，老兩口（兩個孩子早已獨立成家）一個夏季消費不了 20 斤西瓜，還基本上挑小型瓜買，同大西瓜基本再見了。本來我還認為是否我變修太挑剔了，但問一下我好些老戰友，結果竟是共同語言。當前發展到了有毒蔬菜、水果等屢見不鮮地流入市場造成嚴重傷亡事件。

環境破壞應引起重視的是：(1)、農田土質板結、劣化，現在江南已不精耕細作，而是粗放型，農田不深翻，麥子快收割時就撒下稻子；稻子快收割時就撒下麥子，不管稻子或麥子都不人工除草，而用化學除草劑，病蟲害靠農藥解決，原自然界的生態治病蟲害已基本消失，即便是吃蟲較多的麻雀，數量也大大減少，青蛙等快要絕種。大量靠農藥，農作物抗藥性增強，只得增強農藥毒性，造成惡性循環，並更多殺害了益蟲、益鳥。農家肥已很少用，靠濫施化肥促產量，這種耕作方式，必將使土壤板結，糲粒結構破壞乾淨，土質劣化最近有報導東北黑土地土質變劣。另外分田到戶，小農經濟在承包期內盡全力用盡土力，這些因素，都合力促使土地板結、劣化；(2)、氣候異常，嚴寒、暴雨、暴雪、酷熱、長期乾旱等異常氣候頻發，造成不可抗災害，還常造成嚴重財產、人員傷害。例如去年初的雪災、和去冬今春連續的旱災，來北京幾十年，今年（2010 年）是第一次冬季未見雪花；(3)、水土流失、沙化等，都嚴重影響農業和人類生存環境。其他如河床淤塞，人民公社興修的水利有不少遭破壞，

飲用水緊張等等就不細述了。這些年來的亂折騰，造成種種環境的破壞，不僅嚴重影響農業生產，對人的生存也造成了威脅。這 30 來年，從公佈的人均壽命已基本上停滯不前，甚至知識份子平均壽命從 30 年前的 72 歲降到目前 58 歲。同 30 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如繼續這樣瞎折騰下去，人均壽命很可能出現負增長。如果出現負增長，那就不是什麼瞎折騰，而是對人民犯罪！當然影響人均壽命的，環境是個重要因素，其他還有人受剝削迫害、精神壓抑，還有靠武裝力量處理內部矛盾等等因素。

### 5) 崇洋媚外

取消了人民公社這個國產貨以後，一時間崇洋媚外充滿祖國大地，在一些洋奴才折騰下，報紙、書刊要夾雜洋文，才顯有“水準”；商品洋品牌才吃得開；領導人出國講洋話、唱洋歌為時髦；法律要學洋法律；政黨也要學洋政黨；企事業管理要洋化；酒要喝洋的，煙要吸洋的，包括一些人掛在脖子上的那根布帶子也是洋的神氣，真洋到了洋屁也是香的，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差一點要洋到孩子也要洋人幫了生為自豪。與此同時，一些人不顧事實地攻擊 30 年前“閉關鎖國”。崇洋媚外的結果，一些洋資本家被走資派浩浩蕩蕩請了進來瞎折騰，殘酷地壓榨、剝削中國勞動人民，後果十分嚴重。在此僅以洋人在中國農村辦“企業”為例，談點所見所聞。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吃得開的是“引進外資”，也就是把洋資本家請進來辦企業事業（包括洋人獨資或與中方合資），在農村主要辦工廠。為引進外資，當時規

定誰引進了外資，可以獲得引進數額的1至3%的獎勵，背後操作的就說不清了。對縣、鄉一些政府官員定下引進多少外資的任務，完不成任務是不行的，為此也就出了不少人被譽為“能人”。引進外資額多的，那是大“紅人”，上至省領導，下至鄉、村頭頭，都會跟了他轉，這方面後來有一些電視劇作了形象的實事描述。為了引進外資，起碼是先請洋資本家吃好喝足了，吃喝風這是很重要的起因，吃到了一些珍貴動物、魚類絕了種或接近絕種，吃喝到了名牌煙酒暴漲價。還要把洋資本家招待得睡得滿意、玩得痛快，這也是產生嫖、賭、高檔“娛樂”、豪華享受的重要起因。為了引進外資創“政績”，一些官員什麼招都使得出來，包括喪權辱國，甚至在這方面比高低，比如給洋人免稅優惠，有人搞三免兩減（即三年免稅，兩年減半），有的為了競爭，私下承諾五年免稅，有的稅務部門，只要請它吃肥了，再給個“紅包”，都能“圓通”；更有甚者，給外商出點子，免稅期滿時改照牌（廠名），繼續免稅。這一折騰，擠垮了我們不少國有企業。解放初，毛主席同那幾個人在稅收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毛主席主張在稅收上扶持國企（即少收稅），限制資本主義發展；而那幾個人主張保護資本主義，最後毛主席批評了他們。因此對洋資本家的稅收優惠，勢必擠垮了國企，所以說後果十分嚴重。再就是許諾壓低工人工資，並公開宣傳中國勞動力便宜，招引洋資本家，再在這方面互相一競爭，工人工資低了還低，其他如土地白使、廠房白用，等等。這就使我們的國企不少被擠垮，但責任還強加在國企頭上：管理不善、企業“老化”……。為反

動官僚賣國企撈錢創造了條件，並欺騙了人民，更慘的是千百萬工人失業。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更是搖唇鼓舌，大肆鼓吹引進外資還可以學習人家“先進”的管理經驗，可以引進“先進技術”……。以上可見，某些人在洋資本家面前是卑躬屈膝，關懷備至。為了洋資本家“開工廠”，全國不少地方還專門興建了“經濟開發區”，還是那夥人，為了“徵用”農民的土地，而耍盡了威風，並造成了不少死人的慘劇；另一方面，培植了一大批昏官、貪官，還有不少公、檢、法官員上了賊船。對這些昏庸腐敗之事，還不讓爭論，更不讓人民反對和抵制，否則就動用警力，甚至武裝部隊鎮壓。從這個意義上講，某些腐敗官僚為保護洋資本家在我們國土上辦所謂工廠，是不惜讓我們一些階級兄弟流盡了鮮血喪了生命。這類案例已是人人皆知，就不舉例了。然而，結果如何呢？這半年來，一些省市相繼報導了一些洋工廠倒閉，甚至洋資本家捲款潛逃。例如，2009年1月20日，《文化藝術報》第12版，標題為《青島城陽：一個韓資企業老闆離開前》一文說：“在2001年到2007年間，未正常清算撤離的韓國企業就達206家……”。其中有的企業的工人達3000多，洋資本家一逃跑，大多沒有償還我們銀行貸款，沒有結清人工資，有的按約定該交房租也不交……。文中披露：這些洋資本家就是看中了免稅、工人工資低，條件舒適而來開工廠的，其中有的是免稅期滿逃跑了，有的改了幾次企業名稱，享受了幾次免稅後逃跑的。而且他們充分迎合了我們某些人希望的兩頭在外（原材料、另部件從韓國進口，產品全部出口）的需要而建的廠。從文中可見，

洋資本家利用兩頭在外的方便，高價進原材料，低價出口產品，從高價進原材料就賺足了利潤，並撈走了成本，逃跑就一身輕鬆。這就是某些人宣揚的引進外資學到的“先進管理經驗”，一逃了之。至於技術問題，已有大量文章披露，洋資本家的核心技術部分，都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加工，中國僅是它的組裝廠，你撈不到它什麼技術，尤其是電子技術，它拿來的都是加工好了的零部件，基本上是中、大型積體電路，很難仿製。相反，我們有些朋友為了討好洋資本家，把我們一些絕活，讓洋資本家任意參觀、拍攝，反被他不花分文而搞走了，甚至竊取了我們的重要機密。我們幹了“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大蠢事。當然，我並不是說引進外資一無是處，但從政治、經濟、民族尊嚴、國家安危綜合衡量，是弊大於利，得不償失，負面效應慘重。

當今有些人的崇洋還有一大特點，洋大老闆美國一不舒服打幾個“噴嚏”，就忙壞了許多國家去送“醫”送“藥”，並不時間長短，端“茶”送“湯”，“皇帝不急，反急死了太監”。聽朋友說：元旦前後，美國在一些地方每人發 600 美元，讓歡度新年；不僅如此，還兩美元就能買一件毛衣。我想，美國資本家決不會打了兩個“噴嚏”，能打出個菩薩心腸。兩美元買件毛衣，折合人民幣 13 元多。再一想，美國資本家聰明，打幾個“噴嚏”，就不少人掏腰包去慰問，一掏就是幾百、幾千萬美元，因此給一些地方每人發 600 美元不多。再一想，是不是美國資本家又用一架飛機，到哪兒去換了 8 億件毛衣，要是這樣，每件毛衣賣 50 美分也是大賺了一筆。總之，美國資本家

幹賠本的買賣決不可能，甘願賠本的是那些崇洋的美國人的夥計。而且，中國就有前面講的“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崇洋者。

崇洋造成了前述“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超過60%”，“60%的糧油依靠進口”。並使近十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形成了投資依賴和出口依賴，但與此同時，消費率卻不斷下滑，這使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程度擴大，抗擊外部風險的能力減弱”（參見2009年1月20日《作家文摘》報第1版）；還造成“勞動生產率快速提高，幾乎是1980年的8倍，但人均創造的價值（高速下滑）不到那時的1/6”（參見2009年2月13日《文化藝術報》第2版）。這些，導致人的健康狀況下降：“男性開始衰老的年齡，由八十年代的60歲以上，下降為40歲左右，（快速下降了20歲）”（參見前述《文化藝術報》第16版）。證明我在發表的好幾篇文章都擔心如此亂折騰，人均壽命將可能縮短，這將是災難性的後果。現在看來，這種擔心不一定是杞人憂天。說明主動權掌握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手裏，我們成了僅掙了口飯錢的國際打工仔，以及高價進口而廉價出口資本主義緊缺的資源，這是典型的出賣民族利益的交易。為維持這種殖民性質買賣，美帝金融危機一來，還得把我們掙的少得可憐的打工工線，花幾千億美元去買美國的債券，錢又回到了美帝的口袋，讓美國發一筆錢給美國老百姓，並大幅降低物價，以穩定人心。可見，全球一體化市場經濟“大家庭”，奉行的是弱肉強食，而決不是走資派和賣國集團鼓吹的“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的“雙贏”。

一些崇洋人物，由於其階級立場，無視客觀現實，決定了他們思維邏輯混亂。例如，由於毛主席為中華民族建樹了旁人無可替代的豐功偉績，廣大人民自覺擁戴他、尊敬他，並以中華民族傳統的形式和語言表達對毛主席的祝願，這本來是無可指責的。然而，崇洋人物不顧事實的誣衊毛主席搞“個人崇拜”。但是，那個到處侵略、殺人、放火的美帝國主義，折騰到了侵略戰爭不斷，世界無寧日，而崇洋派卻要拜倒他腳下，左一個“先進”、右一個“自由、平等、民主”，並稱兄道弟什麼“夥伴”，拼了命要同他“接軌”，甚至把子孫後代、黃金錢財都寄存在美國才算稱心如意。竟寧肯如此五體投地的崇拜美帝，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別有用心。但你怎麼崇拜他，他還不尿你那一套，美帝亡我之心決不會死，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甚至以炸我使館、撞我飛機，對我作了公開的火力偵察。有報導美帝總統奧巴馬說，如果讓中國人都過上好日子，世界就麻煩了。因此，我倒奉勸崇洋的先生們，再不懸崖勒馬，很可能跌入漢奸的泥坑不能自拔；人民決不會容忍再出汪精衛式的人物。

背離了“三面紅旗”，最嚴重的後果是飛船上天，而紅旗落地，並造成信仰危機、道德淪喪。什麼傷天害理的事都不斷發生、蔓延。這已不用細述，而是誰都清楚的現實。這 30 年來，再沒有聽到一個人說中國現在還有什麼紅旗可言，這也說明，誰都默認了紅旗落地的這一事實。紅旗在中國是落地了，但不僅千百萬中國人民還惦念著紅旗，最終必將把她再舉起來，並舉得更高！而且全世界無產階級還繼續高高舉著，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像雨後

春筍般在許多國家興起，並相繼奪取了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古巴領導人，在中國領導人面前，面對中國留學生，用華語高唱《東方紅》歌曲，我們許多同志看了這些鏡頭，被感動得掉下了崇敬的熱淚。與此相對應的是，美帝總統布什訪問伊拉克，挨了新聞記者砸去的兩隻皮鞋，還有人願出上千萬美元，買下這兩隻皮鞋，可能是作為砸爛美帝修反的珍品以作紀念，說明美帝已到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窮途末路。而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嚮往，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路線會回來的，人民公社這面光輝紅旗，終將在祖國上空高高飄揚！並永遠銘記在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冊！還會有高超的藝術家，塑造一個秦檜式的人物，永遠跪拜在人民公社這面紅旗的面前，教育子孫後代，不忘階級鬥爭！高舉人民公社旗幟前進！

## 八、徹底批判“決議”

鄧小平篡權後，一九八一年六月，他一手操控下炮製的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以下稱“決議”），是一篇反馬列主義、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必須進行徹底批判。這 30 年，由於在“決議”的框架內而制定的內政、外交政策，造成了黨變修、國變色，飛船上天而紅旗落地，以及極端腐敗的現實，足以證明“決議”的反動性。

## 1、“決議”背叛了馬克思歷史唯物論

“決議”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衆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衆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

“決議”說：“（毛主席）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

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我國國民經濟雖然……，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籼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

“決議”一方面說：“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但“決議”又講了毛主席領導的 32 年在內政外交取得的偉大成就（註：其中大多在“文革”時期），這些成就的取得又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成就和成功經驗是黨和人民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

優越性的表現，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前進的基礎”。這一結論，準確無誤地否定了“決議”中“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這一謬論。

前面介紹的“決議”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衆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關於毛主席的這段英明論述，鄧小平自己選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同志就作出了明確的答案：“根據中央的考察、調研，不能說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級黨委已經變質，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黨政一把手是不稱職、不合格的”。還有：2008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通過視頻向全世界所播放的關於“政令難出中南海”。加上當今民間諺語：“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發文件，一級一級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這不正最有力的證明，毛主席從1956年後，憑親歷、親見黨內存在嚴重的走資復辟反動勢力的估計，非常準確、客觀，無任何偏見。

“決議”說：“‘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上

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關於黨內有沒有走資派、有沒有資產階級司令部？前面已作為專題作了論述。結論是肯定的。

僅就以上這些重要問題，已足以說明“決議”中這些論點，都出於鄧小平一人之口，而且都涉及他本人的利害關係。他不是以客觀存在為依據，而是以個人得失為準繩，判斷事物的是與非。而且，“決議”本身就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決議”背叛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成了鄧小平主觀唯心論的產物。“決議”中許多內容，更突出暴露了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有利自己的就拔高為“馬列主義”，不利自己的就貶為“反馬列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內容之一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決議”對從農村合作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十多年共產黨的三大革命運動的評判，都是以個別人的主觀意志、甚至是出於個人好、惡，作為判定事物的標準。例如鄧小平最討厭、最反對說黨內有走資派，因為這同他個人利害關係特別相關。因此他不僅沒有尊重事實，改造自己，反而用“永不翻案”假檢討，欺騙黨和人民。當他陰謀篡權後，無視客觀存在，以個人的權勢，用主觀唯心論，否定黨內有走資派，為個人翻案。前面一再提到的黨內有沒有走資派、有沒有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在前面已作了詳細論述，不再重複。無數事例，充分證明黨內不僅有走資派，雖人不多，且勢力強大，以至（1976年10月6日）一舉走資派政變成功，高速復辟了封、資、修大雜

燴的資本主義，並成了帝國主義半殖民地。從此，一夥走資派，進一步蛻化為叛黨集團。

毛主席從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在國際共運史上第一個發現並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主席這一論斷，極大地豐富了馬列主義的理論寶庫，對未來無產階級革命有十分重大的指導意義。尤其是這30年走資派的充分表演，使好端端的一個社會主義中國，讓一夥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派糟蹋成腐敗不堪、對內血腥鎮壓人民、對外投降賣國。勞動人民又吃二遍苦、又受二茬罪。更進一步證明：毛主席這一理論的正確、偉大。

然而，鄧小平在回答美國華萊士提問他每天工作幾小時說：“每天工作兩小時。”（參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紀實》第2018頁）李先念說：“我沒有什麼好講的。現在趙紫陽搞資本主義，鄧小平打橋牌，我還有什麼好講的。幾天前我去見鄧小平，我講話他在牌桌上，頭都不回，我慎重地說：小平同志，我是來向你彙報工作的！他才轉過身來，這樣我還有什麼好講呢？”（參見東西文化事業公司出版社《鄧小平最後歲月》第22頁）“鄧小平是鬼書武俠愛好者，鄧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註：參見2008年11月28日《文化藝術報》第2版）另外，鄧小平在自我檢討材料中也承認，在戰爭年代，在戰鬥緊要關頭託辭跑掉了。一個不好好上班而泡在牌桌上、不讀馬列的書而讀鬼書、打仗逃跑的鄧小平，竟自稱懂得馬列ABC而妄談馬列，妄圖同毛主席

比高低。世上還真有如此不知廉恥的嗎？黃克誠同志說得好：“如果有人硬要說任何別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勞更大，那就只能是對歷史開玩笑！”黃克誠同志 1980 年 11 月 27 日發表的《關於對毛主席的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高度評價毛主席，儘管其中對“文革”的表述本人不認同外，但文章的中心內容是客觀、公正的。他當時發表這篇文章和講話，誰都明白是針對鄧小平和鄧小平炮製的“決議”貶低毛主席，為自己翻案、大樹特樹自己而發表的。可以說是鄧小平篡權後，黨內第一篇最有分量的討鄧檄文，在黨內外、國內外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在後來出版的黃克誠同志的這篇文章中，上面引用的這段話，被文痞刪掉了。鄧小平用主觀唯心論，否定毛主席的歷史唯物論這一事實，再次證明：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這一偉大真理，同馬列主義的任何理論一樣，都會遭到鄧小平這類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者的頑強反對。從而真理將更加偉大，修正主義更加醜惡，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黃克誠同志在文中以杜甫的詩“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告誡鄧小平一夥輕薄地評論毛主席，結果只能是自己身敗名裂，而無損毛主席半根毫毛。

## 2、否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鬥爭

承認不承認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存在階級、階級

矛盾、階級鬥爭，是真、假馬列主義的試金石。這也是鑒別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比較直觀的方法。“決議”鼓吹：“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是抓階級鬥爭、而是發展生產力”。這裏的“主要任務”，實質是唯一任務，階級鬥爭沒有了。自“決議”公佈至今，不僅從實踐到各類宣傳，階級鬥爭不見了，且成了走資派攻擊毛主席“極左”的靶子。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可以概括地說，就是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學說。人類的整個活動，包括兩大部分：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構成生產力；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稱生產關係。整個人類歷史，生產力始終不斷向前發展；而生產關係基本上阻礙生產力發展，只有當新生的革命力量，推翻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落後的反動的力量後，出現了新的生產關係，這之後一較短歷史時期較適應生產力發展，甚至對生產力發展有推動作用。但很快新的生產關係又變成阻礙生產力發展，而後再有更新的進步力量革命……。這一由新的剝削統治階級代替舊的剝削統治階級，這樣周而復始，這就是我們幾十年來經常見到的“週期律”的全部內容。馬列主義認為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才能、應該能防止這個“週期律”，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即生產關係，促其始終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不阻礙生產力發展，處理得好還對生產力發展有促進作用，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即避免“週期律”的

重演。所以，《共產黨宣言》、《國際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都一致強調無產階級要為消滅剝削和壓迫而鬥爭。說白了，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目的，主要就是調節生產關係，防止重蹈歷史“週期律”。“決議”說，經過土改、對工商業等社會主義改造，階級不存在了。但是“決議”不承認這些人還在，心不死；更有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混進黨內的走資派、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等等，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滋生資產階級的土壤還存在。誰勝誰負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然而“決議”胡謔合作化等違背“八大”路線所確定的，“落後的生產力同先進的生產關係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否定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否定階級的存在。這是赤裸裸的反馬列主義的修正主義謬論。

鄧小平的所謂“八大”路線，即指1956年9月，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是抓階級鬥爭，而是發展生產力”。

本人翻閱了有關一些資料，發表了《評鄧小平“恢復八大路線”》的文章。經查實，“八大”政治報告決議中上述這段文字，是臨開會前約40分鐘，劉少奇、鄧小平未經大會主席團審議，亦未經毛主席審閱，而私自塞進去的私貨。然而，起草該“八大決議”的胡喬木，在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

史問題的決議》時，為迎合鄧小平，而編造了“八大”決議經過了毛主席“審閱同意”的謊言，掩蓋了劉、鄧塞進的私貨這一歷史真相。謊言編造得十分離奇：“胡喬木說：這個問題是陳伯達提出的，陳伯達找了康生，這時大會快閉幕了。他們商量了一個修改的意見，把我找去。陳伯達搬出列寧的《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這篇文章的一些話作為依據，說明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然後我和陳伯達兩人去找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給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後，同意了。他說，好，趕快去印”。40分鐘內，不僅找了兩位領導審閱，康生還拿出了修改意見，毛主席還“琢磨了半天”，再列印出來，再送到離中南海約數公里的政協禮堂，在大會上宣讀。40分鐘內幹這麼多事，而且轉這麼大圈子。不僅僅從有限的40分鐘幹這麼多事，幾近神話，無法解釋，太不合情理。而且一個職業為最高層當秘書出身的胡喬木對如此大事，竟拿不出毛主席、康生閱後談話記錄或親筆批示；還無任何旁證，似乎毛主席、康生都孤獨而居身旁無一人，合邏輯嗎？

陳伯達：“這一句話，在決議的歷次修改稿上都沒有，9月27日凌晨大會主席團常委會通過的稿子上也沒有，那是在大會閉幕式開會前臨時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澤東看過，就印發大會了”。（原文註：根據檔案記載，毛澤東於27日下午1時10分至1時50分在中南海游泳池。陳伯達和胡喬木就是在這個時候將修改後的決議稿送給毛澤東審閱的。這時離大會閉幕式開會只有一小時（註：僅40分鐘）。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

說：“我記得，大概是（八大閉幕）兩個星期以後，毛主席對這個問題提出懷疑。他說列寧講的是亞洲與歐洲比較，你們講的是自己與自己比。陳伯達向我們傳達過毛主席講的這個意思。”（參見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上冊第 537 頁）

1967 年 11 月 5 日，毛主席說：“劉、鄧互相合作，‘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徵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參見遠方出版社《高層政壇恩怨》第 28 頁）

從上可見，鄧小平高舉了好多年“八大路線”，直至他兩腿一伸去見了赫魯曉夫，事實上是他和劉少奇塞進的違反“八大路線”的私貨。

從理論上，人類歷史上至今沒有出現過先進的生產關係，先進到了讓生產力趕不上的程度。劉、鄧在 1958 年大躍進也只是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口號，搞以縣為單位的全民所有制大公社，但很快就被毛主席、中央否定了。何況劉、鄧這些冒進還是 1956 年“八大”以後兩年的事，同“八大”政治報告決議毫不相干。

1956 年召開“八大”時，當時的社會背景是，農村搞初級社，即中央推廣山西省農業合作化的成功經驗。所謂初級社，即農民自願組織起來，土地、大型農具、耕畜入股參加分紅（佔分紅百分之幾的比例），主要按勞動工分多寡分紅。既體現多勞多得按勞取酬的原則，又照顧了入股的土地、農具、耕畜等獲得一定報酬。農村這一新型生產關係，儘管中華民族自有階級社會以來，是一新鮮事物；但充其量僅比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實

行耕者有其田，略進了一步，何談先進的生產關係、落後的生產力。這是無中生有，客觀不存在的事。

如果再看看鄧小平篡權後貫徹他創造的“八大路線”的情況。

在農村以安徽小崗村為“典型”，解散人民公社而分田到戶單幹，不到5年，小崗村兩極分化十分嚴重，那個叫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分田單幹的積極分子、原生產隊幹部，貪污10來萬元人民幣，發家致富；大多農戶欠了債，少數又打起鳳陽花鼓討飯。即便從省內、外無償調進約2000多萬人民幣，平均每戶約100多萬，如此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雖已遠超過劉、鄧在1958年大躍進飈的“共產風”，但並沒有能挽救小崗村分田單幹以失敗告終的命運。

又如鄧小平樹造的廣東深圳特區這個城鎮反面典型，大量文章揭露了從全國各地、各行各業一平二調“共產風”製造的這個典型，就是當前充分暴露的深圳富士康公司那種反動官僚獨霸一方的最腐敗、反動的場所。任從容同志在《陳雲、薄一波等中顧委老幹部有先見之明》中說：“就在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以後，中央下發了一個有損顧委形象的文件，傳達到基層黨組織，內容大意是：中央組織了顧問委員會成員到深圳特區去參觀，以展示改革開放偉大成就，沒想適得其反，這些人參觀後回到北京，在討論會上許多人放聲痛哭，資本家在深圳都神氣起來，成為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資本主義已經在深圳復辟了，一推廣，全國以後都會成為這個樣子，我們幾十年的流血奮鬥，換來的就是這樣的社會嗎？他們的言論受到鄧

小平的痛批，‘政權不還是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嗎，公有制經濟不還佔主體地位嗎。’‘於是決定撤銷顧問委員會，叫你發牢騷都沒地方發。’事實是，委員們看深圳復辟了資本主義的殘酷現實，氣憤難消，怕他們在顧問的位置上，把深圳的反動、腐敗公諸于衆，鄧撤銷了中顧委。而並非是官方所說，中央是應顧問委員們的要求於 1992 年解散了顧問委員會。發生在深圳這些血淋淋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鄧小平的“八大路線”的反動性，而且證明了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不僅存在，還十分尖銳。

與這些相對照的是，頂住了“決議”和分田單幹妖風的河南南街村、江蘇華西村等，堅持了人民公社走集體經濟的道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南街村，至今幾十年如一日，高唱東方紅，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明燈，真正做到了老有所養，少有所學，人們富裕、幸福，找不到那些分田單幹的地方常發生的那些腐敗、墮落、吃喝嫖賭、黑社會等問題。正如華西村吳仁寶同志所說：在分田單幹的地方，“一個黨支部，頂不上一個巫婆”。所以我曾經發表文章說：鄧小平分田單幹對農村社會主義革命造成的損失，在 50 年內，趕不上當今南街村、華西村的水準，何況差距還在繼續擴大。總裝備部有的領導稱：國防科技落後西方國家 50 年。我說農村被鄧小平亂折騰，起碼倒退了 50 年。

可見，鄧小平以不經“八大”主席團討論通過、不經毛主席審閱，而塞進私貨：“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

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已不再是抓階級鬥爭、而是發展生產力”。而作為否定“文革”以及1956至1976年毛主席去世整個這段歷史的路線，而成了“決議”及其後鄧小平們高舉的所謂八大路線。不僅在哲學上是反馬列主義的主觀唯心論，而且叛賣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偉大理論。同時鄧小平自己的實踐，更證明了他的“八大路線”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 3、“決議”邏輯混亂、自相矛盾百出

“決議”，即便是文字表述上，也是邏輯混亂、自相矛盾百出。所以，有的同志就用“決議”內的一些話，就可以批判、否定“決議”的幾乎全部的論點。這些同志用“決議”之矛，射“決議”之盾的幾篇好文章發表後，只見許多同志表示贊許，而沒有看到一個人能予反駁的。這說明“決議”邏輯混亂到了何等地步。前面已列舉了用“決議”批判“決議”的兩個例子，現再舉一例：“決議”把“文革”說成一無是處，即全盤否定。但鄧小平又不只一次承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是為了反修、防修。這就說明“文革”的方向是正確的，即便說“文革”出了多少問題，但也僅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又如“決議”又說“文革”在內政、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又要把“文革”說成一無是處的一場“內亂”。通篇的邏輯混亂，決不是文字表述或水準問題。鄧小平網羅來按他意圖執筆

的是黨內“最權威”的文人胡喬木之輩。其所以搞成了通篇邏輯混亂的如此劣作，主要是手中無真理，而要乞求主觀唯心編造出“理論”來否定推翻不倒的真理。其結果就只能是邏輯混亂，不用批駁，它自身就把它批倒、批臭了。這也是這30年來，一些走資派、文痞們克服不了的通病。

#### 4、“決議”踐踏了黨的組織原則

“決議”全盤否定“文革”的主要論點，幾乎都出自鄧小平一人之口。而這些論點，都是毛主席在世時，中央對劉、鄧所作結論。例如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等。而對這些結論，鄧小平曾一再“檢討”並一再表示“永不翻案”。然而，對這些已作結論並得到了鄧小平承認了的東西，按黨章規定，鄧小平有權提出復議、復查，但也必須說明為什麼要推翻自己原來承認並一再作了檢討的問題。至今沒有看到鄧小平有這方面的說明。再則，不僅共產黨，即便封建王朝，也有當事人的回避制度，包括與當事人的事件有牽連的人都該回避。而鄧小平不僅沒有回避，反而超越許可權，自己操控下作出名義是“中央”關於若干問題“決議”，實為自己翻案。這是嚴重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的。僅就這一點，不僅“決議”是無效的，而應追究主要責任人的責任。否則，不足以教育包括主要責任人在內的廣大黨員。我這個意見，不僅在媒體公開發表了，還在一定範圍多次徵求意見，大家都一致表示贊同，還有長時間全體鼓掌表示支持的。可見，非法

通過“決議”，是我們黨的恥辱。作為全黨行動的“準則”，更是荒唐。

鄧小平自己偽造的“八大路線”後，相繼提出了被一些高級知識份子概括為：“一塊石頭”、“兩隻貓”、“三條魚”、“四隻雞”，即所謂鄧小平理論，這本身就是諷刺。一個號稱幾千萬黨員的執政黨、一個十多億人民的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竟能如此可笑的把所謂這些鄧小平理論作為建設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理論”，指鹿為馬到了如此極端昏庸的地步。結果不僅“四個現代化”不見了影子，社會真正倒退了幾十年。但還不甘心，而提出了“不爭論”，“不問姓資姓社”，公開同他們自己制定的黨章、憲法唱對臺戲。唱到了賣光國企、賣土地，甚至賣人。誰要不贊同“不爭論”、“不無條件同中央保持一致”，就用30萬軍隊，坦克、大炮開到天安門廣場武裝鎮壓血流成河。鄧小平的“八大路線”、“鄧小平理論”，就這樣折騰到了幾千萬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失業，人民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死了也火葬不起。而一小撮反動官僚資本家，靠權錢交易等不法手段，暴富為幾百億家產的反動資本家；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決議”對“文革”的全盤否定，還掩蓋了鄧小平一夥早在1964年就成立了中央以彭真為首的“文革小組”。如果不是毛主席健在，按劉、鄧的路線搞文革，不僅如前面介紹的他們搞的50多天的文化復辟運動，在26所高校就把一萬多師生打成“右派”、“反革命”。在他們篡權後的“後文革”，遭他們迫害的幹部、群衆肯定達千萬以

上。而且，在《5·16通知》發佈後僅七天，劉少奇就召開批鬥朱老總的會。這夥人轉移鬥爭目標真到了機關算盡。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幹將們在“文革”初期製造的青海大屠殺、湖南道縣大屠殺案、武漢大屠殺案等等，用籬筐把羅瑞卿同志抬出來批鬥，整死了工辦趙爾陸同志，還唆使一些爪牙要把北京軍區司令楊勇同志燒、燒焦，更慘重的是他們在1982年開始的嚴打運動（註：這是鄧小平清理“文革”“殘餘”的運動），把馬路上撒尿、公園談戀愛的20來歲的小青年，定為“流氓罪”判處死刑，有人揭發整個運動重判、屠殺了550多萬人。更惡劣的是哪個公安機關亂抓亂編造罪行造成被錯殺害的人多，還評功論獎。另外，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幹將還縱容子女綑架老幹部等暴行。尤其是胡耀邦揭露的鄧小平為掩蓋自己策動了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反革暴亂，暗殺了20多名知道內情的科、處級公安幹部，殺人滅口。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喪心病狂地迫害老幹部，殘酷鎮壓各級幹部和群衆，累計在數千萬之衆。但鄧小平採取以攻為守的反革命策略，全盤否定“文革”，緊接著為走資派、“四類分子”平反、摘帽。掩蓋了他們殘酷迫害幹部和群衆的罪惡。手段的惡劣，證明其目的的卑鄙。

“決議”對黨的腐蝕、對社會主義的破壞、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瘋狂的歪曲和篡改，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蘇聯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最終讓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變修、瓦解。而鄧小平的“決議”，已被證明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還“秘密報告”，共產黨腐敗變修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鐵證。因此，

無產階級不徹底批判和肅清“決議”的流毒，將貽害無窮。帝國主義和各種反華勢力、賣國集團裏應外合破壞中國的現實，亡黨、亡國已不再是杞人憂天。

## 九、1976年10月6日右派武裝政變

1976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策劃武裝綁架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同志。接著當天深夜至7日上午，汪東興又以武力保駕在葉劍英家中的政治局會議“順利召開”。當時汪東興說：“只要採取了措施，政治局會議上可以讓大家表態，誰反對就把他抓起來，到了這個時候再不能有任何手軟的表示了。”（參見內蒙古人民出版社《汪東興傳》第186頁）。葉劍英也說：“下面的任務就是清除他們的黨羽，誰敢公開反對中央的決定，統統把他們抓起來，這時才要顯示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呢。”（參見《汪東興傳》第191頁）。在黨內、黨外、全國上下用恐怖政策掩蓋他們武裝政變篡黨奪權的大陰謀，只准按他們統一的口徑高喊：“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違背了這個統一口徑，講了真話的，下場十分悲慘。七機部在“文革”時期一直堅持打倒王秉璋、炮轟聶榮臻的舒龍山同志，儘管毛主席批示：“（舒龍山）是9·16左派”。但講了幾句心裏話而被逮捕判了16年徒刑（刑滿出獄不久就去世了），全國遭逮捕、判刑的決不是少數。這在近百多年史上，所有政黨（包括資產階級政黨）用法西斯暴力“統一意志”是前所未

有的。直到這夥陰謀家篡權後，分贓不均，產生如鄧小平說的“內訌”，他們內部勾心鬥角，互相指責對方右派政變，這一消息逐步在一些書、刊、小報上公開後，武裝右派政變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才公開了出來。所以，要正確判斷這次右派武裝政變，就需要瞭解他們分贓不均內訌時互相爭鬥的情況，現摘其中幾段內容如下。

華國鋒、葉劍英綁架“四人幫”表面上的一致，其實目的各異，一場爭權奪利分贓的爭奪戰在所難免。

因為，綁架“四人幫”的武裝是汪東興一手佈置和控制的。因此，後來汪東興認為，政治局會議“順利通過”他們綁架“四人幫”這一既成事實，並使華國鋒當上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主席，成了“英明領袖”，就有足夠的“資本”同葉、鄧、聶“軍派”抗爭；以至直言不違對葉劍英講：“葉帥呀，你要想想，我們一舉粉碎‘四人幫’可不是為了一個鄧小平呀，我們當初決定同‘四人幫’鬥爭的時候，是冒著多大的風險呀。”（參見《汪東興傳》219頁至220頁）。

汪東興顯然只知道華國鋒和他主動爭取葉劍英支持的一面，而不知道葉劍英早有行動。

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講：“抓‘四人幫’是順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和毛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可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

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師東兵訪問陳永貴談話記錄）。

聶榮臻對葉劍英說：“看起來事情是有些棘手，恐怕用正常手段解決是不行了……，主席的時間不會太久了”；“兩位老帥之間秘密進行這種‘燕山夜話’，繼續過好多次……，深入探討對付‘四人幫’的良策。西山與其說是他們的‘避難所’，不如說是醞釀處置‘四人幫’的行動陣地更為確切”。（參見時事出版社《新中央機密》第254頁）。

早在1976年7月，唐山發生強烈地震期間，幾十萬中華兒女慘遭不幸，全國上下都積極支援唐山倖存的同胞抗震救災。在這期間，“聶榮臻……等，從山上下山看望葉帥的人接踵而至。來人多半是藉口問候地震後的老帥平安，實際上是來探聽‘風聲’，擺‘龍門陣’，明裏暗裏提出對付‘四人幫’的各種建議的。葉劍英總是同每個同志親切交談，在不洩漏天機的情況下，婉轉地回答各種問題，儘量滿足‘客人’的要求。”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葉劍英給人講了一個故事：“諸葛亮《後出師表》中有六個‘臣之未解’的問題，立論精闢，很發人深省……。（諸葛亮）到六出祁山時，司馬懿打聽到他的飲食起居，知道他吃得很少，就採取‘蘑菇戰術’，避而不戰，等待他死了。”（以上參見時事出版社《新中央機密》第264至266頁）。

鄧小平和葉劍英商討對付毛遠新當毛主席聯絡員問題時，談到毛主席的病情，葉劍英說：“司令（指毛主席）雖然病入膏肓，但是他的智力驚人，絲毫沒有頭腦糊塗

的表示。我聽汪東興講：司令的‘身體除了氣管炎外，很難看出什麼其他的病症。’他對自己的身體保密得很嚴實，凡是給他看過病的醫生一律被告知，不得和任何人透露出他的病情。而且他還有一個特點，給他看病的人都是各看各的，不讓全面的檢查身體。這樣一來，誰也不能準確地掌握他身體方面的全部資料。我很難判斷他究竟還能活多久。”（參見《汪東興傳》第163頁）。

毛主席去世，我們黨和中華民族，為失去這位有史以來唯一為勞苦大眾作主的偉大領袖，舉國上下在萬分沉痛中，工、農、兵、學各界代表，到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遺容時，都呼喊著毛主席呀！而泣不成聲，有的極度悲痛得昏倒在地（這些，都是本人為毛主席守靈時親見、親聞）。而在這同時，“葉劍英從毛主席病重時開始，就主動接近華國鋒，從各方瞭解和幫助華國鋒。毛主席逝世後，葉劍英在參與繁雜的治喪後事中，在與‘四人幫’的緊張周旋中，一次又一次地與他們（指華國鐸）交談。”

“毛主席弔唁儀式的第二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弔唁和守靈。中間休息的時候，葉劍英到了福建廳，一見到東興就說：‘今天我來看看你，想來聽聽你對形勢的看法’。又關切地說：‘主席走後，你是日夜操勞，沒有很好休息過，可不能把身體搞垮喲！很多事情還等著我們辦’……”，“9月15日，在京的外國友人以及外國專家，同首都群衆一起瞻仰毛主席遺容，黨和國家領導人也在毛主席遺體旁守靈，並在弔唁大廳分別接見了前來弔唁的各國朋友。會見外賓後，葉劍英約汪東興由弔唁的大廳，來到東大廳南側的一間辦公室裏，又開始交談……。

汪東興堅定地說：‘江青一夥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黨中央同他們的鬥爭是勢不兩立的’。葉劍英表示贊同：‘他們背離黨中央，背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陰謀詭計，搞分裂，我們如果不採取措施，中國革命就會遭到挫折，甚至倒退失敗……。’”

（以上參見《新中央機密》第 282 頁至 289 頁）

但汪東興現在竟到他面前來擺功，因此，葉劍英反問道：“你的意思是說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我們都沒有出力是不是？不錯，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你和華主席是立了大功的，但是其他的同志也不是沒有出力嘛。我就別說了，其他同志是準備要動手的，如果不是華主席要動手，其他的軍隊的幹部就要動手了嘛。還有你口口聲聲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實際上為粉碎‘四人幫’是作了前期準備的。這一點，我們都要全面分析和加以總結。不然，忽視了群衆的力量，輕視了其他政治勢力的作用，過分誇大自己的力量和作用，是會犯嚴重的政治錯誤的。”（參見《汪東興傳》第 220 頁）。

就在這天晚上，吳德給汪東興送來一封“群衆”來信：“汪東興先生：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小人，你以為你的位置已經穩固了，頭腦已經發熱了是不是？所以，我們今天就想給你降降高溫。在 1976 年 4 月人民群衆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時候，你親自和華國鋒策劃鎮壓了人民群衆，你在毛主席面前說假話、告黑狀，污衊革命群衆是‘反革命’，那時你的政治立場和‘四人幫’沒有什麼兩樣。鑑於你在粉碎‘四人幫’中還有良知，我們一直對你保存有希望。但是，在人民群衆和大批的老革命家提出為

鄧小平同志平反和為天安門事件討個公道的時候，你卻跳出來放肆地攻擊鄧小平同志。攻擊天安門事件英雄們，你的頭腦再一次表現出瘋狂症。汪東興先生，你知道人民在你背後叫你什麼嗎？叫你是太監頭子！你在我們偉大領袖在世的時候，扮演了一個什麼角色？人民當然不會忘記，現在你把當年在毛主席面前的表演，又拿到華國鋒面前來了，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諷刺！華國鋒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所以被你的花言巧語迷住了，其實他只要稍微地想一想，他就能知道你是一個最危險的定時炸彈。你能在毛主席逝世後毀掉了你恩人的全家，到時候你還不能毀掉華國鋒嗎？你能欺騙了一個人，但是你騙不了對你非常瞭解的中央的老同志，包括當年培養你的首長和同志。我們希望你在關鍵的時刻再不要忘乎所以了，還是老老實實地和人民站在一起，這樣可以保持你的晚節。”寫信人署名：降高溫。”（參見《汪東興傳》第 221 頁至 222 頁）。

經過一系列殘酷的鬥爭，汪東興等被趕下臺，然後華國鋒被鄧小平徹底制服，交出權力，鄧小平、葉劍英大獲全勝。勝利者之間的矛盾開始顯現，互相間指責對方是右派政變。

關於綁架江青同志的問題，萬里同志說：“那一年我到廣東視察，就有一些當事人向我聊起 1976 年 10 月 6 日的一些事情，印證了我以前的一些道聽途說，這一事件的內幕，我們的老百姓在去年的一份南方報紙上看到。在處理‘四人幫’過程中，黨的秘密情報機關起到了特殊作用，難以說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帥要利

用自己的親屬與情報機關作溝通打招呼。這一事實被隱瞞了整整三十二年。誰承擔這種隱瞞的責任？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周總理在建國之初就告誡過李克農同志，情報機關不要捲入黨內鬥爭，他的告誡防止了我們黨內的那些不規範行為了嗎？六十年了，執政黨即使不方便向老百姓說清楚，至少也應該先向幾千萬黨內同志講清楚，在讚揚那些為國家進入新局面作出了特殊貢獻的人的同時，也應該明確地否定他們所使用的手段，這才符合基本的政治倫理。”坦率講，這場武裝綁架江青同志的陰謀活動，萬里同志是既得利益者，他當上了人大委員長。對萬里的講話，個別詞句不能認同，但對整個事件揭露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明瞭，並站在黨性的立場，譴責非法綁架江青同志等的陰謀和非法性，堅持了黨的原則，我深表欽佩！我們看到的不少得益於那次事件的人，以個人得失為標準，講了不少歪話；甚至有些人，因“文革”期受了點衝擊，對如此嚴肅的問題，失去了黨性原則，也跟著“糊塗”起來。我在發表的文章中，公開了我的態度：在我們黨內，如果一個黨員，認為另一個黨員是“壞蛋”，在沒有殺人、放火等現行的非常情況，就把一個黨員武裝綁架起來，如果認為這種行為合法，那我們的黨就亂套了。另外，關於鄧小平強制推廣小崗村分田單幹，萬里等同志揭露：“省委書記中間只有遼寧任仲夷、內蒙周惠、貴州池必卿三人贊成，上面農林水利口……都反對分田（單幹）”（註：參見《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變革重大決策紀實》）。

我還得重複一句，萬里同志，對我們黨內近 30 年發生的最為嚴重的三起違紀、違法事件：武裝綁架江青等同志的問題，對 6·4 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他主張平反；尤其對鄧小平推行萬里同志自己支持的小崗村分田單幹問題的揭露。能立黨為公，揭露事實真相，並作出公正、客觀的表態，值得欽佩！對那些受益於這三大事件而至今還在講歪理的人，也是很好的教育。

## 第四章 “文革”的主要教訓

由於文革是國際無產階級革命中的一件大事，其深遠意義不亞于蘇聯十月革命。這是中國無產階級留給世界無產階級一筆十分珍貴的遺產，極大豐富了馬列主義的寶庫。因此，我們不僅要總結“文革”成功的經驗，同樣應認真負責地總結教訓。而且，把教訓總結好，對無產階級革命同樣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對這個問題，本人的水準和在“文革”中親歷的局限性，很難把握好、總結好，難免有錯誤，只能說拋磚引玉，望群策群力共同來總結。

這 30 年，叛徒集團對文革存在的問題，雖然花了吃奶的力氣進行挖掘。但由於他們都是為自己翻案，所以他們認為“文革”存在的問題，恰恰是“文革”發展馬克思主義最精華、最精彩、最精闢的部分。另外，毛主席病重時，雖預見到他去世後要在“腥風血雨”中把“多數人反對”的“文革”交給下一代了等問題。但他老人家畢竟沒有能親自看到華、葉叛徒集團“腥風血雨”篡黨奪權的現實，沒有親自看到幾個老帥鬧事，沒有親自看到軍中出了赫魯曉夫，以及沒有親自看到中國高速復辟資本主義，並腐敗到當今每年非正常死亡 800 萬人民生

命塗炭的悲慘狀況。所以，他生前總結文革的教訓“懷疑一切，全面內戰，不優待俘虜”有一定局限性。我們不能把毛主席對文革存在問題的總結當作教條，而應當實事求是地總結文革的教訓。本人再次聲明，本人僅以敢說、敢想、敢幹的個性，對“文革”應吸取的教訓，發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供商榷。

## 一、關於接班人的問題

很多同志都能熟背：路線決定以後，幹部是決定因素。毛主席關於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問題，不僅有許多精闢的論述，而且花了不少精力解決這個問題。恕我直言，毛主席關於這方面的理論，既完整又深刻，但實踐操作上基本上是失敗的。但是毛主席發動的紅衛兵運動等等培養接班人的措施是非常英明、成功的。我這裏指的失敗僅是對毛主席晚年一再擔心中央出修正主義，可是毛主席去世屍骨未寒，華國鋒、葉劍英叛徒集團武裝右派政變，篡奪了政權，而高速復辟變修。從這個角度來看，說基本是失敗的，符合事實。為什麼失敗？很值得總結。我認為從中應吸取的教訓是：

### 1、把接班人看作是選一個人的問題

不管是劉少奇、林彪還是華國鋒，在人們心目中，所謂接班人，就是選一個人，等毛主席百年後當主席。看看這三個人，無一例外當上接班人後，都背叛了無產

階級，都結黨營私、積極搞非組織篡權反黨陰謀活動。另外，選這三個人，除林彪外，其餘兩位被選為接班人，大多平民百姓都感到驚訝，用土話說：“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另外，為樹這些接班人，還都無例外地打擊了一些對接班人持異議或反對態度的老同志。結果是三個接班人都走上邪路而垮了，但為此被打擊的老同志，有不少並沒有真正平反，甚至沒有平反。

在此，順便談談對王洪文同志的看法。“文革”時期，林彪出了問題以後，王洪文一下提為第一副主席，成了接班人。我認為選這個人接班有些太倉促。當然，也有同志說不如鄧小平選的接班人好。這不好比，我們講的接班人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鄧小平選的是修正主義接班人，這好選得很，誰願死心踏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並效忠鄧小平就選誰，同毛主席選革命事業接班人沒有可比性。王洪文在被捕後的被招安的投降表現，足以證明他不是個馬列主義者。江青同志在同這個世界臨別時對王洪文在獄中的評價也說他下跪求降了。關於華國鋒，從目前所有見到的資料，沒有見到毛主席把他定為接班人，否則毛主席就不會當著華國鋒等人的面講：這個班怎麼交，很可能在腥風血雨中交了的話。說華國鋒是接班人，是葉劍英封的。

沒有把接班人的問題，看作是中央一個完整的領導班子統盤解決，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 2、關於老幹部終身制

沒有這 30 年沉痛教訓，對老幹部終身制問題還認識不了有多大問題。我發現和注意觀察研究這個問題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的。四屆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每天僅開兩小時會，原因就是老同志太多，精力夠不上。當時最突出是朱老總，不僅幾個人用輪椅把他抬上主席臺，幾個健壯人把他抬到座位上；尤其當周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宣讀到最後一段時，總理想提高嗓門講下去，結果不僅沒有提高，反聲音低了下去，明顯力不從心了。這時朱老總竟宣佈：現在宣佈散……。坐在一旁的吳德同志反映特快，趕緊把朱老總扶著坐好，才把那個“散”字後面的“會”字沒有講出來，沒有造成打斷總理作報告。現在很清楚，當時總理已病重在身，朱老總、毛主席都不例外。這三個國家三方面的一把手，都病得很嚴重。正是這種狀況下，為幾個野心家積極地從事篡黨奪權陰謀活動，大大創造了條件。

尤其是葉劍英、聶榮臻等幾個 80 歲左右的軍隊“老革命”，依仗終身制，以老賣老，大搞非組織陰謀篡黨奪權活動，最終造成右派武裝政變，使無產階級幾十年革命建成的社會主義江山，毀於一旦。人們普遍驚歎：辛苦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如果不搞終身制，毛主席、周總理都健在時，就建立一個完整的中央集體領導班子，並有嚴格的互相監督的制度和體制，放手讓他們幹。毛主席、周總理等兼個

名義職務，在重大方針問題上指點指點，起個傳幫帶的作用。不搞終身制，葉劍英、聶榮臻等幾個野心家手中無權了，他們篡黨奪權就很難得逞。

## 二、毛主席軍權旁落

毛主席說，“槍桿子出政權”。我看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都要抓槍桿子。“文革”期間，只要毛主席健在，槍桿子絕對能牢牢掌握在無產階級手中。“文革”中不管遇到什麼亂子，就因為槍桿子掌握在無產階級手裏，所以不管是青海問題，還是武漢問題，尤其是林立果搞武裝政變等等，翻不出大浪，都能很快平息。但是林彪問題以後，不久毛主席的健康每況愈下，自然法則已使他再不能指揮自如，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而這十分關鍵的時刻，毛主席把軍權交給了自始至終反對“文革”的葉劍英。另外，林彪事件中起了異心的汪東興，毛主席不僅沒有對汪東興採取任何措施，還讓他仍掌握著中央警衛師的大權。葉、汪的合夥，說白了，在北京城裏，就沒有他們幹不成的事。葉劍英自己說在毛主席病重時就打算綁架江青同志，沒有敢動手，一是怕有風險，尤其在這前 1975 年的較量，鄧小平也感慨沒想到毛主席病重還有那麼大的力量，讓鄧慘敗了；其次葉劍英自述司馬懿知道諸葛亮已病重而不出兵等諸葛亮死後再說，很形象地勾畫了葉劍英急著等毛主席去世後再篡權，才萬無一失。在戰爭年代，沒見葉劍英有何戰功，但玩權術是有兩下的。所以，林彪

問題以後，毛主席的軍權旁落。尤其是“文革”期間的“三支兩軍”，和各級三結合的革委會，相當數量是軍隊幹部當了一把手。可以說文革後期的主要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軍隊手裏。所以毛主席也說：軍隊支左，實際上把“文革”交給了軍隊，而支的也不都是左派。到毛主席病重時，毛主席終於發現：他死後，幾個老帥要造反，要出軍中赫魯曉夫。但已晚矣！

另外，關於長征途中，葉劍英向毛主席揭發張國燾密謀襲擊中央紅軍一事，博得毛主席稱讚他“大事不糊塗”的美譽。我再沒有見到任何人證明有這事的旁證材料，倒是見到四方軍主要領導人徐向前同志有否定張國燾有這一事實的表述。因此，這個問題的真實性，值得探討。

另外，老、中、青三結合的各級領導機構，從實際情況看，絕大部分的領導班子，上從中央政治局，下到一個生產大隊、工廠車間，年青幹部基本上是擺設，有職無權。大家拜讀一下陳永貴同志晚年的回憶，這個問題就看得清清楚楚。

處於這種局面，走資派武裝政變就很容易。而且借用人民解放軍在人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善玩權術的陰謀家，隨便編幾段謠言都能把你騙得跟了團團轉。所以，中國的走資派武裝政變後，能欺騙那麼多共產黨員、人民群衆跟著高呼“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放著鞭炮慶祝資本主義復辟，就不奇怪。

### 三、正確對待左派的問題

“文革”中最奇特的現象是：喊了幾年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尤其在“文革”時期，許多中央文件、中央領導講話和批示等等，都反覆強調這個問題。但“文革”從始至終，沒有定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但當作走資派批鬥的人可不少。在我印象中最深的是鄧小平的問題，批了十來年的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而1975年四屆人大會議傳達的第一個文件就是：(鄧小平)人才難得。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派，怎麼一下變成了“人才難得”？沒有人解釋這個問題。到75年底，又成了永不翻案靠不住、走資派還在走。可見，“文革”期，對走資派又批又戀戀不捨。從良好的角度理解，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但從這30年走資派篡權復辟造成黨變修、國變色的後果，應當說“文革”中對走資派的處理，心慈手軟，犯了右傾錯誤。我們從中應吸取的教訓是：大部分犯走資派錯誤的幹部是可以教育好，但頑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要他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思想教育能改造人，但不是萬能。我在“文革”前不瞭解鄧小平，但他篡權後，除認識他不學習，理論水準很低，很霸道，真認識不了他有什麼“人才難得”。

同樣“文革”時期，從中央主席到各級幹部，都異口同聲要支持左派。但“文革”時期大凡被稱為左派的，相當的數量是反覆被整的物件。而且整起來毫不手軟。全國最有名的是寫了篇揪軍內一小撮的王力同志，可能

被整得不輕（他這些年發表的某些文章觀點本人不認同）。但後來毛主席自己也一再擔心出軍內赫魯曉夫。何況提出揪軍內一小撮的還有林彪、葉劍英。又如肖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等同志，未見任何證據就被說成“5·16”後臺，也整下去了。關於楊成武同志，打倒他的理由：當時傳達林彪的講話說因為楊成武是少數……。誰聽了也不好理解，少數就該打倒？回過頭來看由左派組成的中央文革，一再進行清洗，到最後幾乎成了“光杆司令”了。至於“文革”時期一些左派小官、群衆組織的頭頭的遭遇就更不用說了。右派武裝政變成功後，左派更成了走資派恨之入骨的反攻倒算的重點，左派從各級領導班子被一掃而光，不少左派同志為“文革”甚至獻出了生命。

對走資派寬大處理，而左派卻遭一而再的從嚴處理；甚至是無故被處理，其後果就可想而知。其中少數人因蒙冤而轉不過彎，反成了反毛、反“文革”的成員。對這少數人，是不是左派？值得研究。這少數人的出現，讓我們從實踐中認識了毛主席提出研究《水滸傳》的重大意義。對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來說，即便蒙冤，也不能動搖自己的信仰和革命意志。誰還比毛主席蒙的冤更多嗎？

#### 四、關於黨的建設問題

黨的建設涉及面很廣，在此僅談組織建設，組織建設也僅談發展新黨員。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非常值得

吸取的教訓。我看到的材料中，看到毛主席談了發展黨員問題，解放後不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入了黨。但最近花精力找這段話，怎麼也沒找到，我也忘了在哪本書中看到的了。

解放後，共產黨成了執政黨，發展新黨員的問題比戰爭年代複雜多了。即便在戰爭年代，雖然入黨要冒生命危險，但照樣有投機分子入黨，一夥走資派就是活標本。解放後，問題就更複雜。黨員成分的複雜化，也是右派篡權、復辟變修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你只要對當前某些掌權人作些分析，他們都是長在紅旗下的，也曾是“革命”熱血青年，甚至喊萬歲比誰都響亮，也曾舉著手高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入黨誓言……，並被培養他們“成才”的母校一再引以為榮。但為什麼有的人成了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和反人民的叛徒、賣國賊、走資派、反動官僚、腐敗分子？人民群衆說，100個當官的，抓他99個，還有一個可能是漏網的。儘管這句話講過了點頭，但腐敗很普遍，這是事實。為什麼紅旗下培養成這麼多黨員腐敗官僚？雖主要是叛徒集團篡權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選拔、培養的產物，但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毛主席在世時入黨的，這就不能不認真總結一下解放後黨的建設存在的問題，而決不應學華、葉叛徒集團文過飾非。

中國千年的封建社會崇揚孔老二“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論，許多舊小說、戲劇等等赤裸裸宣揚“十年寒窗”，升官報私仇。解放後，這些封建流毒沒有肅清，又加上劉少奇的“入黨做官論”的毒害，以及解放後過

多宣揚黨員光榮，而宣揚黨員為人民服務不夠。如果你仔細觀察一下社會，有些人就是為了光榮、做官而入黨的。這樣的人要求入黨時，你讓他圍著黨員或黨員領導轉、甚至讓他鑽黨員褲襠他都幹，一旦入了黨就盛氣凌人。這就是常說的這夥人有韜光養晦的“天才”。你只要看看那些變了質的解放牌“黨員”，成了共產黨叛徒、走資派、反動官僚、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賣國賊的，是不是這樣？而且其中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佔多數。其中又以老子是不願改造的走資派和四類分子不願改造的子女佔不小的比例。讓這夥人混進了黨內，一旦他們掌了權，不反黨、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才是怪事。這就是舊戲劇等宣傳的當官報仇論。

另外，前面的章節介紹的本人入黨過程親歷的情況，在此不重複了。

但應當肯定，不管是老黨員還是解放牌黨員，其中多數是合格的共產黨員。另外，雖然領導集團變修了、叛變了。但廣大黨員是好的、比較好的。

至於近 30 年靠走路子、掏錢買了入黨的，這類問題就只能說腐敗透了，就不是共產黨了。

關於“文革”中一些問題，雖還可以舉出一些，但我認為對全局有影響的，主要是上述幾方面的問題。正是由於這些問題，毛主席一去世，走資派能順利武裝政變成功，高速復辟了資本主義。這一沉痛的歷史教訓，對於無產階級繼續革命，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由於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第一次試驗，出現一些不足之處是難免的。

即便現在正在進行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還難免會出現一些問題。革命的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只要我們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的繼續，我們就能正確對待文革中出現的問題。何況文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比起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微不足道的。共產黨從成立，到奪取政權取得全國勝利，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經驗和教訓？！只要主義正，最後勝利，一定屬於無產階級！

## 結 語

國防科委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同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激烈交鋒的重要戰場之一，鬥爭的焦點是重點整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資派，還是劉、鄧迫害廣大幹部和群衆；其實質是堅持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劉、鄧的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場驚心動魄、長達十年之久的戰鬥中，周總理站在毛主席一邊，在關鍵時刻，他挺身而出，支持群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資產階級司令部走資派以有力的回擊。

再回顧毛主席的講話，“毛主席晚年，從林彪問題以後直到去世，一再憂慮：在他死後老帥們要造反，出現中國軍中的赫魯曉夫，怎麼辦？”（參見姚文元《回顧與反思》）。

毛主席病重時說：“葉劍英也是一個對文化大革命極端不滿的分子，再不要讓他插手軍隊的工作了。這兩年軍隊的情緒不穩是和他有關係的呢。許多政治謠言，和他有很大關係呢。”（參見師東兵訪華國鋒談話記錄）。

重讀毛主席這些講話，他老人家多麼敏銳、高瞻遠矚！看得多麼準確、深刻！

毛主席、周總理去世以後，資產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科研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遭到了暫時的挫折，成千上萬的工人、知識份子、老中青幹部、解放軍指戰員遭殘酷迫害，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正是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我們有責任，把被走資派篡改、歪曲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扭轉過來，告訴人們一個真實的文化大革命，盼後來人更加成熟，更加堅定，迎來無產階級革命新高潮！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 編後記

本文從 2010 年 6 月動筆，至 11 月寫成第一稿（草稿），給幾個互聯網下載，徵求他們的意見。《東方紅》網站全文公開發表了，後又分三大部分連載發表了第一稿（草稿）。許多網站轉載了《東方紅網》發表的本文第一稿，使我瞭解了許多熱心網友對本文的評論。有些網友還提出了不少有益修改意見。《東方紅網》為本文寫了按語：“本文是作者對歷史的真實寫照，對毛澤東思想實踐的研究；而且文中有些話閃閃發光”。一位網友發表的評論說：“這是一篇重量級文章，很值得重重一讀，回憶記錄了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全過程，發人深省。同時也有力回擊了過去和現實修正主義、走資派以及他們的吹鼓手，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惡毒污衊和無恥的攻擊。還原了歷史真相。為此，我建議，該網站繼續做出努力，把此篇文章推向社會，推向執迷不悟者……”。有些網友坦誠指出：“有些部分內容較鬆散，和不必要的重複，以及錯別字太多”。有的老同志特別叮囑我在修改時，對一些重大事實一定要細推敲，力爭準確無誤……。這些評論基本上概括了所有網友的評論意見。另外，文中涉及當今最敏感的一些重大問題，本人把大標題略作修改，在幾個互聯網同

時發表十多篇文章，聽取網友意見，爭取把文章寫得經得起實踐檢驗。為節約文字，在此僅舉一例：我把文中“徹底批判‘決議’”一節，改為《“決議”從內容到合法性值得商榷》在幾個網站同時發表了，網友們幾乎全是讚揚聲，在此摘錄其中一位網友的評論：“這篇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章寫得很好。可以預見的是，必定經受得住今後歷史的反覆拷問和檢驗。相反，文章質疑的某人操控下炮製的所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經一九八一年六月問世以來，整整三十年間歷史和社會的反覆拷問和檢驗，已被證明是站不住腳了。根據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完全可以作出相應結論：這份決議應當重新整改。就像一座宏大工程，品質不合格，一定會推倒重來的。這是對歷史和後人負責。”根據衆多網友的意見，我對全文作了反覆修改，於2011年5月完成第二稿（修改稿）。于7月印出了幾十本作為“討論稿”。但沒想到這幾十本“討論稿”一下傳到了好幾個省市，一些讀者紛紛打來電話暢談意見。8月8日，幾個熱心的網站召集和參與一次專門研討文革的會議，本文為研討的重點內容。會議從上午九時一直到下午五時，與會專家、教授、老幹部熱烈發表了高水準的意見。本人參考以上各方面意見，作了認真的分析和修改，於8月底完成本拙作，歷時一年又兩個月。在此，對“東方紅”、“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等網站、熱心的網友們和參加研討會的專家、教授、老幹部表示衷心感謝！

實事求是講，本書中引用了許多同志的研究成果。

例如關於“大躍進”一節，幾乎全文引用了甄石著《誰嫁禍了毛澤東——大躍進五十週年回憶錄》；凡引用的部分在文中都註明了有關同志發表的有關文章出處。另外還引用了一些不贊同文革的朋友發表的文革方面的文章，本人均未註明出處；因為考慮到這些朋友隨著時間推移，其中大多數會改變對文革的看法。在此，對所有這些同志和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由於本人水準等諸多因素限制，加上文中涉及到一些同志披露的內容（特別是一些資料），本人無法核查其真偽。因此，難免有疏漏或失實錯誤之處，望讀者批評指正；本人的電子郵件：[yunrenxiang@sina.com](mailto:yunrenxiang@sina.com)。

最後對研究文革感興趣的同志推薦一本新書：2011年7月《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的釋悟法居士編著《關於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網文摘編》一書。該書對文革時期中央有關文件和指示精神，以及各重大事件的具體情況，和近些年發表的關於文革的文章，較全面歸納了整個文革的概貌，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彌補了本文不足之處。

惲仁祥

2011年8月底於北京

#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書目

- 四十三年望中猶記 吳焱金 口述 鍾 逸 整理
- 悲欣交集話文革 曹承義 初稿 鍾 逸 整理
- 百年尋夢——一個辛亥武昌首義元勳家庭的百年政治命運 李承弘 著
- 不再沉默——一個文革親歷者的回顧與思考 武彩霞 著
- 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楊道遠 著
- 敢死隊 歐陽健 著
- 機關——武漢市委機關文革回憶 魏繩武 著
- 飛鳴镝——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
- 肖健卿 李近川 主編
- “地質東方紅”興亡史——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 聶樹人 著
- 親歷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 李木森 回憶 何 蜀 整理、註釋
- 我親歷的國防科委文革 樊仁祥 著
- 一定要活出個人樣來——北京“地派”二把手的回憶 聶樹人 著
-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 [法]夏爾·貝特蘭 著 中國工人網 譯
- 武漢“七二〇”事件實錄 徐海亮 著
-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群眾的文化大革命史 童小溪 著
- 真實的張志新和遇羅克 索 風 編
- 毛澤東億萬稿酬之謎 索 風 編
- 改革開放年代的資本運動 嚴 峰 著

ISBN 978-988-16347-2-6

A standard linear barcode representing the ISBN number 978-988-16347-2-6.

9 789881 634726